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半 批 斋 书 今 谈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读书阅世丛书
半拙斋古今谈
唐振常著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新华书店经销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1/32
印张：8.625
字数：227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7—5440—1420—7
Z·7**定价：**9.20**元**

读书篇

君子可欺以其方　　难罔以非其道

君子可欺以其方　难罔以非其道

——论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之诬

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世人更知陈先生之孤怀卓荦、高风亮节。近有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自称与吴先生为 38 年的生死之交，是书之作，乃为“以心香之诚，泪酒之悲，纪其实而存其真”，在封底更揭曰：“谨以此书祭奠吴宓，祭奠千千万万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文革劫中，含愤忍冤殒沉的莘莘学者书生；并祈愿，哀恸不再，灾患不再，悲剧不再。”果如此，则其用心立志可谓光明正大，宜乎受到世人的欢迎了。此书确实也曾一度得到不明真相的读者欢迎。以陈吴两先生之一世深交，以两先生之思想与共，以两先生之道德高尚，以两先生之学术覃深，两部据实记述二先生之作，应该可成双璧。然而，细审之下，大谬不然。陆书言必有据，信而可征，根据大量档案资料、文字记载和访问笔录，写出了真实，写出了真实可信的陈先生及其时代背景。张书则多向壁虚造，穿凿附会，虚构了一个吴先生，乃成对吴先生之诬，对吴先生道德人品之诬。虽假托至交，编饰成书，可以欺不明真相之读者于一时，毕竟不能得遂其志于永久。此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也。吴先生乃方正之君子，在世之时，以其方而时为人所欺，想不到逝世十九年之后，竟亦为人织造了一个颠倒了的形象。但是，罔其非道，则万万不能，虽不能起吴先生于地下而辩之，吴先生的友人仍在，吴先生的学生还在，学界人士爱吴先生尊吴先生者多多，辨别是非真伪，大义所在。忝为吴先生弟子，此文之作乃为辩诬。其已见于季石《〈心香泪酒祭吴宓〉质疑》（1997 年 5 月 29 日文汇报《笔会》）者，不赘。

《吴宓日记》无张紫葛三字

吴先生一生写《日记》不辍，这已是学界所共知。与吴先生熟悉的朋友，看过吴先生《日记》的人更知道，凡与吴先生有交往的人，即使一面之缘，吴先生也在《日记》中记上姓名及因何得见。数年前，吴先生女公子学昭整理先生《日记》，即告我写一简介以作《日记》注解，说是《日记》中写及我。所知，在上海同时被通知写简介者，尚有同学多人。我们这些同学，当年都读了吴先生的教课，男同学且与吴先生同住在男生宿舍，接触不算是很少，吴先生笔而记之，犹可说。友人王勉，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的学生，在联大读书时未选读吴先生教的课程，只是一次日机空袭昆明，在防空洞中与吴先生相遇，交谈数语而已，昨日晤王君，说是也曾得通知写一简介，以备《日记》之注。可见吴先生《日记》不漏相识之语不虚。张紫葛先生自称与吴先生为三十八年的生死之交，何以在先生《日记》中不见半点踪影？张紫葛为此在书内精心编造了一个吴先生“改造日记”的神话，说是吴先生为了保护这位生死之交，把凡是涉及张紫葛的，全都改造了。不是简单地抹掉，而是彻底地改造，剪裁，重写，装订，等等，一看之下，竟是“天衣无缝”。此等神话，徒令细读《吴宓日记》的季石厥倒，季石《质疑》之文详述其事，人当服其文之可信。《吴宓日记》只此一份，皆如先生在世所写原样，将陆续出版，国人得而共读，张紫葛为此不经之说，勿乃欺人欺世太甚。

带着 4000 册书逃难！

张紫葛在书中《后记》（页 455）有一段话：“至抗战前夕，他（指吴先生）的私人藏书已逾（按原文误为愈）万册。其中不少珍版善本。南下赴长沙时，他选带了 4000 本之谱，其余均寄存在北京亲戚家中。经过长沙南逃，

过香港，转云南，所带图书少有损失（振常按，不知是否为稍有损失之误）。于 1939 年挑了 1000 余册赠给了西南联大图书馆。1944 年至成都，鉴于内迁的燕京大学图书严重不足，他又挑了千余册赠给燕京大学图书馆。”

按，吴先生于 1937 年 11 月 7 日偕毛子水等离平赴津，乘船至青岛，登胶济火车，到汉口，又换乘粤汉火车，走走停停，于 11 月 19 日到长沙（据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路上行程共 12 天。以一文弱书生（加上陪行的几位）竟能在交通困难、旅途拥塞的抗日战火中，携带着 4000 册书的重负长途跋涉，真是不可想象的事。张紫葛先生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他自己能相信吗？

吴先生到成都燕京大学之时，我正就读于燕大，未曾听说先生向燕大图书馆赠书的事。那时我们图书馆的书，的确少得可怜，小小一间书库，大约千余本而已。图书馆主任是梁启超的女公子梁思庄女士，同学和梁女士都常埋怨书少。如果吴先生一下赠书千余册，是件大事，会传开来的。张书中没有提吴先生赠送的千余册书是自己从昆明带到成都，还是后来托运到成都的。按吴先生于 1944 年 8 月 23 日自昆明出发，经贵阳、遵义、重庆、白沙到成都，于 10 月 26 日傍晚到达成都，时已在湘桂大撤退之后，入抗战后期，交通情况更坏，所以吴先生行程竟长达两月之久，自更不可能带着 1000 多本书经此长行。为张紫葛解，好在他没有说吴先生是亲带千余册书同来的。吴先生和我们同住在华阳县文庙的男生宿舍，犹忆吴先生只身一人住一小屋，行李简单，书籍无多，孤灯如豆，极为凄凉。

此题所谈是极小的小事，虽极小之事亦作伪，大事如何，可知矣。

关于朱小姐

张书（页 269 至 275）讲了一段所谓朱小姐偕其兄于 1953 年 4 月自天津远道来重庆探望吴先生的事。抗日战争开始之前，朱小姐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读书，吴先生在此校兼课，朱小姐是吴先生的学生。吴先生由北平南下，由朱小姐陪同至天津。又由朱小姐的兄长陪吴先生南下至长沙。据张书所述，朱氏兄妹此时忽来重庆，实因朱小姐在北平时就爱上了吴先生，此来欲圆旧梦。到渝后，才知吴先生已经和邹兰芳结婚，乃向张紫葛吐露衷曲，悻悻而去。张书此前写到吴先生“改造日记”事谓：“1937 年冬离开北平一节，删去了朱小姐等平大女生掩护吴宓由平逃津；也就一并删除了朱小姐的哥哥陪送至长沙情节。理由：如此情节留于日记中，也被认为汝吴宓处处惹草拈花，实为一‘道德败坏之徒’。”（页 147）

按，季石所写对张书的《质疑》，谈到张紫葛所谓吴先生删去有关朱小姐情节，季石文发表在《笔会》时此节被删，兹引录季石原稿如下：

> 事实上，吴先生现存日记里详细记述了抗战开始时离北平南下的经过。如果真有朱小姐随行，也实不必删。因为吴先生当日照护同行一路到长沙的女生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其中有陈援庵先生的女儿陈慈，却没有朱小姐，也没有她的哥哥。当年是如何动身的，路经哪里，乘车乘船都发生了什么事，吴宓日记里可说是巨细无遗。当年的随行者，如今健康、清明如昔，历史岂是可以乱改的。至于朱小姐，确是在北平时吴先生的学生，与她的交往，在现存吴宓日记中也记得很具体。而吴先生日记所记与女性学生或女性友人的交往很多，也往往坦率记录自己对她的观感和想法。这些内容都完整保存，当然也无必要单单删除有关与某一女学生来往的记录，何况日记中有关朱女士的内容历历俱在，并没有删除。

不知仲旗公之名

张书自称在认识吴先生之前，先认识了吴先生尊翁仲旗公（按仲旗公为吴先生叔父。吴先生幼年奉祖母命，嗣与仲旗公为子，称仲旗公为父、嗣父，称自己父亲为爹。先生终生敬事仲旗公，情过骨肉），他是奉了仲旗公之命与吴先生订交的。张书详记经过说，1939 年他在重庆，时去于右任家或衙署，“ 彼时，我见于府有一位老年常客，很受于公尊敬。这就是于公尊称为‘ 吴公 ’ 或‘ 仲旗公 ’ 的贵客。 ”“ 既然我们都是于府常客，自不免互相交谈。吴公熟悉经史，尤爱春秋三传，我更少年意气，喜纵谈诸子百家之说，因而一老一少，颇为投机。 ” 一天，仲旗公问张知道吴宓否？方知仲旗公和吴先生是父子关系，即对仲旗公表示早已敬仰吴先生，愿为吴先生弟子，请仲旗公为之介绍。仲旗公表示愿介绍他们做朋友。“ 大约是 1939 年 8 月初旬的一天上午， ” 张紫葛应于右任电话召去于府，得见仲旗公偕吴先生在座。仲旗公对吴先生和张说：“ 希望你们做个兄弟般的朋友。 ” 张表示愿对吴先生执弟子礼，吴先生则以为张是宋美龄的秘书而“ 不敢高攀 ”。“ 吴老太爷颇为不悦：‘ 你怎么说这些生分话？我斟酌久之，才给你们慎重介绍。岂可说出这些市俗客套话。 ’ ” 于右任拣出张的两篇文章给吴先生看，又说张是“ 后生可畏 ”，“ 将来未可限量 ”。吴先生当场看了文章两遍，说是“ 很有梁任公行文之妙 ”。“ 吴宓就表示，很愿和我切磋学问。但一定要遵父命，作朋友。 ” 张则坚持师事吴先生，还是经于右任一番开导，“ 就这样，我们订了异姓手足般的忘年之交。 ”

不惮辞费，引述张书，凡未读张书者，当亦从此段引述得见张紫葛说来似是确切可信了。事实并不然，季石《质疑》文已证，检索吴先生《日记》，不但张书所指之“ 1939 年吴仲旗先生却根本不在重庆，而是在陕西西安。 ” 又证：“ 事实上，吴仲旗先生在其一生中始终就没有到过重庆。 ” 而张书所谓识吴先生之 1939 年 8 月初旬，季石列举吴先生在昆明正忙于所办的各种事务，亦无缘得去重庆。则张紫葛绘声绘色描述的与吴先生在重庆于府订交之事，只能是完全落空了。

事情更有读者所不可能想到的一面，张书既称屡见仲旗公，“ 一老一少，颇为投机 ”，仲旗公并为他介绍吴先生“ 做兄弟般的朋友 ”，怎么会在他自称“ 写成《吴宓的第三个 28 年》（振常按，当即为《心香泪酒祭吴宓》之原拟名），已洽妥，即将出版 ” 之际，于 1995 年 12 月 3 日写信给吴先生幼女学昭，说是“ 专函请你协助两事 ”，两事之第一事为“ 校正我记忆未清的几点 ”。其第一点，赫然写着：“ 你祖父和两位姐姐的名字。 ” 天下事的怪异还有过于此的吗？对于这么一位屡见的“ 颇为投机 ” 的长者，且是生死之交的至友的父亲，竟然不知其名？说是一时记不起来了。张先生在他的《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一书中，不是以他的惊人记忆力自负吗？且自述所以受宋美龄赏识并得为宋的机要秘书，即由于他的惊人记忆力而起。在这本《心香泪酒祭吴宓》的《后记》中，不是也说他的记忆力绝对可靠，所记“ 绝对准确 ” 吗？此事有待于张紫葛先生指教。

《观且感》真相

据张书所述，吴先生于 1956 年给他看了行狂从 1956 年 6 月 24 日至 1956 年 10 月 4 日所写札记一册，共 30 则不到。张自称印象最深的是两则，一则题《苟不教，性乃迁》，藉为 J 女生补习古文事，阐发有教无类思想。一则题《观且感》，述吴先生于 1956 年 9 月 30 日晚参加中共重庆市委国庆招待

会及 10 月 1 日参加国庆观礼情况。（张书页 310 至 321）

张文详述《观且感》的内容及吴先生的感想。张文写得有声有色，长达 4 页，谓吴先生于 9 月 30 日下午乘市里派来的专车，自北碚乘车入城。“ 市委的国庆招待会，富丽堂皇。陈设华贵，宴馔丰美。宴席连绵，琳琅满目。首尾宴桌之间，遥远难辨人貌。济济多士，其盛大有似欧美之国宴。……一省辖市之国庆招待会都有如此规模，亦可概见今日中华繁荣之一般矣。 ”“ 宴罢，接以盛大的舞会。……场内如云之美女，衣履华丽美艳。有短裙半袜，亦有窄裙袒胸，花色繁多，争奇斗媚，却是绝无蓝色干部服。且伊等大多施粉着脂，香气四溢，余乃大为快慰。 ”当晚宿市委第一招待所，“ 甲级房间，衾枕清洁。 ”次日，乘车至市中心解放碑观礼，又是大篇描写，大段感想，无非夸游行队伍之雄壮，堂堂中华之气象万千。且勿论孤怀卓荦、忧道忧世之吴先生能为此庸俗不堪之文，表现出如斯受宠若惊之状态与否，从事实看，1956 年中共重庆市委的国庆招待会、重庆市国庆游行，都只是张紫葛先生的虚构，吴先生参加而发抒感想之说，更是张先生的想象。

今据吴先生《日记》，1956 年 9 月 30 日是星期天，先生整天没有进城。没有什么人送来请柬，自没有什么入城参加国庆招待会的事，而是在学校宿舍内“ 终日整理书物函稿 ”，“ 至深夜始寝 ”。10 月 1 日先生倒是去参加了国庆庆祝会的，但不是在市里，而是在北碚区，规模并不盛大，如先生 10 月 1 日《日记》所述：“ 今年国庆节之庆祝游行，一切从简。 ”所以没有什么招待宴会，也没有所谓的吴先生“ 登观礼台 ”，而是：“ 宓今日携绿帆布铁架义凳（又俗名马乍子），在会场得安坐，免席地。 ”这一天的《日记》又记着：“ 晴，热。国庆节。晨 7：30 在操场集合，宓偕豫往。入队，与史地系平、陶及吕烈卿（外文系）同列，随校队至北碚体育场。9：00 开会，11：00 毕。从平劝，宓与豫、陶径归，未参加游行。比宓等正午归抵校，游行队亦已散归矣。 ”

事实就是这样明白。张紫葛公然作伪。他为什么要作伪？看他书中写 1956 年前后的吴先生，简直活跃已极，对形势极为乐观，屡作“ 拥护 ”、“ 高呼 ”之谈，尽是趋时媚世之调，甚至于平生不祝酒的吴先生，也高呼“ 为……而干杯 ”。（按，张书杜撰吴先生在宴席上喝醋而不喝酒之说，实则吴先生是喝酒的。）《观且感》只是其一。1956 年前后，阶级斗争的调子唱得少一些，形势呈现缓和，确有不少知识分子为之欢呼，吴先生却不是这样的人，他始终是个远离政治的学者，头脑冷静如初，厌恶政治如初，坚持维护中华文化如初。《观且感》的思想，不符合于吴先生。不多举，只引《观且感》中一句：“ 今社会主义改造业已完成，实应举国上下，万众奋发，致力于科学技术之精进，力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突飞猛进。 ”这就完全不符吴先生的思想。吴先生诚然赞成和拥护要搞经济建设，但自 1919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初识陈寅恪先生，多次倾谈，即得共识：“ 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 ”“ 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于人欲横流，道义沦丧。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页 9 至 10）是以先生一生服膺中华优良文化，维护中华优良文化，舍文化而言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非先生之意也。张紫葛自称与吴先生有深交，竟全然不顾吴先生一贯的思想，做此伪托，胆可谓大矣。

张紫葛确实胆大，大到可以公然搬出一个死人来做他的老师。请看下节。

死人教没有出生的人！

张紫葛记他经张季鸾推许，拜见于右任。其书第三页这样写着：

于右任问及我的家庭和求学经过，叹为苦儿困学。复问师承，我答：曾拜门于清进士吴之英先生。于右任知道吴之英师与章太炎同窗于清儒俞樾的“春在堂”，盛赞吴师道德文章。又问先师授我何业，执何经。

我简单回答了几句，说：“我拜门时先师年事已高，精力很差，尤其我少不更事，因此学无根底，有玷先师门墙。”

以上所举，已经超越神话，只可于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得之，或者与近年为气死历史学家而编制的“戏说”的所谓历史题材电视剧相近。

奇怪的是，编造此说之时，或写作这本“事实可靠”的《心香泪酒祭吴宓》之时，张紫葛为什么不去查一查书？

按，吴子英，字伯朅，吴西蒙愚者，四川名山人。生于 1857 年，卒于 1918 年。四川尊经书院毕业。1887 年后任通才书院主讲，尊经书院都讲，蜀学会主讲，《蜀学报》主笔，推动戊戌变法。入民国后，任国学院院正。著有《寿栎庐丛书》，是一位“熟精选理，尤好诵说司马相如、扬子云之文”的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他是反孔健将吴虞（又陵）的老师，吴虞从他“问卿云之学，穷文章之奥”（《吴先生墓志铭》）。据香港 90 年代杂志社出版的张紫葛《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所载《作者简介》：“张紫葛，1920 年生于湖北松滋县。”

这就奇了！一个 1918 年已经死了，一个 1920 年才出生，死了两年的人怎么去收一个还没有出生的人做学生，或者说一个死了的人怎么去收一个方呱呱坠地的婴儿做学生。此事之伪，不辩而明。

谎话还有。吴伯朅并无功名，不是什么进士，也不是与章太炎同窗同为俞樾弟子。四川尊经书院是张之洞为四川学政时倡办的。主讲为湘潭王闿运，吴之英为尊经书院学生，何曾去做俞樾的学生。章太炎执贽俞樾是杭州的诂经精舍，非苏州的春在堂。还有一层，吴之英所长是文章之学，由上引文可明，也就不会有于右任“又问先师授我何业，执何经”的说话了。开口便假，张君何以解释。此事无关于张紫葛之记吴宓先生，读之可作参考。

《黑夜送别》是捏造

张书有《黑夜送别》一章（页 423 至 436），写 1976 年 11 月吴先生将回老家陕西泾阳之前，在漆黑午夜中，偕刘尊一前来向张紫葛告别。张自称于 1958 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十五年，刑满后送回重庆北碚接受“群众管制”。吴先生来向他告别时，他方被斗争了一夜，在回家的路上，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吴先生和刘尊一叫住了，他们就是这样在路边告别的。书中（页 433 至 434）是这样写的：

今日吴宓收到陕西他妹妹吴须曼来信，打算叫她儿子（吴宓的甥儿）来北碚接他归老家度晚年。吴宓决定今晚在这儿和我说几句话。

吴宓：“是啊！紫葛，我可能最近就回陕西老家，我视力昏，不能自理生活了。……今晚就算告别吧！”

后来，刘尊一告诉我，就在这黑夜送别后的第三天，吴宓的甥儿——他妹妹吴须曼的儿子

> 突然来了。小伙子办事伶俐，先找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办好交涉，革委会同意他领吴宓回原籍去赡养后，他才来到吴宓的宿舍，见他舅舅。

张书又说，吴先生走时，有刘尊一送行。

这里有几件事实须要辨清。一是吴先生被接回泾阳的时间，是在 1976 年 12 月。吴须曼在“ 文革 ”中，曾三次从泾阳来重庆探望吴先生，最后一次是在 1976 年 12 月来的，而非 11 月。这或许可说是张紫葛记错了，那么，二，吴须曼是在 12 月到西南师院看见吴先生后，决定接先生回家，经先生同意，并得校方同意，同时电召其子王玨、女婿鲁予生来渝接先生。其事极为仓促，先生何能有暇去向张告别？三，吴须曼之所以决定接吴先生回家，是因为她发现先生眼盲腿折，重病卧床，不能行走。吴先生既已不能行走，怎么可能去向张紫葛告别，且是“ 黑夜送别 ”？四，书中所写刘尊一女士，是张的老朋友，张书多次写《日记》记及刘尊一，说是“ 素不喜其人 ”，从不来往。据吴须曼回忆，她接吴先生回乡时，只有校方前去送行，并无刘尊一其人。五，同据吴须曼回忆，三去重庆，从未见过张紫葛，也从没有听吴先生提起过张紫葛。这一点，只能留待张先生本人思考了。厚诬陈吴二先生之交

张书《淡淡的悲哀》一章（页 348 至 353）厚诬吴先生，厚诬陈寅恪先生，厚诬陈吴二先生一生深厚的友情，不可不词而辟之。

张书此章写了吴先生 1961 年 9 月专程去广州探望陈先生之行，开端似为陈吴二先生晤谈做一总结，说是“ 两人意见一致的是 ”，这已经够怪了。两位相交多年的至友晤面，畅叙别情，切学问，哪里用得着类如发表公报一般的形式，标举一致的意见？而所谓相一致意见的第一条是：“ 都希望神州大地像 1956 年那样发展下去。”吴先生未曾对 1956 年有过幻想，已如上文《〈观且感〉真相》所述，陈先生更是如此，精研学问，撰述名篇，丝毫不为外界风雨所动。管它什么东西南北风，吹不皱一池治学的春水。既写两人意见之一致，就必有不一致的意见，接下去，果然出现了“ 却也小有分歧 ”的字样。

“ 分歧 ”云何？张紫葛举出 1952 年 7 月 8 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吴先生关于自己思想改造的文章，标题为《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张居然说是，吴先生带去了这篇文章，念给陈先生听了。于是有如此一段妙文：

> 陈安静地听他念完全文之后，徐徐询问：“ 文中所言，悉出肺腑，并无追作之词？ ”“ 是的。 ”“ 秉笔为文之前，即知此文即将刊之报端乎？ ”“ 当然知道的。 ”沉默。吴宓折叠收拾好文章，陈寅恪才说：“ 他们没叫我写这样的文章。当然，如果叫我写，我也是不会写的。这一点，你比我强。 ”吴宓默然，未置一词。内心却对陈寅恪的“ 壁立千仞 ”并很不赞成。但他未对任何人说过。（振常按，张书原文此段是分行排列，为省篇幅，我把它连写如上）

以上所谓“ 分歧 ”，全是捏造诬陷。据所知，吴先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屡次检查，未能通过，后在领导和同事“ 多方帮助 ”下，勉强再做检查，文章乃被校方拿去公开发表，刊于重庆《新华日报》，相继为《光明日报》及上海《大公报》全文转载，吴先生对自己的违心之言和此种做法极为痛苦，时有自责之语。至同年 10 月 2 日有友人告诉吴先生，说是当局已将先生这篇思想改造文章译为英文，对外广播，“ 以作招降胡适等之用 ”，先生在当日《日记》中于此语之后，记下了“ 此事使宓极不快，宓今愧若人矣！ ”的痛

心语言。《日记》中，同年 10 月 3 日阴历中秋节，有《壬辰中秋》一诗，写先生自责被迫写思想改造文的违心，诗中有句云：“ 心死身为赘，名残节已亏。 ”末句重申素志：“ 儒宗与佛教，深信自不疑。 ”此诗可以为先生作证。再引一事以为参证：吴先生是红学大师，1954 年“ 批判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时，吴先生自不能免被强令写文章批俞。这一回，吴先生是顶住了，坚决拒绝，然对此深感内心痛苦，同年 11 月 19 日《日记》云：“ 自恨生不逢辰，不能如黄师（按指黄晦闻）、碧柳（按为吴芳吉）、迪生（按为梅光迪）诸友，早于 1954 年以前逝世，免受此精神之痛苦。 ”对于“ 批俞 ”之事，尚且感到如此痛苦，何况是切身所关的“ 思想改造 ”之自污乎？对于这样一篇极感痛心的文章，还能加以张扬，讲与人听，又是读给几十年心灵共通的陈先生听吗？其事之荒谬编造，人共识之。再举一例。《吴宓与陈寅恪》页 145，引 1961 年 8 月 31 日《雨僧日记》述陈吴二先生是日谈话内容，在“ 其间宓亦插述宓思想 ”后，出版时删去数字，意义大变，应为“ 其间宓亦插述宓思想改造、教学改革经历之困苦与危机 ”，原意甚明，对于思想改造与教学改革不满也。

张紫葛的编造不止于此，更深一层的对陈吴二先生的诬陷，接踵而至。紧接前文，所谓吴先生对陈先生的“ 壁立千仞 ”很不赞成而未对任何人说过的话，“ 直到 1974 年吴宓在本书作者的那间小屋里和作者叙述这段往事时，才一一引举如下。 ”按张书所述，吴先生所不赞成于陈先生的事是，陈先生对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条件“ 很欠明智 ”，“ 只可解释为故意激恼对方 ”；红专大辩论，大字报贴到陈先生家门外，陈先生不该生气，不该询问领导，不该提出辞职，不该提出搬出中山大学。如此等等，难于想象张紫葛是如何编织以陷陈吴二先生的。陈吴二先生已逝，说自由我说，但是，张紫葛忘了一条：吴先生广州之行，留下了两万多字的《日记》。《日记》正在整理，陆续发排、出版以后，张紫葛何以对天下人？

张紫葛笔下此事未完。吴先生既有上举“ 这么几条（对陈先生）不以为然，却是秘而不宣，这岂不是腹诽？少年莫逆之交，乃此腹诽，大非朋友之道。别后，吴宓越想越觉不爽。 ”于是，吴先生便拟再访陈先生，“ 俾得坦率直陈，讨论讨论这些不以为然之处。 ”其实，吴先生计划再到广州，完全是为了视陈先生折膝之伤（陈先生于 1962 年 7 月入浴时跌倒，右腿骨折断），吴先生于 1963 年 10 月得知此事，因而计划去看望陈先生。几次计划出发，均因故未成。此中过程，详记于《吴宓与陈寅恪》中，此书连同《吴宓自编年谱》，吴学昭曾寄赠张紫葛。张紫葛只顾抄录于他“ 有用 ”之处，不惜歪曲和编造其他事实。

吴先生确实对于陈先生说过“ 壁立千仞 ”的话，那完全是对陈先生崇高的颂扬。1961 年 9 月 3 日，在广州，中山大学陈序经先生及夫人请吴先生在陈家早餐，相对畅谈，陈序经先生又谈到“ 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锜、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今寅恪兄在此已习惯且安定矣。 ”（1961 年 9 月 3 日《雨僧日记》，转引自《吴宓与陈寅恪》，页 146）则“ 壁立千仞 ”之语，可能是陈序经先生的原话，更可能是吴先生听了陈序经先生对寅恪先生情况简介后所作的概括，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显然是对陈先生的最高颂扬。“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试问，此种境界，不是对陈先生学问、道德、人格的颂扬是什

么？自古至今，有多少人都以此种境界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箴言，企求达到这个地步。而张紫葛却反其意而用之，反其意而加之于吴先生，以为是吴先生加于陈先生的微词，何其妄也。

1961 年 9 月，吴先生自广州到北京，贺麟告诉吴先生，周扬曾主张调吴先生进京为中央文史馆研究员，贺麟表示愿陪老师去见周扬，先生拒绝了。先生手订的《吴宓自编年谱》（页 231）这样写着：“ 宓惧祸，辞未往。（若竟从之，后来周扬得罪，宓必致牵连。然谨慎不往，伏处西师，1968 年以后仍受种种之惩罚与斗争，则何如其往耶？）惟就此事而论，周扬实为宓之真知己，亦‘ 可人 ’哉！ ”到了张紫葛笔下，竟又拉扯上陈先生，颠倒为吴先生之拒绝访周扬，是为了和陈先生比高低。张书（页 352）如是写：周扬拟访陈先生，陈先生先是拒绝，后经陈序经反复劝说，勉强同意。“ 到陈序经陪同周扬来访，周扬态度谦逊，而陈寅恪却很为矜持，并且主动问难。说有关领导人说话不算数，‘ 言而无信 ’。周扬耐心解释，陈寅恪却一再责难。然而周扬始终彬彬有礼。 ”（振常按，周扬后来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他那次“ 不该激怒陈先生 ”。张紫葛何以解！）张书接着说：“ 陈寅恪以周扬来访，矜态相见。吴宓上访周扬，还请贺麟先容。我吴宓与陈寅恪情同手足，学问虽自愧弗如，品格历来相同。奈何今天在周扬名下高下差别如此？两相比较，能不自愧？ ”这是张紫葛论定吴先生拒访周扬的一个理由，只能说是以己之心度君子。

陈吴两先生一生的友谊，吴先生对陈先生的佩服尊重，两先生心灵相通，患难与共，世所共知。张紫葛先生只顾自做文章，全不考虑。为了提醒张先生，于此稍加摘引陈吴二先生相知之深的证明。1919 年哈佛初识，倾谈定交，终身皆秉初旨。《空轩诗话》有文述：“ 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 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 ”陈吴两先生哈佛对谈的内容，陈先生所谈对于吴先生影响之深，具见于《吴宓与陈寅恪》一书所引《雨僧日记》，可为佐证。此后，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两先生所谈更广更深，关系于中国文化之前途，立身处世之道，以及立学之本，亦可覆按。1927 年王国维先生自沉，对于两先生影响极大，陈先生以为：“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作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痛苦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王观堂先生挽词 · 序》）陈先生在写成此文前，对吴先生谈了以上观点。吴先生谨受教，而表示：“ 而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 ”这是两位大师、文化巨人不惜以身殉文化的悲怆壮烈之语。吴先生读王静安先生临殁书扇诗，有感写成《落花诗》八首，痛陈文化衰落之苦，可参。因而，吴先生乃有王静安先生灵前之誓：“ 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泱忍以殁，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 ”（《吴宓与陈寅恪》，页 43）到了“ 文化大革命 ”，陈吴两先生果然以身殉文化了。

正唯陈吴二先生的友情是建立在共同的认识和理想上，是真正的知音，便两心相通，至死不泯，况之古人，伯牙子期，也不过尔尔，是以才有彼此间的关切。1961 年，吴先生有广州之行，后又多次计划再去广州，是一例。而在 1971 年 9 月 8 日，吴先生还戴着“ 牛鬼蛇神 ”帽子，在四川梁平劳动改

造之时，竟以无畏的勇气，写信给中山大学，探问已经逝世两年的陈先生下落。这不是一般常人之情，非心灵相通如二先生者不能办。小而至于，1944年吴先生之离开西南联大到成都燕京大学授课，就是因为陈先生到燕大去了，“遂决即赴燕京，与寅恪、公权（按为萧公权先生）共事共学。”（《吴宓与陈寅恪》，页110）甚而梦寐之间，吴先生亦念及陈先生。如1952年12月30日，《日记》记：“28日未晓，梦与陈寅恪兄联句，醒而遗忘。”（《吴宓与陈寅恪》，页133）1971年1月29日《日记》记：“阴，晦。上午身体觉不适，心脏痛，疑病。乃服狐裘卧床朗诵①王国维先生《颐和园词》，②陈寅恪君《王观堂先生挽词》等，涕泪横流，久之乃舒。”（《吴宓与陈寅恪》，页154）1973年6月3日《日记》记：“阴雨。夜一时，醒一次。近晓4：40再醒。适梦陈寅恪诵释其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枝雁’，莫解其意。”

陈吴二先生作诗唱和、互道衷情之作甚多，备载二先生集，不引，只转介未曾发表的吴先生一首诗之数句。上引1952年12月30日《日记》“梦与陈寅恪兄联句，醒而遗忘”后，紧接“乃作一诗怀寅恪云”。其诗前四句为：“两载绝音响，翻愁信息来。高名群鬼瞰，劲节万枝摧。”第二句云“翻愁”，当指当时“思想改造”运动，可为前述对“思想改造”之痛苦感佐证。后二句自指肖小之徒对陈先生的攻讦。末二句为“昆池呜咽水，只敬观堂才”。自是言陈先生独佩服自沉昆明湖的王静安先生，亦可移用于吴先生以陈先生比王先生，而独佩之。吴先生向以“受教追陪”于陈先生为荣，吴先生1959年7月29日《寄答陈寅恪兄》诗“受教追陪四十秋”可证，吴先生结识陈先生后之行事可证。

本节文字写来较长，窃以为陈吴二先生之素志未必为人所尽晓，而二先生毕生相知之深，相交之笃，实是古道不泯，乃竟为妄人所歪曲和伪造。辩之，不只为止妄人之口，且为明正道、正人心也。

颠倒了吴先生

吴先生一生为保卫中华优良文化，献身学术，乐道，明道，卫道，远离政治，与现实政治无涉。先生早年有“二马之喻”，即一面欲图事功，一面欲“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娱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先生曾欲兼得此二者，所以喻为“譬如二马并驰，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面挚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1927年6月14日《雨僧日记》，据《吴宓与陈寅恪》引）先生所谓事功，不是入世谋政治上的事业，而是以自己的力量，组织人谋学术文化的发展，那就是先生与志同道合者创办《学衡》，倡明国粹，融化新知；独力主办《大公报·文学副刊》，筹办并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等等。这一方面的事业，和先生毕生研究学问，培育青年相并进。先生是以学人而兼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组织者倡导者与保卫者。先生毕生乐此，对现实政治不只远离，而且厌恶已极。“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之时，先生甘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大不韪，而反对批孔，即是反对政治干预学术。与朋友交，不言政治，只谈学术。在张紫葛笔下，吴先生变了一个人，不但热衷政治，分析形势，趋时媚世，乐在其中；对于他在解放初期享受的政治待遇，极感自得。还乐于“见大人”，如书中所谓的求见邓小平（尽管不是为自己）。甚且杜撰给毛泽东、邓小平算命这样厚诬先生的不经之事。甚至于说，1956年匈牙利事件初起，先生竟能联想到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一定会紧起来，这在一个纯然不懂政治的吴先生身上，绝无可能。

吴先生为人光明磊落，方正纯朴，心口如一，从不作谎语，不知如何应付人事，或可说是迂，或可说是书生意气。因此，一生做过不少在旁人看来是傻事，在先生看来，则是道之所在、义不容辞的事。可是，在张紫葛笔下，吴先生是个工于心计的人，庸俗的人。这又是厚诬吴先生。

甚而在恋爱上，吴先生具有高尚的情操，而持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观。热恋毛彦文，原出于抱打不平，既经卷入，光明正大，从不隐晦。张紫葛何能知此，拉出了个朱小姐千里寻先生，而先生呢，张书把先生写成一个庸俗的人，一个鬼鬼祟祟的人，与朱氏兄妹分别，先生对张“轻轻叹了一声，念了一句仿《西厢记》崔莺莺的道白：‘叹人生，烦恼填胸臆！量这般大小的车儿怎生载得起！’又转头对我说：‘此词难谐我意。你别误会，我并没和朱某恋爱。过去不曾，现在更没有。’”（页 275）先生不管是否恋爱朱小姐，都不会这么说。当年恋爱毛彦文，先生公开发表诗，有句云：“吴宓苦爱□□□，三州人士共惊闻。”何其襟怀坦白。这种境界，非庸俗人所能理解。张之出此，良有以也。

全书写吴先生日常说话的语言，简直是不堪卒读。无论何时何地，书中的吴先生，一开口便是腐朽恶劣的文言，没有半点活气。吴先生无论讲课，还是日常交谈，从来是现代语言，没有书里这种怪腔滥词。张紫葛自称与吴先生相交三十八年，对于吴先生的语言竟全无所知，也就够奇怪了。

读过全书，写成此文，期待张紫葛先生有以指教。

1997 年 6 月 8 日至 10 日深夜

卓荦孤怀身殉道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后

前以《孤怀卓荦殉道真》为题写成《吴宓自编年谱》读后所感（载《读书》杂志 1996 年第六期），今复以同样意义之题稍易其字写作此文，盖以为今世学人唯陈、吴二先生最称得上终生守道、乐道、卫道、明道，经至于以身殉道，正气磅礴，大义凛然，而二先生之一生与道业亦密切不可分也。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而论《兵法》。”人生有此一苦，已不堪受，陈先生兼而得之（吴先生晚年亦受失明断足之苦），所受之痛苦远过古人，何其深也巨也！然而，以此视由于先生肩负学术文化的历史使命，“为此文化所化”极深，在此文化衰落之时，所受之精神上之痛苦（参阅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及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第 47 页），则失明、膑足之身体上的痛苦，能够治疗；而心灵之痛苦，则难以忍受，不能治疗。然而，陈先生所以异于流俗者，厥为对于此种心灵的痛苦早有所见，其忍受与治疗之方，乃为起而保卫和发扬此文化。

早在王静安先生自沉之时，陈先生即深知此文化使命之将终其身以任，心灵早有充分准备，是以能百折不挠，战斗到生命的终结。因此，陈先生能免于所断论的和王静安先生同样的以身殉文化的结局。王先生以身殉，陈先生以道殉，其实质同，其方式异。以身殉易，不过一念间之举而已；以道殉难，须持之一生而不衰。是以，陈先生能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和中国古典文学诸多领域里留下鸿篇巨著，闪耀着先生生命的光辉，蕴含着先生毕生大声疾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万丈光芒。距陈先生逝世二十有七年，读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 20 年》毕，益信“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数年前，三联书店潘振平君为编辑《陈寅恪先生全集》来沪找我，言及广州某君写了一本陈先生传，潘君力言其稿写得很好。此即近日新出的这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得之，数昼夜阅读不能止，每至传神处，或掩卷太息，或闭目泪流，或回思陈先生音容笑貌，或忍不住背诵陈先生的诗章。数日之间，低回反复，情不能已，思不得绝。读既毕，掩卷而叹曰：陈先生承传继往，以生命为中国文化和学术留下了最光辉的篇章，是书作者以心血讴歌先生之人及先生之学，述而有作，其作岂只“很好”，而实多年罕见之佳构。侧闻作者陆键东尚为中青年，非治历史学之人，能成是书，能达如此佳境，真是愧煞陈先生门下。

作者以其著作表明了对陈先生的人格有很深的了解，对陈先生的博大精深之学有较深入的钻研，能领会，有见解。不只此也，作者更进而能将陈先生的人格力量和文化精神融而为一，写此即写彼，写彼亦写此，浑然天成。于是，陈先生之人，在作者笔下，正气凛然，千古所钦。陈先生之学，独立苍茫，境界空前。人与学相统一，人由学而表现，学由人而完成。作者以无限景仰的心情去写陈先生，敬其人，佩其学，高山仰止，望之弥高，钻之弥深，不如此写不出陈先生。大处着眼，细处落笔，通读全书，处处见出正气凛然的当代硕学大师的风貌，而所环绕所以状陈先生随时呼之欲出者，厥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视书内间有叙述的与陈先生同代讲学人，其所不及于陈先生者，非唯学之不逮，更由于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之缺乏与不足，无论书中写到的诸如新史学权威郭沫若、陈先生早年所佩服的陈

援庵（陈垣）以至曾有可望传陈先生之学的及门弟子汪篯、金应熙，皆是如此。

犹忆陈先生在内迁成都的燕京大学授课时，有传郭沫若将由重庆来听课之说，如为谣传，亦符当时的历史真实。此种可能性，随 1949 年之到来而消失，是以其后郭老对陈先生《论再生缘》的态度便索然可解。抄引拙作旧文一段：“ 郭老之文（按指《陈端生考》），自有卓识高见，而其大端，多寅恪先生所已言者，郭老未之标明，反取寅恪先生之作之小疵，从而标举之，亦一憾也。 ”（《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载拙集《往事如烟怀逝者》，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只涉《再生缘》与陈端生，郭老已采如此态度，其后之屡屡指陈先生之史学为资产阶级史学予以蔑视，可知矣。惜无产阶级史学权威晚年之《李白与杜甫》，陈先生已不及见了。然本书透露，陈先生称，郭老最好的作品是《青铜时代》，倒是大可玩味的。

陈援庵先生自是极受人敬重的史学大师，然由政治之影响学术，两位陈先生在学术上晚年亦殊途矣。至于陈先生弟子汪篯、金应熙两位，由于负有政治和学术的矛盾，皆与陈先生决裂，前者中道而殂，后者且屡受命而批判陈先生，更可见“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之不易。我有幸在金应熙晚年借调香港时认识他，虽交往不多，亦感实是好好先生一位，唯其为好好先生，便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叫“ 批判 ”谁便“ 批判 ”谁，落了个背叛师门之名，良有以也。

书中对于以上所列，除关于陈援庵先生一段外，都有较多的描述，甚至细致入微的刻画。作者掌握可信的材料，对照陈先生巍然不动精神，便能使读者得到超乎所叙述的收获。正由于对陈先生之人之学了解甚深，全书末章以《绝响》为题，论陈先生之学在中国文化上体现出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标举以下三条之总结，就非常恰当。爰摘为之记如后：（一）陈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影响者，是陈先生自成一体的文化思想——“ 历史文化观 ”，可分为“ 人与文化 ”及“ 历史与文化 ”两个方面。（二）陈先生的文化情怀与先生对中国历史的精深掌握密不可分。先生的文化视觉与“ 要摧毁、清算旧世界者 ”及“ 抱残守缺者 ”皆有本质的区别。先生眼中的历史，充斥着兴亡盛衰的痛感。先生视觉中的文化，紧紧扣着“ 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与废者 ”之立旨。（三）正因为有此支点，陈先生毕生对中国文化的信仰与追求，便有了甚为沉痛的“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的心路历程的苦炼与“ 众人皆醉我独醒 ”的灵魂号哭。以下该书作者从陈先生历年文字中共摘引了十三处以说明其所据论，而作结语云：“ （这些引录）虽不足以反映陈氏文化思想的全貌，但已见用情之独切，冀望之独厚，苦痛之独深，其毕生的抱负昭然。 ”作者所论，发人深思。

此书的基础是翔实而可靠的材料。陈先生墓木已拱多年之后，搜集材料，爬梳成书，且有些材料，主管者也未必愿意示人，搜集之难，可以想见。书中所用材料，或得之于报刊记载，但大量是有关档案材料，凡所涉及陈先生以及其他人和事者，作者恐已涉览殆遍。文字材料之不足，辅之以口头访问。被访问者除了当事人，还多有家属与友人。一人之说孤证不立，乃及于多人。多人而有歧说，乃采两说并存，作者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试举一例。1961 年 3 月郭沫若拜访陈先生（此事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未载），根据访问知情者所得，书中对此作了较详的记载，叙及郭沫若曾当场口诵一联：“ 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 ”谓有另说：联系两人所对。作者采

取两说并存的态度，似较相信前说。此事可留待读者判断。郭陈皆是对对子高手，陈先生尤然，提倡作对子锻炼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基本功（见所著《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此联下联对仗工整，具见功力，似为陈先生之作。从两人相见时的情状论，郭是以居高临下的自得之情往访，有和缓之意，不会当面作“马牛风”这样对立的表述，陈先生以谈笑方式对下联，较多可能。

在材料翔实的基础上，作者写作一出以真实，不回避，不虚饰，读来真切感人。主人公陈先生真实可信，有血有肉，所做的事，所写的文，所赋的诗，纳入时代大背景，一以贯之，保卫与发扬文化而然。由陈先生而带出了一批人，一批学人，如吴雨僧、向达、陈序经、梁宗岱、刘节、蒋天枢、洗玉清皆栩栩如生，真实可信。写及了一批高官，如陶铸、陈毅、胡乔木、康生、周扬等，各有其貌，亦皆真实可信。其中写与陈毅的会晤，最为生动，佐证和丰富了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谈叙欢洽”的记载。陈毅访先生，不谈政治，而专“论文说史”，尤其谈《世说新语》，深得陈先生之心。致陈先生几天之后对人说：“没有想到共产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并托人找了陈毅的诗来看。写周扬拜访，多按《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没有写到已公布的周扬另一次讲话，是为不足。在这次讲话中，周扬对 1959 年访问陈先生表示了内疚之情，说是当年他不该激怒陈先生。而康生因陈先生以病拒绝会晤，怒而报复，后竟以陈先生反对社会主义为词，禁出陈先生的《论再生缘》一段描述，具见其人。书中还写了一批环绕在陈先生周围的非名人，如黄萱、高守真、中山医学院的护士、中大的工友等，均显露出这些人物对陈先生的真诚之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即陈夫人唐筼师母，本书以专节描述守护在陈先生身边的这位志行高洁的人，最能理解陈先生的人，读之感人至深。从这个意义说，这本书已远超出了个人传记的意义，而写出了时代，写出了这个时代的人群，作者驾驭全局之力，亦可钦佩。

文末，附述一个细节，言材料之尚可追探。

1964 年，陈先生七十五岁，早年弟子蒋天枢到广州拜寿，抄录了陈先生诗稿一册，返上海后遍觅不得。书中记此，似有责蒋掉以轻心之意，今检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64 年条载：“记曾录得诗稿一册，归后遍觅不得，岂被窃欤？”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蒋天枢此书时，有不少文字刊落，我曾从友人处抄录得全部刊落之文。按此条末句后尚有一句：“忆上机时已有人注意及之。”被删。则此事尚有内情，未必即为蒋天枢粗心而遗失。陈先生诗作，除赠人者，向少示人，蒋天枢是除了先生亲属最早得见诗作的人。在中山大学校内，有人曾多次想得到陈先生的诗，“以窥其心”。则蒋天枢之“上机时已有人注意及之”语，非妄疑之词可知。

中山大学广大师生员工，自然知道陈先生的学术与气节，对陈先生极为尊重，但校内系（历史系）内，总也有人想整这个“资产阶级史学权威”，而当风暴一起，不管是否出于本愿，许多人发疯了。于是陈先生也就岌岌可危。陈先生对那些整人者，表示了愤怒之情是自然的。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被刊落的原文，抄两处以为历史之证。

（一）1969 年条，“小彭（振常按：陈先生次女名）又回家探亲”下，有这么一段话：“（先生）曾告小彭：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及先生逝世后，形势所逼，师母让学校将书全部拿去，即先生借我的抄本《有学外集》12 册，亦被拿走。我曾数次函索，均云查无。（蒋天枢注）”

（二）同年条，美延（振常按：陈先生小女）致蒋天枢信，“（父亲骨

灰）寄存在广州火葬场”句下，被刊落文为“其他在广州书箱，一律送交中山大学（母亲意见），中大图书馆还想要存在复旦的书，想和复旦联系。由他们去搞好了。（下略）”

文字的刊落，使原貌不全不真，这自然非本书作者之事了，然说明材料尚可追探。

生前受辱，身后受欺，一代大师，遭际如此。感谢本书作者，努力地写出了陈先生，写出了一个时代。

1996 年 4 月 1 日

孤怀卓荦殉道真
——《吴宓自编年谱》读后

凡是见过吴雨僧先生的人，总难忘他那踽踽独行、喃喃自语之状。他一个人低着头走，不看前面的道路，不看左右周围的人群，唯喃喃自语，一似重有忧者。先生忧的是什么？忧的是世道人心，忧的是中国文化学术。这本是在动荡的年代，世事处于混乱之中，特立独行之士所共有的思想状况，非独先生一人为然。先生所以异于他人者，按先生自己所说，他是两足分踏在两匹并驰的马背上，两手分握二马之缰，强欲使之比肩同进。这是先生著名的“二马之喻”，引原文如下以明：

> 宓设二马之喻。言处今之时世，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观事势之艰难，恬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娱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而宓不幸则欲二者兼之。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又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挚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剧也。而以宓之性情及境遇，则欲不并踏此二马之背而不能，吾其奈之何哉！
>
> （1927 年 6 月 14 日《雨僧日记》，据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引）

先生为此分立二马之背强之比肩同进而苦恼了多年，正因为先生有此认识，为了使中国文化学术在西方新方法下（自然包括西方的新知）积极发展，先生是踏在马背而不能下，强行前进，行之多年，行之一生，至死而不悔。先生所谓的两面，历多年之践行，在他身上已趋于统一，即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秉此，可以理解，先生一生，除了授业、著述、诗文自娱之外，任事甚多，诸如：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年，创业之难，积聚一身。代王文显为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其所规划，为大学的外文教学奠立可行之章。创办《学衡》，几乎是独力苦心经营十二年，出钱出力花时间，琐细到自己包扎《学衡》去邮局寄出。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辛劳备尝者六年。于是，在人们的印象中，先生和一般纯然学者有所不同，能任行政之事，有办事的才干，做起事来，井井有条，仔细认真，讲求效率。如此等等，正是先生两足分踏二马胜任愉快的表现。

先生作“二马之喻”在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后 12 日，先生与陈寅恪先生长谈，王国维先生托两先生以后事，两先生痛感于王国维先生“文化神州丧一身”损失之重大，为中国文化前途忧，而有倾心沥胆之语。雨僧先生“二马之喻”，表示了为中国文化不惜车裂以殉的精神。寅恪先生答以警策出众的卓然之见：一国文化哀亡之时，此文化之寄托者辄痛苦非常，甚至不惜以身殉文化，如王国维先生即是。此语实是对雨僧先生将遭车裂语的肯定，雨僧先生即直道其事曰：“而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一席倾谈，成为两先生面对死者的誓词。此后数十年，两先生秉此素志以行，为中国文化树立了正气，为中国学人建立了榜样。

近年以来，相继出版了几部有关陈吴两先生的书，为两先生矢志献身中国文化作了很好的榜样，而赫然贯穿其间最足以表现两先生的精神者，即为两先生一生不移素志、至死不改初衷的风骨，亦即两先生一生坚执的“独立

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新近出版雨僧先生女公子学昭整理的《吴宓自编年谱》（1894 年至 1925 年），同属是类，而较之他书更足以见此种精神。

书中学昭自述，她最早听见雨僧先生撰写自编年谱的想法是在 1964 年 10 月父女相见于四川内江火车站之时。雨僧先生其时已不获准许授课，乃告女儿以撰写年谱之想，“叙述自己一生的经历并附感想，体例一采简括。”此后再未闻知其事。截至先生含冤去世之翌年——1979 年，冤案平反后，学昭从发还的先生残存遗稿中发现《吴宓自编年谱》手稿，共 133 页。此是先生历年编写，未得完成，而于“文革”中被抄走的。但写稿始于何时，则不得而知。此稿被抄走后，先生极为痛心，从 1972 年开始，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四川梁平劳改），先生重新编写，其 72 页，得以保存。两稿均是未完成之作。学昭对照两份手稿，加以整理，并补录先生失明后的口授内容，得成是书。此乃作者及其所作历尽灾难之后，留下来的时代记录，幸乎，不幸乎？学昭在是书《后记》中说：“遗憾的是父亲当年托付几位学生和朋友保管的许多重写的《年谱》散页，虽然我们多年进行种种努力，尚未能取得。我们仍然祈望这些同志给予支持，以求《年谱》更趋完善。”对于那些“保管者”乞求之情至殷，我不知道现在怎样了，“保管者”是否有归还之意？当年明火执仗的抄家者抄稿以图毁灭历史，“保管者”受托而保存历史，做了好事，今日不予归还，则其行迹与当年抄家者何异？其不归还之用心又何以自明？学昭《后记》中还说，先生自 1910 年起开始写作之《日记》亦将出版，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大幸事。然侧闻先生《日记》亦有部分讨索不回，且公然言说就是不归回，更不知此种人是何用心了。

虽然如此，毕竟今天还能看见这部未完成的有残缺的《自编年谱》，藉以完整地深入地系统地了解一代学人之学之人之思想，得薪尽火传之用，也属不幸中之大幸了。

先生当年告学昭打算自编年谱时，说了一句话：“内容但求真实，真实！”此语重要之极，得史书写作之精义，见先生之为人与性情。今日细读全书毕，深感先生确是处处出以真实，写先生笔下的事，钜细无遗；述先生心中的情，大小无隐；于先生所持之对人对事是非曲直之见，丝毫无讳。有此三者，这本书乃成为有价值有意义之作。先生具有许多美德，如极富同情心，对人同情，对动物之遭受蹂躏亦极同情，书中多处写及对于骡之遭受鞭打表示痛惜。一生助人，读书时对同学，常以金钱帮助；教书时常多为人介绍工作。受人之托，必忠人之事，更不惜牺牲自己以全他人。做事认真，可以说一丝不苟。对人真诚，绝无虚情假意。对长者尊者，极为尊敬，而于长者尊者处事之不当，则不讳言其缺失。如此等等，《年谱》中时有无讳无隐的记述。这些，都不是只受儒家学说熏陶的旧式学者所能做到，如按传统思想，这么写，会被认为是矫情或自夸。先生则按事之如何、理之如何、情之如何，直言无讳，具实写来，此所以为真实也。

先生受西方思想教育，崇拜卢梭，自述自剖，有如卢梭之写《忏悔录》，这是中国传统文人所不能做到的。先生富于情而明于道，对自己解剖极广，加以生情柔弱，“好谋而不能断”，所以自己遇事常在悔恨之中。先生和陈心一女士的婚姻，是先生多次悔恨的事。朋友陈烈勋不断敦劝，求先生和其姐陈心一结婚，先生对于未曾谋面的这一桩婚事，犹豫颇多，后来允婚，又复毁约。最后又由于至友汤用彤先生的一言，终复成婚。《自编年谱》中均历历如实道来，不作丝毫之隐。在美留学应为五年，只三年而提前回国，先

生表示“多年后，悔之不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不回清华，于先生可谓大事。此对于先生在解放后的命运关系重大，先生写了一段话：“然而大事，例如 1949 年 4 月，不回清华，又弃武汉大学而来渝碚（重庆北碚），遂走入相辉（相辉文学院），编入西师（1950 年先生任教的四川教育学院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则举动之极端错误，而祸害以长者也。”事实确乎如此，先生如去清华，其后来之命运，当不致如在四川之所遇也。小之至于 1961 年先生到北京，贺麟告诉先生，周扬曾主张调先生到中央文史馆任研究员，专力译沙克雷小说，因而愿陪先生去看周扬，先生未往。后来写到这段事时说：“若竟从之，后来周扬得罪，宓必致牵连。然谨慎不往，伏处西师，1968 年以后仍受种种之惩罚与斗争，则何如其往耶？”

凡此，可以举出很多先生一生悔恨之事。但是，唯独一件，终生不悔，至死无怨言，那就是载负中国文化学术的重任，甘任二马车裂。这种精神，贯穿于全书，而可以标举本书 176 页先生所书一段总结性按语以明之：

> 然按后来事实之因果论之，则宓若在 1918—1919 学年，仍留弗吉尼亚大学，而不来到波士顿转入哈佛大学，则与梅光迪在美国未由相识，无从接受其反对陈独秀、胡适新诗、白话文学、新文化运动之主张，并不获由梅君导谒白璧德先生，受其教，读其书，明其学，传其业，则后来必无《学衡》杂志之编辑与出版。而宓一生之事业、声名、成败、苦乐，亦必大异，而不知如何。总之，一切非人为，皆天命也！

这正是对于一生所作为于中国文化学术无悔的宣言。请更引先生在悔婚约无效后的一段自白来看：“宓经此失败后，废然安于天命，今后不在婚姻与生活中追求幸福，而当在事业、文章、道德中自寻乐地。”先生安身立命自有境地。1921 年，先生回国到上海后，写道：“此时期，宓所最系心者，惟宓之工作与事业。即是：赶速到东南大学教学、授课，及编撰、出版《学衡》杂志之二大事。结婚以及其他活动，只是为扫清道路，排除障碍，俾宓能从早、从速，用我之全力于此二大事也。”

《自编年谱》止于 1925 年，是以先生乐道、守道、明道、卫道的具体表现只是写及于任教东南大学及编辑《学衡》，此后则是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大公报·文学》等一以贯之了。王国维先生死，先生于灵前自誓云：“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泱泱以殁，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冥鉴之。”以后数十年，先生以此精神贯之，终而至于在 1958 年大倡厚今薄古之时，抗言“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诵读”，“文革”中不同意批孔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劳动改造，双目失明。终而至于含冤以死，真正如在王国维先生灵前所誓“以身殉道”了。乐道，守道，明道，卫道，以至于殉道，先生历其一生，尽其所能，忍受了历史的灾难。然非由于欲兼两方面而遭背驰之马车裂，乃为时代的不幸所遭致，岂不哀哉！

1996 年 3 月 3 日深夜急就章

道高犹许后生闻
——吴宓先生之乐道敬业精神

“道高犹许后生闻”，是萧公权先生 1944 年赠挚友吴宓（雨僧）先生诗中一句。萧先生自己亦甚喜此句，曾以之为书题命名其所撰自传、书信和谈话录，于生前出版，后列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萧公权全集》九册之第一集。（详见拙文《漫记萧公权先生》，载《读书》1993 年第二期）萧先生此诗题为《雨僧移讲成都赋二首》，下注“雨僧去岁五十初度”，诗共二律，全引如下：

鬓霜剑外乍添丝，守道身严似旧时。移座倾谈心曲语，启囊亲检别来诗。尘劳愧我仍无状，天命知君已不疑。杜陆遐踪今有继，风流儒雅亦吾师。（自注：借用杜句）

孤怀卓荦任斯文，笔振寒辉破俗氛。诗健别从新境辟，道高犹许后生闻。人居槛外清于水，女出东门乱似云。莫恨空轩归不去，梦中梅影自缤纷。（自注：槛外、空轩本事，均见《吴宓诗集》）

萧先生赞扬吴先生“守道身严”、“孤怀卓荦”，用语贴切。我写此小文，独取“道高犹许后生闻”为题，盖以此句实可概括吴先生一生，孤怀乐道，兢兢授业，历受挫折而不挠，饱经忧患而不移，无他，传其道也。日居静思，时浮现先生踽踽独行、喃喃自语之状，课堂授业语尽滔滔之情，活脱一个栖栖惶惶席不暇暖的孔子，深思睿智的柏拉图老人。返看举世扰扰，于是，哀思每发，在《漫记萧公权先生》文中，叹而言曰：“先生之道，后生终不可得而闻乎？”近年，先生作品，记录和研究先生的著作时有出版，举行了先生的学术研讨会，先生文集闻亦在整理中，而先生女公子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一书，则是以权威的材料如实记述陈吴二先生一生之交及思想学术的最佳之作，读之催人泪下。海内外学人似乎发现了一个地下文物，研读之余，多有撰述。终究令我欣然于“道高犹许后生闻”矣。

先生所守与所乐之道，何道？简言之，儒道也。如先生自己所说：“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神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绝不从时俗为转移。”（1961 年 8 月 30 日《日记》）或者如先生 1927 年 6 月 3 日在王国维先生灵前之誓词：“然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其达此之途，则先生又迥然不同于旧国粹派及孔教会成员，从来没有听说先生和先生一生的同道者陈寅恪先生儒冠儒服参与过祭孔大典，即使二先生活到今天，我想也不会去凑这个热闹。陈吴二先生博通中西之学，一生坚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先生认为这是最好的达道之途之法，而反对盲目固执其一端。

陈先生早年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此为人所熟知。在这段话的前面，陈先生徵引儒释道三教之影响，对于中西文化关系事作结云：“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以上均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时至 1961

年，两位老友分别十六年之后，吴先生往广州探陈先生，于 8 月 30 日深夜十二时抵达中山大学陈先生寓所，陈先生撮要谈述 1949 年后十二年近况，吴先生在是日《日记》中详记所谈，然后说：“ 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 ”

陈先生一生唯授业解惑，从事著述，守其道，乐其道，卫其道，明其道，从不担任何行政职务。吴先生守道乐道卫道明道与陈先生同，然除了授业、著述之外，为此所做所任之事则与陈先生有所不同，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年，创业之难，集聚一身。代王文显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订立教学规划，为中国的大学外文系教学建立可行之章。创办《学衡》，苦心经营将近十二年，主持《大公报 · 文学副刊》，艰难支持六年。所有这些，为中国文化，为中西学术交融，留下了功绩，也是吴先生守道乐道卫道明道之必为。陈先生每劝吴先生放弃他务，专心于学，吴先生虽以挚友之言为然，终苦于不能放弃其所从事的事业。吴先生称以上所事为事功的一面，而提出了他自称的“ 二马之喻 ”。这是了解吴先生性格极重要的文字，引如下：

> “ 宓设二马之喻。言处今之时世，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观事势之艰难，恬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娱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而宓不幸则欲二者兼之。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又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已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挚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剧也。而以宓之性情及境遇，则欲不并踏此二马之背而不能，吾其奈之何哉！ ”

此系在 1927 年 6 月 14 日，即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后十二日与寅恪先生所谈，下面即引出寅恪先生极为警策之语，谓一国文化衰亡之时，此文化之寄托者辄痛苦非常，甚至以其身殉文化，如王国维先生。此语寅恪先生后写入《王观堂先生挽词 · 序》中，为王先生之死下一定论。吴先生则对陈先生答曰：“ 而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 ”这是两位大师、文化巨人不惜以身殉文化的悲怆壮烈之语，今日读之，犹觉浩然之气不可夺。此后几十年，两先生秉此素志以为，虽未自杀，亦等同以身殉文化。

其实，吴先生所谓的两面，他所身体力行，实是统一的。正所谓“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

吴先生和胡先骕、梅光迪、柳诒徵诸先生创办《学衡》，标明宗旨为“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后八字尤为要领，是所持中体西用的体现，为吴先生一生兢兢以赴，统一体现于他的治学、授业与事功中。远在哈佛就读时，深深服膺乃师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以为其说“ 综合古今东西的文化传统，是超国界的 ”；另一方面，则对白璧德表示：“ 归国后，无论处何境界，必日以一定之时，研究国学，以成斯志也。 ”这就是先生的国粹与新知并举之见。归国之前，1920 年秋，即与中华书局有约，编辑出版《学衡》，由先生任总编辑。为此，先生毅然在 1921 年 6 月提前归国，并舍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科主任教授月薪 300 元大洋之约，而就南京高师及东南大学教授聘，月薪只有 160 元大洋，为的就是能与诸同道创办《学衡》，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所以梅光迪致先生促归国信说：“ 兄素能为理想与道德作勇敢之牺牲，此其时矣！ ”任教南京，先生讲课大受欢迎，以致 1923 年时为清华高等科四年级学生的梁实秋等数人在东南大学听先生课两三日，梁回校在《清华周刊》写文章大为推崇，而慨叹清华未能罗致先生回母校。先生认为：“ 盖自新文化运动之起，国内人士竞谈‘ 新文学 ’，而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则绝少（仅有周作人之《欧洲文学史》上册，可与谢六逸之《日本文学史》并立），故梅君与宓等，在此三数年间，谈论西洋文学，乃甚合时机者也。 ”（据《吴宓与陈寅恪》引《吴宓自编年谱》）《学衡》创刊于 1922 年春，吴先生等以为新文化运动甚为偏激，“ 更痛感欲融会西方文化，以浚发国人的情思，必须高瞻远瞩，斟酌损益。 ”《学衡》十二年间（有断续，中间曾停刊达两年），几乎是吴先生一人独力苦撑，编务集于一身，经费大部要他自掏腰包，起初，先生每期津贴《学衡》百元，即使如此，仍难维持，中华书局屡欲停办，《学衡》同人亦有不能谅解者起而指责先生，先生悲愤欲绝，然仍苦战不已，提出“ 款由宓独任 ”，只望杂志不停。但《学衡》于 1933 年还是停办了，共出七十九期，《大公报 · 文学副刊》亦于同年易人，先生之志终未得伸。新文化运动冲击之下，与之抗衡者势难抵挡。贤者今日论衡，可以不同意《学衡》持论，然不能不佩服先生的精神，亦不能不承认《学衡》在学术上的独树一帜。

清华学校时属外交部，校长曹云祥乃外交部所派，不谙学术，先生创国学研究院，手订《旨趣》三条，亦可以“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八字概括。王国维先生坚不肯就院长，只允任教授，曹云祥请吴先生任院长，先生只允任主任。王国维、梁启超二先生，均先生亲持聘书往谒请来，先生记谒王事云：“ 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陈寅恪先生，更是先生所力荐，从国外请来。一年之后，先生因研究院发展方向与清华教务长张仲述等意见不合而辞职，将辞职书与《研究院发展计划书》同时提交校务会议。此一见临事不苟，一见维护初衷之精神如一。而国学研究院四年之间，为中国学术界造就了七十余位杰出之士，先生有大功焉。

先生有道可守，持道为乐，终身所为，恒以敬业精神出之。远在 1919 年，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哈佛，12 月 14 日《雨僧日记》长篇记载陈先生关于中西文化的四点谈话，其第一条述中西哲学美术之不同，陈先生慨叹当时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 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 ”“ 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 ”并断然曰：“ 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救药，势必至于人欲横流，道义沦丧。 ”陈先生之说予吴先生以深刻影响，陈吴二先生毕生为此奋战，终不能力挽狂澜，今天的现实亦印证了陈先生的论断，可悲也夫！

1927 年 6 月 2 日，王国维先生之死震惊了中国学术界，震惊了清华园，王先生委以后事的陈吴二先生尤为哀痛，在灵前行跪拜礼，吴先生自誓云：“ 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泯泯以殁，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冥鉴之。 ”陈先生则发出“ 文化神州丧一身 ”的痛惜，而呼号保持“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吴二先生一生坚持“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先生晚年“ 著书唯乘颂红妆 ”，不作阿时之语，吴先生于 1958 年大倡厚今

薄古之时，抗言“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诵读”，到“文革”中不同意批孔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至逝世前两年“卧床朗诵（1）王国维先生《颐和园词》，（2）陈寅恪君《王观堂先生挽词》，涕泪纵横，久之乃舒”。这是何等的气节，何等的感情！吴先生所以涕泪纵横者，乃为中国文化，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维护的中国文化，而终不免于以身殉之而后已。

今年是吴先生诞生百年纪念，写此小文，以明师道。

1994 年 5 月 3 日/

谈陈寅恪先生治史

学术界每谈到陈寅恪先生，多倾服于先生之通解众多种类文字，尤其是对于今日已鲜为人解的西夏文、梵文之精通。这诚然是事实。陈先生利用所解各种文字，精研世所罕见人所难读的典籍，早期于佛学、敦煌学的研究，写过不少他人所不能言的论文。而陈先生之研习各种文字，均有其治学之目的。据吴宓先生 1927 年 11 月 14 日《日记》，是日胡先骕到清华，吴先生导胡“访陈寅恪，谈东方语言系统。寅恪谓非通梵藏等文，不能明中国文字之源流音义，不能读《尔雅》及《说文》云。”举此可概其他。但更多更普遍的情况是，陈先生为文所用的材料皆世所习见，学者所共知，并非世不经见的井中书，壁中籍。无论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于隋唐史研究，以至晚年的明末清初史研究，皆然。倒是陈先生因其祖、父两代的政事经历与家学渊源而得天独厚深所谙知的晚清史实，则数十年略而不言，只于晚年（1965 年夏至 1966 年春）写成《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弁言〉》及文字七章，又大部佚失，只存一半不足，则陈先生之学绝不以史料炫众，明矣。陈先生之所以为一代大师，还在于从世所经见的史料中，以冰雪聪明之资，积读书万卷之识，于他人见而不察之处，触类旁通，化平常为神奇，发而为雷霆惊锐之文。学术界又常言陈先生“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通人之法，史学家通诗者多矣，陈先生独以此法为世所钦所重，也正由于上述陈先生触类旁通化平常为神奇的修养之深，便能信手拈来，证史解诗皆得其妙，心领之，神会之而手挥之，运用自如，浑然天成。

本文只想举一例以证此说。大家都知道，陈先生对唐代古文运动的独具之见，对唐代传奇兴起的精深研究，对元白诗笺证的功力之深，对唐代藩镇之乱及种族纠纷的深刻见解。所有这些，连而贯之，陈先生的理解成为一条非常鲜明的通解线索。

在陈先生的著作和论文中，多次谈到有关上举诸方面的论述，兹以《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开章《长恨歌》所论开始。是章首引白居易与元微之书，论及长安娼妓身价，某妓自夸“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何以能诵《长恨歌》就增身价？陈先生认为要了解《长恨歌》，须了解当时文体之关系、当时文人之关系两层。谈文体关系，陈先生引了赵彦卫《云麓漫钞》一段记载：

>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也。

《云麓漫钞》是极常见的宋人笔记，一般人见此一段记载，只不过增一历史知识，知道唐代科举士子风习。先有所谓行卷，继之温卷，以自己的作品经名人介绍送与主试官员，借以得一个好印象，以利于中式。而举人呈送的作品是传奇，进士则以诗为贽。在研究过程中，这段材料似乎不会发挥大作用。

陈先生则不然。从以传奇于进、以诗为贽，研究其所以然，对“文备众体”一句尤加注意，据史阐发，进而明了文体之关系，诗与传的关系，小说之兴，古文运动之所以发生，古文运动之所以以“尊王攘夷”为中心，韩愈之所以成为古文运动的不易之领袖，如此等等一连串事件，如串置散钱治棼理丝，把唐代的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都铺展在读者之前。如

此大手法，非具锐利之眼，非持大智慧，何可得？一般史学著作，只是予人以知识，陈先生之作，则除了知识，更予人以智慧。此所以可尊可贵也。

陈先生执着“文备众体”句，特加发挥，认为“史才指小说中叙事之散文言，诗笔即谓诗之笔法，指韵文而言，其笔字与六朝人之以无韵之文为笔者不同。”先生举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为例，断言歌与传非如一般诗与序文的关系，而实为不可分离的共同机构，“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之部分，白氏之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之部分，陈氏之传当之。”对于这点，后人昧于此义，如沈德潜《唐诗别裁》评《长恨歌》云：“迷离恍惚，不用收结，此正作法之妙。”《唐宋诗醇》则云：“结处点清长恨，为一诗结穴，戛然而止，全势已足，不必另作结束。”陈先生认为两说皆似是而非，实际《长恨歌》真正之收结即议论与作诗之缘起，乃见于陈氏传文中。传文略云：“（王）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先生一语揭出，破千古之疑与谬，这是何等的卓识！

《长恨歌》及《传》如是，先生进而论元稹与李绅（公垂）之《莺莺传》及《歌》亦如是。元稹《莺莺传》末云：“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先生又引《莺莺歌》最后数句“诗中报郎含隐语，郎知暗到花深处。三五月明当户时，与郎相见花间语。”而云：“但亦不用所谓收结者，其故何耶？盖《莺莺传》既可谓之《会真记》，与《长恨歌》以长恨结，正复相同。至于二诗之真正收结，则又各在其传文之中也。二诗作者不同，价值亦异，而其体裁实无一不合，盖二者同为具备众体之小说中之歌诗部分也。”先生复引韩愈的小说《石鼎联句》序及诗以论证此说，谓《石鼎联句》与上举二例“结构全同”，韩诗及文此处不具引。

由此证明，“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此种文体之所以兴起和流行，正如赵彦卫所说由于“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元李白陈上举之作，虽非举人投献主司的作品，但其体裁全同，实为其时新兴之文体。“此种文体之兴起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振常按：说详后），其优点在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具备众体也。”

先生曾多次论唐代以明经、进士两科取士，详述其渊源变化，详见于先生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兹不备述，如以简言述之，则先生刊于1954年第二期《历史研究》之《论韩愈》文最见精当。其文曰：“唐太宗崇尚儒学，以统治华夏，然其所谓儒学，亦不过承继南北朝以来正义义疏繁琐之章句学耳。又高宗、武则天以后，偏重进士词科之选，明经一目仅为中材以下进取之途径，盖其所谓明经者，止限于记诵章句，绝无意义之发明，故明经之科在（韩）退之时代，已全失去政治社会上之地位矣。”明经易考，进士难求，是以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唐代大臣中每有以非进士科出身为耻者，先生唐史诸作中多有例证。贞元元和之世，兴起新文体之小说，以为千进之资，于时乃大倡行焉。

尤其值得注意的，唐代小说之兴起，“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

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论唐代古文运动和小说的关系，寅恪先生是第一人。先生早年有《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惜未收入以后出版的文集。此文“要旨以为，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先生得此结论，乃因研究敦煌俗文学及日本遗存之游仙窟中之唐代小说，与洛阳出土之唐代非士族之墓志等，发现作者既非当时高才文士，其所用之文体，骈文固已腐化，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均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先生举了两篇不同人物的墓志作例，指出写法全同，开端言“君讳×”，字什么，什么地方人，如何如何，“因家焉”，全是固定公式。因此，“则知非大事创革不可”。韩愈起而改之，倡新文体，所写碑志传记多创造之作，进而以古文写小说，作《毛颖传》，被好友张籍讥为“多尚驳杂无实之说”。《毛颖传》虽非佳作，韩愈矢志如初，而其力倡和领导古文运动，则成大功劳。

关于古文运动，先生在多处有所论述，兹不详引，仅综述要点如次。从文体言，倡为古文运动，实欲以先秦、西汉之文体一扫腐化僵化不适用于人生的骈体文，“故名虽复古，实则通今，在当时为最便宣传，甚合实际之文体也”。其形成过程，则先由于稍前于韩愈的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之发扬，后由韩愈及其同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相力行，而形成运动。最见功力处，是先生论述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为“尊王攘夷”。先生论证，古文运动之兴，实由于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引起。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先生考证出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唐人对安史之乱和藩镇的专横跋扈，均所身受，由今及远，“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受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由此进而指出，元白实是佞佛之人，白氏《法曲》结语云：“法句与心王，期君日三复。”又在《梦游春》诗序中对元稹说：“况与足下外服儒风内宗梵行者有日矣。”是以元白虽有内中国而外夷狄的议论，但认识主张均远不如韩愈彻底。柳刘虽与元白佞佛程度有差，但亦“不敢亦不能因释迦为夷狄之人，佛教夷狄之法，抉其本根，力排痛斥，若退之之所言所行也”。韩愈成为以“尊王攘夷”为中心思想的古文运动不争之领袖，势所必然。先生认为：“其他古文运动之健者若元白二公，则于不自觉之中，间接直接受此潮流之震荡，而具有潜伏意识，遂藏于心者发于言耳。”先生再进一步把眼光扫向唐以后，认为韩愈虽反佛，但受新禅宗的影响，“睹儒家之积弊，效僧侣之先河”，以《小戴记》中《大学》一篇来阐明“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可济世安民，虽相反而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于是，先生下结论说：“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真是目光如炬，一扫群惑。

于众人经见的史料中，于极细微处下功夫，逐步引发，化平常为神奇，先生勾划出了有关唐代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这样一篇大文章的轮廓。

忆昔受教师门，少不更事，荒于学业，且以学术无补于当时之斗争为词而自得于其荒，后来追悔无及，致成终身之憾。“文革”大乱方止，写《可怜无补费精神——评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关于韩柳的评价》及《韩愈排佛老议》二文，再学寅恪先生之作，领会稍增。今兹重读先生作品，有感

而写此文，以补前愆，本述而不作之意，不敢妄议。

1994 年 4 月 6 日

纵贯横通论晚清

——石泉《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晚清政局概观》书后

甲午一战，败于蕞尔岛国之日本，而且，败得那样地惨。自是年六月廿三日（公历 7 月 25 日）接战，至年底，日军连陷平壤、安东、九连城、金州、旅大、盖平，中国军队几无回手之力。翌年乙未三月二十三日（公历 4 月 17 日），签订了丧权辱国至极的《马关条约》。同年五月（公历 6 月），日军入侵台湾。自此，帝国主义者更为大胆无忌地入侵中国。甲午一役，对于中国朝野的震动，可谓空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真的该亡吗？中国人在担心，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思索，寻找变局。中国的历史曲折以前进。

一代先进知识分子挺身求变。甲午五月中下旬，距战争爆发不到一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言改革，未被采纳，决心革命，于甲午败势已定之十月廿七日，创兴中会于檀香山，《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筹备起义工作更加积极。《马关条约》签后之四月初八日（公历 5 月 2 日），康有为振臂一呼，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子 1300 人“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实学报》和《译书公报》，开始言革命。翰林公蔡元培，开始改变沿习的旧学道路，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翰林公张元济，亦夫学英文，求西学，与友好同办通艺学堂。……

于时，体用之争，本末之辩，发都下而传全国，中西两大文化冲突之所演绎，赫然进入于新阶段，于是而有戊戌维新，而有六君子之血染菜市口，而有革命形势之大发展。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验以生，而其所生所变，则远远超乎李鸿章所意味的内容与形式。遂亦可知，甲午一战之败，关系中国前途之至深至巨也。明乎此，则可见石泉《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晚清政局概观》一文之作之深意焉。

按石泉此文作于 50 年代前，时就学燕京大学研究院，系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硕士论文。就所知，石泉当为寅恪先生亲自指导完成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论文写作之第一人，甚而是唯一之一人。据石泉自述，远在 1944 年冬季，侍寅恪先生目疾，先生问及毕业论文拟作何题。石泉因答拟就甲午战争惨败之内政背景进行探索，意在阐明中日几乎同时仿效西方，何以甲午成败判然，而国际局势、国内政局皆因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我国此后更为动荡之历史新阶段。此题得蒙寅恪先生首肯，并告石泉曰：“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作。你想要作，我可以指导你。”于是，石泉即在先生指导下搜集材料，进行写作。每成一节，即读与先生听，然后详细讨论定稿。至 1948 年夏完成。

所以详引石泉自述写作经过如上，则由于寅恪先生晚岁记叙家世父祖三代所经历之晚清政局之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既多散佚，而石泉论文所据史实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之对当时政局的评论，颇多得自先生之启迪与诲正，是以读石泉之文，或可稍补未能得睹先生全稿之憾于万一。此石泉之作乃更足可珍矣。

石泉论文题作《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未曾发表。今兹在全书出版之前，先以其第一章《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晚清政局概观》发表于《燕京学报》新二号。本文即就此立论，略述读后之感。

同治一朝，号称中兴。其时，太平天国底定，东捻、西捻相继平服，左

宗棠更荡平西北，勒马天山，盖由湘、淮军力之盛，选练制兵之成，亦夫洋务建设之功，而以文人出身统御军事之将帅，自曾、左、李以下，一时人才称盛，亦其因也。然洋务运动，自始即有其失，李鸿章于同治三年致恭亲王奕䜣及军机大臣文祥书云：“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制器；欲学外国制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 蒋廷黻以为这是“ 中国 19 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 ”。实则，只着眼于器、艺、才，正是李鸿章见识不足之处。他在同治四年八月改建江南制造局奏折中说：“ 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狂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 ” 于是，李鸿章之所欲学于西方者，只是其长技而已。早在甲午前，有识之士如郭嵩焘，专函李鸿章，指陈洋务之失，主张派留学生出洋学习制造和驾驶，不如学科学技术。更好的办法，应是像日本一样，在国外学习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立国之本，李鸿章见不及此，而答以“ 鄙人职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 ”。“ 兵乃立国之要端，欲舍此别图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 ” 这就是梁启超批评李鸿章“ 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源 ”。由此可知，洋务运动从一开始提出，即过于重长技，重军事，重科技，不揣其本，只求其末，其所培养的人才，曰洋务官僚，或称为科技官僚是也。虽能济事于一时，毕竟不能图长远。是以经之营之三十年，至甲午一败，乃不可收拾，而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焉。然虽经此败，国人犹有效李鸿章之余风者，是以时至 1919 年 12 月 14 日《雨僧日记》记陈寅恪先生与吴雨僧先生哈佛夜谈慨叹当时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谓为“ 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 ”，“ 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 ”。陈先生并断然曰：“ 今人误为中国过重虚理，专谋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谋精神救药，势必至于人欲横流，道义沦丧。 ” 寅恪先生此言，亦可视为对洋务运动间接之批评。

洋务运动既以见识之限，不能为掘地见根之革新，而海军建设费用，在光绪十四年以后，因移以营造颐和园而大减，又复累受制于李鸿章的老对头，掌管户部之翁同龢，更不能不情见势绌。李鸿章于光绪八年，与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合奏，分析中日双方兵船的力量，认为是互不相让，进而说：“ 然比年以来，臣鸿章与内外诸臣熟商御侮之要，力整武备，虽限于财力，格于浮议，而购船制械，选将练兵，随时设法，独具规模。 ” 结语说：“ 中国地大物博，能合力以图之，持久以困之，不患不操胜算。中国战舰足用，统驶得人，则日本自服，球案（按指日入侵琉球）亦易结矣。 ” 李鸿章这时对胜利前景的信心，并非无据，光绪十四年以前，中国海军较日本为有优势。及十四年以后的情势，如甲午战败时李鸿章所奏：“ 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购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启奏渎请，臣当躬任其咎。 ” 六年之期，海军未扩，至光绪二十年战启，日本海军已强于中国了。

李鸿章对此是明白的。他分析北洋海军之可用者，只镇远、定远两舰优于日本，然“ 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汊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远。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 ” 因此，尽管是时业已战启，李鸿章制定的政策是“ 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

以求谅于局外也。”李鸿章之不主战明矣。然而，毕竟还是战了。李鸿章以局内人明白不能战，尽管他没有公言反战，已招来了汉奸之谤，“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流行舞台，盛传都下，李鸿章毕竟也爱名节，于是在和战之前流之于依违两可。此所以陈宝箴在时流中独具只眼，于战败后责备李鸿章曰：“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畏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凭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陈三立《府君行状》）

抄引拙作旧文一段（《再说李鸿章》，载《川上集》）如次：“一时主战之风甚嚣尘上，且说动了慈禧和光绪，李鸿章在奏折中才作此表示（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中国屡受敌侵，朝野有轻易求战之心，其情可谅；在不能战之时而强战，乃以国家事为儿戏，其事不可取。远一点说，南宋以来，即因辽金元之屡侵，就造成了轻易言战的心理，士大夫以功名自见者，动辄言战，后之人误以为不问任何情况，言战即同于爱国，因而往往以战和判忠奸，其误甚矣。即在近代，甲午以前，已有鸦片、英法联军、中法三役之败，不检讨自己，审时度势，力求自强，锐意改革，只是空口叫战，只能败得更惨。可悲的是，甲午惨败诚然深深震动了中国，尤其知识阶层，戊戌维新以起，革命之说以兴，当政者则还是昏聩胡涂，最后引来了义和团，招致了八国联军入侵。”

李鸿章非欲战，而终于不得不战者，即由上述轻易言战之心理，引发了以李鸿藻为首的清流党人、帝师翁同龢等主战派之群力促成之也。清流党人为局外，局外人危言高论，立异以为高，说来轻松，造成风气，再加以宫廷矛盾、朝臣党争，终于不当战而战，遂使经营三十年之自强运动归于失败矣。凡此等等，均详论于《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晚清政局概观》之中，条分缕析，上探其因，下论其果，左右兼及，横通并列，一事标而诸事明，诸事举而一事彰，论史之文，于斯至矣。吾于此三读之而致赞焉。

抑更有言者，石泉此文作于 50 年前，一可见其独立无羁之思想，了无顾忌，言人之所未言，发人所未发之覆，毫无左顾右盼之拘束，此正得寅恪先生平生所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真谛，吾于此更尊其为同门学长也。二从文字言，挥洒自如，得心应手，语语照应，前后关连，以视后之八股之风，高出不知多少。今之治史者，于此亦当有以学之。

既服其识，又佩其文，谨为书后如上，不尽欲言之于万一也。

1997 年 3 月 28 日

访古讲史 各得其宜

读罢姜鸣的《被调整的目光》，喟然叹曰：此类题材之写作，应出于老年人之手。想不到竟有一个年轻人勇为之，且优为之，写得那么悠然自如，历史材料熟积于胸，随事点染，益人以智；凭吊遗址，说古谈今，更增沧桑之感，兴亡之叹。而文字的掌握运用，亦到佳境。使我这么一个看不懂新潮写作的老朽，击节赞叹之余而憾见其作之晚也。

中国向有讲史之体，与民间流传的“说三分”之类的口头文学互相渗发，今日“说书”尚存，而庙堂的讲史之体不得其传。例外的是，远在美国的前辈学人黎东方先生，抗日战争时期，即以在各地讲史负盛名。黎先生去台赴美后，承其讲史之体，写成和出版了洋洋大观的几大部《细说》各朝历史之作。我在前数月，为黎先生的大陆版《细说》诸书写序，（《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载《文汇报·笔会》），曾述讲史之学不可废。然黎先生的讲史属于史体，文史相结合，所谓散文随笔式的说古谈今之作，又是一体。此类体裁，妙在随事而发，挥洒自如，增入了作者的盛衰之感，兴亡之叹，既能使读者获“在历史中求史识”（陈寅恪先生语）之益，复可予读者以踵事增华的文学之妙。此亦旧有之体，然近年大盛，要必有因。

姜鸣之作，除了他本研究历史，具史识，又复性好游，喜访古，遍览京中古迹，谈史之中皆间入今事，古今相糅，撒得开，收得住，其文乃免于唯掉书袋之弊，而增加了活泼清新之气。这也是昔人所有的写法，能得其妙，则存乎一心。我所尤喜者，集中有的篇章，就史论史，亦有其所见，能言史家所未言，破一些研究文章多年承袭的谬说。集中写奕䜣，写李鸿章，写翁同龢，写珍妃，写康有为诸篇，遂有所见，能发未发之覆。这就更可贵了。作者名其书为《被调整的目光》，不知是否源于此。

识史篇

曾·左·李

左宗棠挽曾国藩联云：“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李鸿章挽曾国藩联云：“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材。”两联皆称名联，传诵一时。所谓中兴名臣的代表，更兼以三人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后之读史者，不免抚联兴叹。

一般挽联，颂死者事功道德学问，述生者与死者的关系。死者不可得见生者之评，是给活着的人看的，然盖棺之论，尤其出于与死者生前关系密切的名人，却是重要的启示，其联语应重在真与诚。秉此而论，左李二联有可议处。

左李二人都由曾国藩提携推荐而出人头地位登公卿，李鸿章更出于曾国藩之门。曾李均两榜出身，曾任侍读，李入翰林，左宗棠只中了个举人，三试礼部不第，这是左宗棠最痛心事。宗棠心高气傲，恃才傲物，谁也不在他眼里。早年居湖南巡抚骆秉章（先是张亮基）幕，才情及任事之能名动公卿，骆秉章凡遇僚属白事，都要问一句：“季高先生云何？”他有几分狂，以诸葛亮自喻，称为今亮。他对此自有一番解释：“后人思想薄弱，不敢以今拟古。”此言真有一番气势，当得起开思想解放之先声。他狂得来有本事，尽管“谤议四起”，旁人也不能不服，称之为“左都御史”，讽刺中带着无可奈何。狂不是毛病，宗棠最大病，是霸，对谁皆霸。《清史稿》本传云：“始未出，与国藩、（胡）林翼交，气陵二人出其上。”这就是自负过高，傲而忌，忌而霸了。至于下文言：“中兴请将帅，大率国藩所荐起，虽贵，皆尊事国藩。宗棠独与抗行，不少屈，趣舍时合时不合。”这倒不全能以此定宗棠之非，议论合与不合，要看事情的是非、正误。

曾国藩知人之明，举人之功，其世推第一人。对于左宗棠，更是多次保荐。咸丰六年，国藩打下武昌，奏陈宗棠济师济饷之功，诏以兵部郎中用，俄加四品衔。接着为骆秉章劾罢总兵樊燮之事，涉及宗棠，诏令对簿武昌，国藩与胡林翼皆上言宗棠无罪，且荐其才可大用。从此，宗棠从国藩治军。后以所练楚军转战浙江，国藩时受命节制浙江，又荐宗棠足任浙事，经再次疏荐，宗棠终于在咸丰十一年得任浙江巡抚，独当方面，从此大展其才。

以上所引，皆见正史。至于稗官野乘，于曾左李间之事记载甚多，亦有可资参照者。曾官至四川总督的刘秉璋，出于淮军，其子体仁，著《异辞录》，所记当系闻之于其尊翁。《异辞录》记曾左事，有云：“文襄在军距曾军数十里程，间日跨马而来，文正盛设馔食以待，谓大烹以养圣贤，重之如此。文襄善啖而好谈，入座则杯盘狼藉，遇大块用手擘开。恣意笑乐，议论风生，旁若无人。偶与辩胜，张目而视，若将搏噬之状。称人必以其名，惟于文正则敬之称字。一日言事有异同，文正出句云：‘季子自鸣高，与我心期何太左！’文襄对曰：‘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以名对字，偶一呼名，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简单数语，于宗棠之豪之才之狂，描写尽致。

国藩守经，宗棠霸道，两人相处，就未必能融洽。曾氏家族之最盛日，宗棠之声名日上时，宗棠于国藩已不是那么佩服，尤其对于曾国荃，厌恶已极，虽兄弟贤愚有异，宗棠未必能不移其厌心于乃兄。世传宗棠曾鼓动国藩“鼎之轻重，似可问焉”，于史无据。国藩死，宗棠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当是生平第一次低认人下。高阳写小说《胡雪岩全传》，谓此句为宗棠向国藩认错，这是本于《清史稿》本传之论，评宗棠“初

与国藩论事不洽”而述及挽联语上句的推论。其实，承认不如国藩，亦非认错。至于下联“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只能说是门面话了，二人何曾有此关系。

李鸿章从曾国藩游，讲求经世之学，终身师事国藩，堪称大弟子。挽联上句“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以传人自居，隐有自得之意，然亦记其实，就事功勋业言，鸿章确可谓国藩传人。自然，国藩守经，鸿章反之为从权；国藩拙诚，鸿章反之为欺诈，两人于此，大相径庭，其高与低不可同日而语。下联“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材”，颂扬之高，无与伦比，也当是当时人所同意。进而考察两人一生关系，就复杂多了。

鸿章初在乡，随他父亲办团练，颇有扰民之事，乡人为之揭帖（按：今之大字报也）云：“翰林变作绿林。”往依安徽巡抚福济，落落不得志，反学得欺诈之术，说是应“时时以小人之心待人”。咸丰四年，去江西入国藩幕，未见重用，及国藩为太平军败于祁门，鸿章竟辞幕而去，没有什么师生之谊了。途过益阳，晤胡林翼，告以离曾营之故。林翼劝他说：“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君非涤生曷以进身？”青年李鸿章气壮如牛，答：“吾始以公为豪杰之士，不待人而兴者，今乃知不然。”鸿章归寓，束装将行，林翼派人把他强留下了，留饮数日，绝口不说前事。鸿章终去，在江西依其做知县的兄弟，进退维谷，极感困难。这时国藩攻克安庆，鸿章驰书贺捷，国藩立报之书云：“足下行踪亦颇突兀，昔祁门危而君去，今安庆甚安而不来，何也？”文字间虽带有挖苦，毕竟认为鸿章是可用之材而盼之来。鸿章立刻回曾营，《异辞录》记曰：“文正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熏陶之能事。”还对刘秉璋称赞鸿章，谓之为皖北人才，在《日记》中记曰：“气象峥嵘，志意沉着，美才也。”鸿章也对刘秉璋盛道国藩之善教，为他所遇老师中仅有之一人。师生上下关系，此时当为最融洽的时候。国藩荐鸿章可大用，而鸿章受命招募淮军，更助其羽翼，旋经国藩保荐，鸿章得为江苏巡抚。从此，鸿章大遂其志，勋业赫赫，曾李并称。

鸿章所以报效老师兼提携者，最大的莫过于让曾国藩兄弟克金陵之功。国荃久攻金陵不下，时鸿章已克苏州，朝旨令鸿章赴金陵助攻，鸿章以金陵破在旦夕，托辞延师，虽经部下将领数请出兵，终不允。及城破，鸿章至金陵，国藩迎之于下关，拉着鸿章手说：“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曾氏弟兄攻城前种种部署，就是不让他人分享破金陵之功。鸿章善体师意，成交了一笔政治交易，这正是鸿章的权变处。观曾国藩与国荃书，对于是否派鸿章助攻金陵考虑多端，派则分国荃之功，更怕国荃不高兴。多次信中对此没有明说，而是借口担心国荃的身体（时正病）。甚至于说自己将来去金陵也是为“看热闹”，以安国荃独占功劳之心。可见弟兄之间也不免疑忌，李鸿章算是看透了。

世事变化，终有出人意表者。国藩晚年，英雄气短，声名虽盛，而成事已难。国藩生平心病，维两大端：一是剿捻无功，一是处理天津教案违心失当而丢了直隶总督。代之平捻成功者是鸿章，代之处理天津教案和督直者，也是鸿章。于此，国藩的心境是复杂的，设辞聊以自解，且有酸葡萄之意流露，甚焉者，还有牢骚言语。史载，天津教案善后，鸿章继国藩督直，新旧更替，同居督署中。一日，谈笑极乐，文正谓文忠曰：“我遇困境，咸赖汝继，汝才胜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为我所荐也。”这已经是带有解嘲之意。

国藩剿捻无功，鸿章继为帅。国藩愧弗忍去，自请留营效力。不管国藩用意如何，总有自责而愿协同之心。鸿章对此事的做法，极为过分，“至军，亟取钦差关防于文正所。文正对人说：“关防，重物也；将帅受代，大事也。彼（指：鸿章）弗自重，亟索以去，无如之何。然吾弗去也。’”鸿章遣人百端说之回江督任。无效。鸿章竟施以威吓：“以公之望，虽违旨匆行可也。九帅（按曾国荃与剿东捻役，久无功，后果摘顶，下部议处）之师屡失利，不惧朝廷谴责乎？”国藩遂东归，闷了一口气在心里，自是绝口不谈剿捻军事。及后捻平，鸿章疏请加恩从前领兵大臣，虚应故事，国藩得了个轻微的世袭轻车都尉之名，修养再高也忍不住了，一口气爆发出来，“闻之大怒，谓江宁府涂朗轩太守曰：‘异日李宫保至，吾当为之下，今非昔比矣。’”老师在军，学生何得擅专，鸿章太绝情，国藩诚亦失其风度。

一次，国藩对刘秉璋说到鸿章，国藩举巨掌以喻，说是“奈何与此公相背，今上甚从其言也”。此是充满酸意的话，人以为以巨掌指门生为失言。

勿烦多引，同为名臣，诚然有人所不及处，但毕竟是人，就难免有些是是非非。

左李之间，是非更多。二人未发迹时即各不相下，以宗棠之霸，更不把鸿章放在眼里，鸿章以安徽人在湘军，谓“湘人胸中有鳞甲”，即指与宗棠难于相处，以后相互意见更多。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两人战区相接，益形敌对。“淮军平两捻，张总愚（西捻首领）投水死。文忠奏报时，朝廷悬一大学士缺，隐然以为赏格，文忠因此得相位，尤触文襄之忌，公然疏言张总愚未死，伏有隐患。是后彼此遂不相通。”鸿章曾指责宗棠非西捻张总愚对手，甚至谩骂宗棠与西方交恶，误国甚于崇厚的丧地俄国。此皆非公平之语。

三人中，鸿章寿最长，活了七十九岁，功业日盛，毁誉不一。甲午一败，落得汉奸之名，虽非其实，毕竟让英雄齿冷。以人品论，鸿章低于曾左二人，《清史稿》本传论曰：“唯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从，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倒是确论。咸同光之际，以文臣而为武将，开一代之风，曾左李三人，其佼佼者，此风至于民国而泯。读史至此，发一浩叹。

1995 年 8 月 2 日校订

李二先生非汉奸

李鸿章在世时，声誉之隆，两宫特别是慈禧，对他的宠信之深，一时无出其右者。朝中人望，他已骎骎乎凌驾于乃师曾国藩之上。曾国藩讨捻无功，继之者为李鸿章，居然功成；曾国藩于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措置失当，连《清史稿》本传也说“津民争怨之。平生故旧持高论者，日移书谯让，省馆至毁所署楹帖。”继之处理此案者亦是李鸿章，“逾月而定”。此时的李鸿章，真可谓顾盼自若，旁若无人。而曾国藩则屡屡求退，一身暮气，坐在轿子里背诵经书，饭后一局棋，对手都让他数子，此老无复进取之心。位极人臣不招众忌，从来少有，最讲究修养且修养亦确甚高的曾国藩，对于凌驾己上的学生李鸿章，亦不能无忌言。如讨捻之役，曾国藩久无功，李鸿章正自得意，出言不免讥刺，曾国藩奏疏有云：“臣不敢以一战之功，遂自忘其丑陋。”有人告李鸿章此话有所指，李鸿章瞿然，从此对捻事出言小心了。这是暗指。一次甚至明白地对人说，不要和李鸿章作对，“今上甚从其言也。”酸葡萄之味毕见。

李鸿章崛起，在上海附近一战。他编练淮军，方开抵上海时，衣装破烂，洋人耻笑不置，人谓之叫化子兵。李鸿章说：“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及战，洋兵数败，华尔率洋枪队弃青浦，走松江。李鸿章率部程学启（原属曾国藩军）战于新桥，乘胜攻泗泾，解松江围。洋鬼子不敢轻视李鸿章带的叫化子兵了，李鸿章声名大噪。从此以后，一帆风顺，直至甲午战前，享受了极高的荣誉。

自清初至同治，文臣封侯，自曾国藩始。打下江宁，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赏双眼花翎。是时的李鸿章，封一等肃毅伯，亦赏双眼花翎，以爵位论，在国藩之下。后来的岁月，鸿章所得优遇，就逐渐凌驾国藩之上了。同治七年，西捻平，鸿章八月入觐，赐紫禁城骑马。这是国藩所未得者。光绪五年，鸿章受命题同治及其皇后神主。以学问、人品都远不及国藩的鸿章，得此当时认为无上光荣的尊重，可谓极矣。自然，其时国藩已死，即使不死，按诸情势，点主之荣，也落不到他头上了。鸿章一生最高赏赐，在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甲午战发之前，光绪十九年正月，鸿章年七十，两宫赐寿。光绪二十年，赏戴三眼花翎，这又是乃师生前所未得者。《异辞录》有一段话，谓：“同光以来，每逢庆典，李文忠常得异数。紫缰三眼翎，本朝赐近支八分，今以当古之九锡，人臣所不能有。……德宗三旬庆典，文忠得方龙补服，出于《会典》之外。”

最可看曾李待遇之异者，是死后享受的不同。曾死，“辍朝三日，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李死，“两宫震悼，赐祭葬，赠太傅，受封一等位，谥文忠。入祀贤良祠，安徽、浙江、江苏、上海、江宁、天津各建专祠以祀，并命于京师特建专祠。汉臣祀京师，盖异数也。”（以上分见《清史稿》曾李本传）李鸿章的爵位，在死后和曾国藩拉平了，比国藩高了一级的是，京师建立专祠。国藩地下有知，当重复生前所说：“今上甚从其言也。”其实，重用后半生的李鸿章，初在恭王，后在醇王，因二王而邀慈禧的宠信，鸿章身价日隆矣。

甲午战败以前，鸿章虽亦曾受攻讦，还有人比之为贾似道、严嵩，袁爽秋甚而毁与鸿章子经方的儿女婚约。但攻讦主要来自反对洋务的守旧之士和清议朝政的清流党人，对他来说，是小焉者，不在话下的。反对开放，反对学西法（尽管国藩和鸿章主张学的西法是尚未得其本，毕竟是进了一大步），

其时已成不了气候。至于清流党，尽管激昂慷慨，终归是局外人空口说白话容易，无实际之补，亦于鸿章所图之大局无碍。对李鸿章一生最大打击，致命的一击，乃在甲午惨败。

尽管有人批评鸿章历次上疏言海防之固“似嫌过于自满，启上骄志”，又说：“然北洋海陆全军，缓急足恃与否，渤海门户深固不摇与否，公（指鸿章）于事前似未尽知。”（《异辞录》）毕竟，苦心经营数十年，鸿章于我海防及海军实力，还是比较清楚的。鸿章之咎，在于未力争不得以购买机器军火费用移以修建颐和园。《异辞录》作者刘体仁，对此说是“以汉臣面膺宠眷，未便与人家事，此不能为公咎者。”其说荒唐，动用军费怎能说是清室家事？正因为李鸿章于中日海军比较清楚，所以，他才不主战。多年传统观念，至今也还是如此，论战论人，往往概以主张战和判忠奸，主战者皆忠臣、英雄，主和者必奸臣、败类。鸿章在此种朝野议论影响下，没有公开明确表示反对战，然《清史稿》鸿章本传，已道出鸿章之不主战，“至是（指甲午时），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方设谋解纷难”，就是通过外交谈判。张百熙疏劾鸿章“阳作战备，阴实主和”，在朝野压力之下，鸿章自不能不战了。时头脑清醒的大臣无多，只孙家鼐力言衅不可启。私家笔记所载，也证明了鸿章已战而欲中途停战：“中日战事方起，是时当局要人李文忠为海陆军帅，手握全权；直隶提督叶曙青为大将，身当前敌；项城为行人，通使命，合词请班师以待天下公论。”战端已起，自然止不住了。

当时，主战最力的人，是李鸿藻与翁同龢。袁世凯奔走李鸿藻之门，张季直和文廷式为翁同龢耳目，袁世凯大言，按他的计划，可以制敌于先，这自然是胡吹。难怪战败以后，李鸿藻用袁世凯小站练兵，鸿章以羞辱之身归自马关，讽刺说：“余败军之将，候袁大少爷成军后可以一战。”

甲午终败了，且败得如是之惨，李鸿章声誉一落千丈，他还得含羞忍辱去日本马关谈判。鸿章本不愿去，“然辞气之间，不无踟躇”，李鸿藻怂恿他去，说是“好为之，所不与公祸福与共者，有如天日。”不能说鸿章因此一言而去，毕竟有一位大臣愿与共分担责任，有以促成其去。马关谈判，春帆楼面对伊藤博文咄咄逼人的气势，李鸿章虽败军之将亦足以言勇，当场还能使伊藤下不了台。而李鸿藻口出壮言，徒成空语。这正是做实事和说空话的对照。

回国之后，从此背上了汉奸罪名，“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成了千古名联。名丑杨鸣玉（又名杨赶三）讽刺李鸿章早在平壤之败时，是役李诏夺三眼翎黄马挂，赶三演《丑表功》，去保儿，临场插诨云：“我有汗马功劳，奈何夺我三眼翎，褫我黄马挂。”可以想见剧场的强烈反应。不久杨死，乃有此联出。平心而论，以战败之罪归于一人，是不公平的。李二先生非汉奸。

甲午战败后，慈禧欲治主战者之罪，以为李鸿藻老成，且为同治之师，目标便集于翁同龢，但止于披其枝叶：吴大免官，汪鸣銮被谴。无一词及于李鸿章。后，李鸿章使俄，慈禧对他说：“中国败于日本，汝辱斯甚。”当面一言，算是为他洗刷，更为了还要用他。庚子义和团，他以两广参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组织的东南互保条约，给清廷和慈禧下不了台。辛丑议和，还得劳动这位衰翁。条约一订，他就在这一

年死了，让历史去总结他的一生。《清史稿》本传，称鸿章“自壮及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振常按：自然是遭众骂），或劝之归。鸿章则言：‘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不能把这话全看作门面语，李鸿章确有临事的精神，所以才一直到七十九岁高龄还在位做事。如果在他六十多岁以后一刀切，退了下来，当可免去后来汉奸之诬，历史也就残缺了。

1995 年 8 月 9 日

再说李鸿章

前文《李二先生非汉奸》（载《文汇读书周报》第 555 期），言而未尽，作此续篇。

李鸿章阐述他的洋务思想最具代表性之作，为同治三年写给恭亲王奕䜣和军机大臣文祥的信。此信提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之理，结语云：“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 蒋廷黻对此信赞誉极高，认为是 “ 中国 19 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 ”。

其实，这正是李鸿章见识不足之处，也是洋务运动的根本缺陷所在。还是用李鸿章自己的说法来证实，他在同治四年八月改建江南制造局的奏摺中说：“ 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 ” 照此，中国的政教、文化、风俗皆优于洋人，无须作任何改变，只要学得西方之长技足矣。至甲午战败的几十年中，洋务运动的声势，不可谓不盛，终至一战溃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宣告了此路不通，以事实证明了李鸿章思想之大局限，甚而可以说：李鸿章但有实务而无思想。梁启超评论他不学无术，殆即指此。

甚至还用不着到甲午，早在此前，个别杰出之士，已指出洋务之法有欠缺。出使英法的郭嵩焘，以亲身所验提出，非只洋人的科技制造值得学习，洋人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更应借鉴。他为此专门写信给李鸿章，主张派留学生出洋学习制造和驾驶，不如学科学技术。更好的办法，应是像日本一样，在国外学习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立国之本。时人目郭嵩焘之说为邪说异端，李鸿章亦不接受郭嵩焘建议，答称：“ 鄙人职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 ”“ 兵乃立国之要端，欲舍此别图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 ” 以主兵为藉口，实认为兵即是立国的大者远者，而否认了西洋的政教文化有可学。这就是梁启超批评李鸿章 “ 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 ”。

李鸿章练兵的首要是，购买新式战舰，建立强大海军以对付日本。光绪八年，他与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合奏，分析了中日双方兵船的力量，认为是互不相让，进而说：“ 然比年以来，臣鸿章与内外诸臣熟商御侮之要，力整武备，虽限于财力，格于浮议，而购船制械，选将练兵，随时设法，独具规模。 ” 结语说：“ 中国地大物博，能合力以图之，持久以困之，不患不操胜算。 ”“ 中国战舰足用，统驶得人，则日本自服，球案（指日入侵琉球）亦易结矣。 ”

李鸿章对胜利前景的信心，倒也并非无据。光绪十四年以前，中国海军较日本为有优势。光绪十四年以后，因献媚慈禧，海军经费大量用以建造颐和园，照李鸿章甲午战启时所奏，说是 “ 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购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 ” 李鸿章不敢语涉慈禧，稍言海军经费移用造园事，隐忍出以 “ 臣当躬任其咎 ”，满腹怨气。以后终于对掌管户部的老对头翁同龢发泄出来，这且留待后面去说。经六年停滞，到光绪二十年战发，日本海军已强于中国了。李鸿章对此是明白的，看他在甲午战启时双方海军兵力的分析可知，其时北洋海军之可用者，只镇远、定远两舰优于日本，然 “ 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汊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远。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 ” 因此，李鸿章制定

的政策是“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

这就明白地表示，李鸿章并不主战。为什么要“求谅于局外”，即因局外人不明就里，一时主战之风甚嚣尘上，且说动了慈禧和光绪，李鸿章在奏摺中才作此表示。中国屡受战侵，朝野有轻易求战之心，其情可谅，在不能战时而强战，乃以国家为儿戏，其事不可取。远一点说，南宋以来，即因辽金元之屡侵，就造成了轻易言战的心理，士大夫以功名目见者，动辄言战。后之人误以为不问任何情况，言战即同于爱国，因而往往以战和判忠奸，其误甚矣。即在近代，甲午以前，已有鸦片、英法联军、中法三役之败。不检讨自己，审时度势，力求自强，锐意改革，只是空口叫战，只能败得更惨。

李鸿章以局内人明白不能战，尽管他没有公言反战，已招来了汉奸之谤，李鸿章毕竟也爱名节，便流之于依违两可。几十年的练兵，局外人误以为已属莫敌，从前三败于洋鬼子，今与东洋人战当可胜之。于是，内外言战者众。这里面，军机大臣李鸿藻和翁同龢起了最主要作用。胡思敬《国闻备乘·名流误国》有载：“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同龢旧傅德宗，德宗亲政后，以军机大臣兼毓庆宫行走，尝蒙独对，不同值诸大臣不尽闻其谋。通州张謇、瑞安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文士，梯缘出其门下，日夜磨励以须，思以功名自见。及东事发，咸起言兵。是时，鸿章为北洋大臣，陆海兵权尽在其手，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孝钦以勋旧倚之。謇等仅恃同龢之力，不能敌。于是廷式等结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进言于上。妃日夜怂恿，上为所动，兵祸遂开。”

这节记载，大致可信，但忽略了慈禧的作用，大失。没有慈禧首肯，光绪何能决定作战？紧接上文，下面写到李鸿章向翁同龢一泄怒气，两个对头正面交锋了：“既而屡战不胜，敌逼榆关，孝钦大怒，召同龢切责，令即日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晓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归乃不敢言战。”

这段记载，颇能传神，李鸿章怨气冲天，翁同龢退无可守，看来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和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之间的纠葛，实际是翁李二人甚至是翁李二家的恩怨纠结。

翁同龢家世显赫，与其父心存均为两朝宰相而兼帝师，与其侄曾源均中状元，所谓父子宰相、叔侄联魁。陈康祺《郎潜纪闻》称翁家为“两朝宰相，再世帝师，三子公卿，四世翰苑”。翁同龢的长兄同书任安徽巡抚时误抚练首苗沛霖，以致失陷封疆，被两江总督曾国藩参劾，革职充军新疆，死于戍所。曾国藩参劾显赫的翁家人物，并非没有顾虑，劾疏中有云：“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牵就。”就表明了顾虑所在。而这句话确也厉害极了，正好以此堵住了同治和慈安、慈禧之口，宽假无从。逮问时定拟翁同书大辟，后因翁心存病死，方减罪为充军。为曾国藩拟这个疏劾的，正是李鸿章。李鸿章是著名的刀笔，曾国藩就曾称赞他的公牍写得好。翁氏一家，对于李鸿章，怎不怀恨在心。翁同龢既入军机。后久兼户部，职权在手，对李鸿章施以报复，请款购买军舰屡遭驳诘，自在意中。重臣以国家事为私人恩怨之具，不亦可叹。

李翁仇隙之深，还可另引一条材料说明。其记载出于身经其事的吴永，

所著《庚子西狩丛谈》谓甲午败后，袁世凯为翁同龢做说客，去北京贤良祠看李鸿章，劝李“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鼙鼓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缴徵逐，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声价耳。语未即已，公即厉声诃之曰：‘止，止。慰庭，尔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想要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的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

李鸿章在甲午败后，直隶总督一职被革，文华殿大学士衔尚在，清例，大学士不开缺，旁人不能补。翁同龢虽入军机，却因无缺，补不上大学士，做不了协办大学士，不能称为拜相。翁同龢于此，心有戚戚。袁世凯善于窥伺，乃在他昔日恩人李鸿章面前为翁同龢谋此。话才开头，李鸿章敏感之甚，立即出以激愤之言止之斥之，翁李怨毒之深可见。

事情没有结束。袁世凯退后，李鸿章即对吴永诉说了一通。《庚子西狩丛谈》续记云：“项城出后，公即呼予相告曰：‘适才袁慰庭来，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翁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的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李鸿章自负一生不求退，面对翁同龢，更要干到底。曾国藩平时常对人言，他有“挺经”十九条。这所谓“挺经”，无非是收罗一些成语故事，讲的是刚柔相克处世之道，李鸿章要继承师道了。

杂记甲午和战问题如上，如果李鸿章在光绪十四年以后，能如愿以偿续买军舰，慈禧不以海军经费营建颐和园，中国海军建设当有强于甲午之时，但也未必能战胜日本。这就不是但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的李鸿章及其流亚所能见及了。甲午战败，李鸿章处于万人唾骂之中，当时主张诛李鸿章者甚多，文廷式等翁党之议无论矣，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于乙未五月亦有由致两江总督张之洞，请吁奏诛合肥以谢天下。黄濬得见此电，以之载所著《花随人圣庵摭忆》，原电云：“读铣电，愈出愈奇，国无可为矣。犹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局外哀鸣，伏维赐察。三立。”张之洞是极有心机的人，迎风善变，他自然明白，甲午后慈禧犹眷顾李鸿章，所以对陈三立此电未复。值得探求的是，陈三立何以有此主张，是否与时流以李鸿章为汉奸的看法相同？

查陈三立《府君行状》记：“其时李公鸿章自日本使还（振常按，指乙未签约归），留天津，群谓且复总督任。府君愤不往见，曰：‘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人或为李公解，府君曰：‘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凭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卒不往。”如是，则陈宝箴之责李鸿章，与众议之一哄而嗤之为汉奸也大不同，责其不当战而战，不冒死据实以呈国家实不能战也。然则，其子散原老人之请诛合肥，当亦秉其义。壮哉，义宁陈氏之谠论也。

陈宝箴此说，与往昔曾国藩所论亦相符合。曾国藩在天津教案落职后致李鸿章信云：“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请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一意主和。盖恐群情懈弛，无复隐图自强之志。鄙人今岁所以大蒙讥诟而在己亦悔憾者，此也。”曾国藩毕竟高李鸿章一筹，

李鸿章以“筑室忝为门生长”自居，惜乎未见得领略了乃师之深意，便使后人亦复哀后人也。

1995 年 11 月 20 日

张之洞巧宦热中

黄濬批评张之洞“巧宦热中”，和梁启超抨评的“迎合宦术甚工”，一个意思。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云：“其（张之洞）幕府今尚有存者，言当年南皮仕宦之热中，历历可徵。”文字一转，下面说了张之洞另一面。“然南皮究为书生，究存老辈风度，晚入军机后，西后既殁，即力主起用沧趣（按即陈宝琛），集（按指张之洞诗集）中如《过张绳庵宅》（按为张佩纶）、《拜宝竹坡墓》（按为宝廷）诸诗，皆甚敦气类。所惜者，急于仕宦，不肯引绳批根，直论政治崩坏之本原。欲结官掖之恩知，不惜诟人以利己。”张之洞本是有所见的人，但是，为了做官，不免迎合，甚而不惜损人利己，以得奖掖。用现在的语言说，是个风派。尽管如此，张之洞毕竟有所建树。

张之洞的建树，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一是重工业。张之洞本是词臣，居翰林院 18 年，深知文化教育的重要，两任试差（典乡试），两行学差（地方学政），均有成绩。及后历任封疆大吏，始终注意兴学。他在各地举办的书院中，颇有培养出硕学大儒之士者，如四川的尊经书院，湖北的两湖书院，广东的广雅书院，至如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专业学堂，他也有所建树。建立汉阳钢铁厂，张之洞名声最大，以至毛泽东说“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但他实是全凭主观意志，盲目兴建，在选址、开矿、购器、经营诸方面，多是任意而为，大手花钱，其结果是搞不下去，留了一个烂摊子给盛宣怀。（详已述于另文《清末三屠》，此处不赘）凭实而论，张之洞留给后人的，教育上的成绩多于洋务（重工业是他兴办洋务事业中的最重要部分）。他所兴办的洋务事业，只能见效于一时，有的甚至一时也未曾见效（他太外行了），他在教育上的兴为，则留益于久远。加上张之洞一生清廉，不谋私利，《清史稿》本传称他，“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其人即有可称。

黄濬评张之洞“事功不如文章”，和柴萼《梵天庐丛谈》所议相符，过于就“立言”为论。就文章而言，张之洞确是高手，既为大臣，则所重应在事功。且张之洞的事功，应合其兴办教育事业和洋务事业来计算，亦不薄矣，不宜强为对比，致兴“恨王荆公不作翰林学士”与“惜褚彦回之作中书而后死”之叹。

张之洞观风而动，以下举诸事明之。

戊戌政变前，张之洞和康有为有来往，并从经济上支持强学会上海分会。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光绪二十一年十月条记：“康祖诒来。”下注云：“祖诒在京师创立强学会，朝士集者百数十人，是月十一日来见，旋赴上海设分会，请公列名。公复电云：‘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乃助会款五百两，拨公款一千两。”张之洞虽亦言维新，未必与康有为之论合辙，捐款而不列名，正是张之洞欲观风向各占一脚之举。

张康关系，如仅只是这一晤和捐款，也就很一般。《花随人圣盦摭忆》揭载张之洞幕僚梁鼎芬写给张之洞的两封信，大有意味，且深可探索。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半夜，张之洞长孙堕溺两江总督署花园池塘殒命，张之洞悲痛至极，时时涕泣，康有为到南京见张在十月十一日，正是张之洞丧孙之后。这位清客梁鼎芬在信中提出了为张之洞释忧的奇妙之法：和康有为终日相对长谈。其一信云：“比闻公伤悼不已，敬念无既。（旁注云：断断不可如此，忧能伤人，况涕泣乎！）今思一排遣之法，长素健谈，可以终日相对，计每日午后案牍少（稍）清，早饭共食，使之发挥中西之学、近日士夫

之论，使人心开。”又一信云：“长素于世俗应酬全不理会，不必区区于招饮，鼎芬亦可先道尊意与近事，渠必乐从。如可行，今日先办。或欲闻禅理，兼约礼卿（按为蒯光典）使之各树一义，粲花妙论，人人解颐，连日皆如此，康蒯二子，深相契合，两宾相对，可以释忧。”黄濬据此谓：“此两笺是当时南皮延重康长素之铁证，而节庵居间尤力。”梁鼎芬曾列名强学会上海分会发起人，和康梁颇有关系，他是张之洞的亲信，为张康居间，很合适。度梁鼎芬如果平时不从张之洞处得知张对康的看法，不致为此奇妙的献策，献此策必投张之所好。因此，可以断定，康有为此行访张，必有一段时间盘旋，非一面之晤而止。

在戊戌政变之前，张之洞这个深得慈禧宠信的大员，早已窥测出风向，深知康氏政治改革、倡导民主民权之说（假托为孔子学说）必不可行，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著为《劝学篇》，以“教忠”，“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和康有为维新学说划清界线，所以，《清史稿》张之洞本传说：“二十四年，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

张之洞不只著《劝学篇》在政治上明志，以示其斥康说，甚而在谈诗论诗上，也前后不一。最明显的莫过于对王安石的态度。黄濬评张诗之最佳者是其绝句，而其绝句纯学王荆公，甚至在晚年的《吊袁爽秋》诗中曾唱：“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双井半山今一手，伤哉斜日广陵琴。”对于王安石的推崇达于极点。忽然又再三说明他不赞成王安石，《学术》一诗自注云：“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论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歪曲事实地说这种风气和他毫无关系。他的《金陵杂诗》中，亦有《非王安石》一首。政治扩大到了学术和诗，文章讲龚自珍，经论崇王安石，和康有为经学讲《公羊》连在了一起，变成政治问题了。后世批胡适、批胡风的做法，早见于戊戌之时，其源有自，真令人悲哀，而张之洞真算得窥风高手。于此，也就不能不赞赏黄濬下面的推究所得为敏锐之见，黄濬对张之洞于王安石立说之数异，发表意见云：“细求其故，殆由于南皮先曾保康梁，为子延誉其力，及戊戌变起，乃亟亟印《劝学篇》以自明。任公时著《大政治家王安石》，南皮则亟诋之，吟咏之不足，又躬自注释，以明其宗尚正大。此中矫揉，皆为逢迎西后，正为自全之一念驱使之。”呜呼，“自全”毁了多少知识分子、学者，也毁了士大夫如张之洞。

己亥立储，是晚清一大事，是慈禧酝酿未成的一个政变。废光绪立大阿哥浦儁为皇嗣，当时知识分子反响强烈，上海签名反对者多达数千人，对慈禧这个专制统治者并无影响，促成慈禧中止此事的动因，乃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一句话：“中外之口难防”，借外国人吓退了慈禧。张之洞时为湖广总督，态度如何？有两说，一说见于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谓张之洞对慈禧征问立储的意见答说：“权在太后，非疆臣所得干预。”恰恰是这个张之洞，在此前光绪行新政时和陈宝箴共同疏奏奉行兴革事宜最力。一说见于胡思敬《国闻备乘》，谓张之洞本已和刘坤一商定反对废储，“之洞始诺而中悔，摺已发矣，中途追摺弁回，削其名勿与。”所以刘坤一说：“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后图。吾老朽何惮？”于是留下了刘坤一单独具名的名言两句：“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无论何说为是，张之洞逃不了看风说话的论定。

与此相类似的有庚子西狩事。李鸿章邀集各督抚力阻慈禧挟持光绪逃往

太原继逃西安，李鸿章的考虑是，西逃则联军无议和对象，必致战争延长，议和困难，赔偿亦必增加。李鸿章的考虑是对的，张之洞非见不及此，只是了解慈禧亟欲西逃，希慈禧留而不列名会奏。张之洞一生对慈禧亦步亦趋，所以不倒，且官位日隆。

下面要说的一件事，因政治关系涉及了张之洞做人品质。张之洞源出清流，和清流名人张佩纶、宝廷、陈宝琛等意气相投，深相友善。后张佩纶外放，马江兵败，谪戍远行，释归后做了清流最反对的李鸿章的女婿，晚年闲居南京，郁郁不得志，张之洞移督两江，和张佩纶同在一城，《花随人圣盦摭忆》揭载，张之洞又打算盘了，以张佩纶“夙为西后所嫉，与之往还，俱失欢西朝；不与往还，又失故人之谊”，亏他做得出，叫人劝张佩纶移居苏州，难怪张佩纶大怒，“谓我一失职闲居之人，何至南京亦不许我住耶？”其后闻南皮又使人先容，微服往访（佩纶），至于相对痛哭。不能说张之洞全无旧情，交友为政治所左右，难矣。张佩纶死，陈宝琛千里往悼，并留诗。此时张之洞又迁督湖广，陈宝琛吊丧路过，张之洞约他同游庐山，陈宝琛谢不往，干脆答以“吾为吊丧来，非游山也。”张之洞意兴阑珊地写了《江行望庐山，约陈伯潜游不至》诗，后来又有《过张绳庵宅》（绳庵即张佩纶）四诗，故人情谊，毕竟不能全忘，为求禄位，内心矛盾亦深，张之洞这样的风派人物，做人也太难了。

1995 年 12 月 17 日

清末三屠

清代末年，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有三：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稗宫野乘有载，时人称之为三屠，今人说当时又叫作三大杀手。度杀手当是现时叫法，意大利黑手党盛行，美国动作片杀手狂飞，这种称呼才流行于时。三屠之称，较合于历史实际。因以为题。

三屠者，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为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自小站练兵至山东剿拳到天津搜杀拳民余遗，杀人不计其数，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劾人，不畏强暴，自监司大员以至微员佐贰，有时且劾至百余人，称为屠官。自然，这只是各就其突出之一项标举以特称，一身而二屠并在者自不免，如袁世凯，兼为屠财好手。每有记载，言其好财货，挥金如土，喜以金钱爵禄羁縻人才，曾对人言：天下无难事，惟有金钱自能达到目的耳。胡思敬《大盗窃国记》论袁世凯，“每幸一姬，辄有犒赏。宴客常备珍馐，一席之费，不减中人十家之产。……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张佩纶《涧于集·致李兰荪师相》谓，袁世凯“骄奢淫佚，阴贼险狠，无一不备”。袁世凯于屠民、屠财之中，屠民居其首，尤在入民国后为独夫民贼，屠杀异己，摧残革命，其财更为屠民所掩而居于后位了。

《清史稿》张之洞本传有句云：“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前事言公，后事言私。公者，张之洞居疆寄数十年，历两广、两江、湖广诸任，其所作为，规模极大，而他用财如水，不问多寡，耗费了国家大量资财。但他有一个最大好处，不谋私利，不贪污，所有国家钱财都用到了事业上去。所以，张之洞一生有清廉之名。“及卒，家不增一亩，”即就其私者而言。本传中另有一例，即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八年再署两江时，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这就是现在所谓的行贿了，张之洞“立劾罢之”。前偶观电视报道，张之洞身后，家乡河北南皮只遗房屋一处，已为张氏后人捐献作了学校校舍。张之洞一生重视教育，在任翰林期中，两典试差，两放学政。任四川学政时，创设尊经书院，请湘潭王壬秋入蜀掌院，硕学大儒多出其门，承传继往，蜀学大盛，川人至今感念。后任封疆大吏，转向洋务事业，仍不忘教育，如在广东恢复广雅书院，在湖北设立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当其著者。张氏后人捐献故居作校舍，可谓善体先人之志。

张之洞于同治二年会试中探花，入翰林院，至光绪七年十一月补授山西巡抚，在翰林院达十八年。翰林是苦差，收入极薄，一般都靠外放考差、学政捞财。考差，尤其学政，程仪既丰，陋规所得更多。“一年学政，十年吃着不尽”是当时写照，可见收入之丰。四川是大省，生员最多，一任学政，所得陋规收入，有二万数千两银子之多。张之洞于同治十二年十月在四川充乡试副考官事竣，派任四川学政。按陋规应得收入，他概行拒收，两袖清风，重返北京。此种清廉之风，使官场耳目一新。自任山西巡抚开始，历经封疆大吏，张之洞保持着清廉之风，这就更不容易了。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记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六年中，“凡所规划，用款率取之清厘中饱”。此话恐有夸张，张之洞规划的地方事业规模极大，厘金积弊诚多，收入诚巨，清理厘金中饱，所得毕竟不会太庞大，况张之洞本人清廉，未必他下面办事的人个个都清廉，难免没有从清理贪污中亦作贪污者，总其上缴清理所得，当难满足六年地方事业之需。但是，由此说明了，张之洞本人不中饱，清厘中饱所得毕竟为数甚多，加上其他筹措，可以让张之洞放开手去做事。

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评论张之洞好大喜功，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评论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二年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施为，说是“今观其举措，似侧重铺张应付，专力为物质上之角逐者”。黄意张之洞不注意政治思想的更张和人民知识的增进。此评过当。张之洞并非如此，好大喜功则是确评，因为好大喜功，不免铺张应付。现以筹办汉阳铁厂为例说明之。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时，上奏在广州筹炼铁厂，列举数字，指报广东产铁甚多，而购入洋铁，开支甚大，呈请在英国订购大炉及机器。在办理中，张之洞因筹办芦汉铁路转调湖广总督，继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奏报广东产铁不多，不能设厂，张之洞因奏请炼铁厂移设湖北，即后来的汉阳钢铁厂。张之洞上报广东产铁情况全属臆测，而对于国外炼铁方法全无所知，贸然便要买回两座炼铁炉，能否应用不在意中。英厂主说是须先将煤焦和铁砂样品寄英化验，才能根据品质决定设计炼铁用的炉子。张之洞竟然答复：“中国之大，何处无佳煤佳铁？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此种屠财手面，惊世骇俗。英方按英国所用炼铁方法设计二座炼炉运到，马鞍之煤无从炼焦，大冶之铁不适用于此种炉型，变成笑话一场。在铁厂设址问题上，更见张之洞的专横无知和狭窄。其时大冶发现铁矿，有人建议炼铁厂应设在大冶，张之洞说：“大冶路远，照料不便，若建于汉阳，吾犹及见铁厂之烟囱也。”为了让总督大人看得见烟囱，炼铁厂乃建于龟山之麓，招致后来不少麻烦。汉阳钢铁厂经费计银三百万两，张之洞选址不当，填土费用就花了三十多万两，在英国订购机器所用亦为三十多万两，两者相加，用去了建厂经费的十分之二。无知导致的损失如是之大。光绪二十年，汉阳钢铁厂产品应市，历年亏折惊人，至光绪二十四年，亏折累计达到了一百多万两。这个烂摊子，后来不得不交给盛宣怀去收拾。举此一例，可概其余。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评论张之洞“巧宦热中”，张之洞做官，自有一套本领，结慈禧欢心，醇王奕䜣为之奥援，出身清流，为翰林时屡劾大员，一生清廉，博得好名声，便恣睢放肆，为所欲为，旁人不敢奈何。张之洞自撰的《抱冰堂弟子记》，述其在粤督任上得奕䜣维护，颇为自得：“己丑庚寅间，大枢某、大司农某，立意为难，事事诘责，不问事理。大抵粤省政事无不翻驳者，奏咨字句无不吹求者。醇贤亲王大为不平，乃于曩所议奏各事，一一皆奏请特旨准行，且事事皆极口称奖，并作手书与枢廷诸公曰：‘公等幸无藉枢廷势恐吓张某’。又与大司农言曰：‘如张某在粤有亏空，可设法为之弥补，不必驳斥。’其实粤省报销款固无所亏也，然贤王之意则可感矣。”得意之情，跃然纸上。

黄濬又评张之洞“事功不如文章”，这和柴萼《梵天庐从录》之评相同，柴著曰：“论者谓，使文襄生于乾嘉全盛之时，论思献纳，润色鸿业，则必能于阮、纪两文达（按指阮元、纪昀）之间占一席地位。即不生于太平时代，而终其身为文学侍从之臣，亦必能于潘文勤、翁文恭（按指潘祖荫、翁同龢）而后，主都下风雅之坛坫。昔人恨王荆公不作翰林学士，而惜褚彦回之作中书而后死，以为‘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予于文襄亦云。”

按诸张之洞为人狂放，性行怪僻，不拘细节，柴萼这番话不为无理。《国闻备乘》说张之洞“自负才地，多作度外之事，不屑拘守旧规，年愈迈而气愈骄，自享太平五十年，俯视一切，盖以为天下莫己若矣。”择举《国闻备乘》所举事例的一部分如后：“直隶人闻之洞内用，皆欣欣有喜色，合八府三州京官，张宴于湖广会馆，徵集名优，衣冠济济，极一时之盛。之洞收柬

已三日，届时催者络驿载道，卒托故不往。鹿传霖、徐世昌忍饥待至二更，皆扫兴而散。闻其性情怪僻：或终夕不寐；或累月不薙发；或夜半呼庖人具馔，稍不惬即呼行杖；或白昼坐内厅宣淫；或出门谢客，客肃衣冠出迎，（张则）僵卧舆中不起。其生平细行大节，鲜不乖谬者。”在他下面做事的人就苦了，“幕僚侍立白事，小有失误，诃责之声达于户外。”所以张幕无人才，辜鸿铭无非一怪人，陈衍只会做诗，梁鼎芬一无节行之徒。像这样的一个大员，确是狂傲文人本色，还是去做一个词臣更适合。

说张之洞屠财如上，袁世凯屠民可无论矣，下面说岑春煊的屠官之事。岑春煊在清末算得上干练能臣，做事有担当，有魄力，本人亦清廉，有佳誉。平生最大事迹，在于联合瞿鸿　去斗庆亲王奕䜣和袁世凯，酿成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政潮，事虽未成，瞿岑两人且因此落职，亦云壮矣。岑春煊因庚子慈禧和光绪避八国联军西狩护驾有功，深得慈禧宠信，一再重用，官至总督、尚书，此人头脑灵活，入民国后，仍活跃政坛，初接受昔日政敌袁世凯差委，先后任福建巡按史、粤汉铁路督办。及袁称帝，又被南方推为讨袁军都司令。至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岑春煊与孙中山同为总裁，尔后又与政学系合作，反对中山。一身数变，随时浮沉，究其一生，留在历史上的，还应当是他的屠官往事。

岑春煊捐班出身，以父（毓英，云贵总督）荫升迁极快，至光绪二十四年，得任广东布政使。时在戊戌维新期间，裁巡抚，布政使岑春煊直接受两广总督谭钟麟管辖。岑到位之初，即与顶头上司谭钟麟大干了一场。大要为，谭钟麟信用的道员王某，颇多不法，商民多受其鱼肉。岑到位后，有来控告者，岑经调查，请总督撤去王某差事，谭钟麟不从。岑自行撤去王某的补抽厂坐办，又邀集司道同寅谒谭，请求并撤王的督署文案。谭岑二人当场冲突，岑春煊在所著《乐斋漫笔》中记述说：“谭愧且怒，遽拍案诟詈，目镜堕石桌立碎，势张甚。余亦拍案曰：“藩司乃朝廷大员，所言乃公事，即有不可，总督不应无礼至此。既不相容，奏参可也。’掷冠案上，拂衣而去，回署即请病假。”后岑春煊奉召入都陛见，谭钟麟委派臬司代理他的藩司，岑准备交代工作。亦据岑自述，南海、番禺两县商民数千人到藩署请愿，表示支持岑。岑带着王某案控词入京，谭派员“辇金入都”，以作活动。岑抵武汉，果然奉谕“调补甘藩，勿庸来京请训”。“到任后，终以谭王营私舞弊事具疏，有旨查办，谭因罢归，王亦革职。此案以藩司劾罢督臣，为有清仅见之事也。”

岑春煊以上自述，不免夸张，即如罢谭钟麟易以李鸿章督粤，实为甲午败后李鸿章受攻击，亟谋外放总督，由荣禄为之谋得，岑之参奏，最多只起了参考作用。但是，岑春煊敢于老虎头上拔毛，算得汉子。至光绪二十九年，岑春煊调署两广总督，时已在庚子大得慈禧赏识之后，岑春煊胆气更壮，在粤三年，办了两件惩治贪污案，分别简述如下。

南海县知县裴景福贪污案。裴景福，进士出身，历官广东数县知县。在南海县任上，贪污受贿经查出者，即达银元二十四万四千二百余元。据岑自述，岑先将裴景福革职看管，后裴自愿罚款充饷，外释，逃往澳门，抗不归案。岑派员赴澳门交涉，得以引渡，充发新疆。民国后，裴景福花钱运动，竟平安释回，且在民国三年出任安徽省公署秘书长及政务厅长。此事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易名编入。

粤海关书办周荣曜侵蚀巨款案。小小一书办，侵蚀之款竟达数百万，尤

可惊者，以款贿动赫赫权贵庆亲王奕䜣，被派任出使比利时大臣，尚未出洋，被岑春煊揭发，革职查抄。岑春煊动得了书办周荣曜，动不了奕䜣，岑在谒见慈禧时多言奕䜣，慈禧问：“汝说奕䜣贪，有何证？”岑春煊讲了周荣曜运动出使比利时事，“斯时奕䜣方管外务部，周犯便伊所保，非得贿而何？”慈禧说：“奕䜣太老实，是上人的当。”从此没有下文了。

屠官之名，未必为美谥，《国闻备乘》说：“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股栗失色者如皆贪官，岑春煊所屠如皆污吏，则是人民之德，亦屠官者之德矣。

刘公岛上念甲午

月初有烟台之行，乘间登临刘公岛，吊古战场。今年是甲午战争百年纪念，想见黄海大战，怒涛汹涌，硝烟弥漫，北洋水师，精锐尽覆，马关之盟，为帝国主义长驱直入开启了道路，中国再一次遭受了屈辱和悲痛，而历史曲折以进，百感丛生，乃作此文。

刘公岛，隶威海，北洋水师设于斯。昔年遗址多存，而最令人低徊不忍去者，厥维总部所在的海军公所。门额一匾，署“海军公所”四个大字，乃李鸿章手书，李鸿章三字虽已铲去，仍依稀可辨。此举实属多余，以视门外两旗杆，高挂大清帝国龙旗，又何如哉！大清帝国一去不复返，李鸿章还留待后人评说。

公所几进几层，非巍峨亦可以言雄壮，厚重多实，朴素无华。何处议事，何处办公，依次标明，井然有序。丁汝昌寓所在衙外东辕门之后，丁战败后仰药自尽于衙内侧室，遗迹昭然。临其室，壮丁公之志，不免怆然。师败自尽殉国，并不亚于邓世昌壮烈战死，后人多颂邓世昌，甚或不知丁汝昌之名者，影片《甲午海战》的作用超过了历史书。所异者，其侧院在举行巴黎服装展览，甲午先烈不知对此作何想法。

衙后陈列一大炮，非不雄壮也，想其临阵轰鸣，威亦足以夺人。曾、左、李辈经营洋务运动多年，临事敬业，精神可钦。运动之起，本为自强御侮，着眼与着手，便在军事工业，由火炮铁甲而带来了声光化电，一时科技之学大昌，这本来也是好事。然而，过重物质而轻精神，诚为时弊。甲午大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探其弊，扰扰多年的体用之争乃入本末之辩，于是，求其体而探其本，使晚清之局走上维新和革命之途。这是历史的发展，固不足以苛责曾、左、李辈。其实，曾李相较，前辈之曾胜于后辈之李，曾国藩有经世之才，亦有传统与现实相合而生的思想底蕴，时人谓之有学有术，毛泽东早年讲过他服膺曾国藩，蒋介石更是一生师事曾国藩，可知矣。时人和后人，没有在洋务运动失败上指责这个运动的真正领袖曾国藩，而将矛头对准了他的弟子李鸿章，这固然是由于北洋水师乃李一手苦心经营，甲午战败表明了经营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的破产，更由于李鸿章身当军国大事，多次签订丧权辱国之约。

李鸿章亦有经世之才与术，时人谓之不学有术，此言稍过，但比起曾国藩来，他缺少的确是蕴涵深厚的思想，迷信工业，迷信科技，而乏统御工业、科技的精神力量，其结果还是只能培养官僚，不过与传统形式的官僚略异而已。此李鸿章及其洋务运动及其北洋水师之所以败也。甲午败后，“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这副名联盛传全国，其实，汉奸之名是加不到李鸿章头上的。主战主和，不足以论英雄，不能以判忠奸，李鸿章当年谋国之事，主和之时，不能叫他为投降派，他深知其时是不能言战的。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其势然也，亦不足以责李鸿章一人。观乎八国联军之役，李鸿章以两广总督而加入刘坤一等发起的东南互保，他深知义和团而不主战。及败，他奉命北上签订和约，滞留上海数月不愿行，后来还是去吞了这个苦果，他并非不知此约之辱，也已预见到将留骂名于后世。李鸿章是个悲剧性人物。后人评史，应析之。

从鸦片战争开始，再没有比甲午之败那样广泛和强烈地震动朝野了。此前败于武器精锐的高鼻蓝眼的毛子，自忖不如人，这次却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又称同文同种，深受华夏文化的熏陶，可称是学生打败了老师。而经营

多年的北洋水师，似乎俨然其强盛矣，事实上当时也确乎胜过日师，如今惨败，自六月廿三日（公历 6 月 25 日）接战，至年底，半年之间，日军连陷九连城、金州、旅大、海城、盖平。翌年乙未三月二十三日（公历 4 月 17 日），签订了丧权辱国至极的《马关条约》。同年五月（公历 6 月），日军入侵台湾。自此之后，帝国主义者更为大胆地入侵中国，《马关条约》签订六天之后，三月二十九日（公历 4 月 23 日），俄、德、法三国强索辽东半岛，清政府增付“还辽报酬费”三千万两。中国土地真成了强者宰割的鱼肉。中国真的该亡吗？中国人在担心，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思索，寻找变局，中国的历史由此而前进。试举出几位著名先进知识分子的行进以参照。

甲午五月中下旬，距战争爆发不到一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言改革，未被采纳，决心革命，于甲午败势已定之十月廿七日，创兴中会于檀香山。《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筹备起义的工作更积极。

《马关条约》签后之四月初八日（公历 5 月 2 日），康有为振臂一呼，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子一千三百余人“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这是永载史册的振聋发聩的历史壮举。

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经世报》、《实学报》和《译书公报》，开始言维新变法。

翰林公蔡元培，甲午前后居京中，一直沿着旧学道路前进，甲午之战，为其转变的一大契机。战事初起，列名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领衔的一份奏折，请密联英德以御日人。战争期中，在他的《杂记》手稿中，逐日记述对战事的关切之情。《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皆说明舍末以逐本。越三年，1898 年，戊戌维新的壮举，终于失败。直接的动因，就是甲午大败。客观形势造成了主观思想的变化，主观思想的变化，又促成了客观形势的前进。人民如此，知识分子如此，在朝肉食者亦有变化。历史终究在前进。戊戌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而且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的空前耻辱，历史亦复在前进，且不说以后辛亥之役，即使看清末新政，其所颁行之改革内容，远过于戊戌维新的政纲，可明。

站立刘公岛上，看黄海滔滔之浪，奔流不息，历史在前进我念更坚。

1994 年 7 月 24 日

春帆楼屈辱依在

甲午战败，乙未签和，祖国宝岛台湾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侵占，再陷于屈辱。历五十年，于 1945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回归祖国。回顾五十年台湾同胞在日本屠刀下的屈辱，黯然神伤。然而，台湾人民的斗争精神，永世长在，五十年中，他们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起义和斗争，此起彼伏。这斗争，和他们的先辈在明天启四年到清康熙元年（1624—1662），历时三十八年的反对荷兰占领者的斗争，同其辉煌，同其永垂史册。

亡友李纯青先生，生前任台盟中央副主席，为台湾问题的著名专家，在其遗著《台湾问题研究》历史篇前言中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句话包含着三个意思：一、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二、台湾长期从属于中国，没有发生过边界纠纷；三、台湾两次被外国侵占，终皆物还故主——归还中国。这就是台湾领土归属的历史真实。”此诚不易之论，虽别有用心者亦不能否认其事。

由于明朝政府和官吏的昏庸无知，竟在战胜了荷兰的入侵后而听任它占领台湾。亏得台湾人民反抗荷兰侵占的武装起义连续不断，最著者为郭怀一起义。后郑成功终于打败荷兰占领军，俘获荷督揆一，收复全台。至清初，又亏得施琅的坚持，敢于反对康熙所谓“台湾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的错误看法，上奏《陈台湾弃留利害疏》，使得清政府置台湾于祖国一统之内。

历史无情，223 年之后，马关一纸所谓和约，台湾宝岛再入异国之手，读《李鸿章、伊藤博文谈判实灵》，一方是横蛮骄狂，颐指气使，势在必得，一方是卑躬屈膝，哀哀苦求，毫无办法，真是不忍卒读。

文载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至同年三月二十一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各偕其同僚在马关春帆楼所举行的五次会议的实录。割台、赔款二亿两之空前屈辱，于此达成协议。从实录看，割台之事，始见于第四次会议，引李、伊对话如下：

李：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

伊：此系彼此定约商让之事，不论兵力到否。

李：我不肯让，又将如何？

伊：如所让之地必须兵力所到之地，我兵深入山东各省，将如之何？

李：此日本新创办法，兵力所已到者，西国从来（振常按：“来”当系“未”之误排）全据。日本如此，岂不贻诮西国。

伊：中国吉林、黑龙江一带，何以让与俄国？

李：此非因战而让者。

伊：台湾亦然，此理更说得者。

……

李：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为数甚巨，必请再减，营口还请退出，台湾不必提及。

此时之李鸿章，尚坚持不能割台，语气亦属坚决。而五天之后，在第五次会议上，所谈主要内容是李求减低赔款、伊藤坚持不减以及签约期限问题，至于割台，除了李讲到台湾人民迁出后的产业归属问题，并谓“我接台湾巡抚来电，闻将让台湾，台民鼓噪，誓不肯为日民”，伊藤则凶相毕露地答：“听彼鼓噪，我自有法。”看来，由于见诸会议实录之外的活动，其事已成定局。

李鸿章尽管乙未签约被骂为汉奸，“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之联语遍传国中，但此非李鸿章一人应尸其咎，开战之前，疆吏中只李与刘坤一两人认为不能战，然在以战和判忠奸的舆论中，在枢臣李鸿藻与翁同龢等的鼓噪下，李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又不能不战，这就不只是李鸿章一人的悲剧了。前面说，会谈中李是卑躬屈膝，苦苦哀求，乃就总体而言，就甲午战败两方所处之情势而言，从会议实录着，李鸿章亦有强硬处，有时且有绝妙的语辞讽刺对方，如谈到签约的期限，伊藤求速签，只允一月为期，李鸿章认为太短，说是：“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接着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脱口而出：“尚未下咽，饿甚。”一付凶馋相。李鸿章讽刺说：“两万万（按指赔款）足可疗饥。”虽显无可奈何之状，亦是妙语刺敌。而在李鸿章使日之前，清政府曾派“钦命出使全权大臣、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及“钦命全权大臣湖南巡抚”邵友濂于 1895 年 2 月 1 日与伊藤博文等在广岛会谈，甫开始，伊藤博文接过张、邵交与的全权委托状，一看就掷了回去，说是委任状没有写明和谈具体内容，断然拒绝谈判，张、邵不得不泄气而归。李鸿章在会谈中的可怜相，实是当时局势所由定，非李一人之辱也。

春帆楼谈判，以赔款二万万两及割台终，据载，约定，伊藤在春帆楼举行庆功宴会的同时，李鸿章及其随员乘招商局“公义”及“礼祐”两船启航出关门海峡，李鸿章立船上沉默不语良久，突然回头远望春帆楼上辉煌的灯光，对着海风说：“台湾啊！台湾！”则李鸿章并非没有心肝，他亦深知台湾之辱。

割台消息传到，“全台震惊号哭，民众以台湾绅民名义，电奏清廷，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等死后，再言割地。”（李纯青《台湾问题研究》。）此后，唐景崧之抗敌，虽只六天而败，刘永福亦不能久峙，但是，陷台之初，台湾抗日义军烽火遍全岛，著名人物如丘逢甲、胡阿锦、陈秋菊、徐骧、柯铁、简大狮、刘德标等，此仆彼起，以迄于辛亥之后至抗日战争之时，台湾抗日事件亦乎连续不断。梁启超 1911 年舟泊马关，将赴台湾，有诗云：“汉家故是负珠崖，覆水东流岂复西？我遇龟年无可诉，听谈天宝只伤凄。”这只是一种哀叹台湾不复归的感伤。毕竟，台湾归来了。两岸虽仍隔裂，终必趋于统一。

春帆楼屈辱依在。今年又逢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半个世纪中两次遭受强邻侵略，历史不能忘。

1995 年 1 月 15 日深夜草

东南互保幕后策划

东南互保，中国近代史一件不大不小事。说它不大，不过地方督抚协同一致与外国代表共谋保全地方的安宁。说它不小，是地方敢于违抗中央、欺瞒中央，公然与外国订成条约。近年以来，考证东南互保，议其得失之文渐有，间亦有能得其精要者，然都忽略了一个幕后策划人的活动。没有这个人，便无所谓东南互保一事，东南一地，尤其上海一隅，在义和团起事和相继而来的八国联军大入侵中，不知会被搅成什么样子。

此人身非显要，名气颇有，富策略，善活动，如用今日通称，算得上真正的社会活动家。黄炎培曾说：此四十年间（晚清至民国），东南之局，有大事必与这位老人有关。其言或有夸诞，此人参与了东南半壁不少大事则是事实。其人乃赵凤昌，字竹君，久居沪上，结交官绅商学，所居惜阴堂，在清末宪政运动中，和狄平子《时报》内的息楼更成为立宪派活动的大本营而声名陡起，惜阴堂一直为名流聚会之所，折冲樽俎之地，而赵凤昌其人，尚有待于历史的评说。从我接触到他的材料看，1903 年《苏报》案，他扮演了为端方做密探的角色，并和福开森联络，促成了工部局下令逮人，极不光彩，而在早于此三年的庚子之变中，他做了一桩好事。

关于东南互保，赵凤昌写有回忆文字，初载于《人文月刊》，似乎未曾引起注意，后黄濬访问赵凤昌，将赵文写入《花随人圣盦摭忆》，世人渐知东南互保萌议的始末。

据黄所引赵文，庚子义和团事起，北方纷乱，上海城内忽传有拳民千人飞渡而至，旋沪巨室纷纷迁避内地，有的刚出发就遭抢劫。传说未必可信，有一桩事却赫然呈现眼前：各国兵舰连樯浦江，即分驶沿江海各岸保护侨商，英水师提督西摩（振常按：指英国东亚舰队总司令 E.H.Seymour）更是拟入长江。这事刺激了赵凤昌，他认为：“倘外舰到后，与各地方一有冲突，大局瓦解，立召瓜分之祸。”于是和他的老朋友何梅生（即何嗣龢，曾为张树声幕僚）商量，他的想法是：“意欲与西摩商，各国兵舰勿入长江内地，在各省各埠之侨商教士，由各省督抚联合立约负责保护；上海租界保护，外人任之；华界保护，华官任之。总以租界内无一华兵，租界外无一外兵，力杜冲突。虽各担责任，而仍互相保护，东南各省一律合订中外互保之约。”这就是后来订立的东南互保条约的雏形。

赵、何商议后，认为“须有任枢纽之人”意即能交通中外上下的人促成其事，他们认定盛宣怀最合宜，当由何梅生去疏通盛，何还约了一个美国人同去，因为有外国人说话，容易取得盛的信任。盛宣怀有所顾虑：“端（王）刚（毅）用事，已无中枢，今特与外人定此约，何以为继？”实际是怕担待关系。这个顾虑很自然。赵凤昌又出主意了：“可由各省督抚派侯补道员来沪，随沪道迳与各国驻沪领事签字。公（盛）不过誓为枢纽，非负责之人，身已凌空，后来自免关系。”这一着实在高明，盛宣怀做实事而不担名声。于是，由盛宣怀分电沿江海各督抚，讲明其事，重点对象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除了发电，还分别派人去面说。去南京的是沈瑜庆（字涛园，号爱沧，沈葆桢之子），去武汉的是沈曾植（子培）、张謇（季直）。条约是盛宣怀草拟，共八条。赵凤昌为之增加汉口租界和各口岸两条，共成十条。

一切如所商议，在上海会审公廨谈判签约了。这位赵凤昌，头脑实在灵活，认为盛宣怀既不在签约之列，即不便对外发言，而主要的中方签约人上

海道余联沅“拙于应对”，便由赵巧妙安排了座次：“外人以领袖领事在前，以次各领事；中则以沪道在前，盛以太常寺卿为绅士居次，与余道坐近，再次各省派来道员。”关键是余联沅的座位要靠近盛宣怀。赵凤昌授余联沅以机宜：“倘领事有问，难于置若者，即自与盛商后再答之，庶有转圜之地。”果然，领袖领事美国总领事古纳即席发问，提出“5月15日上谕饬全国与外人启釁”，因说：“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办否？”这句问话很难回答，“遵办则此约不须订；不遵办即系逆命，逆命即无外吏，焉能订约？”余联沅转向盛宣怀，盛告余：“即答以‘今日定约，系奏明办理’。”如此含糊过去，两方乃签约，东南之地，免了一场生灵涂炭。

约既签，盛、赵颇为得意，彼此标榜一番：“盛回来深服予之先见，预与余道有约，幸渡危境，予亦极称其迅答四字（按指‘奏明办理’）之圆妙。”其实，与外人签此约何曾“奏明办理”？这叫做私通外邦，罪名原本不小，然当此际会，清室中央已难指挥地方，而“位同方伯”的督抚，听任地方绅商玩了一场游戏，清室中央实在无可奈何了。两广总督李鸿章和山东巡抚袁世凯还迫不及待地自请加入条约呢。

1996年7月6日

赵凤昌假造圣旨

赵凤昌策动盛宣怀说服刘坤一、张之洞等与各国订立东南互保，已是大胆事，因为这么做，就是公然违抗清廷助拳剿洋的命令，其间更为大胆的，竟是假造圣旨。

庚子七月二十一日夜，八国联军已经攻陷北京（按：八国联军于 1900 年 8 月 14 日即庚子七月二十日攻陷北京），慈禧挟持光绪逃，不愿人知，怕人知，走得极为秘密而又仓卒，不要说老百姓不知道，官员知者也不多。消息终究传开，反正是皇帝和太后往西跑了，惹得人心惶惶，自然增加混乱。远在上海的赵凤昌，此时发了一个电报给湖广总督张之洞，电文说：“ 洋电两宫西幸，有旨饬各督抚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庆邸留京与各国会议云。 ” 所谓庚申例，即是 1860 年英法联军陷北京，咸丰出逃承德，庆邸即庆亲王亦劻。

据赵凤昌自己说，拍这个电报的目的是，“ 意欲鄂得此电，可宣布文武官僚、地方士庶，藉以安长江一带人心耳。 ” 何以安人心呢？关键的一句应是“ 令庆邸留京与各国会议 ”，所谓“ 饬令各督抚力保疆土 ” 之说只是虚言，首都都陷落了，各地督抚如何力保疆土？与八国联军这个仗本是不能打的。而发电之时，奕䜣实已随从慈禧、光绪西逃，所谓“ 留京与各国会议 ”，全是赵凤昌捏造，赵凤昌实是押了一宝。

张之洞是个细心人，复电“ 询电从何来，即确复。 ” 于是，赵凤昌难办了，电系自拟，哪有来处。此人鬼点子真多，去找盛宣怀，提出由盛照他发给张之洞的同一电文发与各督抚，表示确有其事。盛宣怀认为“ 旨岂有捏造 ”，意颇迟迟。此君又有说词：“ 捏旨亡国则不可，捏旨救国则何碍？ ” 这种冠冕堂皇的话，恐怕未必能说动盛宣怀，下面的话就很实际：“ 且既称洋电，即西人之电，吾辈得闻，即为传达而已。 ” 洋电如不实，追查起来，最多不过是传播谣言而已，和假造圣旨的罪名比起来就轻多了。而且既是洋电，查也查不出的。赵凤昌致张之洞电，之所以冠以洋电二字，用心可谓甚深。

等盛宣怀的通电发出了，赵凤昌方才复电张之洞：“ 盛亦得洋电，已通电各省。望即宣布，以安地方而免意外。 ” 这些事都在七月二十二日一天办妥，这个洞补得天衣无缝。但是，还有一个亦䜣留京的问题。七月二十二日以后，确知慈禧、光绪西逃，也确知奕䜣随扈在途，赵凤昌对于所拟之电，半中而半不中，恐怕是捏了一把汗。到八月初三日，慈禧、光绪传命奕䜣回京，而奕䜣还逗留保定，一直到八月十五日，有廷寄下达，“ 援庚申例饬奕䜣与各国开议， ” 赵凤昌得意地记述：“ 且一如所拟之电， ” 这时真是舒了一口长气。下面一句结语：“ 此忧患中一快事， ” 表面看，似是说他为国家办了一件好事而有此快，实际是表现他至此解脱了捏造和假传圣旨之罪的心情，一句“ 且一如所拟之电 ” 即是明证。

从这件事看，赵凤昌似乎有胆识而料事如神，其实，他是根据了可靠的京城消息来源而作判断，采行动，他自己在回忆文中透露的，就有他的 ” 京友庆宽 ”。庆宽曾任专使访问日本，获得日本颁发的宝星勋章，八国联军日将大岛与庆宽相识，联军入城之后，大岛请庆宽向奕䜣通消息，并要庆宽去保定请奕䜣回京。这事，庆宽告诉了赵凤昌，赵凤昌既判有根据，便能大胆行动，冒假造圣旨之大不韪而自鸣得意了。书生行事，并非无成。辛丑和约之后，洋员赫德和盛宣怀同旨加宫保衔，盛宣怀对于赵凤昌无所酬庸表示歉然，赵答以“ 我本无此想。 ” 其实，清廷的酬庸盛宣怀是不得已而为之，赵

凤昌看出来了：“ 外臣向系另旨（封酬），（今）又以汉臣列外臣之次，可知（清廷）于互保尚有意见。 ”这意见是不能免的，封酬的人自然愈少愈好。

1996 年 7 月 8 日

赫德与《辛丑条约》

前一篇文章谈到《辛丑条约》签后，清廷封赫德和盛宣怀为宫保事，那是在 1901 年 12 月 11 日,慈禧和光绪尚在从西安返回北京的途中发布的上谕所颁。该谕违反了外臣另旨的惯例，两人同列一谕，盛宣怀且在赫德之后，赵凤昌据此认为清廷对于东南互保尚有不满之意，这是正确的。违反旨意，暗自行事，尽管当时无如之何，事定之后，尽管事实证明所行之事带来东南一带免去战乱之灾，慈禧心中自然还是不高兴，封一个盛宣怀已经至矣尽矣，那是有苦说不出。赵凤昌说他“本无此想”，如为真话，算他聪明。至于对赫德，则与东南互保全无关系，那是酬庸他奔走《辛丑条约》之功。谕旨明称：“总税务局赫德，随同商办和约，颇资赞助，”封为太子少保。

赫德这位权倾一时的外臣，从 1900 年 6 月 20 日凌晨，义和团和荣禄、董福祥指挥的清军开始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和西什库天主教堂起，直到 8 月 14 日下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为止，整整两个月之内，处于东交民巷被围困之中。这位作为中国政府外臣的中国通，又代表帝国主义的利益，确然在庚子、辛丑间做了不少事情。早在这一年的 6 月 10 日，赫德发电给广州税务司庆丕（P.H.King），要他通过两广总督李鸿章向慈禧求援。电文说：“各国使馆皆担心被攻，预料中国政府即使没有敌意，也毫无帮助。如发生任何意外，或形势没有迅速转机，肯定会发生外国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帝国可能灭亡。以我的名义请求他（李鸿章）致电西太后，以确保使馆平安为要。不要管所有那些劝说采取敌对行动的大臣们。火急！”李鸿章即刻按赫德意电呈慈禧，并于次日（11 日）会见了美、德等国领事，商讨北方局势。而在赫德发电给庆丕的同一天，英、法、日、俄、德、美、意、奥已组成侵略军，由津进京，不过中途为义和团之军所阻耳。

13 日，赫德在海关内的房子为义和团所焚，除所记　70 册日记为一关员携出，余物荡然无存。17 日，各国军队侵袭并迅速占领了大沽炮台。19 日，清政府尚不知大沽口已失，以“有意失和，首先开衅”为由，通知各国驻京公使，限使馆全体人员 24 小时内离京赴津，同样通知也送给了赫德。赫德作答，为侵略者辩护说：“各国所调之兵，莫非为自卫保襄助平定乱局起见，毫无碍及朝廷之意。”20 日凌晨，义和团及清军围攻使馆。21 日，清政府发出宣战书。

被围困的赫德，成为中外最关心的人物，而他与中外各方联络亦未全断。围攻开始，赫德向侵华联军指挥官送去告急信件：“各国人士被围困在使馆内。形势险恶，你们速来。”信件送到天津德领馆，于 6 月 29 日电发到欧洲，成为围攻初期欧洲获悉消息的最早重要来源。清政府急切探听赫德下落，一个极为奇怪的现象，在战争进行中，清政府和各国使馆之间，竟能秘密通信。7 月 21 日，总理衙门总办函询赫德“现居何处”，并告在赫德不能理事期间以英人戴乐尔（F.E.Taylor）代理总务司，请赫酌夺。赫德翌日复信，表示对代理人选的意见，并报告在东交民巷的海关人员情况。27 日，清政府给东交民巷送去食物十五车，其中一份是专门给赫德的，计：蔬菜一挑，西瓜 10 个，冰块两方，白面百斤，供其“聊佐清暑之需”。

在英国和欧洲，却传出了赫德的死讯，那是 7 月 17 日伦敦《泰晤士报》首先刊载的，各报继之纷纷刊载。以至于英国各界决定于 7 月 23 日在伦敦圣保罗教堂为赫德举行追悼仪式，只是经过赫德密友金登干（J.D.Campbell）劝阻才罢。24 日，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告知伦敦方面，赫德性命无虞。后来，

清政府允许公使馆与外界通电，赫德于 27 日回复上海税务司安格联（F.A.Aglen）报告平安的电报转传英国，赫德死讯乃息。

8 月 14 日，联军攻陷北京，使馆解围，赫德活跃之至。在侵略军的大屠杀大抢劫中，在清政府处于兵败急欲求和状态中，他应付两方，大展身手。解围仅两天，16 日，总理衙门通过衙门章京舒文致函赫德，求其出面维持和议，并求询问各国态度。赫德一面约期会晤大学士昆冈，一面去电英国外交部，密报清廷可能调各省军队来京，联军可能被围，要求各国增援军队。21 日，他与昆冈会晤，再三强调，应让奕䜣急速回京谈判，9 月 3 日，奕䜣回京。4 日，奕䜣与赫德在广化寺晤谈。李鸿章、奕䜣被任命为议和大臣，李于 10 月 2 日到京，赫德受任为清政府谈判顾问。谈判经年，和约告成。

赫德做的是清朝议和大臣的顾问，他却未必会代表中国的利益，十年外臣的特权，本身就是以帝国主义为依靠得来。谈判中他又能作一些似乎是照顾中国利益的举措，一在于他不愿他把持几十年的海关的权益为他人夺去，他在这个帝国主义各国大分赃的争吵中，实是在为维护他自己的利益而争。二在于他在中国多年，事实的教训，他头脑比较清楚，知道中国人民有一天会觉醒。远在 1894 年 10 月，他在给他的好友金登干的信中说：“ 两千年的经验，虽把中国人磨练得非常冷静，但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我想很可能有一天绝望情绪会以最激怒的方式爆发出来，我们在北京的外国人也许通通会被杀光。每个中国人将说：‘ 如果没有这帮番鬼，我们怎会闹到今天这般地步。在我们自己被毁灭以前，且让他们先尝尝滋味。 ’ ”他自然在此不能预言六年后义和团之事，却明白帝国主义以其侵略掠夺如处火山之中，因而他不会走极端。

义和团之事始解，赫德还在任议和顾问期间，连续写了六篇文章，就中国问题发表意见。其中第一篇《各国驻北京公使馆：一次民族起义和国际插曲》，讨论如何对待外国军队占领下的清朝。他认为有三个办法，即：瓜分中国，改换朝代和维持清朝统治。逐一分析之后，他以为最后一个是最现实而迅速有效的办法。赫德之得到清王朝太子少保的封赠，良有以也。

回到赵凤昌的回忆东南互保文章，说是条约签订后，“ 英政府沙侯忽与刘张两督通电。刘督译文，仅谓如需英可以相助；张督译意，谓需若何相助，均可尽力。同一电文，译意有简复，刘之译才不如张所用之梁崧生。崧生告我，语气似在窥探两人之旨，意在言外，如两人有何主意，亦必相助。讵知两人皆矢忠清室，然亦可见外人因清廷纵拳启衅而欲绝之矣。 ”这就是说，英国表示要鼓动刘坤一和张之洞推翻清朝，取以自代。这种做法，传亦曾施之于李鸿章。甚至孙中山也曾对李鸿章作此想，曾经对李进行策反工作。比较起来，倒是赫德的办法要实际些，势所然也。

1996 年 7 月 9 日

寿则多辱

章太炎写过一篇著名的《谢本师》，表示与老师俞樾绝。后来周作人写了《“谢本师”》，表示与老师章太炎绝。及至抗日战起，周作人滞留北平不出，继之落水，周的一个学生（不忆为谁，是否沈启无抑或林庚？）又写了一篇谢本师的文章，表示与老师周作人绝。十几年前，我写《论章太炎》，本有一节专谈此事。及至看清样，忽然一股念头涌上脑际：这样写法，会否贻人以历史循环论之柄，乃删去。今天看来，这种念头诚然可笑，那时方当拨乱反正之初，岂止心有余悸，直是犹在悸中，有这种莫明其妙的念头亦不足为奇。近日思索这几位前人“谢本师”始末，深感历史老人如何在折磨与考验人。

章太炎写《谢本师》在 1901 年，时已倡言革命排满，《正仇满论》即写于是年 8 月。太炎和俞曲园反目，据太炎《谢本师》自述，谓“顷之，以事游台湾。台湾则既隶日本。归，复谒先生，先生遽曰：‘闻尔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盖先生与人交，辞气陵厉，未有如此甚者！”太炎为文每多誇诞，俞曲园是否如此指斥太炎，是否指太炎远游台湾为不孝，无从自他处证实，师生之背离在于太炎排满革命，则可断言。

以下，太炎持论反驳老师，并严加指责：“先生既治经，又素博览，戎狄豺狼之说，岂其未喻，而以辱舌卫捍之？将以尝仕索虏食其廪禄耶？昔戴君与全绍衣并污伪命，先生亦授职为伪编修，非有土子民之吏，不为谋主，与全戴同。何恩于虏，而恳恳蔽遮其恶？如先生之棣通故训，不改全、戴所操以论承学，虽扬雄、孔颖达何以加焉？”措辞极为严刻。戴东原、全祖望皆清中叶以后人，并非明遗民，仕于清，太炎称之为受伪命。老师当清末造，不过做了个编修，的确不是“有土子民之吏”，亦称之为伪，而比之为扬雄、孔颖达。扬雄仕新莽，士林不齿，孔颖达在隋举明经，后仕于唐，俞曲园于扬、孔何与？以政治主张故，因俞曲园之顽固维护清室而反对之诚然，以扬、孔无以加比之，太炎有些不择言了。虽然，太炎此文毕竟是表达了他的革命主张，甚至不惜与受教八年的老师分途，应属可钦可敬。

在西方，师生之间发生这种事，大约秉“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之义，顺理成章，易于解释。中国可不同，“天地君亲师”，是供在堂屋的牌位，侵犯不得的，哪里有什么“真理”超过老师尊严的事？尽管韩愈说过“师道之不尊也久矣”的话，也未见其时学生公然“谢本师”的事。韩文中“尊”字，一本作“传”字。如作“传”字解，立意更不同。这种公开发表文字表明与老师背道之风，当在近代西风东渐日盛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薰染而生。清末动乱之际，师生异道的事，当非个别。梁启超流质多变，于乃师康南海，尤其后期，无论学术与政治，就屡有南北。周善培（孝怀）回忆，康有为极不满于梁启超对他不恭，对周说：“为什么你对你的老师赵熙（尧生）那样尊重恭敬，任公对我如此坏？”梁启超诚然在与人书信中对康有为多表不满，但未公然为文“谢本师”。“谢本师”之举，始发于好作奇峰突起的章太炎，并非偶然。章太炎的研究者，于此当可作解。

事过 25 年，轮到章太炎所写的历史来作弄他自己。周作人与章太炎，关系、情谊均远不如章太炎之与俞曲园深。只是在 1908 年周作人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说文》，此后十几年中“我还没有见过先生一面”。但周自承：“对

于国学及革命事业我不能承了先生的教训有什么供献，但我自己知道受了先生不少的影响，”“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于此可见周作人对太炎的尊重。可悲的是，周作人不得不仿乃师之所为，也作《“谢本师”》了。

周文说：“‘讨赤’军兴，先生又猛烈地作起政治的活动来了。我坐在萧斋里，不及尽见先生所发的函电，但是见到一个，见到两个，总不禁为我们的‘老夫子’惜，到得近日看见第三个电报，把‘剿平发逆’的‘曾文正’奉作人伦模范，我于是觉得不能不来说一句话了。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主张的光复大业抛诸脑后了。我想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按 1925 年至周作人写此文时之 1926 年 8 月间，章太炎屡屡发表反赤的演说与通电，且任上海反赤大同盟主席兼理事、反共救国大联合干事会主席。周作人称所见到的第三个电报，经查，指 1926 年 8 月 13 日所发《章炳麟通电》，载于同年是月 15 日的《申报》。通电反对北伐，斥蒋介石“尊事赤俄”，“为赤俄之顺民，奉赤俄之政策”，希望他所致电的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一串南北军阀做曾国藩，谓“昔卢循必待刘裕而后灭，洪、杨必待曾国藩而后破，……今之世虽无刘裕，而曾国藩为老生逮见之人，非不可勉而企也。”于是周作人表态：“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殊非始料所及。此后先生有何言论，本已与我无复相关，唯本临别赠言之义，敢进忠告，以尽寸心：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自爱惜令名。”心情是沉痛的，言词是平和的。

周作人此论，自然是从政治着眼。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赞扬老师早年之从事革命大业，以后来“先生好作不高明的政治活动”为不然，深深惋惜太炎辛亥回国以来不再讲学，说是“先生倘若肯移了在上海发电报的工夫与心思来著书，一定可以完成一两部大著，嘉惠中国的后学。”又说：“先生太轻学问而重经济（经济特种之经济，非 Economics 之谓。——振常按：此经济特种之“种”，疑为“科”之误），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这一句话，无意间道出了太炎在政治与学术间的矛盾。太炎弟子王仲荦生前曾对我说：“老师本是学者，而谈起学术来昏昏欲睡。老师本不擅政治，但一谈政治则眉飞色舞。”此语可为周作人看法作注解。太炎自然是卓越的学者，周作人惋惜太炎分心政治，影响了学术，望乃师成为纯粹的学者。这是周作人的心态与企求，以之与乃兄鲁迅所论的太炎，有所不同，亦可见弟兄二人的异趣。

鲁迅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谓“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这自然指革命排满的功绩，文中虽不及太炎后来的政治活动，但必然对这些政治活动是不赞成的，且在其他文章中已有所议论，如指章参与孙传芳“投壶”为拉倒车。然而鲁迅眼中看太炎，却以为“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这是希望太炎在辛亥以后与时俱进，继续发扬其革命的雄风。其实太炎未归于宁静的学者之前，如上举周作人所说的讨赤的呼叫，早已和时代隔绝，甚至背离了。则其归于宁静的学者，为中国学术计，倒是大好事。周作人“谢本师”时，太炎未归于宁静的学者，周惋惜之，实望其归于宁静的学者。鲁写此文时，太炎方死，则惋惜其归于宁静的学者。这正是弟兄相异之处。其实鲁迅亦为卓越的学者，而上海十年，以文学为武器，从事于政

治战斗，回溯太炎排满革命的经历，也就很自然地发而为此论了。

秉此，举鲁文一例。讲到在东京受业太炎，文章说：“ 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按指太炎在《民报》倡革命之说），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是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记不得了。 ”自述听讲之故，少年心境，当是可信。但谓对所讲《说文解字》全无记忆，仿佛当时便不甚经心，恐未必然。近年从北京图书馆和绍兴鲁迅纪念馆分别发现了周树人记听讲《说文》的手稿两种，1988 年 6 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以之影印成《说文解字札记》一册，翻阅全篇，发现鲁迅不但记录认真，记后且复加以整理，有所增益。于此，我以为鲁迅这一段文字，立意还在强调太炎早年的革命业绩。

不过，周作人并未真的与章太炎绝。后来太炎情况变化，周作人对老师态度也就改变。据《知堂回想录》引《日记》回忆，太炎于 1932 年春北游讲学，周作人不但两次去北大听讲（一次讲《论语》，一次周《日记》未记明讲题），还参与了太炎弟子和北大同仁的几次宴太炎聚会，只有一次马叙伦宴太炎时周作人未去，那是因为“ 座中有黄侃，……不欲见之也。 ”并且，他自己在家设宴款太炎，极为隆重。“ 托（马）幼渔以汽车迓太炎先生来 ”，请了钱玄同等陪宴，“ 在院中照一相，又乞书条幅一纸 ”，一直到晚十时半始散，“ 仍以汽车由玄同送太炎先生回去。 ”师生相聚之情当必欢愉。同据这篇回忆录，周作人说，他之所以写《谢本师》，实因为太炎主张把北方交给张作霖，南方交给吴佩孚，在《谢本师》中“ 却借了曾文正、李文忠字样（振常按：文中并未写到李鸿章，此是周误记）来责备他，与实在情形是不相符合的。 ”周作人尊师如故，当由于太炎晚年“ 末了回到讲学 ”（周语），符合周作人的素望。章氏弟子集资刊刻《章氏丛书续编》，周作人也出资一百元，刊后分得了两部书。苏州章氏弟子刊行《同门录》，颇有宗派观念，鲁迅、许寿裳均未列入。然据钱玄同告周作人，《同门录》名单，全凭章太炎记忆所及列举，是以漏了好些人，而周作人“ 大名赫然在焉 ”，可见章太炎对弟子当年之“ 谢师 ”也未存芥蒂。章太炎死后半年，周作人还写了一篇《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以作纪念。文中称乃师“ 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天语，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 ”还有一事应予注意，周作人宴请章太炎，陪客中有俞曲园后人平伯，俞章之事亦应作一了结。

周作人后来亦落入被学生“ 谢本师 ”之列，亦他自造历史所必不可免。如果用杜牧《阿房宫赋》的话，可谓“ 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 谢 ”周的人如是沈启无，亦为晚节不佳的人，又得加上一个被哀的后人。历史严酷，最不容情。日本兼好法师说：“ 语云，‘ 寿则多辱 ’。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过了这个年纪便将忘其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至可叹息。 ”五四运动时，有人说：“ 年过四十，最好杀头。 ”这些说法，都是同一思路，自然不足征。老了并不就昏聩，要在与时俱进又不媚时，保持其清醒独立的意志与见解，斯为难尔。

“ 无大臣之风 ”

1927 年，国民政府根据蔡元培的提议，设立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并试行大学区制，蔡元培任大学院长。大学区制执行阻碍重重，1928 年又碰上中央大学校长易人之争，原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被大学院改任参事，以吴稚晖长中央大学。张乃燕为张静江之侄，张静江、李石曾起而反对张乃燕调任，国民党四老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分为两派，发生争执，吴稚晖亦不就中央大学校长。蔡元培乃辞大学院长职，蒋梦麟继任大学院长，旋易名教育部，蒋梦麟为部长。中央大学易长纠纷仍炽，素长折冲尊俎的蒋梦麟亦无法应付，乃辞职。

辞职前夜，吴稚晖兴问罪之师，蒋梦麟在所著《西潮》中有一段生动的描写：“ 据吴老先生的看法，部长是当朝大臣，应该多管国家大事，少管学校小事。最后用手向我一点，厉声说道：‘ 你真是无大臣之风。 ’我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回答说：‘ 先生坐。何至于是 !我知罪矣。’第二天我就辞了职。…… 刘半农教授闻之，赠我图章一方，文曰：无大臣之风。 ” 蒋梦麟出以轻松调侃的笔墨描绘此事，仍掩不住一丝苦笑。蒋梦麟此文似隐隐含有经吴稚晖一点点明了自己的去就之意。蒋梦麟是蔡元培的学生，多年以来，又是蔡的得力助手，蔡既去，蒋自难留。蔡元培苦心建构的大学区制，于 1929 年 6 月为国民政府明令停止。

照吴稚晖的说法，大臣之风是多管国家大事，大学校长易人是小事，不必去管，这自然说得太轻易了，此老一向说话随便，往往有哗众取宠之心，人不以为异。大学校长易人而云小事，教育部长也就没有多少大事可管了。此老如得见我们今日大学校长所管一个大学林林总总的杂事之多，当不知他的手指要点向多少人，而金石家将刻多少 “ 无大臣之风 ” 的闲章以送各位校长了。

大臣之风，到底如何定义，恐怕谁也说不清楚。辜鸿铭谈到大臣之度，所说其实也是大臣之风，他倒是有其说法，然亦只是例以明之，没有下定义。他说：“ 当咸同间，中兴人才除湘乡曾文正外，皆无一有大臣之度，即李文忠亦可谓之功臣而不可谓之大臣，盖所谓大臣者，为其能定天下之大计也，孟子所谓‘ 及是时修其政刑者也 ’。 ” 他说到太平天国既平，大计不外 “ 办善后 ” 与 “ 御外侮 ” 二端，“ 办善后姑且不论，至御外侮一节，当时诸贤以为西人所以强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铁舰枪炮耳。至彼邦学术制度文物，皆不过问，一若得铁舰枪炮即可以抵御彼族。此文正公所定御侮之方略也，亦可谓陋矣。 ” 辜鸿铭在一篇题名《大臣远略》文章中，亦述此意。他赞扬文祥 “ 独设同文馆，欲培洋务人材，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销外患之要策。由此观之，文文忠之远略，有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 ” 辜论之失，在提了一方面，忽略了另一方面，和他所批评的曾国藩、李鸿章犯同样毛病。且以辜的思想推延下去，中华学术制度文物是至矣尽矣，亦无须兼融西学。

所以他才有儒臣与大臣之论。按辜说：“ 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懦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致于无政也。当同光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于李文忠者，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 ” 虽然誉曾国藩为大臣，弯来绕去，一番议论，所定天下之大计既误，还能称做大臣之度吗？

然而，辜鸿铭的议论还是可以发人深思。他批评李鸿章，“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才能而不论人品。”这确实揭到了李鸿章的短处。李鸿章一生讲权变，几于不择手段。《异辞录》一书作者刘体仁，是曾官至四川总督的刘秉璋的儿子。刘秉璋出于淮系，与李鸿章有通家之好，《异辞录》屡言及此，亦屡颂李，然于多处亦不免对李有微词，如言李鸿章免于舒城之难后，返乡助其父办团练，“不免募捐，乡人为之揭帖云：‘翰林变作绿林’。”其实是指李氏父子诈财。如言“文忠治军，不使诸将和睦，预防其协谋，为主帅害。”“文忠常述中丞（振常按：指安徽巡抚福济）之言曰：‘时时以不肖之心待人’。”勿庸多举，李鸿章权变之相显见，其何以具大臣之风？辜鸿铭对此下一结语说：“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于是，辜鸿铭寄希望于儒臣张之洞，而张之洞在中法战后亦效西法，由清流而变为后期洋务名臣，辜鸿铭虽强设词为张之洞解，亦不免于言之不能成理，乃兴无穷的浩叹。

究竟怎么样才够得上大臣之风？李斯《谏逐客书》讲国君的大度容人，“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这是王者之风，移用之于大臣，亦自适当。然而李斯毕竟身当遭逐，为求容，乃发此议，终非全面之论。中唐名臣郭子仪，身系天下安危，司马光写他，“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忌，穷奢极欲而人莫非之。”写了一个得众心的大臣，而于大臣之风无涉，只是说他的威望之高。

吴稚晖所谓大臣少管小事，辜鸿铭持论极不相同。辜鸿铭的同乡故友蔡毅若，幼年入广东同文馆习英文，与诸同学入馆之日，在门首一长髯老翁欢喜迎入，导游各处，并加讲解。又问大家吃了饭没有，答说未曾，“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诸生始知适才所见之老翁乃今日当朝之宰相文中堂也。于此想见我朝前辈温恭恺悌之风度也。”这位文中堂（即名臣文祥）亲身迎新生入校，管吃饭，自然是管小事了。他又是辜鸿铭誉为有远略的大臣。那么，辜鸿铭理解的大臣之风，当是对青年“温恭恺悌”没有架子和具远略兼备了。岂其然欤？

1995 年 7 月 18 日

也说吴稚晖

黄裳谈吴稚晖文（载 1995 年 12 月 9 日《文汇读书周报》），讲了此老在苏报案中为是否告密与章太炎的文字官司，鲁迅、周作人及瞿秋白对吴稚晖的评议。由于吴稚晖后来的政治态度（1927 年清党案的发难，是他反共最烈之举），周氏兄弟、瞿秋白对之持批评，自属当然。但鲁迅还算是尊重历史的，对于吴稚晖当年在东京和蔡钧大战，后愤而投水，仍致其景仰，且不同意乃师章太炎所谓东京皇宫御河实为阳沟，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写道：“ 其实是日本的御沟并不狭小。 ”对待人持历史主义态度，是知人论世之首要。

从 1907 年章太炎在日本发表《邹容传》，指吴稚晖向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告密[①]，至 1947 年吴稚晖著《苏报案之前后》，历时长达三十六年，为是否告密，文字纠缠不休，共达四遭，先是吴章对骂，各执一说，后是吴继续反驳，章沉默，再后是章死而吴继续申辩。据吴自述，1947 年写《苏报案之前后》，起因于蒋介石向他询问苏报案经过。其间还有蔡元培挺身而出，写文为吴辩诬，章士钊出面为他的拜兄章太炎缓颊（章士钊和章太炎、张继、邹容结义为兄弟），调解章吴之争，并写文证明吴未曾告密，章是偶然“ 出言不检 ”。此中经过及其真相，我于 1982 年初写了《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长文发表，以事实证明，章太炎所指吴稚晖告密实为诬陷。此文发表及经报刊报道后，吴稚晖的侄子据以要求《辞海》改正吴告密之说，听说《辞海》新版确也改正了。吴稚晖这位侄子找了我多次，他是位冬烘先生，访我之初，先问中央哪个部门管理吴稚晖苏报案平反事。我无从作答，告诉他，我在文章开头就说了，“ 为个人辩诬之意义小，求历史公正之意义大 ”，写文章讲清事实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此君便屡次上书《辞海》去了，也真亏他的精神。后来他对我历述吴的行事多端，并写了他所知道的吴稚晖文章，自己印刷成篇。可惜，他送我的文章已佚。他所告吴稚晖的行事，还记得的，述如下。

吴稚晖去台湾，系只身一人前往，把夫人和女儿留在了上海。吴氏家无恒产（吴稚晖生活简朴，世所共知），满室唯书籍。他去台湾，什么也没有带，只带了一张纸，那是蔡元培任命他为中央大学校长的委任状。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根据蔡元培的提议，设大学区制，建立大学院，管理全国高等教育，蔡元培任院长。大学区制推行，困难重重，中间又遇上中央大学易长的纠纷。原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乃张静江之侄。1928 年 6 月，蔡元培呈请改任张乃燕为大学院参事，以吴稚晖继任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不满，张静江和李石曾支持张乃燕，闹得不可开交，吴稚晖无从到任，国民党四老分成了两派，终于导致 1929 年 6 月国民政府停止大学区制。蔡吴向为

[①] 俞明震其实是故意放走革命党人。俞明震反对甲午割台。后在南京为陆师学堂监督，每有革新之论。其子大纯为留日革命党，俞氏通过大纯约晤吴稚晖，告以逮人消息，要让他们逃走。吴稚晖通知了其他人，而不告章太炎，是以私隙而不顾大义之举。不久，两江总督魏光焘也知道了俞明震查办不力之事，把他撤换了。俞明震是陈寅恪先生的舅父。俞明震还有一个儿子俞大维，乃寅恪先生之表弟和妹夫。章士钊是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后为苏报主笔，他的回忆苏报文章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今之史家研究苏报案之作，每多错误，其最大者即为沿袭太炎臆造吴稚晖告密之说；对于俞明震，不查其因缘作为，但指为奉命查办，忽略了他在此案中所起的作用，亦是错误之一。详参拙文《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收入拙集《近代上海探索录》）。

挚友，任命老友为校长，当是两人一生交谊中唯一的一次上下任命关系，这个任命终于成空，吴稚晖孑然一身飘去海峡彼岸，独携老友当年的一纸委任状以载，不知其时心中所想的是什么？是对离世已经九年（1940 年至 1949 年）的老友蔡元培的怀念之情，还是对自己终未能一展其志于教育的浩叹？吴稚晖曾一再宣称不做官，只任国民党内的职务，他对教育很重视，然又终生未任教育之事，其人其事，其文其说，每多与世人异，往往借油腔滑调之词表述甚为极端的思想，真解其人，甚难甚难。

吴稚晖去台后，家属在上海靠卖所遗藏书为生。及至“文革”，大难临头，折磨得很苦，母女终于相继死去。他有一个儿子，与李济深之女成婚，定居美国。

前几年偶游常熟，在破山寺方丈室内见悬挂一联，乃吴稚晖手书篆文。据云，系 60 年代初吴氏死前书赠该寺老方丈者，托人辗转带来，带到时老方丈已圆寂。我当时很佩服新方丈的胆量，敢于悬挂出来。不知这是不是吴稚晖带到大陆的唯一的纪念品。破山寺是革命和尚乌目山僧黄宗仰住锡之地，黄宗仰当年和蔡元培、吴稚晖等倡言革命，共办中国教育会，张园演说，指天划地，颇励人心，这对联也当是对昔年同道的忆旧。

吴稚晖死于 60 年代初，前偶闻台湾友人言，吴氏葬仪极为隆重，蒋经国披麻戴孝临丧。想想这也有理，当蒋经国幼时，其父托吴稚晖子畜之，送到北平，由吴稚晖照顾入学。吴稚晖一生追随蒋介石，两人关系密切，记起听见过的一件传闻之事。蒋介石修家谱，托吴为觅祖宗。吴稚晖这个善作怪语的人，竟然对蒋说，他的祖宗是蒋干。这可惹恼了蒋介石。吴稚晖却郑重其事说：蒋干在历史上是个有作为的人，不要把京戏舞台上的蒋干当成为真蒋干。此事得之传闻，恐是政治笑话而已。即或有之，也当如章太炎把杜月笙的祖先选为杜预（元凯）一般的胡闹。

吴稚晖是个怪人，每天嬉皮笑脸间有惊人之论，亦有纯真之语，台湾出版的吴氏遗作有很多册，对于这个一生反共而又至死反传统倡科学的人，对其遗作，倒也该好好研究一番。他早年的怪论之一，“古书都该丢进茅厕”。后来又说，他是故意说得这么极端的。我相信，如果认真研究，吴稚晖思想仍有可循之迹，不要为其荒诞的表象所迷。

1995 年 12 月 10 日

“我们在割稻子”

抗战八年，中国人民在干什么？“在割稻子”。中国知识分子在干什么？“在割稻子”。换言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御侮，以求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战时期，敌机连续不断轰炸大后方，尤其是重庆，在狂轰滥炸之下，损失无算。1939 年“五三”、“五四”连续两天大轰炸，重庆几无以自存。1941 年七八月，值重庆无雾期，天高气爽，敌机持续轰炸，《大公报》损失惨重。《大公报》人就是在这惨重打击下坚持工作，鼓士气而励人心。据王芸生先生回忆说，8 月 18 日，他到南岸汪山探望张季鸾先生病。时张病势沉重，转月 6 日就逝世了。王与张谈到敌机轰炸，张说：“芸生，你尽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答：“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张季鸾先生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的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王芸生先生按此意，于次日《大公报》发表了《我们在割稻子！》的社评。《新记大公报史稿》一书作者评曰：“这篇社评很能代表这一阶段《大公报》的风格和精神，那就是坚持抗战，不屈不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在‘想个说法打击敌人’。”

“割稻子”是一象征用语，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坚毅精神，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不苟的气节。张、王两先生和《大公报》抓住了这一点，形象地表现了这种精神与气节。《大公报》是知识分子结合的民间报纸，他们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正义之感。今写此文，据《我们在割稻子！》引申开去，回想知识分子八年期间的作为，这是可以写成一部书的题目，此文仅识其小，且仅限于大后方。

战时后方，昆明为学术重镇。所以然，厥维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在焉。三校学风，各有特点。北大继承了蔡元培创始的兼容并包之大，民主自由之风；清华功课严格、兼通中西，学人辈出；南开治校严谨，学有所长，尤以经济学科为时所重。三校融合，汇集众长，沛然为长江大河，执战时内迁大学之牛耳。万千学子，咸来就学。方由长沙临时大学而迁蒙自再迁昆明，洋洋大队，徒步千里，已过中年的闻一多，舍舟车而参加了徒步的行列，何其壮也。

及抵昆明，组成联合大学，百废待兴，生活的艰苦困难与全国内迁大学同，而八年之间，弦歌不辍，教师讲诵，学子莘莘。一切端赖三大学原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和张百苓三氏折衷樽俎，蒋、张两位常在重庆，梅贻琦往往独司大任，在艰难困苦之中应付裕如，而其家生活之艰苦与全校师生同，梅贻琦夫人每晨去菜场买卖，亦与全校教授之家庭同。硕学大师陈寅恪、吴雨僧、汤用彤、金岳霖辈，虽生计日绌，而安贫乐道，坚持以身殉道的精神。闻一多治印以维生计，后复毅然走出书斋，与时代潮流契合。朱自清清苦自守，高吟时代之歌。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是这一大批有气节的大师带领着这个大学维护了学术的尊严。于是学术空气弥漫西南，学术活跃为全国冠。

成都，已成战时后方大学城，及陈寅恪、吴雨僧两大师受聘燕京大学，与原已在校的萧公权、李方桂、赵守愚、徐中舒等汇合而成学术巨流，程门立雪，学术高张。诸先生在极端艰苦的颠沛流离中，不废所守。而于抗日大业，关心备至，陈寅恪先生于此有诗篇流传。陈先生有“食蛤那知天下事，

看花愁近最高楼”之句，对蒋介石与国民党表现了厌恶，而于抗战则表现出坚持到底的“割稻子”精神。先生长女流求有笔记云：“父亲常和老师们谈论时局，关心战事。”先生用目过度，右眼早已失明。居成都时，灯光昏暗，物价飞涨，营养极差，而先生仍勤奋读书写作，终致 1945 年左眼亦复失明。吴先生子然一身，与学生共居于华阳县文庙的学生宿舍，踽踽独行，敬业守道。这就是一代大师们在抗战时期的生活，他们每天都在“割稻子”。

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无论师生，所居皆草棚，饮食极乏，而甘之如饴，浙江大学僻处贵州遵义，武汉大学在乐山，物质生活皆艰，而士气昂然，为抗战不计其他。

湘桂撤退之前，桂林为文化中心，文化名流不甘于重庆的政治压迫，纷迁桂林，一时文运发达，剧运昌盛，刊物众多，抗战的气氛最隆。而坚守重庆的学者、作家、戏剧家亦为抗战而不懈宣传，不废本业，抗战戏剧且独盛于全国。至于解放区，亦是全民努力“割稻子”。

及后，国民党政府腐败日盛，独裁愈炽，而于抗战大业，更时有消极之态，广大知识分子抗战之志不衰，反蒋亦所以求坚持抗战，取得胜利。及至 1945 年“八一五”抗战胜利消息传来，全民欢欣，举国庆祝。这胜利来得不易，以 3500 万人的生命换来，以无数财产的损失换来，以全国人民“割稻子”贵在坚持的精神换来。回想当年，张季鸾置个人病危于不顾，苦思“想个说法打击敌人”而提出“我们在割稻子”，可谓见事明而谋国忠。张季鸾逝世之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有云：“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这个评语表达了真实。

当年胜利之时，返思八年苦战，近看眼前现实，一夜之间，流传“惨胜”之说，如其实。胜利五十年了，如非健忘，其惨犹在。而五十年来，日本无悔罪之心，且时作狂妄之语，其情更令人愤。日本不承认历史，我们有时竟也忘了历史，一举手之间，赔款不要了，民间索赔也未提出，连个慰安妇事件也没有人议及，更不见有当年身为慰安妇者挺身而出，岂不可悲。我们的宽大、容忍，有以助长日本的不悔罪，一笑之泯（鲁迅诗‘相逢一笑泯恩仇’），对不住死难将士，牺牲人民，也枉费了“割稻子”人民的坚毅精神。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作

关于《大公报》二事

其一。上海出版的《海上文坛》第四期刊载了一篇题为《一代报人王芸生》的文章，作者刘自立，访问了原《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先生的子女芝琛、芝瑜，写成此文，用以为筹办 2002 年将要到来的《大公报》百年纪念和王芸生先生百年诞辰两项活动预作通报。芝琛写信告诉我：“《海上文坛》第四期，北京已脱销。据邮局报刊杂志部说，不知何因，这期脱销得快。因为我到了几个大邮局去买，头一天在西单买了八本，第二天其他大邮局都说昨天卖光。我接到三个报刊记者来电话，想要采访，都说看了刘的文章之后有感。刘自立来电话说，《海上文坛》编委已给他去电话，说有好几个报刊提出要转载。”

可见《海上文坛》这篇文章受到了读者的注意。在此以前，刘自立给我寄来他这篇文章的复制件时曾说，《海上文坛》“删节近 2000 字，如芸老写《我们在割稻子》，继承张季鸾的思想”。即使如此，按以上所引的反应，文章依然起了作用。

其二。香港《大公报》于 1996 年 3 月 2 日在该报第一版以显著位置刊载《本报郑重声明》，指称“近日台湾有人未征得本报同意，以《大公报》名义在台试版报纸，本报为此正展开严正交涉”。“这是严重侵犯知识分子产权的行为，本报对此密切关注，正咨询法律意见，除要求台湾方面立即停止此侵权行为外，并保留追讨一切损失的权利”。

此外，《北京晚报》于 1996 年 3 月 11 日“台港澳新闻”版就此事发表消息，除摘录香港《大公报》的《郑重声明》外，并谓：“据悉，台湾的《大公报》与香港的《大公报》毫无关系，其负责人曾要求和香港《大公报》合作发行台湾版被拒绝后，就自己‘创办’《大公报》……其职员在接受采访时，竟坚决否认世界上已有一份《大公报》存在。”

以上两事自然互不相干，然王芸老原是《大公报》多年的总编辑，且是那么一位有担当的总编辑，离开了《大公报》就没有王芸老。《大公报》如果缺少了个王芸老，亦乎难以想象。王芸老与《大公报》是一而二，二而一之事。王芸老业已仙逝多年，大陆唯一尚存的北京《大公报》，更早在“文革”起事之初即归消灭。忽然，如实记述王芸老的文章不胫而走，引起多家报刊记者的关注，争欲采访其后代，以探前辈报人的风范和昔年《大公报》的究竟；而台湾竟然出现了一份试版的《大公报》，居然一口否认“世界上已有一份《大公报》存在”，但偏偏就要取名《大公报》，用心可知。是则，欲忘或强使人忘，然人实不能忘之事亦有，甚至于海峡彼岸亦有人欲盗其名以遂他图。这两条新闻当可引起对旧事的思考。

胡适一事

《文汇报·笔会》有《回首沧桑》文，作者茹荻，记他在 1947 年 2 月间写文讽刺胡适那首著名的诗“做了过河卒子，只好拚命向前”事（“只好”应为“只能”）。胡适这首诗，在蒋介石政府召开伪国大之时，曾盛传，各方人士以之抨击胡适成了蒋介石的过河卒子。诗是真的，无须考证，确为胡适所作。但是，写诗的时间搞错了，其含意乃迥然不同。当年胡适此诗载于报章成误打误抨之局，今日犹承其说，乃有以明之。

胡适此诗，实写于 1938 年他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之时，而非 1946 年 11 月南京伪国大召开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胡适受蒋介石委托，以非官方身份出游欧美，于 1937 年 9 月到美国，继到欧洲，游说美英各方支持中国抗战。1938 年 9 月 17 日，南京宣布胡适任驻美大使。同年 10 月 31 日，胡适在赠陈光甫的小照上，题诗一首，如下：

偶有几茎白发，
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
只能拚命向前。

后来胡适重抄此诗，写了这样的话：“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

原委如此，用意极明。胡适特别注明“过河卒子”语以说明“国家最危急的时期”，其不顾一切，力求拚命抗战之心可见。其时胡适四十七岁，方符合“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的状态。如将诗句移植到伪国大召开的 1946 年，胡氏已是五十五岁；到诗句在报纸揭载的 1946 年，胡氏已经五十六岁了，都不能说是“微近中年”。

记忆所及，此诗在 1947 年之前从未发表。胡适在政治上愈来愈靠拢蒋介石和国民党，抗战胜利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发表的政治言论不得人心，至伪国大召开，他竭力拥护，并于 1946 年 11 月飞南京， 15 日出席伪国大，为主席团成员。此时的胡适，名声不佳。

最先揭载这首诗的是《文汇报》。据黄裳告，他从一堆稿件中，发现有一抄录胡适此诗的投稿，黄裳以之刊于文教版。于是不胫而走，各方齐讨“过河卒子”。郭沫若有文，将“只能拚命向前”改了一个字，为“只能奉命向前”，以示胡适为蒋介石效忠之心，用意更深。自然，就某种意义说，胡适此时亦可算是蒋介石的走卒，然做诗时间后移九年，既失真实，复背原意，谬矣。

此事，我在两三年前偶对黄裳言及。黄裳说：“诗虽旧作，问题在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发表。”此亦未必然，发表者非胡适，乃此抄录胡适诗的投稿者。写此文，未查当年《文汇报》，不知发表此诗时是否注明乃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时所作。度是未曾注明的，否则不可能群起而攻之。读史谈史，首要为历史感。陈寅恪先生一生倡“在历史中求史识”，看来确属重要。

“过河卒子”之名当年风行全国，未闻胡适有辩。只据黄裳言，胡后来说过他写这首诗的时间。可见也没有当成什么大事。胡适一生倡“容忍”，尤过于倡“自由”。胡适对此事的态度，与唐德刚所述，胡对大陆批他的文章都看了，对这些谩骂之文但为一笑而不置评，如出一辙，则胡适庶几得“容

忍”之旨乎？

一个词语搅乱了历史

报载，韬奋塑像落成，11 月 16 日举行了揭幕仪式，塑像建立在华东政法学院校园。奇怪的是，报纸用了一个词语叫作“ 前身 ”，称华东政法学院前身为圣约翰大学，一词之误用或乱用，搅乱了历史。

韬奋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52 年院系调整前，圣约翰大学尚存，为了纪念韬奋，学校将靠校园大草坪前的一座旧式楼房定名为韬奋楼。其时我在这所大学兼职教书，上课即在韬奋楼。院系调整后，教会学校不复存，在圣约翰大学遗址或者说旧址，办起了华东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和圣约翰大学了无关系，或者说，只是一个校园与房屋的转换关系而已。华东政法学院和韬奋，自然更是风马牛之不相及了。

校园遗址的关系转换，不能称为前身与后任，其事至明。如果只是校名改变，余事一以贯之，才能称为前身是某校，如北京大学的前身为京师大学堂，交通大学的前身为南洋公学（其间都还有几次校名的改变）。如按华东政法学院前身为圣约翰大学之说以推，则北京大学从沙滩迁去了燕京大学旧址，北京大学的前身岂不成了燕京大学？浙江大学的一部分用了之江大学旧址，浙江大学的前身岂不成了之江大学？事实上，京师大学堂创立于清末，燕京大学则于 1919 年方由三个教会大学和学校合并而成。一词之误，导致了历史的混乱，后之治教育史者，如按此“ 前身 ”之说以考，岂不扑朔迷离？

按，“ 前身 ”度出佛语，说轮回转世，亦作“ 前生 ”。苏东坡《赠虔州术士谢君》有句云：“ 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 ”陈寅恪先生击节而赞“ 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 ”自然，更不能说圣约翰大学转世而成了华东政法学院。

再有，圣约翰大学遗址内，现亦非止一个华东政法学院。据我所知，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即在其中，按此“ 前身 ”说，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前身也是圣约翰大学了。不亦怪乎！

报纸用语，偶有错误，不足为异，我看了两家报纸的此塑像揭幕记载，同用“ 前身 ”一词，不能不奇怪。为此小文，近乎吹毛求疵，抑亦颇感于文化与知识的重要，乃欲有言。

还想到与此有关一事，人事沧桑，尤其在院系调整这个“ 大举动 ”之后，许多学校没有了，本来不足为怪，研究教育制度者，应该考其得失，以为后之镜鉴。所怪者，近年，这些都已消失的学校的校友们，常有大张旗鼓举行校庆多少周年纪念活动之举。学校早已无存，还有什么多少周年校庆？只能说是多少周年冥诞，而非生辰，怀念旧校，相聚一块，意义也就仅此而已，正不必标举多少周年之庆以作慰安。不明究竟之外来人，一经追究“ 贵校何在 ”，何词以答。

广重塑上海城市形象论

李天纲为《重塑上海的城市形象》文（载《上海文化》1993 年第一期），读后深有同感，因作续貂之篇。以所谈已不限于目可见的形象，故名之曰“广”。而就我的专业，回望过去，也许还有话说；议论当前，则力不从心，是以乃流于多翻旧帐。自知此失，仍然嚼舌，则因历史未必无用也。

有容乃大

人们习惯把上海叫作大上海，今昔皆然。这个大，并不专指地域之大。又常说，上海是个海。这个海，并非就说失足不能自拔；更不是今日最时髦的改业从商。海之一字，对于上海历史的发展诚然重要，苏州河（吴淞江）、黄浦江，加上更重要的出海口，背对内陆，腹地广阔，条件优越，渐成以港兴商，以商兴市。于此，论者多矣，也并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说的。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此是不易的物理与人理。把这句话迻易成更早的古训，就是“有容乃大”。其理千古如新，用以论人衡事，以至察国家之兴盛，莫不皆然。北京大学在本世纪 10 至 20 年代之所以成其大，就在蔡元培之大。蔡元培之大，在于他的兼容并包学说，容得下一个中外古今。这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以一个大字冠诸上海，恰当不过。上海城市的性格，最是有容，最担当得起这个大字，名副其实的海纳百川。

内陆文化发达的城市，性格早经固定，生活亦成习套。茶馆品茗，多至三市；酒楼赋诗，心存魏阙，似怀天下之忧，实则是待机而沽，无所作为的状态表露无遗，于是留下了马路之中踱方步的幽闲之状，一切都显得那么呆板，那么停滞。商业城市，似乎多了些闹声，其实也只是沉闷中的点缀。无论前者和后者，这些城市，就总体而论，多只是一种狭窄，一种不足以容他的性格与心态。

上海人来自四面八方。“阿拉上海人”，这“阿拉”本就不是上海。宁波人带来经商的本领。苏北人带来勤劳，广东人带来勇猛坚毅，四川人带来聪明机智，与山东高头大马巡捕俱来的是强悍之气，徽帮与扬帮带来的，除了各自不同的经营之道，更多了几分翰墨气，……如此等等。上海吞而融之，兼容并蓄，形成了上海性格，或曰广义的上海文化。国内移民城市非只上海一个，上海独能慷慨地接受无法统计其数目之多的移民，上海从不排外，天生没有那种小家子气。而各地各帮的移民之间，大体能融和无间，没有或很少其他移民城市那种常有的争斗，关键也在上海能够容纳和融和移民。有容乃大，此其一也。

其二。上海曾经是国际大都市，各国侨民住上海者最多时达数万人（没有很准确的数字，有的记载说六万多人，有的记载多或少于此数），这是过去少见的现象。诚然，上海曾经是实行落地签证的城市，来去方便，是个客观原因。也还有另一原因，二战时期，全世界许多国家排犹之时，上海容纳了人数众多的犹太难民。但是，根本之点，却在于上海这个地方，能使各国人谋生，赚钱，发展，生活过得舒适愉快。他们不只愿意来，更愿意居住下去。

与外人俱来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再加上上海有所谓两租界，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议会精神，在两租界完整体现。这些，都必然影响于上海，影响于上海市民，亦影响于上海地方官府当局。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到华界制度表现，都产生了巨变。拙文《市民

意识与上海社会》（全文载《上海研究论丛》第九辑，并见拙集《近代上海探索录》。香港《二十一世纪》及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所刊均只是一部分）对此有所论述，此处不赘。人所熟知，上海是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中西文化碰撞，首战于上海，胜负初分，西方文化乃经由上海而辐射于全国。初战既定，其孕育的上海文化，非中非西，亦中亦西，既不能以浅薄庸俗而鄙薄之，如从前京派之视海派然，亦不能视之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而高山仰止。其实，它可以“五彩缤纷”四字概括。举例说明：美国洛杉矶狄斯尼乐园为代表的文化，与亨廷顿图书馆（其实它除了极佳的图书馆，还有收藏丰富的博物馆和硕大无比的各种形式精美庭园）为代表的文化并序，雅俗并具。此亦有容乃大。上海文化庶几近之。

生意盎然

距今四十七年前初从内地到上海的时候，第一个令我目瞪口呆的现象，是上海人行步如飞，马路上都是那么急匆匆的，似乎是天将塌，又像是天即将降大任于斯人，非立去办大事不可的样儿。这种状况，与内地人悠哉游哉在马路当中踱方步的形象迥异；内地人只有在警报拉响，预告日军飞机将来轰炸的时候才会急行和奔跑。接着，我投入工作，每天必去的地方，距所居处真是近在咫尺，逐渐发现，即使如此，也非急行如风不可，去晚了，我所要得到的必后于同业，工作的损失必大。由是，才明白上海人把走路叫作跑路实在有道理，不跑不行，不跑必落后。跑，是上海这个城市生活的节奏，跑路是上海这个城市的外在形象。这节奏，由于上海城市竞争机制而产生。由于这种快节奏，由于讲效率，这个城市乃表现为生意盎然。生意盎然，可以说是上海城市的内在形象。

想举一些事例来说明，但为列举，不作分析。

经济是上海的命脉，经济的浮沉首靠信息。上海的经济信息，一是快，二是全。商家自有信息机构与渠道，这自然不够，上海各家报纸，无论中文与西文，也无论报纸的性质各有所侧重，要必有经济版，而经济版的编辑，多为研究有素的经济学者。当时私家通讯社众多，其中专业经济的通讯社不在少数。各业竞争，靠手段，靠关系，靠经营手法，最重要的则是靠信息的快速灵通。各条俱备，方能言竞争，方能一显身手。至于交易所的紧张繁忙，今日上海成立甫三年的证券交易所的景象，倒是颇为相似了。

上海是文化中心，不拟谈文化中心形成之故及其表现，只想说一点我所见的出版新闻事业的表象。历史悠久的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文化事业上贡献极大，新知识新思想的输入，不能忘了商务之功，严复《天演论》之后的几部译作，都由商务出版。商务以满腔热忱和为数可观的经济上的帮助，支持众多学人出国研究和读书及从事著述，蔡元培只是其一，仅只翻一翻香港商务影印出版的《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附与其他友人来往书札），就可以列举一批人。商务“日出一书”，其效率之高惊人。有了一番事业心，便能奋发有为。不要以为商务保守，拍摄第一部有声电影短片的是商务。陈原先生告诉我，中国首先用电扇的是张元济。出版机构各相竞争，各出心裁，百花齐放。福州路文化街的出现，不是偶然。即使是所谓皮包书店，区区几个人，出书速度也高得惊人。

上海大小报纸有数十家之多，各种名目的通讯社即起即落，落而复起，为上海的生气平添春色。各新闻单位之间，不竞争无以图生存。记者采访习称为跑新闻、抢新闻。不跑而坐，乃成无闻；不抢就没有独家而先发的新闻。

报纸记者多者十余人，少者数人，每人每晚写稿总在千字左右，非如此不能过日子。报馆如战场，其紧张状态，足使今日从事新闻工作的年轻人惊为怪事。还有一事，报纸要早出，抢时间最为要紧。上海人没有下午才看日报的怪事，下午看日报，已是读历史材料了。今天上海的报纸，似乎隔了几天看也无大碍，如求之于昔，这张报纸早已关门大吉。现在香港的日报，每份报纸三元五角，到了下午，在报摊上则是两份不同报纸合在一起，也卖三元五角。即使如此，买的人也不多了。昔年上海望平街，天未明已是报贩云集，报纸一到，其抢发抢领之热烈高速紧张气氛，可以说是上海醒来的第一声市声。各家报纸抢赶沪宁早班第一趟列车，更是一场战斗，连总编辑也管这件事，总要提醒大家不能脱了火车的班。

竞争，效率高只是一种现象，实质则是敬业精神。上面略举新闻与出版的情况，推而广之，上海各行各业的表现亦皆如此，放眼一看，整个城市忙忙乱乱，闹闹哄哄，齐奏出一种市声。进而求其实质，正是敬业精神的表现。

为天下先

老子不为天下先，已成为一部分中国人尤其官场人士处世的哲学。上海，则愿为天下先，敢为天下先。所以如此，诚然有上海所处地位的优越条件，时代的关系，租界的影响。然而，上海人的有容，敏感，勇于吸收新鲜事物，则是能够利用客观条件的必不可缺的因素。无论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是如此。

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中，列举了上海开埠之后数十年间市政创兴和先进公用设施始用的年代，文繁此处不录，其所说明，其时上海的一些先进公用设施已居于世界的前列。所举事例，其时自然只能是在租界地区所出现。租界积年开辟道路，修建桥梁，建筑码头，营造房屋，改良交通工具，改良饮水，改革照明，荒郊渐成闹市，租界当局作了许多市政管理的规定，市民从不习惯到习惯，遵守规定，市政井然有序。先进的租界刺激了落后的华界，有识之士奔走呼吁，华界奋起直追，面貌渐变。特别应予一提的，是以李平书为首的南市绅商所倡办的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开始于 1905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结束于 1914 年，发端既在全国之先，且在清廷颁诏办理地方自治之前四年，而其收效亦显著优于全国。就因为北面有两个租界，多所仿效，乃得其功。

租界之兴，华界之追，从实践中引进中国从来没有的学说与认识，市民意识逐渐得以养成和增长，这是上海社会先进于全国的关键所在（请参前举拙文《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地方自治运动之收宏效，华人参政运动之与日俱进，皆端赖于此。厥后，各种市民运动仍独步于全国，即以抗战胜利至 1949 年上海解放几年间为例，次数频繁，规模至大，皆多于及大于全国，尤为特殊者，舞女可以因禁舞而酿成舞潮案，集队向上海市社会局请愿，大打出手，终得胜利（1948 年）。摊贩竟能联合一致，发起群众性的抗议行动，致使上海市政府不能不明令终止取消摊贩（1946 年）。而一向生活比较稳定，思想较为平和的店职员，亦屡屡发为市民运动。凡此，都足以说明上海市民意识之高于全国。市民有权对有关市政举措作出自己的反应，而既经纳税，便有议政之权。

上海也曾经出现不为天下先的事。1876 年，英商怡和洋行筑成吴淞铁路，“沪人诧为奇观，有乘专车游淞口炮台者，视为行乐之一途，以故收入甚丰。”两江总督沈葆桢本属开明派，对此力持反对，几经交涉，购回拆除，

路轨运往台湾。英商建筑铁路自有一个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但从中国方面来说，不是购回自办，而是拆除，亦属可悲。沈葆桢出此，是因为：“（他认为）铁路一事，虽为时势所必趋，然断不使后人之谓中国之有此，乃由江督沈葆桢而起。”（以上两引均见伯熙编《新上海》第一册）这只能说官场为保乌纱所采的圆滑，与上海人无涉，与市民意识日增的上海市民无涉。

从本文第一节和本节的叙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上海之所以成其为上海，根基在人，在于逐渐具备了现代人意识的上海人。

抚昔说今

我曾经说过，旅游者新到一个城市，除了市容，要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素质，或者说是形象，有三者可备参考：一是书店，二是博物馆，三是文化遗址的保存与维护。上海福州路文化街自然早已名实不符，而且其他闹市区的不少书店也都改换门庭，成为美食街、黄金屋之类。书店多少并不是最主要，更要看卖的什么书，丰富与否。以此衡量，这就更难说了。上海博物馆有最好的藏品，青铜器，陶瓷，明清书画，堪称三绝，尤以青铜器为最，惜乎原馆址是个旧银行，不适保藏和展览。新馆之建，大家都寄与厚望。新馆建筑应该精美绝伦，富有特色。纽约的曼哈顿博物馆建筑宏伟，藏品之富之精，让人进去就不想走出。甚至美国一些大学的博物馆，如史丹佛，如普灵斯顿，亦至佳美。澳洲墨尔本博物馆的建筑，别出匠心，堪称当世一绝。至于文化遗址的保存，上海成绩本差，这在过去本不足奇，历史久远，越不爱惜和珍重自己的历史。更可忧者，经济大潮之中，随意拆房，伤及本不该拆的文化遗址，令人憾然。我们国家有文化保护法，而无文物立法之权，于是，规定管规定，拆除自为之。

上海这些年较注意为历史人物造铜像，本是好事，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准则，就会乱套。谁的家属捐钱就给他的先人造像，难免失去历史的本意。交通大学内塑像，光有盛宣怀，而不首及于张元济、唐文治、蔡元培，属于无章。最近才知道，上海有个名人公墓，此事甚当，但何种人可入此公墓，亦应有符合历史公正的标准。凡此种种，不必多举。

谁都赞成上海应该更加繁华，前若干年上海太冷清了。但上海之失去昔日荣耀，并不单因为冷清。反过来说，要重塑上海，并不就只是恢复昔日繁华，甚而过之。繁华只是表象，要就其内在，研究上海人，研究上海现象，研究广义的上海文化，这样才能有更深层的理解，更可行的办法，收更佳的效果。

1993 年 12 月 19 日

也谈清官

读林放同志《清官的魅力》（1979 年 8 月 29 日《笔会》），有所感，也谈几句。

正确评价与崇敬历史上的清官，是一回事。怀念历史上的清官，又是一回事。正确评价历史上的清官，肯定他的作用与功绩，随之油然而生崇敬之心，也自是当然。这是属于研究与学习历史的范畴，与现实无涉，或相涉不大。怀念历史上的清官，则必有感于当世，说穿了，无非期望包拯、海瑞之再现，这就和现实发生联系了。所以如此，我以为：其事可思，其情可悯。其事可思者，林放同志说得清楚，人心思治，人心思法也。如果在我们的社会里，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在法律面前还确实人人平等，我想，人们还是会喜欢看包公戏，但不会怀念包龙图，望其再现于现代。因为，毕竟所谓包龙图精神，根本是不能与我们社会主义真正的法治相提并论的。恰恰许多年来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相去远甚，“四人帮”的大破坏，更彻底摧残了我们尚未及完整建立的法制。三年来，我们做了许多事，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又通过了若干法律，然而，距离真正的实现，毕竟还有一段距离；在现实生活中，违法乱纪之事依然有，冤不能伸、愤不能平之事依然有，那么，人们之怀念清官，也就有以然。生在社会主义社会，而怀念封建社会的清官，简单地说，岂非历史的倒退？其情之所以可悯者，在此！

封建社会有法律吗？有的。单篇的法令不算，从魏相李悝《法经》算起，历朝均有《律》，随着社会的那怕是极为缓慢的进化，《律》总是日趋于发展的。但是，千变万化，封建社会之法，总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那个小农经济基础。所谓“订之以刑”，是在辅助“以礼为纪”之不足，就是说：礼拴不住人们手脚的时候，就要用刑来惩罚了。而归根到底，则在维护封建专制。这是一面。另一面，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之后，尽管儒家教义体现在法律里，形成儒家教义与封建法律的统一，但，毕竟有时也表现为局部的矛盾。试举一例。读唐史，子复父仇之事甚多，史籍记载子复父仇应如何处理的争论不鲜。韩愈就说过，子复父仇“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韩愈的说法是：“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以上均见《韩昌黎集·复仇状》）柳宗元有《驳复仇议》一文，他是完全尊经义，反对子复父仇而明正典刑的。韩愈强为解释“非阙文”，实际却是因经与律的矛盾而只好缺如。正因如此，韩愈就有韩愈的解释，柳宗元就有柳宗元的意见，正是无法可依也。武则天之世，就曾将子复父仇应如何处理交大臣议论，其说纷纭，当可想见。自然，总的说，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后，以儒教治国，其重要体现反映在律例中。

还要看到事情的再一面。终封建之世，《律》也者，往往不免是一纸空文，真正行通，也是困难的。鱼肉老百姓时行得通，触及权势者就未必能行。真正出了那么两个清官，敢于摸老虎屁股，勇于为小民伸冤，老百姓自然喜出望外，爱戴拥护。清官戏之所以盛行，其故在此。人民是善于创造的，创造了各种各样善良的也是可悯的愿望，往包拯、况钟、海瑞身上贴去。其实，清官真是那么按律而断、执法不阿吗？未见得。清官执法，说他不惧权贵有之，然而，封建社会法律的伸缩性当然有的。京剧《秦香莲》的作者是高明的，包拯并不完全是按律要铡陈世美，他也斗不过太后与公主，准备息事宁

人了，在太后面前妥协，给秦香莲三百两银子，了结此案。包黑头最后之所以触犯天颜铡了陈世美，并非什么维护法律的尊严，恰恰是秦香莲的一句话“官官相护有牵连”所起。这句话刺激了包黑头，激怒了包黑头，免冠而铡陈世美。从戏来说，这是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从政治意义说，却道破了封建社会并非那么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包黑头自然同情秦香莲，但最后之所以出此者，有维护清官之名声因素在，维护其个人之尊严因素在。

如果说《秦香莲》只是戏，那就看一段历史。施世纶，清朝有名的清官。这里引一段康熙对施世纶的评价：“朕深知世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公讼，彼必袒民；诸生与W 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可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七）康熙指责施世纶偏执，恰恰是说明施世纶违背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康熙再不让他作地方官了。这与《清史稿》称颂他“摧抑豪猾，禁戢胥吏”合。这倒成为他可贵之处了。

今天人们怀念清官，与社会主义社会极不协调，是本来不应该有之事。然而，却有之。这就使得我们有其情可悯之叹。人民之情可悯，从杜会主义社会应有的法制言，也是可悯的。所愿者，这可悯早一些消逝，越快越好。

1979 年 10 月

忆故居

离乡逾五十年，难得几次回去，总想到我出生和度过少年时期的故居看上一看。或时日仓卒，旅程无暇；或事先没有“招呼”，临阵未可；有一次倒蒙准许了，突然又告：值国庆前夕，里面临时关了不少犯人，多有未便。于是，终于没有能一游故居，了却心头之愿。今生是否能再履故乡，心不敢必，为此忆念之文，以寄相思。

故居在成都南城文庙后街。通衢大道，交通便利，从西头往南，行不数十伍，出南城，迎面乃著名的万里桥。诸葛亮送费祎使吴，至此桥，说道：“万里之行，始于此桥。”桥以是得名。过桥右转前行，即是“锦官城外柏森森”的丞相祠堂和昭烈庙；下桥左转，直抵昔年全国大学校园最广最美的华西坝。如由文庙后街东头出去，可出新西门，往访杜甫草堂。

成都市内有三个文庙：成都府文庙在南城文庙前街，规模宏大，望之俨然，秦蜀郡文翁兴学石室，即在于此；华阳县文庙在府文庙侧之何公巷，成都县文庙在北城。后二庙的规模自然远不及府文庙，然亦壮丽可观，宽敞有余。1946 年离成都，此前二十二年的生活中，和文庙结了不解之缘。家住文庙后街，即指府文庙之后背，可说依靠圣人了。华阳县文庙在我家之东侧，西侧有一条小巷叫孟家巷，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的大将军喻培伦之家居于此，是以我家堂屋的板对上有句云：“东邻孔壁，西接孟家”，倒并不是美化东西紧邻的两个著名的军阀之家。及入小学，即在何公巷文庙内，与圣人厮混了两年半。后去一家最为尊孔的中学，虽非孔庙，却有大成殿，早晚在大成殿向孔圣上香，朔望则大拜。过圣诞节，此圣非彼圣，乃孔而非耶。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延续三天，鼓乐齐鸣，演礼如仪，比耶稣圣诞节的活动壮广隆重多矣。一年之后，转入另一家中学，再一年，祖母逝世，文庙后街居宅卖出，父母三房分赁新居，从此，似将与文庙二字绝缘了。想不到抗日战争期中，一度住家文庙前街，紧邻府文庙，在我家楼上，即可看见文庙建筑。更想不到进了大学，我们的男生宿舍竟是何公巷的华阳县文庙，旧地重游，于兹四年，文庙孔圣，挥也挥不去。

提起古城成都，人皆熟知，可人之居在少城。所谓少城，据《华阳国志》，乃秦蜀郡守张若所置，古老之极了。入清，成了满城，乃满人聚居之地，在新西门和老西门之间，直穿两条较长的马路，横列两排若干条较短的胡同，这一片土地与民居，叫作满城。这若干条横胡同内，遍布公馆，树枝出墙，花香溢于墙外，行人过此，鼻嗅花香，遥想墙内居室园庭之美，不忍离去。（附带说一句，这几年成都大兴土木，有识之士呼吁，不要破坏少城。结果还是破坏了，在少城十几条马路中，只保留了半条街的房屋。看来，经济大兴，乡土文化建筑难免破坏无遗，真是悲哀的事。）清朝开国以后，在一些大城市设置满州将军，与巡抚分治，成都的将军衙门在通惠门（新西门）内。满洲将军自然权限颇大，满城居民亦成特权阶级。起初汉人不得入住满城，晚清以后，其禁渐弛。满城居室、园庭诚佳，然甚少深宅大院，在成都这个古城里，未免显得小家子气，人视之，不过小康之家而已。相传张仪筑城成都，其说即可信，亦当是在成都西南的郫邑。但是，成都确为古城，经之营之，历多朝代，自成规模。清末实行新政，成都成绩斐然，新政的倡行者四川劝业道、巡警道周善培（孝怀）先生在通惠门城楼大书十六字：“既酌且崇，名曰成都，文明建设，今有古无。”议古得其真，论今具通识。成都多深宅大院，不是偶然。深宅大院多不在满城，盖历史之短浅也。顾炎武说，

唐以前州治，道路宽广平直，气象恢宏，宋以后无此气象了。这是文化的积累使然。

文庙后街一带，是南城深宅大院较为集中的地方。文庙后街上，有好几家深宅大院，人称为大公馆。我家居宅是大公馆之尤者。城南唐家，与城北李家（巴金府上）并称为南唐北李，自然首先是指两个世家大族，实亦兼容两个深宅大院的公馆之规模。在这条马路上，确有好几个大公馆，除了我家，未曾略知这些宅第的渊源演变。但是，有一点是明白的，时移世迁，这些原来俱为世家大族之居的巨宅，后来都成了军阀之家。古城成都，历代首府，明清两代为督抚同城兼治之地，世家大族居成都者自多，深宅大院也就繁兴。清代疆吏，位同方伯，权重一时，而自对太平天国用兵起，多由文人任疆寄而治武事，集权更盛，武化大兴，开民国以后军阀割据之始。到了民国，遍地皆军阀，四川一地尤甚，大小军阀，关起四川的大门，裂土封疆，闹得鸡犬不宁，成都尤为必争之地，成都深宅大院的主人，逐渐而变成了各系军阀。四川军人行防区制，谁的武力盛，谁就打下一个地盘，占山为王，一切军政民政，由他作主。胜来败去，防区多变。甚至更有怪异事，这一系军阀已经被赶出成都了，他早已统领残兵败卒退至外地，成都已非他的防区，而他本人和手下将领仍然住家成都。于是，世家大族日衰，军阀之家日兴。各系军阀干戈扰攘，他们在成都的家庭之居竟是晏如也。

今天还记得起来的，文庙后街上，至少有五个分属不同派系的军阀之家。我家东邻，是刘文辉之家，他本人长期甚至从来就没有住在这里，而由他的家属也是部下的师长一家居住，西邻是某部旅长张富安之家。对过一个大院，是军长王瓒绪所住。此人后来成了四川省政府主席，解放战争时期又带兵打仗被俘。东头有二十九军师长王惠安和二十四军师长田伯施各住一巨宅，后田军势败，他房子的主人，变成了王陵基——蒋介石忠实追随者、官至战区司令长官和某省省主席——的家属兼部下的一个师长。我家处于这九个各路军阀的包围之中，其被淹殁或蚕食殆是迟早事。

故居是四进大宅，大小房屋不下六十余间。入大门，左右两个门房。天井内各有左右门，右门内是马房，左门通花园。二门内的天井有六棵树，四株为桂花，两株为玉兰。每到中秋，桂花盛开，香溢四处。大厅颇大，可摆席十余桌，日常，除了两张方桌，再无长物。始终不明白这两张方桌作何用，儿时我们弟兄姊妹，每以这两张方桌用来打乒乓球。厅的上方悬一匾，写着祖父的堂名。厅右是书房，由内向外，隔着一个堆煤的小院，是一厅二室的小小居处，叔父逝时停灵在此，后来租给了人家。由外向内，则与西厢房相连。厅左是个小客厅，其下，是进花园的圆门，又下，是大书房，要从花园出入了。花园内，四个大花坛，所种皆为海棠，那是成都最多的花树，陆游所谓“锦城海棠九千株”是，杂置花木，事实上乏人经营，并无花木之胜。所谓大花厅，是园中巨构，原为看花而设，空空一巨厅，了无陈设。记忆中这个大花厅的用场，只在供我们称为太老师的理学、佛学大师刘洙源（复礼）先生讲佛经之用。太老师每讲经，蒲团上坐满来听讲的父母辈的世交，虔诚之相，今犹在忆。以后，我们这一房所住的后花园租了人，我们便住在大花园内，大花厅隔成了三间房间，不足用，又住了大小书房。与大花厅遥遥相对，是一个称为四面厅的大室，外面就是靠马路的围墙了。

正厅有房十余间，祖母住堂屋左面的正房及其平房数间，伯父一家住堂屋右面的正房和平房数间。伯父一家迁居上海后，我父母一家曾住此。叔父

一家住西厢房，东厢房一厅二室空置，其一间偶由祖母礼佛，其厅只偶会外客。主厅天井很大，奇怪的是没有花木，只有两个大鱼缸。儿时嬉戏的地方，常在祖母室外窗前，数夜空星星，屋檐下听讲故事。有时我们闹声大了，隔窗传来祖母一声叫喊，立刻肃然。后进房多而住人少，我的几个弟兄和庶母住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嬉戏最多，也最放肆，祖母很少走到这里，声威不及。

由正厅到后进，要穿过堂屋，否则便要经过伯父一家耳房旁的小院。堂屋是家中最肃穆之地，祖宗牌位高高在上。只有年节祭祖的时候，挂出了祖宗画像，儿童们才感觉几分热闹好玩。像前摆满祭品，正厅大厅二厅的大门都打开了，从大门外开始，沿地遍燃香烛，直到堂屋祖宗像前，算是迎接祖宗回家。儿时看此夜景，以为美丽非常。如此盛况，连续几个昼夜，好玩之中，给了我们这些孩童们森严之感。不谙家世，不知道挂像的祖宗究竟为谁，甚至连我们的祖父也因早逝没有见过，只知道祖父是光绪三年丙子进士，历官知县，学问很深，他的学生中多有著名的学者，赵尧生（熙）先生是祖父最钟爱的学生，状元骆存骧也是他的学生。堂屋前一副板对：“ 大德一篇尧典，清源万古湘川 ”，在孩子的心灵里，还真以为我家是唐尧之后，其荒唐宁有甚于此者？由湖南而四川倒是真的，不过祖父中进士是贵州籍，祖母是贵州人，到四川之前，先住贵州，所以大门外挂一牌，上书“ 黔南唐寓 ”。湖南衡阳唐姓是大姓，我们这一族的人繁衍颇多，许多年来，我遇见不少姓名为唐振×者的人，交谈之下，皆出衡阳，与我同辈。我家三代排名为“ 家声振 ”，我父亲一辈排名是“ 声 ”字。据说，唐生智将军一家是易“ 声 ”为“ 生 ”的。谱牒之学久废，自新风起，家庭子弟排名，也多不依旧传，于寻根，增加了困难。

应该说到后花园了。我家后花园极大，由前花园有长长的廊道相通，前花园尽处，有围墙与后花园相隔，数株大树，矗立后园的庭院之中，长廊的东侧即是隔邻刘家，后园西侧亦有围墙，有一小门，通本宅的最后一进房屋。父亲弟兄三人，1905 年由他们的家庭塾师吴虞（又陵）先生携往日本游学，父亲慕西纪，于西方物质文明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成都最早装电灯，专程去上海买来浴室的西式设备。这个后花园，由他开造为半中半西。房屋是平房三合式，有几间房子的门窗改为西式。园中既有戏台、假山、水池，富中国园林之胜，复有西方园林的开扩的大草地。我们一房住在这个大花园里，住房宽舒之极，活动的天地极为广阔，有山可登，有洞可入，有水可涉，花木丛中鸟语花香，自然感到快乐。最能满足我们童心的，是夏天风雨交加之时，弟兄姐妹，各拿脸盆去几株胡桃树下捡拾风雨打落的胡桃，剥皮取仁，用最好的酱油蘸食新鲜胡桃，其味之佳，无与伦比。我们双手都被胡桃壳汁染得变色，整个夏天都难于洗掉。儿时之乐，未有甚于此者。唯一不快的事，是在书房读书，太老师刘洙源先生严厉太过，动辄打骂。

这座后花园，曾经两度出租。一当家用拮据，父母就把它租了出去，我们便又迁回大院。第一次出租给成都大学作女生宿舍，以致在这里的有两位女大学生，和我的一个姐姐成了终身的好友。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当时是不准女子出外就学的，我的姐姐们都是在自己的家塾读书成长。第二次出租给一个美国老小姐满秀实，她是一位医生，在我们这里办了个进益产科学校，兼业产科医院。后来知道，韩素英当时是进益产科学校的学生。50 年代初，看四川报纸，驱逐“ 帝国主义分子 ”出境，赫然有满秀实之名。房子租出，最令我们不快的，是不能去检拾胡桃了。

四川军阀连年混战，首善之区的成都，亦巷战不已。战争发生，全城骚乱，文庙后街既然有各派各系的军阀居住，而且每次战事，非你我敌对，即我他交战。照说，这条多军阀的大街应该最骚乱不宁了。奇怪的是，每次战争，这条街的内外，最为平静无事。除了有时枪弹飞落宅内，我们弟兄顶着脸盆去捡枪弹子以为一乐，所谓战争的感觉别无他有。枪声一过，更感平静，只有大门以内二门之上贴了几张某军军长、司令出的布告，宣示不准本部军人入宅骚扰，可以从中看出是在打仗。这种布告，那些年多的是，不只是一个军队占了这个区之后出这种布告，两个敌对之军的布告，同时贴在一宅之上是常见的事。

一个更奇怪的现象，战争打得热闹，在我们这条街上，那几幢军阀之家的主人，彼此应酬往来依然不绝。东邻宅前车马盈门，敌对一方的西邻主人或我家对过的司令、军长，都是被邀的客人。他们之间，觥筹交错，谈笑为乐，似不知战争事。那么，战争只是兵士之间的事了，兵士多死少死，再加上死一些老百姓，于将军何有哉！

祖母病逝，这幢房子终于要出卖了。我不甚明白此宅的来历，只知道，祖父买下这幢房子时，主人是太平天国的降将，也姓唐，有个绰号叫唐毛碟（儿），我不明白它的意义，既为降将，总非好意。以讹化讹，我的中学同学中，颇有人以我是唐毛碟（儿）之后。旧家日衰，军阀日盛，这幢原为清朝军人的房屋，其归于民国军阀，也是理有固然。买下我家房屋的，还是对门而居的军阀王瓒绪。王瓒绪把这幢房子作了他的司令部。以后，我多次走过故居门前，最为触目的，是钉上了某某集团军司令部的巨幅牌子。全国解放，这幢房子自然没收归公。听说，起初为四川省公安厅，后来有所变易，仍属公安系统，我之要求一看而未能，良有以也。再想，前去看上一看，无非欲拾得几片幼时记忆的残瓣，也没有什么意思，倒不如回味拾胡桃吃胡桃之乐为真乐也。

1996 年 6 月 28 日

所遇胡适门下一人

曾经遇见胡适门下一人，接触的时间只有一天，后来通过两封信。交浅如此，久忘其人，听人谈到他的近况，不免有所惜。

时在 1983 年，我应邀访问澳洲，在墨尔本认识了他。我在墨尔本只能停留两天，要从那里去塔斯马尼亚。这两天里，头一天由蒙纳席大学接待，第二天则访问墨尔本大学，墨尔本大学派来接待我的，便是这篇短文的主人公。

他个儿高人胖，一副魁伟之相。开口说话，道地的京音。客厅里一幅画，是溥心畬的手迹；一张条幅，是胡适所写，字画上款都写有他的名字。他对我了无生疏之意，自报家门，叙述家世。原来他姓爱新觉罗，是清室贵胄，解放前在北京大学读历史。在台湾，工作于中央研究院，是胡适的秘书。谈到胡适，他先是滔滔不绝，继之泪流满面，开口闭口，称恩师不止。他完全没有停止讲话的意思，以至于他的太太不断提醒该去大学了，他还是慢条斯理地拿出几件东西送我，那是两本胡适在台自费印刷的罗尔纲的《师门承教记》，多张胡适逝世后台湾印刷的有胡适题句制版的明信片和书签。

下午，在墨尔本大学的活动结束了，他说陪我去参观墨尔本美术馆。久闻此馆建筑别致，藏品精美，心为之喜。他又说，时间还早，不妨到公园小坐。坐在公园美丽的耶纳河旁，听他谈胡适。他讲得来真动感情，依然不时流泪。他研究清初历史，说是与国内王钟翰先生的研究相近，曾经通信。王先生与我相熟，这样，我们又多了一个话题。我问他为什么不研究胡适。他很伤感地说：“不行，一研究就要动感情。”这个观点向合我心，历史学家对研究对象有了感情，必失其真。章太炎就说过，历史学应该“汰华辞，去感情”，我深以他不研究胡适为然。我们谈了许久，我记挂着美术馆，几次提醒他是否该走了，他总说不急，关门之前赶得上。等我们去到美术馆，竟没有赶上而被摒诸门外。我才感到他有些漫不经心。等我一周后从塔斯马尼亚回来，道经墨尔本，才独自去了美术馆。

我回国一段时期之后，他忽来一信，说是要去天津南开大学讲学，问我在南开有无熟人，可以介绍照顾。正好我的一位老友在南开任党委书记，我为之介绍了。以后，他去了南开，我的朋友也认真安排接待了他。他从南开来信表示感谢，又说，将去南京看他的姑母，其时定来上海相晤。从此没有了消息，也不知他去了南京没有。我在南开的这位朋友后来告诉我说，这位客人很懒散，在学术上的反映也不佳。

多年之后，一位朋友从墨尔本大学来，谈起此公，竟颇为不屑地说，他在系里已经无法开课了，只是懒洋洋地讲《三国演义》，不时有几个学生坐在下面，也是懒洋洋地听他讲故事。这位朋友（一个中国通）甚至出以形象化地描述：“有人问我清朝为什么会亡，我说，你们去看×××就明白了，八旗子弟就是这个样儿，焉得不亡。”

×××就是我认识的胡适这位晚年秘书。我听了这位朋友的话，觉得其言或过，不免也为此君惋惜，他确曾在胡适门下，《胡适晚年谈话》有关于他的记载，他本来有条件可以做学问，凭他对胡适的感情，（人都相信他这种感情是真实的）可以从胡适那里学到东西，可惜他竟白白浪费了，只留下八旗子弟形象的不美之名。生活优裕如他在澳洲那样，他是如此；生活如困窘，也未必奋进，可悲在此。

1996 年 8 月

香港缘

香港是个奇特的地方。蕞尔小岛，原本不毛之地，自然更谈不上人文之盛。英国占领以前，按清政府规定，西方来华商人通过广州这一口岸和中国贸易，每年按季节，西方商人到广州和十三行办商务，可以在广州住上一段短时间，其余时间只能住在香港或澳门。西人之涉足香港，自此时始，这自然是临时居住性质。鸦片战后，五口开放通商，而香港则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统治者除了锐意扩充和经营五口的租界，自然倾其全力以统治和建设香港这个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经营多年，香港诚然具规模，呈变异，声名崛起于时；然人之视香港，不过美其称曰“小上海”。事实确乎如此，香港是以上海为榜样建立起来的。谓之曰“小”，不只是地域之小，且是以上海为前瞻，遵循以进，“小上海”是跟着大上海迈步的。时至今天，香港北角还有一条上海街。香港的纺织业、服装业是上海人创立，香港的印刷、排字工人，多来自上海。小而至于香港技精的理发师傅，多是上海的移民。香港的饮食业最大菜系，除粤味潮味，就是广义的上海菜了。香港与上海之缘，随处可见。及至本世纪 70 年代，香港经济腾飞，百业兴旺，文化渐盛，社会发展，昔日之小上海，反过来倒令大上海瞠乎落于其后，须得急起直追了。

自 1948 年起，我与香港偶然结缘，历五十年，若断若续，可谓不绝如缕。我观香港，则若明若暗，或知其表面而昧于深层，或是知其局部而不谙全体，始终是一个外江佬过客，终不测其深浅。写此短文，但凭直观。

1948 年 10 月，我之由上海去香港，由于亡命，乃不得已之事。时被通知，列入黑名单，将有不利。《大公报》对于同仁的安全，向所关心，蒙准调去时方复刊数月的《香港大公报》工作，于是，仓猝成行。总务部门设想周到，以为直飞香港或有在出境时缉拿归案之虞，不如先飞广州，住一夜再行。及至抵港，足踏启德机场，舒了一口气，算是脱离了险境。其时像我这样因此而去香港的文化界朋友甚多，在香港乃过渡性措施，等待上海解放即赋归来。香港这地方，向来无民主而有自由，生活维艰而安全无虑，国民党的特工不可能到香港抓人，除了暗杀。在香港住了将近八个月，不谙粤语，我们这些过渡性居住的外江佬，自成天地，加以我做夜班，昼伏夜出，与香港社会无涉，对香港的了解，更是微乎其微，表面言之，可述如下。

上海早在 30 年代有了高楼建筑，24 层的国际饭店和稍次的百老汇大厦名震远东，10 层以上的建筑不胜繁举，其著名者如沙逊大厦、中国银行大楼、华懋公寓、都城饭店、汉弥尔登大楼、建设大楼、金门饭店、西侨青年会，等等。香港其时无高楼，最高的建筑是地处中环的中国银行大楼，方始建成，尚未启用，楼高仅 9 层。中环著名的大楼有两座，即高罗斯打酒店和香港酒店，不过 5 层高。九龙的半岛酒店诚然是最佳的建筑，有最考究的设备，大约也不外 5 层。城市建筑绝然不能以楼高自夸，高楼并不足以表现城市的水平，上海最好最富有特色的建筑在外滩一带，除了沙逊大楼和中国银行大楼，都不以高为荣，但外滩一景是可以代表上海的。今天上海的竞建高楼，并不足以称道。我在这里只是想说明一个历史现象，被称为高楼林立成景观的今日香港，回溯到四五十年前，它是没有高楼的。

最令我吃惊的，是香港的文字。马路偏僻之处，可见这样的告白：“如要小便乃可在此。”用意甚明，无公厕，避免随地小便，指定了可以小便的偏僻角落。但是，出了上述的行文，令人哭笑不得。有人极而言之，说这就是香港文学。这种说法，近于绝对化，但也道出了香港文化的一面。有轨电

车上的告示牌，赫然写着这样的词句：“ 如遇打大风之时，或猛烈之风，或高速度之风，或……之风，切不可将窗门关上。 ”和“ 如要小便乃可在此 ”是同样的语法。类似的文词，还屡见于他处。报纸更不用说了，文句似通非通，更令人莫解的是，生造了不少的字，用广东话行文，怎么也读不懂。上海有所谓洋泾浜英语，香港则通行以英语译音的汉语名词，许多东西已失去中文称谓，变成了汉语英读，如称手杖叫士的，商店叫士多之类。有人戏拟一句云：“ 拿士的，乘的士，进士多，吃多士。 ”干脆说英语也就罢了，这种殖民地化的语词，叫人不能忍受。这时的香港，只有一个大学即香港大学，当权的是英国人，教学都用英语。中学通称书院，那是清末实行新政时就已废除了的名称，香港的奇特在于，一面盛行西化，一面又保留了不少早已不合时宜的习俗、名称，书院不过其中之一。香港的书院亦皆以英语教学。中文之受忽视如此，“ 如要小便乃可在此 ”之公然通行，也就不足怪了。

这时香港的物价并不高，但人民薪给收入甚薄，住房条件差而房价奇贵，生活并不容易。比如我的住房只是一间所谓厅加木板隔成，不过 10 平方米，月租为 300 多港元，而我的工资只有 100 多港元。所幸房租由报社付了。当时在湾仔，报社为几家夫妻置办了宿舍。每层两家，每家一小屋，只是一板之隔，大家形容为鸡犬之声相闻。后来住在半山豪华住宅的金庸也在其内。今天的《香港大公报》，在铜锣湾有自盖的十余层高楼一座，巍巍乎，堂而皇之。一切设备，都体现现代化的先进技术水平。当年面貌，则不堪言状。报社自己没有房子，没有印刷厂，没有排字房，在中环利源东街《新生晚报》的二楼租得一间房，细瘦狭长，不过 20 多平方米，那是报社的全部了。白天是经理部和日班编辑办公，夜间由晚班编辑、译电、校对使用，没有一个人（包括总编辑在内）有一个单独使用的写字台，排字、印刷全租用《新生晚报》现成设备和人员。然而，报社全体人员晏然也以高度的敬业精神把一张报纸办得虎虎有生气。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6 月欣然赋归。与香港一别三十有七年，1983 年，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之邀前往讲学，去时经香港，住数日；三个多月之后，应香港大学之邀，由澳赴港，讲学两周，这才得以仔细观察这个旧游之地。至今十四年中，屡去香港，或开会，或讲学，其中一次，应邀住三月，我住了两个月，算是最长了。多次停留，一个印象：香港大变矣！

原来无高楼变成了高楼林立。中环是香港的精华，自然是高楼遍处，无缝可插。东面的湾仔、铜锣湾，以至北角，亦复如是。西环（又称上环）高楼无中环、东环之盛，但也变了。香港如此，九龙亦然，原来是荒岛的新界，也是面目大异。我并不赞成大建高楼，特别是原有其建筑风格的城市，更不应破坏风格而以高楼为尚。香港这个地方，地少人多，不建高楼不行。香港历史短浅，原没有什么故有的建筑风格，建高楼就说不上什么破坏，九龙的半岛酒店，可以算是有风格的老建筑，业务发展，他们并没有推倒旧楼另建新厦，而聪明地采取了旧楼丝毫不动的办法，只是在旧楼顶上的中部加盖新楼，于旧楼无损。有历史意义的总督府（香港人叫它为兵头府）、立法局等都保存原样，也是明智之举。更有一层，香港的高楼，尤其在中环及其附近，争奇斗妍，各极其妙，没有一幢的样式相同，于是，香港的高楼群乃成景观。

香港物资丰富，市场繁荣，人称为购物天堂，信乎其言。各种颜色皮肤的人，手提大包小袋满街逛走，满商场出入，放眼看去，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跑到香港买东西来了。因为是自由港，因为商业竞争强，货物的价钱便宜，

有些商品，在出产国，售价比香港要贵。而全世界的产品，在香港都能买到。上海崛起之时，世界上出现新发明新产品，很快便在上海运用，或出现于市场，而今这个优先，是早已让给香港了。除了这些，还得加上一条，那就是服务人员态度好，效率高。这种敬业精神，来自于优良的训练和竞争，香港人于此，首具特质。

一个更为明显的事例，可于香港饮食业见之。我居香港之时，我们这些外江佬，最不习惯的，便是饮食的单调。上海原是各帮各派菜系最全最多的地方，香港可不同了，多为粤菜和潮菜，且皆保守陈旧，极乏特色和新意，难得一见外江菜，稍能吸引人的，是通称为北方菜的海景楼，不分帮系笼而统之叫作上海菜的国泰酒家。三十七年之后香港饮食业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但帮派最多最齐全，而且遵守家法，味道正宗。食客在香港可以吃到大陆已消失的菜系和菜肴。

文化渐兴，教育渐盛，是我近年所见香港的又一景象。大学早已非只香港大学正宗元老一家独占，中文大学崛起，各领半壁，这些年又有了由浸会学院升格的浸会大学、新办的科技大学、城市理工大学等。现在还有如岭南学院正急谋批准升格为大学。弹丸香港，共有 60 余家报纸，600 多家杂志，自然是品类复杂，良莠不齐，从数量言可谓盛矣，由于香港所处的地理位置，优越的条件，信息灵通，香港应是了解和观察世界最佳的地方，最有条件成为学术中心的地带。于是历年以来，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多次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世界各类学者请到这里共同讨论，而大陆和台湾两岸学者的学术沟通，正是得力于香港的中介。从前，人称香港为文化沙漠，尽管香港学人听了不高兴，但也并非危言耸听。今则不同，自然不能这么说了。但以香港之优越，它在文化学术上应有的成就，应起的作用，自然还大有待于发展。

香港人的工资收入，自然是我辈所望尘莫及。香港优遇学人、教授，为各国学者所欣羡。曾知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教授职位有空缺，各国学者竞相求得者多多。更有不少在本国退休了的教授，都愿意到香港的大学来执教。我认识的朋友中，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对我表示了愿来香港的原因，不外这么几条；收入高，所得税少，福利好，物价贱，研究条件好，生活方便，风景美。还有一位增加了一条：饮食可口。

香港确乎如此。香港人并不那么愿意去做移民，他们认为，在香港生活最方便了。虽然有不少人离开香港，去做移民。然而，事实上，又确有不少人去了又回来了。去了国外的人，亲身所受，以为还是香港好。我的一个老同学老朋友，道地的香港人，早年留学英国，几十年一直在香港工作，他慨然对我说：“ 已经出去，或者还要出去的人，一个个都会回来的。端在一国两制要贯彻执行。中央已经一再坚决表示了，香港人是相信的。 ”

昔年小上海，何以能巨变如斯，是要留给专家和制定政策人士研究的，非我所知。认真研究了，按照一国两制执行了，香港必能稳定，更加繁荣。前年底至去年初，居香港近二月，所见多萧条之象，亦是人心不稳之时。今年初，访台湾归来，住港数日，气象一变，看见了一个活活泼泼的香港，百事以兴的香港。这就说明了，香港和香港人经得起考验，回归有日，万民所望，港人所期，香港前途灿然。

1997 年 5 月 18 日

怀逝篇

赵尧生先生手札书后

赵尧生熙先生致先父手札甚多，多已散失。只存十七件，装裱成册，珍藏多年。这一册页，连同尧生先生亲笔书其为先祖所撰之墓志铭，为先父所书并画之团扇四幅（八面），成了我家仅存的尧生先生手迹。谊属世交，情亲多年，所留存的纪念物，仅止于此，只能说是后人如我弟兄辈，未能善存其世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三项遗物的命运可想而知。早已装裱挂在框内的四幅字画，被一伙打家劫舍的好汉，随手劫夺而去。墓志铭自然被认为续家谱的变天之帐抄去。以上两件此后均不知下落，只有手札册页，则因家兄保管而幸存。

前年 4 月，有返川之行。本欲趁此觅得先生一些法书。我想，在四川，是不难寻求的。殊知，事与愿违。提起赵熙，有些四川人，只知道是川剧《情探》的作者，而不知其他！（看来，得赶快写出一部《四川文化史》。）归上海之后数月，蒙老友刘廷璧同志盛情，自成都寄赠尧生先生书其所作《丙子四月乌尤寺胜集特记梦痕》绝句七首单条一张，并对联一付。欣喜无极。自然，最可珍贵者，还是此一册页。因读先生此手札，草成此文，以为乡人谈乡贤。

先得交代一下尧生先生与我家关系。尧生先生是先祖（讳家驹，又名选皋，字直夫）的门生（先祖官荣县时，尧生先生领乡荐，入赘）。据尧生先生纂修民国十八年《荣县志·秩官第十》载：“唐选皋，字直夫，贵筑人。光绪丙子进士。由工部主事改官荣县，十年到任。久于荣，熟悉民事，见闻中无其比。政多实益。当时无盛名，及其去，遂无趾美者，故民久而弥思之。”同书《事纪第十五》载：“光绪十八年，兴学田，士子入学，负院贵，选皋调兴文。其去也，士民送之，六十里不绝。贫民呼泣，选皋亦泣。太平佳话如此。”尧生先生复承先祖命，教授先父弟兄三人（先伯父汝声，字伯泉；先父凤声，字仲威；先叔父钧声，字叔均）。先祖早逝，尧生先生对先父弟兄，谊属师生，情同手足。通家之好，往还多年。

所存先生此十七通手札，其中五件为明信片，有年月可查。十二件书信，其在荣县家居时写者，具月日而不年，惟由书中内容所涉，大致可以考出年份。以上两者，均为 20 年代初之作。起于 1920 年，止于 1924 年。其在居成都时所书便简，月日均无，或仅署“即刻”字。考其内容，或写于民国初年居成都时，或写于 20 年代偶游成都时。

手札内容，约言如下：

一、叹时局动乱，哀民生多艰，并谋应付之道。

尧生先生为江西道监察御史时，“所陈治安诸策，直言切谏，无可回忌，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者。故直声动朝野。顾多留中不发，世莫知其详焉。”（《民国四川人物传记·赵熙传》台湾 1966 年出版）梁启超诗“谏草留御床，直声在天地（自注：君所上封事，十九留中）”，即指是。（见《因若海纳交于赵尧生侍御，从问诗古文辞，所以进之者良厚。顾羁海外，迄未识面，辄为长谣以寄遐忆》）先生于宣统三年（1911）弹劾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借债卖路，更是敢言之举，以此而去官之沪，在此以前，曾连劾庆亲王奕䜣等多人。近见《四川文史资料》第二十辑所载二文，得知戊戌政变后，先生为刘光第保存其为刑部堂官所扣之《甲午条陈》稿；宣统嗣位后，为杨锐之子杨庆昶代写呈都察院文，求为杨锐昭雪。（杨锐门人黄尚毅撰《杨叔峤先生事略》全

引其文）于此，亦可见先生之风骨。辛亥革命后，数十年间无意仕进，俨然是个遗老。但是，其心情恐是复杂的，还要作具体分析。诗言志，其时诗作，多叹军阀混战，哀民生多艰，正是先生的心情表现。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电延先生参加，力却不与。从军阀混战到蒋介石政府统治，他都杜门不出，避与权贵往来。我所知道的，只在晚年（抗日战争后期），为盐务总局长缪秋杰所邀，赴重庆小住盘桓，亦为诗文交往之事。这，也是可贵的了。今观其手札中，多对时局不满之语，更信为有心之人。

世局动宕不定。闻省城时有风鹤之惊。城居畏兵，乡居畏贼，十年饱尝此味，亦复家常便饭矣。

这当是 1922 年所写的信。因为信中首先问及我家叔父在贵州为土匪绑架事。此事发生于 1922 年。信尾署“闰四日”（概为旧历，下同）。考 1922 年农历有闰五月，“闰四日”即闰月四日，亦即闰五月初四日，即公历 1922 年 6 月 28 日。信中言“十年饱尝此味”，意即民国成立后之十年，实为十一年，此处约言之。“省城”，指成都。（手札中亦有简称为“省”者，意同）此时先生居荣县故里。“时有风鹤之惊”，指军阀混战。“城居畏兵，乡居畏贼”，一语道出人民的痛苦。

钧弟何时成行，已往黔中否？倘可稍缓，亦未始非策。乱世道途之警，万方一概。俟太平从容措置，良佳也。

此信署十一月十九日，即 1921 年 12 月 17 日，首句所言，即指先叔扶先祖柩回黔安葬事。言乱世道途之警，劝缓行，果然言中。

前后信中，多处言乱世，并由此而论及处世之道，主逆来顺受，并求从佛法因果中谋解脱。1921 年另一信云：

古今乱世之变，何所不有？仅此小小事端（按指军阀派款事——引者），正以炼吾气性，方寸中自有桃源也。

1924 年 6 月 16 日信（信中署“五月十五日”）云：

成都景况，时于友人书中得其大略。国变十三年矣，吾人事事经惯，且可安之。

称清之亡为国变，依然御史风貌。“事事经惯”，正见其对乱世之不满，而又无可奈何。前此，1923 年 3 月 24 日一信（信中署“二月八日”，有较详的发挥）援引如下：

谁知今年大局如此。三弟在黔，自以安住为上策。此次风浪，折尽宿世恐怖之缘。（作此想则为大幸）以后慎之又慎，履险如夷，多为修福，自然远离颠倒梦想矣。

敝县隶八师防区，陈师长于众流中，可云事事佛因。不筹款，不轻战，总以地方安静为前提。党派中人，或议其观望。然按之事势，实有不能滚入漩窠之苦。而人民叨福极矣。昨一英人见过，谓一入八师防区，居然福地。可知公论在人也。

三弟既然平安无恙，侧想师母大人自然欢慰。凡乱世一动不如一静，颇闻滇黔亦有兵事，果不虚也。在省亦自无防。“万人如海一身藏”，东坡诗也。只身在外，固易为计，特不可轻

动耳。

四川其时军阀分割，行防区制。所述荣县一带境况，自是比较而言，未可轻信。然四川人民尝够了派款、混战之苦，“不筹款，不轻战”，“人民叨福”虽未必极矣，困苦总稍好一些。

对于教育问题，颇感不满。何以解救生民，叹无良策，发了如下一通议论：

近来世兄辈计渐成人，知当照常读书。惟外观世局，不知拨乱返正当用何术。学子争谈流派，大都趁意所云。至寻常科业，仍是从前制艺变相，利禄之途，且夫昏乱士生。斯世惟出没于五浊中耳。伏维一门慈孝，自远风尘，必太平庵，桃源所在，此即人大福，夫复何求？

自然，他也明白：“自远风尘，心太平庵”，也非“桃源所在”。于是，屡言其暮境。实则，其时只五十余：

不佞入夏来，转多小病，至端节前后忽困。自知年日衰则病日臻，乃人生应历之程。生老病死，时至即行，安之而已。

“生老病死，时至即行”，唐斐度之语也。其上句为“鸡菜鱼肉，得着便吃”。斐度语此，人以为豁达。先生用之，则意在从读佛经中求解脱。手札中言读佛书之处甚多，并一再嘱为觅佛经，还多次发挥议论，只引以下二段，以概其余。

不佞开年似较去冬为健。然岁月到此，衰困亦是常理，无复不了之缘。上年蒙赠佛经，愧未能以次尽读。钝根多所不解，故精进难耳。而各地僧众，往往以佛学书相遗，因此引动。展读《园觉经》，真浩浩法海，四无崖际。……净土三经，不佞有其二，惟缺《十六观经》。欲恳吾弟便中于各寺访求，代请一部。则亦弟之法施，功德为不小矣。

在另一信中，写着：

然佛真无上正等正觉，赞无可赞，今事粗知，皆拜吾弟及乌尤和尚之惠也。彼亦随时赠我经典，拔我于苦海之中，其与弟慈悲一也。

于是他概括言之：

世局如此，尊处扰于筹款，谅必深苦。然望随缘应付，勿生烦恼。此是劫运，处处皆然，非已身独丁其厄。佛学之要，忍而已矣。

这正是人们无可奈何中带有普遍性的想法。

二、述两家情谊，关怀备至。

由于书信集中于 20 年代初这一段时间，写得最多的，是关心先叔赴黔为土匪绑架事。语词中，充满关注之情。

1922 年 6 月 28 日一信云：

不佞数月来，死不死，活不活，知药无益，亦复置之。百事悠悠，随化待尽。故凡知旧处，皆三月无书。然三弟行迹，未尝一刻去怀。妇孺辈皆祷神问卜。第一师母长寿，不宜忧虑。下则三弟夫人着急，为极当办理而慰藉也。大抵失财免灾而已，但机宜当中节耳。不佞卜谓平安，梦中云：有江苏人无意保持，仗此神庥，稍缓即泰。寤而颇喜，似非偶然。望弟便中垂示数行人，（四字密圈——引者）下慰寒家之悬念也。

得先父去信后，同年 7 月 16 日复一明信云（片中署“闰月二十二日”）：

奉书，忧惋无似。黔事虽未就绪，能确探行人所在否？（八字密圈——引者）钱所无计，（句尾密圈——引者）要使人无恙。（句尾密圈——引者）不佞辈束手无一策也。弟性笃爱，望投闲设法，万无着急，谋以上慰慈闱，下安三弟夫人，尤第一要务。不知如何乃善法也。人生灾运，命有定程。行善获祸，信修善事，度难一次，则平生业缘，亦减一半。世风如此，而身适遭之，无可奈何。好在奉安灵柩，乃孝行之大，必蒙天修也。

越月余，未得复，又于 8 月 21 日写一明信片云（信中署“二十九日”）：

久未得书，不审三弟安信，近已妥确办理否？不佞于此不能尽毫毛之助，安悬心著急而已。望上解慈怀，下慰三弟夫人之切望。二弟当此，计亦苦矣。便中望示数字为祷。

之后，人的下落探明了，于同年 10 月 6 日又写一片云（片中署“中秋翌日”）：

前得书，知远人无恙，（四字密圈——引者）窃慰，窃慰。瞬过中秋，天气日凉，古人砧杵刀尺之时也。（深恐体气侵挹）不知已办有头绪否？此等事不可久悬，日日在危境中，不知何时可以出险？（八字密圈——引者）素知二弟睦谊深至，苦心焦思久矣。愧不能助分豪之力。破财多少，似无庸计议矣。时时延望，近希便中示及近状，（四字密圈——引者）（举家悬念）为幸。

翌年初，得知出险，于 2 月 20 日写一片云（片中署“破五日”）：

奉书，知三弟出险，暂回黔居住。举家狂喜。新年第一大庆也。去腊得约麦书，以为费尽巨款，而安问渺然，方极怅愤。继思巨款必托亲知，岂有于此干没之理？必可无恙。今果吉人天相。乃知孝思诚笃，一年惊惧中折除此生无限浩劫矣。

以上作了较多的抄录，备见先生之重于友情。这种友情，缘于先生始终尊重和热爱他的老师。1921 年一函，言及为先祖撰墓志铭事，又检出所存先祖手书，嘱加保存：

老师墓铭，不肖今年必当敬谨从事。乞禀师母慰心。箧中检得当年数札，恭缴弟存为世泽。计此外，按求各处，亦不能多得矣。

1921 年 12 月 17 日一信，言及为先祖所画之像，并谓将为先祖母画像事：

先师画像，不知师母下汜弟、妹辈以为肖否？不肖敬瞻眼神，颇觉如侍几杖。大端疑不差

矣。师母寿像，寒家拟议不一，未审弟谓如何？久思上讯，因贱体不适，至今乃一商酌也。

先生所书墓铭，一反所见法书，一字一划，工整极矣，为先生法书中另存一格。稿中还画了图，说明安葬之法。先生善画，而不轻易为之。其所画山水，淡淡几笔，气象俨然，保存了文人画的传统风格。读此信，方知亦擅人物画。

先生视我家如己家。1924 年 6 月 16 日一函，动问家中情况之后，说：

不佞僻居山县，而私心时时在尊府。伏望便中示及一二。

1921 年一函云：

入春，师母计安适。叱名请安。闺人感念慈德，时时怀恋也。频年在省，上荷师母慈德，下蒙二弟、三弟相爱，谊如骨肉。不知何以得此。

正因先生视两家关系为通家之好，便将其在成都读书之子交先父照顾。1921 年 12 月 17 日，有一长函，谈及其事云：

五子留省，诸蒙挚爱，千感万谢。前闻五子意羡奢风，修饰不祥之物，承吾弟谕止，恩逾骨肉。儿子年少，或不尽知感戴。然宠及深远，俾终身不入歧途，虽至亲伯叔，不过尔尔。不肖则望风拜谢。弟之风义，真古人不啻也。

今已冬寒，不知五子犹遵教诲，不放意他驰否？往尝见送子求学，学未成而身败名裂，十有八九。此子性情不定，亦不确知邪正之分。（此层最可虑）能侍贤叔，自是福命。尤望推爱不肖之意，切实规范，勿碍口也。（四字密圈——引者）其有零星用度，乞弟考其真实不虚者，乃照付之。不肖敬当一一缴还。苟其暗趋邪僻，则以钱造孽矣，乞斥之勿与也。

不肖年五十余，自省平生衣食，皆循寒苦。儿辈虽非华腴，较不肖已算为所欲为。不肖断不至悭吝小费。所不放心者，恐其自罹罪业耳。近闻其衣履，一一当须添置。果其非妄，乞弟为我酌之。感刻无极。

外与五子一纸，乞垂示之。此纸亦乞示之一诵为幸。

三、寄情山水，赋诗题字之类。

手札中，有述其山水之乐者，有记其诗词者，均为佳妙文字。兹引 1921 年一函如下：

去冬蒙枉送江楼，明发安流，一日抵黄龙溪，次日至彭山。已承眉山派兵迎护。抵眉，官绅留饮。向于诗中知墓颐山，此行乃畅游，生平快事也。张文襄香涛（张之洞——引者）于苏祠修一楼，四十年来未题榜。州之君子，以委不佞，亦雅话也。拟撰一诗，刻之墓颐。今延未就，懒散至矣。青神留饮一日，起岸。经井研，又留饮一日。行程至乐矣。乃乐不可极，隔日而风雪作，抵家之日，极苦。舆中戏赋一诗云：

下簾浑不辨西东，晓气僵人雨又风。一例天寒笼病鹤，无声穴处蛰寒翁。安危只好人相托，（谓舆夫也。一笑）辛苦谁云命不同。（吾于舆中叫寒。舆夫云：坐者如此，荷者何如哉？又一笑）少日安心思八座，老还新妇闭车中。

无事，可与山公、向农老生、季吾一笑也。

归家百事如梦，瞬又花朝。因忆去年今日出门，曾有小诗纪事。昨钞寄山公，极岁华之感。

山公，林思进山腴先生，华阳人，著名文学家，诗人。季吾，未详。向农先生，则吾家大舅父龚道耕先生也。先生字向农，一字君迪，别署蛛隐。应庚子、辛丑（1900 至 1901 年）并科举人。为著名经学家、文学家。尝长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及成都大学，历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多年，1941 年逝世。向农先生著述极丰，“ 成书数十卷，若《朝服经传五经注》、《礼记旧疏考证》、《三礼述要》、《经字通论》、《说文逸文笺记》、《补宋宗室世系表》，此其著也。学者比之湘潭王壬秋、会稽李越漫、（引者按：应称李越缦。李慈铭，字　伯，清末人。世人因其《越缦堂日记》而称之为越缦）长沙叶鞠裳诸家所为云。 ”（潘慈光《龚向农先生传》，载国史馆馆刊第一卷第 3 号，1948 年出版）尧生先生极尊崇向农先生学识，信中多次言及。现引一处（为旅居成都时所书便简）：

再者，前恳向农先生代觅《集韵》，不知可得否？此书于词学至有关系，（宋韵之根荄也）倘寻得者，实大幸也。

尊府子弟观法，向农先生即读书可为种子者矣，来往须勤。常诏子弟效法，即宏益也。附叩。

“ 常诏子弟效法，即宏益也。 ”读此句，无限感慨。忆少年时，得大舅父钟爱，耳提面命，时加教诲。惜少不更事，多所未解。而今思之，追悔无及。闻大舅父遗稿多散佚，搜集整理之事，其门人当能任之。而大舅父长孙师古，得承家学，尤宜奋而为之。

尧生先生毕竟是诗人本色，寄情山水，赋诗填词，原来信中一种消沉之气顿消。1921 年 6 月 14 日一信云（信中署“ 五月九日 ”）：

不肖拟游峨眉，期本月发。惜弟不偕此乐。

归荣县后，于 10 月 17 日写一片云：

不佞中夏游峨眉，孟秋之杪乃返乡县。登崖涉壑，恣所欲行，并及二峨而返。得纪行七绝约百首，碑文三通。归来后翻阅佛乘，大抵弟昔年所赠者也。（真过百金之惠，读之粗能入也）丁兹末世，舍闭门读书，别无上策。而登山临水，极生平未有之奇，斯获于天者厚矣。

登山临水得来的快乐，溢乎纸上，是真快乐。读佛书“ 粗能入 ”，不是诗人本性的快乐，只是无可奈何中自求安慰而已。

中夏出游，孟秋杪返，二月之间，得绝句竟达百首，碑文三通，才思之敏捷，足以惊人。钱基博推崇先生诗才之捷，诗笔之精云：“ 而诗功湛深，苍秀密栗，成之极易。见者莫不以为苦吟而得，其实皆脱口而出，不加锤炼者也。 ”钱基博并举一例，谓杨增荦将官蜀，先生为写入蜀山水竹枝词三十首，陈衍（石遗）见而爱之，请书一横幅见界。先生立增首尾四诗为赠云：“ 石遗老子天下绝，谈诗爱山无世情。大好金华读书处，闻风心到锦官城。 ”“ 送客魂销下里词，故人杨子最能诗。迟君一纵巴山棹，细雨迎秋唱竹枝。 ”“ 千山万水三生约，好句亲题送子云。西向定将人日报，草堂花发最思君。 ”“ 水驿山程约略齐，并应渔具手中携。闲吟无伴陈无已，一夜乡心到蜀西。 ”

钱氏以此记先生写诗之敏捷。（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其实，诗才敏捷，得力于素养，并非什么天授。而先生性爱山水之游，“尝五至京师，五出入夔巫巴峡，一登嵩山，一游西湖，……爱峨眉竺，盖尝七八游。故咏峨眉及夔巫巴峡中景物诗独多。一景物每数咏之，以极其变。”（《香宋诗前集·周盖培叙》）所谓胸中自有丘壑，故能出口成章耳。这就是杨增荦“致叹熙之锤幽凿险，范山模水，出以歌咏，直有抉天心、探地肺之奇，不徒以捷给见长也。”（《现代中国文学史》）梁启超对先生诗文说得好：“诗撼少陵律，笔摩昌黎垒。择言转气盛，刊华得神拟。浩浩扬天风，郁郁斐兰芷，幽幽缭洞壑，漠漠弄洲沚。……自从同光来，斯道久陵替。岂期万人海，复听九嗥戾。”（见《因若海纳交于赵尧生侍御，从问诗古文辞，所以进之者良厚。顾羁海外，迄未识面，辄为长谣以寄遐忆》，并参梁诗《寄赵尧生侍御以诗代书》）

从先生手札所述写诗作文事，亦可证其才思之捷。旅居成都时一信云：

> 归奉手教，敬当一一遵命。惟诗、字可以坐索，作文而强为之，必落酬应之习矣。稍留周纪于此，俟夜中构思，再属草也。

说得明白，诗与字可以坐索，作文不能。但“稍留周纪于此”，夜中即可草成交来人带回，实际也是坐索可得。这亦见才思之捷。尽管坐索可得，先生反对酬应之习，总是慎重从事的。绘画亦然。有一便笺云：

> 再者，去岁蒙命涂绘五件。此次均在行箧，非敢忘也。特临事愧耻，须缓缓从事，或丑状少耳。

“临事愧耻”，表现了郑重的创作态度。又在一便笺中，附了如下一句：

> 不肖不喜涂摺扇，希一概代谢为幸。

这并非书画家的癖性，恐亦“临事愧耻”之意。

又，先生旅居成都时，所书便简，多为向先父借书。所索书多史。旅途为暂，书不在箧，而犹勤于读书可见。

《香宋词》三卷，（香宋为先生别号）刻成于 1919 年。《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谓刻成于丁巳（1917 年），其后绝不复作，文守仁《赵熙传》已指其误，然文氏不知 1919 年之后复有续刻。手札中 1922 年 6 月 28 日一信云：

> 约麦尝过从否？闻近病疮，犹健行否？音书久绝，不知新词刻竣否？便晤希致下忱。

手札中，复有一笺云：

> 柳花球词，乞代致约斋钞一稿为幸，附纸。

约斋当即约麦，嘱将柳花球词交约斋钞一稿，显为刻入新词。则“不知新词刻竣否”之询，必指先生之作无疑。现将先生附纸所写之柳花球词录下，以为本节作结：

春风袅娜·柳花

怪东风无力，总荡愁边。吹作雪软于绵，一条条，绾定万丝千缕。非花非雾，情海漫漫。绿鸟吴音，黄骢征曲。欲挽柔情难上难。拾翠佳人洗眉黛，一鞭游子怨关山。

昔日家中所悬之先生字画幅，即有此柳花球词，忆不只此一阕，惜被劫夺，不能复忆其词。

尧生先生生于 1867 年（同治丁卯），卒于 1948 年，享年八十一岁。1891 年（光绪辛卯）领乡荐，1892 年（壬辰）成进士，入翰林院。（文守仁《赵熙传》谓“光绪十六年庚寅成进士”，误。《香宋诗前集》第一卷《北游诗录》自注“辛卯腊月至壬辰七月”，盖赴京考沿途之作。《辞家》云：“乡俗重过年，儿偏驰岁暮。”可证辛卯年尾启程。《天津行》云：“天津二月春水清，壬辰赵子天津行。”可证壬辰二月抵津。《四月十日放榜，名第十七，恭纪》，壬辰四月也。《传胪列二甲，恭纪》句：“五月蓬山扫落花”，《朝考》句：“一样榴花端午节，今年何幸在銮坡”，《西苑引觐，钦选翰林院庶士，恭纪》句：“万柄芰荷香海净”，皆著明时间，可证成进士于壬辰。）最负盛名者，为先生之诗。一时海内名诗人陈衍、陈三立等，皆与唱和。二陈诗属同光体，先生诗则出入唐宋。诗之外，先生之词，之文，之书，皆妙绝一时。画不多作，得者以为珍。先生又是一位剧作家。人们谈到先生所改写的川剧《情探》，总以其词典雅称之。这种褒词，是片面的，于先生不足荣。即使只就剧词论，典雅绝不能概括赵作《情探》，而是典雅通俗，兼而有之，绝无咬文嚼字之弊。敫桂英唱：“纸儿，笔儿，墨儿，砚儿，件件般般都如郎君在。”多么通俗，又多么切合人物身分与规定情景。《情探》名为改编，实是创作，是刻划人物之作，为戏曲创作首开新路，较诸原作，高明多矣，岂只是剧词典雅通俗而已！我以为，我们不应以名士目先生。先生是一位文学家，著名诗人。

写到这里，深感应该搜集整理先生遗作出版，并编写传记、年谱。以诗而论，先生为诗极多。文守仁谓“生平所为诗三千余首，顾不自惜，随手斥弃。”《赵熙传》所称“三千余首”，当远不止此。钱基博谓：“每观近人刻集，多空陋，心嗤其骜名而无本，遂自戒不轻付刻。”（《现代中国文学史》）世间传诵，是其少量，成集者当更少。1954 年，先生门人江庸、周善培、向楚、郭沫若、吴念存、尹石公等集资刻《香宋诗前集》上下册五卷，只是先生诗的一部分，即按周善培《叙》所云：“曰《前集》者，先生诗散在四方，集之不易。又局于资，仅能即已集者先印其十之六，权以为《前集》。余十之四，或续有所集，能复得资，当更付印，则以为《后集》。”可见，已经搜集到的，还有十分之四；而此十分之四的《后集》，亦始终未见出版，更何况还有所不知数量的没有搜集到的。又如先生之文，《香宋诗前集》周善培《叙》云：“先生之文，亦集数十篇，并待续印。”亦未见印。先生之词，亦得按集整理出版。至于书札，其有史料价值者，亦不宜使之散佚。总之，这是一项应该立刻做的工作。侧闻赵氏后人已着手，甚望能早日公诸于世。

1981 年 1 月 10 日写 15 日抄定

校稿附记：此文发表于 1981 年《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刊物已无存，今据原稿抄件发表。近年另有一文《直声在天地，诗名满人间——记香

宋赵尧生先生》，载拙作《川上集》，可参。先生哲嗣元凯、念君二先生整理编辑之《香宋诗钞》、《赵熙集》，已分别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及巴蜀书社出版。

1997 年 8 月

周孝怀先生

偶然得见张东荪先生“事发”后幽居多年中写的诗稿。其中有挽周孝怀先生七律一首，诗题为《闻孝怀周善培逝世，遗著有十余种，前所未闻，并知此七、八年内每每以余为怀。诗以纪之，非敢悼也》，诗录下：

宣南谈笑异当初，应料奇情彼此无。
山岳填胸诸路暗，风云插手一身孤。
逃名独解虞翻易，遗世重编许慎书。
闻说临危犹念旧，缄心不辨沸何如。

在张先生自编诗稿中，这首诗列入第二部分，称作“续作补录”，标明写作时间为“1959—1960”。忆周孝怀先生逝世于1959年，则逝世当年即闻噩耗而写此诗的可能性最大。不敢言悼，当是张先生自感于50年代起所处的政治境地，也因此，对于周先生七八年来每每以他为念，自是感念无极，而著之于诗题了。张先生“事发”于1951年，至写诗之1959年，正是“七八年来”。二三两联自是谈周先生，第二联谈周先生的政治活动。周先生清末从政，而于民国初年南北政治活动中，多参与，“山岳填胸”、“风云插手”，纪其实。第三联谈周先生的学术，以“逃名”、“遗世”为词，想见张先生眼中的周先生是脱离政坛归心学术以为乐。我只知道周先生精研《易》经，读此诗，才知还研究文字学。最后两句，感念周先生的怀旧和自己的处境，其事只能是语焉不详，即使是无意示人的诗。

我不知道张周二先生的关系，然张先生出于研究系，与康梁关系密切，所遗晚年诗稿，写及康梁者再。周先生与康南海为知友，与梁任公亦为多年之交。则张周之订交，或由于康梁的因缘，未敢肯定。写此小文，只是想谈一点周先生这位当年名动一时的人物。

周先生在清末王文韶、赵尔丰前后为四川总督时，相继任劝业道与巡警道，现在的称呼应是实业厅长、警察厅长。其时实行新政，周先生成了清末新政中的风头人物。从全国论，办理新政最有成效的区域是上海、四川和贵州。上海新政成绩优异，是自然之事。条件设施好，还有租界一套做法可资参照，上海办理地方自治且先于清政府颁布地方自治条例五年。边远地区四川、贵州之取得新政佳绩，恐怕主要是人为所致。这中间，周先生与有大力焉。周先生思想新颖，早年成都通惠门（新西门）城楼上，悬有他大字书写的四句十六字：“既丽且崇，名曰成都。文明建设，今有古无。”这当是他办理新政的指导思想。傲视古人，颇有高屋建领之风，所以能取得成绩也。梁启超写到周先生，谓之曰：“觥觥周孝侯，刚果通大理。宦迹遍三川，气骨横一世。”通大理而为人刚果，气骨傲然，所以能成大事。

周先生人矮小，而气势威严不可犯，办起事来雷厉风行，四川人特别是成都人对他是敬畏有加，然又免不了以成都人特有的趣味对他说了如下的俏皮话。那就是把周先生在成都的政绩，归纳为四个字，叫做：“娼，厂，唱，场”。“娼”者娼妓。周先生把成都的妓女集中一条街上，以便管理，特为这条街取名兴化街，表示以兴教化之义，并在每户妓家大门上钉一个名为“监视户”的牌子，表明对此户人家应予监视。直至解放以前，兴化街始终是成都下等妓女集居之地，而“监视户”则成了妓女的专名，成都人称妓女都这么叫。周先生实是中国红灯区的创始人，只此一点，可见其刚果。“厂”者

造币厂，用不着多说。“唱”者指唱戏，专对川戏而言。周先生倡导改良川戏，去其鄙俗，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是有大功劳的。今之成都锦江剧场，即周先生昔年兴建的悦来茶园，名震一时的三庆会戏班演于此，川剧大盛。周先生之师赵尧生（熙）先生偶写川剧《情探》，周先生即命三庆会演出，一时风行，至今《情探》仍是川剧上佳的传统剧目，且为多个剧种移植以去。“场”者劝业场，万商云集，百业繁兴，至今为成都商业繁盛之地，前些年扩建立牌，胡耀邦为题牌名。成都人以“娼、厂、唱、场”四字加之于周先，无非为俏皮，倒也如其实，道出了周先生在新政中所为的一部分。

周先生在辛亥四川保路运动中是个重要角色，著有《四川保路事件亲历记》一书（近在家中遍检而未得，不知书名是否准确？），记其与官绅周旋，各方因应之事甚详。然其所记，似与他人之说有异，周先生在保路运动中的功过是非尚待详考。

入民国后，周先生并未退出政坛，和南北政界要人多有来往，和孙中山颇有关系，多次参与南北政界活动。因为善于折冲樽俎，各方面都愿和他周旋。周先生久居上海，也曾从事实业活动，在上海办了个盐垦公司，邀我父入股，先父以师命难违，从四川汇款来沪，后来全部赔光，父亲因此致病。

父亲在光绪年间受业于周先生。原在我家课馆教授先父弟兄三人的是赵尧生先生，赵先生中进士后另有所任，向先祖（尧生先生之师）荐周先生接馆。周先生是赵先生的学生，周先生尊人周震先生任四川营山知县，光绪十六年庚寅，请赵先生课馆教孝怀先生。我不知道周先生教先父的时间有多久，幼时只知两家时有往来。周先生早已定居上海（周先生原籍诸暨，周震先生宦游入川定居，孝怀先生生于斯长于斯，满口四川话，而终署浙江籍），哲嗣中一人我们弟兄称之为周九叔者住在成都，和我家一直往来。直到 1949 年之后，我才在上海见到周先生。时周先生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已是垂垂老矣，然神清气朗，虽对后辈言语温和，威严之相依然可见，可以想见当年的凛不可犯。

赵先生教周先生读书时，周先生方十五岁，赵先生亦只二十三岁，教的时间也不长久，因翌年光绪辛卯，赵先生即领乡荐，北上会试，再翌年光绪壬辰，中进士，主讲蜀中各学堂了。而周先生一生尊重敬事赵先生，弥老而情愈亲敬愈重。民国三十五年丙戌，赵先生八十寿辰，周先生写《香宋吾师八十寿序》一文，于敬师之情，作了充分的描述。周先生归纳赵先生所教及所行为三，历五十七年（至写《寿序》时），周先生谓“朝夕奉之以应无穷之变”。此真至诚之言。周先生之重师道，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难怪康有为奇怪地问周先生：“为什么你对你的老师赵先生这样的好，我的学生梁启超对我那样的坏？”周先生何以为答，周先生回忆文章不在手边，已忘。读周先生《香宋吾师八十寿序》，实为周先生之答。

1996 年 9 月 18 日

附注：此文在报纸发表后，承四川大学朱寄尧先生函告，周先生所书四句非悬于通惠门，是在少城迎祥门。张秀熟《畅言诗录》、李思纯《成都史迹考》均可按。赵尧生先生哲嗣念君先生函告，周先生答康有为赵周师生关系问之句为：“无论什么情况下，我老师都对我从无个人要求。”前辈风范，令人肃然。

1997 年 8 月 8 日

忆舅父

——记一代经学大师龚向农先生

大舅父向农龚道耕先生，蜀中名儒，一代经学大师，1941 年逝世，迄今将近半个世纪了。我所见写大舅父的传记共有四种，分别为庞石帚、徐仁甫、潘慈光、姜亮夫四先生之作。庞先生乃大舅父友人，徐潘姜三位是大舅父高弟。前三作都写于大舅父逝世之时，姜亮夫先生之作则为近年所写。潘作系为国民政府宣付国史馆立传而作。四先生之作各有千秋，但以体例所限，均失之于简。近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准备出版大舅父遗作《旧唐书札迻》，我建议应附一较详的传记，蒙出版社同意，并委之于我。我对于大舅父之学略无所窥，何敢妄为，且此事不是短期可成，非通读精研大舅父一生等身之作，不敢言略知其学之一二；非广微博采大舅父生平资料，不足颂其高行大德于万一。大舅父《旧唐书札迻》即将出版，原所拟议的较详细的传记终付缺如，不能无憾。写此短文，不敢言发潜德之幽光，只不过略抒思亲的情怀而已。

先就从《旧唐书札迻》说起。三年前，有山东之行，访殷孟伦先生于山东大学。殷先生为大舅父学生，相与言及，四川整理出版几位大师硕学遗著进行甚缓，尤其是对向农大舅父著作整理似乎茫无头绪，更不要说出版之期了。我听参与这项工作的人谈，一是大舅父遗作散佚甚多，多有目无文；二是大舅父生平治学最精深者为三礼之学，现在四川已经难于找到一位后继者能够着手整理了。殷先生听了，说是他手头存有一部大舅父遗稿。言毕，即出其所藏《旧唐书札迻》相示。翻阅之下，大喜过望。虽非手稿，而系他人过录，也已弥足珍贵了。

归上海，即函大舅父长孙师古，告以经过，并建议应即设法将此稿出版。师古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为殷先生的学生。经师古与殷先生商量后，殷先生即将稿件托人带川交师古。初商之于巴蜀书社，书社以为将无赢利而婉谢，继交四川大学。四川大学以大舅父早期既为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四川师范大学校长，又多年为四川大学教授，义不容辞，此书应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虽亏本亦不足计，其事乃成。遗憾的是，殷孟伦先生于 1988 年逝世，未及见这本书的出版。

《旧唐书札迻》又名《旧唐书校补》，属考订之作，大舅父生前，此作只部分发表在《华西学报》，至《本纪》部分即止。奇怪的是，近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旧唐书》标校本，大量引用了《旧唐书札迻》以纠正原书错误，所引用部分，《本纪》以后未曾发表的也在内（于近人考订之作，书中还多引用张森楷的《校勘记》。对张作多标举张森楷先生姓名，对大舅父之作，一种版本标举了作者姓名，一种版本则只用其文，而未标举作者之名，此亦异事）。由此可见，《旧唐书札迻》未发表部分，已流传于世。何以流传和被引用，我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为此，向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请询。李侃先告诉我，《旧唐书》是归上海标校的，原稿尚在，他当查清以后告我，以便我向标校者查问。我想，如能因此而查出大舅父手稿，直属望外之喜了。后李侃又告，称经查找后，原稿已无着。此事便无结果，不胜遗憾。

这里，我想起王仲荦先生生前对我多次表示过对大舅父的景仰，说他在标校北史三书时，采用了大舅父不少考订。大舅父兼通甲乙两部之学，是以亦为史家所景仰。王仲荦先生与殷孟伦先生为知友，因而知道我和向农先生的关系，几次属望我整理大舅父遗作。谬承厚爱，小子何能，只能敬谢不敏了。

大舅父讳道耕，字向农，一字君迪，别署蛛隐，以晚年重听又号■翁。先世浙江会稽人，宦游入蜀，著籍成都。我的外曾祖父玉彬先生以军功擢知府，外祖父维翰先生出身副贡生，署理番厅教谕，一生致力教育事业，著名的成都县立中学（现为成都市第七中学）即外祖父所创办。大舅父为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 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 年）并科乡试举人，入为内阁中书，无心功名利禄，不久返乡，潜心著述，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曾任四川高等师范学堂监督、四川师范大学校长，并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及华西大学经学教授。门下弟子满蜀中，多有俊材硕学之士。

向农先生一生事业，一在教育，一在学术。从清末到民国，多年主持高等教育，培育人材，贡献极大。正当革旧图新之时，对于教育方针、设施、措置之改革，先生付出了极大精力。两次出席全国教育会议，亦多建树。辛亥革命之后，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于 1912 年 7 月 8 日在北京举行预备会议，10 日正式开幕，至 8 月 10 日闭幕，历时一月。时当蔡元培北上迎袁失败，唐绍仪组阁，蔡元培仍长教育部之时，国务院于 3 月 20 日成立，蔡元培于 21 日就任教育总长。这时候蔡元培还雄心勃勃，想改革整顿全国教育事业，于 5 月初决定在暑假中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邀请全国教育家讨论学制系统、学校规程等问题。蔡元培本来寄很大期望于这个会议，谁知唐绍仪内阁组成，袁世凯大权独揽，致使唐绍仪难以开展工作，而同盟会和袁世凯之间也日益暴露出矛盾，同盟会员之入阁者，办事受到牵制。于是，唐绍仪辞职，蔡元培与同盟会三阁员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亦辞职。临时教育会议开幕之时，蔡元培辞职尚未批准，他主持会议开幕，还按他就任唐内阁教育总长时所发表的整顿学务五条任务加以阐述，至 7 月 14 日，蔡元培辞职获准，就再也没有参加临时教育会议，致使这个会议的成效大减。四川出席临时教育会议的有向农先生及徐子休（炯）先生等数人，徐子休先生是我的中学校长和老师，是一位顽固的尊孔读经派，和向农先生一向异趣。今查临时教育会议资料，只见有徐子休先生的提案，向农先生未连署，会中发言记录，亦未查出。向农先生第二次出席全国教育会议，甚至是在何年何月，现亦不能知。

写到这里，想到向农先生日记的丢失，深感损失重大。先生从早年开始，即逐日详写日记，至 1941 年逝世前一日犹不断（先生是突然脑溢血而逝）。案头线装通行日记本一册，先生执笔徐书，此情此景，今日犹在眼前。几十年来，这些日记，累记当成厚叠。其于清末至民国时期之政治、社会、教育、学术诸方面，于先生的学术思想，于先生之生活、为人与交往，都是极可宝贵的资料，于两次出席的全国教育会议，也当有资料可以提供。潘慈光所写先生传记曾称这部日记有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可惜一代学人的这部洋洋大观的自述，竟然散佚无着了。

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博大精深，林山腴先生称先生“君家固世达宦，又多藏书，浸淫积靡，群经大通，诸子百家，靡不毕贯。”（见所著《龚向农寿序》，载《清寂堂集》，巴蜀书社出版。）先生于四部之学，无所不窥，而于经史，尤所倾注，最得力的著作，在于经学的研究。姜亮夫先生所写先生传有云：

> 先生生而夙慧，三岁能诵诗，出语辄惊长老。年十三补县秀士，十四而群经诸子皆卒业，兼通乙部，尝读《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因是汉宋明清之学统系益精习。……归而奋力于学，自六经、苍、雅、诸子、乙部、古今典制、当代轶闻，靡不综贯穿穴，年未三十成

书数十种。亲党宿儒罔不踵门质难，由是三蜀士夫咸知成都有龚君矣。

这是指的早年的大舅父。正由于为学无所不窥，所以能成其大。先生早岁多有诗作，后不多为。偶有唱和，也不轻易发表。所著《中国文学史略论》，盛著于时，多为学校采作教本，多次重刊。先生自序，此书原主讲四川高等师范学堂时受刘师培委托而写。我至今珍藏一部，时加阅读，深感叙事则条理分明，论议则精恰得当，尤以论今古文之争，分析今古二家治学之术有五异，实为精当。先生治古文经学，于经今学亦所深研，虽不喜经今学奇诡狂肆之说，然于二家不主重此轻彼，由此方能发为实事求是之论。所以，姜亮夫先生于此一唱三叹曰：

其评骘今古之义最为诚质，而所校论，但以事实，不作褒贬，不言优劣，则今文无通才而古文多鸿儒，此虽古今之殊异，而学术升降之契，固章然甚明。以精诚之思，为邃密之析，折中至当，众喙当息矣。

先生一生著述极丰，据弟子徐仁甫先生约略统计，已达七十种。其有关经学诸著述，最为学者景仰。《经学通论》、《礼记旧疏考证》、《三礼述要》、《丧服经传五家注叙》、《妇为舅姑服三年辨》、《孔子生卒年月说》、《孟子弟子目录》等诸作，或议论卓识，或考证精湛，为学术界所传诵。先生一生倾服郑康成（玄），自号其堂曰希郑。姜亮夫先生颂先生“博雅近郑氏，而珪璋特达，亦似郑君。秉懿相迹，途术相会，学有独得。三百年来，述郑君年历者数家，而先生所撰年谱，精洁纲维，要义可明，不蔓不枝，无遗无复，大过诸贤。”从先生与郑康成的为人治学之相近，称先生所著郑氏《年谱》，为三百年来之首选，其说极是。

蜀中向有林、龚、向之学的称道。龚者先生，林者华阳林山腴思进先生，向者巴县向仙乔楚先生。三先生皆学林硕望，一时之选，为学博大，而又各极其精深（林向以诗词名世）。三先生又相与为知友，（向先生且与先生为同年），濡沫切磋，相得益彰。蜀中学人，罔有不出三先生门下者。先生早逝，林向相继逝于 50 年代初。向仙乔先生 1942 年有《追挽龚向农同年》七律一首（见所著《空石居诗存》），录之如次：

挟书岩壁等逃秦，又向深山哭故人。祝向九原（谓祝屺怀、向宗鲁也）应慰汝，魏梁一曲更伤神，（君赴友人曲会，归即不起）。花城酒伴多为鬼，身后书田不救贫，今日礼堂空感旧，吾衰心事竟谁陈。

情真意切，读之伤神。

赵尧生熙先生，我祖之学生而又我父之师，清末以翰林出为御史，硕学名流，驰誉国内。尧生先生最推重向农大舅父，我家尚存尧生先生致先父书札数十通，札中有谓“如向农先生者，可谓读书种子矣。”多次嘱先父多与向农大舅父相接，学其学，学其人。1989 年 3 月，在香港晤从台湾来港和我共与一学术讨论会的潘重规先生。潘先生乃章太炎、黄季刚两先生之门人，又为黄季刚先生之婿，抗战时期曾执教四川大学，他对我说，他最感遗憾的，是他在四川大学时，向农先生刚去世。他读了向农先生著述，佩服之极。

学与人，两不可分。先生之为学如此，为人也是德高望重，备受敬仰。外祖父所出众多，先生居长，生母早逝，我的诸舅诸姨和我的母亲，均先生

继母所生。先生事继母至孝，对诸弟妹的友于之情，不只为我的舅姨和母亲所深感，不只是为诸亲戚家所乐道，也是凡认识先生者所素仰。母亲多次对我兄弟姐妹说：大舅父每天外出回家，总是先生去我外祖母居室请安，然后回房。几十年来，一次也没有走错过。这听来似乎是细节，不是情发乎自然，不能有此纯真。先生课诸舅父学业，并以自己的道德行为影响诸舅父，诸舅父均以教育名家，分别为成都各著名中学的著名教师。成都世家大族，一提起小福建营龚家（外祖母逝世以前，合家聚居于西玉龙街之小福建营，人称为龚家花园），均称为教育世家。先生还亲自课我母亲和诸姨读，母亲从小勤学，写得一手好字，能背诵古书，尤爱读《左传》，先生发乎至情，友于诸弟及妹，而对我母尤钟爱。母亲总对我们弟兄姐妹辈说：“ 你们读书做人，就要向大舅父和几位舅父学。 ” 大舅父逝世，母亲悲痛逾恒，口述内容而由我兄毅衡（是大舅父在华西大学中文系所教学生）写成一挽联云：

抚我如父，导我如师，数十年骨肉情亲，那堪老景多艰，长坦悲怀怜弱妹。
学之不厌，教之不倦，只一夕膏育病剧，讵料尘缘尽了，空余恸泪哭阿兄。

姜亮夫先生引此联于其所撰大舅父传，而评之曰：“ 弱妹有联述家庭为挽，禺禺之象最真切，而情辞令人读之欲泪，则先生教妹之方亦可知矣。 ”

大舅父一生，对家人慈爱亲切，从无疾言厉色。面丰腴，笑容满面，娓娓细语，和善至极。大舅母先于大舅父而逝，两位表嫂侍大舅父极孝，饮食起居，亲为侍奉。这自是两位表嫂的高行，也是大舅父盛德之所感。最近返川，年已九十的二表嫂还对我说，大舅父一生没有责备过她和大表嫂一句话。我常在大舅父家，有时且居住数月，一段时期，因避日本飞机轰炸，两家还共租乡下农居同住。其时虽少不更事，然每日亲接謦欬，感慈爱的关切，得至德的感化，终身不忘。大舅父善饮，只饮黄酒，每饭必饮，饮不及醉而罢。我侍坐在侧，大舅父总命我饮，他不只一次地说：“ 不能饮酒者非吾甥也。 ” 几十年来，所最感惭愧的是，只在喝酒一面得到了大舅父的遗风。

大舅父不只在教育界学术界受到敬重，其时四川军政人物也加敬重。姜亮夫先生说：“ 民国以来，蜀中军人跋扈，先生与华阳林先生山腴，虽悍将骄卒不敢无礼，非大德不足以服暴也。 ” 事实确实如此，先生之丧，一时著名军人吊唁与送挽幛者甚多，大德服暴，信然。但是，另一面，四川军人也多读书人，出于先生之门者亦不少，军人而读书，也就知礼而敬重知识分子了。

大舅父不与闻政治，但内心有其看法，对于正义之举也能参与其中，且以他的德望被推为首列。二十多年前，曾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刊有早年四川大学教师为政事罢教记载，几次发表的宣言中，都是大舅父领衔。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派党阀程天放主持四川大学，教师反对，大舅父也参加了反对行列。

大舅父通音律，喜唱昆曲，尤善击板（小鼓），时与同好有曲会之举。我曾在大舅父家几次逢其盛，大舅父逝世，也是在友人的曲会上。时在 1941 年冬，跌倒于曲会之上，脑溢血而逝。

我尚存有大舅父亲笔所抄曲谱一册，中缝印《聱斋曲谱》四字，首页朱印篆文“ 适轩 ” 二字，不知是否先生室名？谱中计抄《思乡》、《寄子》、《闺塾》、《拾画》、《西谍》、《瑶台》、《访素》、《草地》、《亭会》、

《访翠》、《定情》、《密誓》、《惊变》、《独占》、《乔醋》、《冥勘》、《送客》、《思凡》、《饭店》诸出，有的只抄其数句，词旁均以墨朱二笔记工尺。在《思凡》之末，有亲笔批语二段：

> 时本转调下标采茶歌、哭皇天、香雪灯、风吹荷叶煞等牌名，按之于谱，殊多不合，而末二句标为尾声，南尾尤无此法，兹用纳书楹本。
>
> 此出与《下山》，《缀白裘》题为《孽海记》，纳书楹但云时曲而已，黄氏书目、王氏书录所载传奇杂剧甚多，如《孽海记》名。

睹物思人，不胜今昔之感。姜亮夫先生记，在一次曲会上，大舅父“命余夫妇入座，歌《牡丹亭·游园》，先生乐曰：‘孔子三月不去乐，今所传昆曲，尚得安和平正之义。’因知先生虽宴乐亦在礼义之域。呜呼，美矣！”安和平正，大舅父是于乱世中企求盛世之音以为安慰了。

1990 年 1 月 23 日

附记：文中所引姜亮夫文，见其所著《学兼汉宋的教育家龚向农》，载《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3 月出版。

重校附记：

两年前，顾廷龙先生自北京来信，谓“曩与顾颉刚先生同辑《尚书文字合编》，今将写定”，“近读龚道耕（向农）先生所撰《唐写残本尚书释文考证》一文，极为精博”。顾老拟将此文录入，然其文分载《华西学报》之四、五、六、七期，似尚未全。顾老听人说我与向农先生有戚谊，又说听说我有文章写向农先生，因向我询问向农先生此文有存稿否，并索我文，以备用作在顾老所编书中写向农先生之简历之用。我除了将我的这篇文章寄呈顾老，并函师古查觅家中有无存稿，同时告师古寄呈顾老时已出版的大舅父遗作《旧唐书札迻》。师古寄去了《旧唐书札迻》，而《唐写残本尚书释文考证》存稿则未找到，乃成残文。顾老复给我连来二信，对向农先生极表佩仰。又说：“近得中华友人见赠江有诰《音学十书》一册，系根据成都■式诲刻本影印者，而其中《唐韵四声正》及《等韵丛说》两种皆有。成都龚道耕重校，题记，诚一代通儒也。”我从不保存友人书信，因爱顾老法书，此三信独存，尤以顾老第一信，写信正值春节，以洒金红笺用毛笔写成，更觉可珍，今日乃能补写此一段往事，更见报载，两位顾先生所辑《尚书文字合编》已将出版，甚可喜也。顾老信中提到的■式诲，亦我长辈姻亲，四川著名的大藏书家、刻书家，向农大舅父为其家所校之书甚多。今并及之。

1996 年 8 月 8 日

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

本月初，审定《松江县志》稿，阅《人物》卷，发现一些名重一时而与松江颇有关系的人物未曾入传。照说这些人物可以“寄寓”、“流寓”之名而入传的。其中，尤使我系念不已的，是河东君柳如是。柳如是乃嘉兴人，早年为“吴江故相”家之姬妾，甚至说是婢也一样。陈寅恪先生考证，这位“吴江故相”乃周道登。周死，柳不容于周家，被卖在苏州为娼，以诗文字画名于时，后为“云间孝廉”鼎鼎大名的陈子龙之妾（陈寅恪先生以为说是“外妇”更恰当），居于松江者有年，终以不容于子龙之妻而离去。中间经过许多曲折离合，这位名女子与明末江南名士多人有关系，爱其才，慕其色的名士大有人在，终以二十四岁之年，嫁给了原东林领袖人物钱谦益。钱死后一月，柳自缢身亡，年仅四十。忆数年前去常熟，探访柳氏墓地，在路旁草丛中见一小冢，碑已倒置地上，上有“柳如是之墓”数字，备极凄凉。嘉兴、苏州、常熟修志，自应为柳如是立传。而柳如是毕竟在松江住了几年，和松江有密切的关系，她对松江有厚爱，自称“云间柳隐如是”。这大概和她始终不忘陈子龙有关。松江修志，不应将她排除在外。

松江归来后，此事迄不能忘，乃检出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重读一过。十多天来，寅恪先生之形象萦回于脑际不能去，适《书林》索稿，乃为此文。

先从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说起。

先生写《柳如是别传》，起于 1954 年 3 月，经十年时间，于 1964 年夏完成。全书 80 余万字，为先生晚年力作。先生早于 1945 年春双目失明，手术无效，同年秋应英国皇家学会邀请赴伦敦治疗目疾，亦不能愈。然自失明至“文革”开始之二十年间，先生教书、治学、写作不辍。不能看书，改为听读；不能写字，改为口述。先生素以过目成诵、记忆力惊人著称，失明后，每写作辄告助手何事查何书，考虑成熟，然后口诵，由助手笔录成文，其文依然保持数十年来独具之风格。《柳如是别传》同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十年得 80 余万字，对于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可谓神速了。

先生晚年何以花这样大精力去研究柳如是？先生在是书第一章《缘起》中对此有明白的交代。是书原名《钱柳因缘诗证释》，秉先生一生以诗证史之旨和研究方法，笺释钱牧斋与柳如是因缘，而论证明末清初历史。《缘起》交代，先生少时居南京，在其舅父俞明震家（按俞于 1903 年以江苏候补道奉派至上海查缉苏报案，有意回护章士钊，并图放走吴稚晖、蔡元培、章太炎）得见钱遵王所注钱牧斋诗集，“大好之，遂匆匆读诵一过，然实未能详绎也。是后钱氏遗著尽出，虽几悉读之，然游学四方，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故虽曾读之，亦未深有所赏会也。”抗战期间，先生执教昆明西南联大，一日在旧书店中购得店主昔年在常熟白茆港钱氏旧园中所拾之红豆一粒，“自得此豆后，至今岁（指写作《柳如是别传》开始之 1954 年）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指购得红豆起）遂重读钱集，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先生有《咏红豆》、《题牧斋〈初学集〉》二诗记其事，兹引二诗而略其《序》及《注》如后：

咏红豆

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纵回杨爱千

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

题牧斋《初学集》

早岁偷窥禁锢篇，白头重读倍凄然。夕阳芳草要离冢，东海南山下潠田。谁使英雄休入彀，转悲遗逸得加年。柘兰衰柳终无负，莫咏柴桑拟古篇。

读此二诗，可以大约明白先生之笺释钱柳因缘诗的旨趣及所论的范围了。先生所谓“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自释为“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岂意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这是指钱柳之学而言，我以为先生更着眼于钱柳之事。即所云：“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请试述之。

钱牧斋学问诗文，自为寅恪先生所倾服。（先生自谓，少时即深赏其“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之句）然以一代文宗而降于清，则为先生所深不齿。这在《柳如是别传》中，多有论列。但先生深探史实，精研诗篇，论证牧斋降清之后，内心有所愧悔，由于清政府对降臣的疑忌，也由于钱牧斋与复明运动有所联系，而两次遭清廷之狱，又于诗文中时有隐晦甚而明白的不忘故国之心的表露。先生于此有所论述。但先生是作之重点在写柳如是。如所云：“今撰此书，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上，以免喧宾夺主之嫌。起自初访半野堂前之一段因缘，迄于殉家难后之附带事件，并详述河东君与陈卧子（子龙）、程孟阳（嘉燧）、谢象三（三宾）、宋辕文（徵舆）、李存我（待问）等之关系。”先生对柳如是之诗文才学自极佩服，更重要的是敬佩她的气节，她的爱国主义精神。柳如是为明末重要爱国社团几社社员，清兵入关，北都倾覆，柳如是劝钱谦益死（时钱为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钱谢不能。柳即奋身自沉水中，侍儿持之不得入。及南都倾覆，钱谦益率先投降，清政府授以礼部侍郎，北上任新职，柳如是虽与钱感情极笃，坚留南京不肯随行。钱谢病南返后，“丁亥三月，捕宗伯（振常按：明封钱为少宗伯）甚急，时君（振常按：指柳）病，力疾挈一囊，……饘粥牧圉，昼夜不舍。”（顾云美《河东君传》）为新朝作新贵，坚不随行；为钱被捕事，力疾随行，柳如是处大节之态度备极鲜明。后柳如是忽下发入道。钱谦益死后一月，柳如是为族人敲诈勒索，自缢死。一生大概如此，称之为女中豪杰未为不可。

钱柳年龄相差悬殊，而感情弥笃。但二人在处大节上，则河汉迥异。上举简要，已可见大概，更举二事，可见柳如是在谈笑间对钱之讽喻。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柳如是”条云：“宗伯暮年不得意，恨曰：‘要死，要死！’君叱曰：‘公不死于乙酉（振常按：是年清兵入关），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柳君亦女中丈夫也哉。”《牧斋遗事》云：“后牧斋偕柳游拂水山庄，见石洞流泉，澄洁可爱，牧斋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笑曰：‘此沟渠水，岂秦淮河邪？’牧斋有惭容。”盖柳以此语刺钱之不死于南京陷落之时也。于此，既可见柳之气节，亦可见其机智诙谐。

寅恪先生佩服钱之学问诗文而鄙其人，爱柳之诗文亦重其人，笺释二人因缘，如自述所云：“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词，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孌

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这段话极可注意。先生以一代史学大师，博通中西之学，发为人所莫及的史学论著，而又具文学家的情怀，以真挚纯真的感情，同情热爱中国之弱女子，为之呼吁，为之鼓吹，其情之真，人所不及。先生撰是书之大旨，可于此见之。先生晚岁标其广州中山大学所居曰寒柳堂，曰金明馆，其文集或称《寒柳堂集》，或称《金明馆丛稿》，均从柳如是得来，其情之挚可知矣。

先生挚友吴宓（雨僧）先生于 1961 年 7 月由重庆去广州探访先生，先生为述写作《柳如是别传》大纲，雨僧先生于是年 9 月 1 日《日记》有记云：

>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也谈及卞玉京、陈圆圆等与柳之关系。侯朝宗之应试，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时寅恪先生书尚未脱稿，雨僧先生自未及见，而闻之于寅恪先生“细述”，则上举文可看作是寅恪先生自述著书旨趣，也可看作为雨僧先生闻“细述”后所作评论。两先生相交逾五十年（1919 年始识于美国哈佛大学），灵犀相遇，雨僧先生之言，自是确论。

于此，应该提一提先生晚年另一著作《论〈再生缘〉》。此文作于开始写《柳如是别传》之前一年，即 1958 年，完成于翌年之 2 月，继又作《〈论再生缘〉校补记》，同年 3 月即着手写作《柳如是别传》。先生之写《论〈再生缘〉》，实与写柳如是有相同旨趣，“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记其本末，草成此文。”“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与写柳如是一样，以诗人的情怀同情弱女子陈端生的身世。先生赠雨僧先生诗有云：“著书唯剩颂红妆”，就是此意。成文后，先生有二律咏其事，其一律第二联之下句曰“异代春闺梦里词”，点明这是清代的春闺梦里词，感时之战乱流徙，而哀春闺梦思之人。在《柳如是别传》中，写著书缘起，有“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亦可明白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有相同之旨趣。

就是这样一个考证之作，初则抄本被人流传到海外，继则台湾、香港都有盗印本，海外学人中有人断定《论〈再生缘〉》系借题发挥，旨在批评“中共暴政”。这种想像之词，自不堪一驳。美国汪荣祖教授著《史家陈寅恪》一书，已批其妄。可叹的是，寅恪先生是作完成后，在国内只有先生自费所印油印本，而未能刊布。先生以是作寄给了郭沫若先生，郭老于 60 年代初写了《陈端生考》一文发表。郭老之文，自有卓识高见，而其大端，多寅恪先生所已言者，郭老未之标明，反取寅恪先生之作之小疵，从而标举之，亦一憾也。自郭老是文出，一时兴起了陈端生热、《再生缘》热，戏剧舞台之上，弹词说书之中，孟丽君一时大为走红。然先生之《论〈论再缘〉》一文，仍未能刊行。我在读郭老文之后，方知先生有《论〈再生缘〉》之作，几经访求，才从友人处借来香港的盗印本。

于此，难怪寅恪先生有“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之叹了。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62 年春，陶铸陪同胡乔木去中山大学拜访先生，谈

及旧稿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多年，但迟迟不予出版。先生因言：“ 盖棺有期，出版无日。 ” 胡笑答云：“ 出版有期，盖棺尚远。 ” 按先生之作，在全国解放后，只于 50 年代初出版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三书，其余旧论文及新著均未能结集刊行。尽管胡乔木答说“ 出版有期 ”，其将新旧论著包括三册的《柳如是别传》合为《陈寅恪文集》出版，已在 1980 年。其时距先生之逝已十有一年，先生仍不及见。而先生最后之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写于 1965 年夏至 1966 年春）共七章，大部散佚，只存残稿。此稿多为先生回忆家世之作，以先生祖父宝箴先生之参与维新，推行新政，先生父亲三立先生之一代诗宗，《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于研究清末社会政治及先生家世、家学渊源及先生思想，关系至巨，如今只能抚读残稿，实大憾事。所幸者，先生文集七种，毕竟在 1980 年出版了，若拖到今天，则以学术著作出版之危机，不知须要多少补贴，方能问世了。

先生当时云“ 盖棺有期，出版无日 ”，实出口成佳对。先生富文学修养，谈笑之间每有佳对，早已名于世。1926 年，先生方登讲坛，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前一年归国受聘，以父丧请假一年），一时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先生并称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一天，先生对学生说：“ 我有个联送给你们：‘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 大家哄堂大笑。 ”（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记蓝孟博语）上联指受梁启超之教，下联指王国维曾为宣统之师。人以为这是先生的幽默，其实先生之注重对联，极有深意，容下言之。

1930 年，清华学校易名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去看先生，送其所编《科学与玄学》与先生。是书记丁文江、张君劢科玄论战事。先生随手翻了一翻便说：“ 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 ” 罗称即去买宣纸请写，先生说不必，当即诵出：“ 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 ”，又说横额为“ 儒将风流 ”。罗在北伐军中为少将，娶了一个漂亮妻子，所以说“ 儒将风流 ”。上下联中又将“ 家 ”、“ 伦 ” 二字嵌入，精妙之极。谈此旧事的蓝孟博以为，先生“ 才思敏捷，诙谐风趣，大率类此。 ” 话并不错，但忽略了先生一时戏作实有深意。先生对于当时科学玄学之争、中西文化论战，皆不以为然。他一生秉承的思想，是调和中西，中体西用。先生至友吴宓（雨僧）先生即对先生作过如是评语，先生自己也如此承认。这副即兴所作的对联，就是这种思想的表露。

1932 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叔雅）先生请先生拟定招生国文试题，先生出题中有对对子“ 孙行者 ” 一题，引起舆论大哗，以为此是无用之旧套。先生初默然不答，后于《学衡》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畅论国文试题之应改变前趣，“ 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度，始能于阅卷定分之时，有所依据，庶几可使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屈之事。 ” 其论及所以出对对子之义，认为对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一）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能否分别平仄声；（三）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思想条理如何。文中对此四条均分别有详略不同之解释。这其实是以最简单的方法测验应试者的基本功，应是无可疑论的。先生意中“ 孙行者 ” 之最佳对应为“ 胡适之 ”，“ 盖猢狲乃猿猴，而‘ 行者 ’ 与‘ 适之 ’ 意义音韵皆可相对。 ” 先生此对原有所本，1965 年为此文所写《附记》中指出：“ 苏东坡诗有‘ 前生

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韩卢’为犬名（见《战国策·齐策》及《史记·范雎传》），‘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于此，可见先生之博学深思。讲起对对子一道，今天更是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了。此事之不可废，先生已预见于五十多年前。

我曾从先生受业两年，以愚鲁之资，于先生之学无所窥，何敢信口妄说？好在多年以来，海内外先生知友及弟子多有发舒，中山大学复于最近出版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鲁殿灵光，足以辉映前哲。我只想说，先生与王国维、梁启超二先生，都继承了中国文化学术传统，为通人，为学人，经史文兼通，是以为一代大师也。先生又深通西学，聪慧过人，俞大维（先生之至友及表弟与妹夫）谓先生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天才加勤学，先生便能成其大，就其深。

先生逝世整二十年，回忆昔年受教之时，犹在眼前。那是 1943 年冬，在四川成都，我方为燕京大学二年级生。一日，全校周会，校长梅贻宝先生告众云：“我校迁徙西南，设备简陋，不意请得海内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前来执教。陈先生业已到校，即可开课。这是学校之福。”不久，教务处公布了先生所开课目。先生兼教历史、中文两系，所开课为《魏晋南北朝史》及《元白诗》，我两门课都选修了。下年，先生则开《唐史》及《元白刘诗》，我又都选修了。时我校借一女子中学旧址上课，地小房少，听先生讲课者为教室所不容，且先生住房亦狭隘。所以，第二年开设《唐史》及《元白刘诗》时，改至城外华西大学广益学舍之大教室，以便所谓华西五大学学生均可共同听课，先生亦迁至广益学舍居住。

时先生右目早于抗战初期失明，走路略感吃力。穿长袍马褂，手拿黑布包袱，包着书本、讲义，另手拿着一瓶冷开水，步入教室，入坐即开课，了无闲言。助教容媛女士（容庚先生之妹）随其后，先生坐定，容女士亦入后座。在我校那间坐得满满的教室，听讲的不但有他校学生（华西五大学可互选课程），还有我校和他校教师。至今记得的，时为金陵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高文先生，每课必来听，并详记笔记。后改在华西大学教室授课时，著名诗人、文学家林山腴思进教授亦来听讲。林山腴先生为陈三立先生诗友，于寅恪先生为父执。寅恪先生来成都后，曾集句请山腴先生书一联：“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休。”林先生伤其太哀。寅恪先生今忽见林先生在座中，为之瞿然，语人曰：“山公厚我励我，真我之良师也。”郑天挺先生称寅恪先生为教授之教授，信不虚也。有人说，时为四川教育厅长的郭有守先生亦曾来听讲，我未之见。倒是一时盛传，“郭沫若将由重广”来听讲。当时此种传闻，符合历史真实，及至解放以后，形势迥易，自无郭氏降尊的可能了。先生一面讲，一面写黑板，不时喝水。至 1945 年春，先生左眼又盲，是以后来乃有去美国治疗之行。

先生讲诗亦如讲史，即以诗证史，而非纯诗义之讲解。不先熟读元白（后加刘禹锡）之诗，是听不懂先生所讲的。还记得讲《元白诗》，第一课是讲《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话听起来很怪，当时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寓居成都，与我相熟，他耳闻先生大名，想来听课。我告诉他，第一课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问题，他以为无聊，便不来了。其实，先生是以这个题目带出唐代婚礼制度，乃重要事。

为什么将元白并讲？这更须了解先生的深意。当时比较研究之法已有所

滥觞，先生对此有独具的看法，以语言为例，先生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即指出各种语言有其特殊之文法，比较研究之法，非在同系语言如梵语、波斯语等中进行，不能得其功。“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研究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而小异之语言。”所以先生对马建忠之仿印欧语系而建立中国文法之作不以为然，斥之为：“《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语言如此，文学更然。先生说：“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这种议论，今天看来，应成定律，而发之于五十六年之前，则不能不说是卓见。即使在今天，胡乱比较之妄人也还有之。元稹与白居易，处同时代，同为元和体的创始人，两人多有同一题目之作，所作又互相影响，先生并讲元白诗，恰当极矣。

先生日常在课堂上，只管自己讲述，很少与学生交流。一日，讲元稹《悼亡诗》，讲到“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句，忽然对学生提了问题。当时我坐在第一排中间，与先生相距最近，先生即指着我问：“为什么说‘长开眼’？”我当时真是瞠目结舌，讷讷不能对。先生又问了几个同学，皆不能答。先生乃从“鲽鱼眼长开”说起，谓元稹表示将不再娶之意。此事距今已历四十六年，每一忆及，犹觉愧怍。

还有一件事，深感有负于先生厚望。我在学校副修历史，全从兴趣出发，并无研究历史之志。当时年少不知世事之艰，满脑袋斗争观念，在学校未曾好好读书，以为到社会也无非去斗争。没有想到，一次考试，偶然高分，寅恪先生要我转到历史系去。我以“我不是研究学问的人”为词敬谢。此后，闯荡社会数十年，到了老年，终于改业历史研究，深感为时之晚。

今年 3 月，有广州之行，住中山大学一日，历史系一位教师陪我访寅恪先生故居。一座小楼，清幽可喜，先生在这里度过了晚年，写下了不朽之作。但并非安度，“文革”一起，他就不得安身了，以后终于被赶走。我对这位教师说：“至少应该在楼前竖一牌，写明此为寅恪先生故居。”

先生之学，博大精深，我想到我的两位老师，也是先生的知友之言，录之以为本文之结。

肖公权（迹园）先生去美后，教弟子中有汪荣祖教授者，写《史家陈寅恪》一书竣，结语问道：“前贤已已，典型犹在，后史氏们能否超越前进，较寅老尤更上一层？”汪氏以校稿请正肖先生，肖先生复书云：

> 大著于陈氏之为人治学，述论颇详。渠地下有知，当欣然引足下为“异代”之知己。愚以此公之天赋境遇，均超越一切。其记忆力极强，即古人所谓“过目成诵”。少年时家学渊源既厚，又得机会游学西国，不受一般留学生求学位、计出路之牵绊。又精通中外语文，故能用许多人不能用之史料。其力学之勤，有时到废寝忘食之程度（致种失明之远因）。足下卷末谓：“后史氏们能否超越前进，较寅老尤更上一层？”窃想不易做到耳。
>
> 书中于其“引诗证史”、“从诗看史”之功力，深致赞扬，愚亦有同感。惟窃谓陈氏乃卓绝之史家，然未必为优越诗人。其论诗笺诗，虽多胜义，然以较其在史学上之成就，则殊有逊

色。孔子为稼不如老农，为圃不如老圃，无损于其为圣人。则陈氏纵果非至善至美之诗人及文学批评家，固无损于其为空前绝后之史学家矣。

公权先生一代学者，诗力功底极深，前两年得其弟子陈学霖教授从美国寄来先生所著《迹园诗稿》，读之倾服。公权先生论寅恪先生之诗自有所见，也是以寅恪先生史学与诗学之成就相较而作是言，然寅恪先生之诗出人唐宋，造诣极高，亦世所公认。

与寅恪先生相交最早、相知最深的吴宓（雨僧）先生（寅恪先生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即雨僧先生所荐，雨僧先生为研究院主任。人云荐者为梁启超，乃误传），有如下一段文字：

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以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

肖吴两先生之言，实为公论。胡适之先生于寅恪先生，亦极佩服（具见《胡适日记》），但说“陈先生就是记忆力好”，微含酸葡萄之味，可以不论。至于胡先生认为寅恪先生文章写得不好，则不知先生之文，正是绚烂归于平淡之品了。

1989 年 10 月 27 日

想起了吴雨僧先生

说是“想起了”，并非日常完全置诸脑后，而是近来写《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文，翻检寅恪先生诗作颇多寄怀雨僧先生和与雨僧先生唱和之诗，再查寅恪先生一生事迹，和雨僧先生多有关系。两先生称为知己，怀念所及，感从中来。

今天的青年，恐怕多已不知吴雨僧先生为何人。甚至在文学界，知道雨僧先生的人，恐亦不多。知道的人，也似乎多已淡忘了他。日常阅读报刊文字甚少，只忆前数年《人民日报》有一短文，谈先生对于在大学里建立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建设之功不可殁。其实，先生贡献远不只此。只此一点，说明先生确乎似成历史遗忘了的人。

先生名宓，陕西泾阳人，1918 年留学美国，后复遍游欧美各国。生前历任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等校外文系教授，其中以任清华大学教授时间最长。

我从雨僧先生受业时间只有一年。1944 年，先生离开西南联大，应聘到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我选修了先生的《西洋文学史》一课。之后，先生就转入四川大学任教去了。此后偶尔尚去请益，但接触并不多。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先生一度任教武汉大学。全国解放以前，传闻先生曾萌削发入山之意。不知怎么的，去了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又不知怎么的，竟然放弃了他几十年执教的西洋文学，当了图书馆长。果如此，我想绝非他的本愿。1979 年路经重庆，听西南师范学院一位教师说，先生是在 1977 年含冤去世的。这位教师向我历述“文革”中先生遭遇之苦，受折磨之深，令人不忍卒闻。精神肉体饱受摧残，挨过了“四人帮”的覆灭，终不免于一死。

先生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熏陶于西方文化之中，又热爱中国故有文化传统，国学根底极为深厚，诗作尤名于世，他的思想感情，无论于当世的西方和中国社会，都格格不相入。我以为，他的思想感情，或停留于西方的中世纪中（按先生课堂所教，他以为当称为“中世”，而不能称为“中世纪”，“中世”与“纪”相连为不通），或徘徊于《红楼梦》的大观园里。雨僧先生是《红楼梦》研究名家，他一生迷恋《红楼梦》，以为它是中国最好的小说，甚至是唯一的一部小说。但他不站在《红楼梦》外研究《红楼梦》，而是生活在《红楼梦》世界中，迷恋不能出。他每以妙玉自况，人或笑之。记得一次学校发工资，先生在办公室点数。事后，一位老师说，妙玉是不计身外之物的，吴先生何必如此认真。其实，雨僧先生毕竟是要生活的。但先生确实不知如何生活。思想感情既与现实相隔离，生活上亦复难以自理。先生与妻离异多年，长年是孤身一人在外生活。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就和我们学生同住于华阳县文庙中，不过他独居一室而已。每见他踽踽独行，对身边人与事概无所见，不时口中喃喃自语，我心中总有说不出的感触。他不是现实社会中人。他生活得太痛苦了。四川多老鼠，人皆不以为异。一次我入厕，是夜停电，朦胧难辨周围，忽闻有人声，连呼“打死它，打死它”，声带恐惧之情，我听出是先生声音，告诉他不要怕。先生说：“太可怕了！”

先生的思想感情难以令人理解，其痛苦便深不能去。他早年出于同情而爱上了毛彦文，这是先生所说的柏拉图式的恋爱，俗人不能理解。孰知毛后嫁给了年龄相差 33 岁的国务总理熊希龄（秉三），此事大伤先生之心，更感孤独。先生的学生、剧作家李健吾，以此事写成话剧《新学究》，从而嘲讽之。先生确乎有新学究之气，但我以为做此事有失忠厚之道，更非学生所应

为。1946 年，在上海我偶对李健吾先生言及此意，李先生仍不无自得，说他很了解雨僧先生。甚至说：“ 我把他写活了。 ”嘲弄老师的痛苦，实在是并不了解老师。

先生与梅光迪、胡先驌诸先生创《学衡》杂志，以《学衡》派名于世，其反对白话文与新文学，成了文学史上一桩大公案。我们不能为贤者讳，《学衡》派在文学主张上确有守旧之处，然不能以此为一人及同侪诸人一生功过定论。梅光迪、胡先驌诸先生皆各有所长和贡献，雨僧先生亦然。且雨僧先生的乐道之心，敬业之诚，确应永为世法。

于西洋文学，先生有极深造诣。先生讲《西洋文学史》，不用讲义，从头到尾，以英语讲述，不看一本书一个字，熟极而透。记得他对《浮士德》，赞赏备至，一提起靡菲斯特，其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先生生平写格律诗最多，诗学功底极深，平生寄怀多在诗中。茅盾《回忆录》曾说，《子夜》出，第一篇评论《子夜》且予以甚高评价之作，出于先生（当然是用文言写的）。此事大出茅盾意料，我们这些后辈自然更没有想到。受教于先生之时，从未闻先生对新文学及白话文有所议论，平时言谈，从未说到当年《学衡》与新文学界的争论，也从未听他说起曾为文推荐《子夜》。我想，先生绝非改变了初衷，可能是以为此皆过去之事，不在他的意中了。只是在讲述中推崇白璧德，使我想起了鲁迅当年讽刺“ 白璧德的高足 ”事。尽管鲁迅所指非先生，而先生确为白璧德高足。

先生研究《红》学，学生皆极仰慕。记得一次他对全校作学术演讲，题目是谈《红楼梦》的回目。所着意讲的，是对对子之学。哪些回目对子好，哪些差，娓娓而谈，回目背得烂熟，皆信口而出，无一纸笔记。对对子是一项今天听来似无用处的旧套，其实，先生深意如同其挚友陈寅恪先生所主张，对对子是测验中国语文基本功的最好之法，寅恪先生曾在《致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有长篇评论。那是 1933 年，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拟定招生国文试题，题中有以“ 孙行者 ”为题命对。一时群情大哗，寅恪先生乃致书刘文典（叔雅）先生论其用意。寅恪先生意中最佳之对为“ 胡适之 ”。“ 盖猢狲乃猿猴，而‘ 行者 ’与‘ 适之 ’意义音韵皆可相对 ”。寅恪先生此对原有所本，他说：“ 苏东坡诗有‘ 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 ’一联，‘ 韩卢 ’为犬名（见《战国策 · 齐策》及《史记 · 范雎传》），‘ 行 ’与‘ 退 ’皆步履进退之词，‘ 者 ’与‘ 之 ’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 ”于此，可见对对子是颇有学问之事。陈吴二先生所见相同。

雨僧先生为我国学术界立的第一功劳，我以为应推雨僧先生荐寅恪先生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5 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雨僧先生为研究院主任，为荐寅恪先生任教（翌年到校。外传系梁启超所荐，误）。《吴宓文集》有如下一段文字：“ 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 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 ”寅恪先生初上讲坛，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先生并称为四大导师，自 1925 年至 1930 年国学研究院停办，五年之间，诸导师为中国文史之学培养了数十位卓有贡献的知名学者，此为世所公认。雨僧先生于 1927 年离研究院主任职，而其识人推荐之力和担任主任折衷樽俎之功，是中国学术界所不可忘的。

陈吴两先生相交逾五十年，切磋学问，至于晚年，寅恪先生之诗作多有散佚，多赖雨僧先生录存保留。雨僧先生对寅恪先生诗作了解最深，每有批

注，能得其神。学人之风，君子之德，后学皆引为楷模。

寅恪先生以一代大师在“文革”中折磨至死，雨僧先生思想感情本不合于今世，被迫废其所学，管理图书，其痛苦可想而知。我为两先生泣，为中国学术泣。

雨僧先生赠寅恪先生诗甚多，仅录两首以见二先生相知之深：

经年瀛海盼音尘，握手犹思异国春。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溷残英怨水滨。灿灿池荷开正好，名园合与寄吟身。

国伤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

匆写此文毕，瘦骨嶙峋，光头少发，终年着长袍，孑然一身的“古人”吴雨僧先生，如在眼前，一个不容于时、不合于世的孤苦学者。

1989 年 11 月 3 日

校后附记：近年，吴先生的著作和研究吴先生的著作与论文，出版、发表渐多，研究吴先生的中西文学的学术讨论会也举行了多次，令人高兴。一个为世遗忘多年的学者还是被大家记起来了，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1994 年 9 月 5 日

周太玄“法师”杂忆

吾乡周太玄先生是一代通才，他是著名的科学家，中国早期青年运动的倡导者、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又是政论家和教育家，早在 20 年代还是一位诗人。郭沫若笔下如是写周太玄先生：“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他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做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文章。”这写的是清末郭老与之同在成都石室中学（时称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同学的青年周太玄先生，此后成就自然远远超乎郭老笔下所写。40 年代末，香港《大公报》同人则称周太玄先生为太玄“法师”，王芸生先生一味兴起，还戏称之为周和尚。

这是什么缘故？进入中年以后，周太玄先生好佛理，精研佛经典籍，从著名的能海大师学。能海法师原为四川一位军人，全国解放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圆寂于五台山，至今山上有骨塔焉。太玄先生既悟法，极尊能海法师之学，30 年代末至 40 年代初，能海法师讲经于成都文殊院和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先生与令兄著名地质学家晓和先生，每日前去虔诚听讲，风雨不辍。其时我尚读书，从中学以至大学，读过太玄先生文章，心仪久矣，曾因偶然得见先生，而先生不之我识。不只一次，我在少城公园得见先生昆仲听讲归去，步行园中，其虔诚肃穆的形象，历四十余年而未忘。两先生相貌极相似，高矮相若，头均微秃，穿着一样，均服蓝布长衫，手执黑布雨伞以代杖，并肩而行，步履相齐，形容肃然。文殊院在城北，少城公园居城南，无论南北二先生均是步行来去。虔诚苦行，小子见而生敬。

1948 年底，太玄先生终以多年《大公报》客卿的关系，担任了香港《大公报》顾问，在董理报社大政方针之余，常和我们谈禅理。我们自然是似懂非懂，而先生总是严肃认真而又虔诚地娓娓道来，绝不敷衍了事。我们几个青年人，少不更事，有时听了，还似笑非笑，先生自然明白我们用意，亦不以为忤，照样严肃认真讲来。同人中除费公彝民似乎颇有所悟外，能与先生对谈禅理者只有陈凡老兄。先生讲佛，口头语中常用“快乐”、“配合”二词。先生说，学佛法讲究配合，理性配合，心之所思与行之所为配合，万物配合，那就是一致，就会感到快乐。先生每日坚持静坐，四川话叫做打坐。先生清心寡欲，每天只日中一食，这是学佛的人所应做到的。先生常说：“打坐入定，真是快乐呀，快乐！”先生与我为小同乡（近见先生哲嗣孟璞、仲璧昆仲与刘恩义君合写的《一代通才的科学家周太玄》，始知先生祖籍河南祥符，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周亮工之后），我学他说话，自能入神。时报中同人每有集会，茶饭之际，费公彝民每要我学太玄先生口语，并仿学费公自己的夸张动作，我不能却，静坐而语曰：“配合，快乐呀，快乐！”第一个笑起来的，往往是太玄先生。

据孟璞、仲璧文，先生原名怜惜　，字朗宣，后改名无，字太玄，赴法国留学后，废名而以字行。名字相连，本为传统方式，先生易此名与字，未知其所本，也许从《易经》衍化，是否年轻时代受虚无主义思想影响，亦所未知。先生青年时代的思想极为活跃，为时代的先锋，开风气的先河。最著者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及参与华法教育会选派留法勤工俭学人员。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共七人，最主要的人，是太玄先生和他的知友王光祈，加上李大钊。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于 1919 年 7 月，早在两年前，先生在北京任职于《京华日报》和《中华新报》时，即与王光祈和李大钊多所商议，决定成立此会。发起人会议于 1918 年 6 月 30 日在北京宣武门外岳云别墅举行，

推定王光祈任书记，李大钊任编辑，先生任文牍。先生后来为文追忆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的动因说：“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发起人会议时，所定宗旨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成立大会上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其精神是一致的。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社团之一，其成员遍布国内外，总会设于北京，国内一些地方设有分会。1921 年 3 月，又于巴黎成立分会，太玄先生当选书记，会员之在国外者，均由巴黎分会联系，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当时来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皆一时青年之精英，后来成员思想分化，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等一批人成为共产主义者，曾琦、左舜生、魏嗣銮（即魏时珍）等一批人成为国家主义派，然在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之时，则不能不说有一致的拯国家于水火的思想。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与周恩来宴请民主人士，太玄先生被邀三次参与。席间，毛泽东主席曾询问太玄先生，能否恢复少年中国学会，其言也许有因，也许纯为怀旧，就不得而知了。

先生早有赴法意愿，初在北京，经吴玉章介绍，入华法教育会学习法文。1919 年 1 月赴法之后，曾与李璜（字幼椿，后为青年党党魁）、李劼人（后为著名文学家）共办巴黎通信社，把巴黎和会不利于中国的事实尽快传到国内。后又创办《旅欧周刊》（想来必得到华法教育会李石曾、蔡元培等的支持），提倡勤工俭学，宣传工读主义。继又与李立三、赵世炎合办《华工周刊》，于在法华工遭际，多所维护。先生初在法国学教育学，得蒙彼利埃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继入巴黎大学研究院学生物学，成绩优异，发表论文及报告多篇，于 1930 年被授予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1930 年 11 月，先生归国返川，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动物学讲座教授的名义，同时在成都大学及成都师范大学任教，翌年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先生出任教授，并兼理学院长与生物系主任。1936 年重游欧陆，多有文章发表于《东方杂志》及《大公报》。开此一张清单，以明先生前半生之大略。于此，可以看出先生经世及治学所诲之广，思想之活跃。

这里，应该写到先生和《大公报》的关系。先生与张季鸾先生有旧，和胡政之先生关系尤深。先生曾在上海中国公学就读五年卒业，胡政之先生曾在中国公学任教，于先生有师生之谊，但我不知道，究竟胡政之先生是否教过太玄先生。太玄先生很敬重胡政之先生，胡先生亦甚尊重太玄先生。《大公报》星期论文的一位主要作者就是太玄先生，据说胡先生经常以办报所涉问题征询太玄先生意见。多年以来，太玄先生于《大公报》，似乎处于客卿地位。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上海《大公报》的《新思潮》周刊，曾由太玄先生主编。

记得 1947 年先生由成都来上海，住在南京路《大公报》经理部三楼胡政之先生办公室甚久，隔室就是我在那里工作的采访课，日见先生出入。一日登门求见，我想先生自然不知道我，自报家门之后，接着说我是先生的学生刘芃如的好朋友。不料先生说：“我知道你。你在《新世纪丛刊》写过文章。”此言一出，我不禁愧然。那是 1945 年，先生在成都与张友渔、黄药眠、沈志远等先生创办新世纪学会，出版《新世纪丛刊》。黄药眠大师忽然要我写一篇论战后处置德国问题的文章，我于国际问题几无所知，何敢命笔。一再推

谢，黄大师不许，告诉我英国新闻处有资料，去查阅整理即可，并指示了一番大意。我勉力写成，黄大师总算同意了我的话，说我确非写国际问题文章之材。文章经黄大师修改后，发表于《新世纪丛刊》第一辑，从此决心不再写这类文章。太玄先生提到这篇不及格的文章，我怎不脸红。此次与先生初谈，虽所涉不深，只是先生谈了些对时局的看法和在上海的行止，并嘱我为安排会见几位他指名的文化界人士，然于先生的学者气质、长者风度，深所不忘。

1948 年 10 月，我到香港，不久之后，太玄先生也来了，正式“下海”，为香港《大公报》顾问。紧接着，杨东莼先生亦任香港《大公报》顾问。周、杨两先生为知友，我估计，是太玄先生推荐东莼先生来的。香港《大公报》之完全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报社上层决策言，太玄、东莼两先生的功绩，是一因素。周、杨两先生、王芸老、费公彝民、杨刚大姐，均逝矣，《大公报》内旧人明白此中原委者，只余李纯青公一人了。李公多病，不能命文，那么，这段史实或将湮没不明了。

太玄先生在港期间，寓六国饭店。先生夫人王耀群女士是四川留法勤工俭读学生，英年早逝，所遗子女五人，先生父兼母职，抚养成人。先生伉俪情深，多年未再娶，独居静坐，已成素习。这时还是一人在港。住六国饭店，是《大公报》对先生的优待。时《大公报》物质条件极差，宿舍既极挤塞，报社办公只有一间房子，白天供经理部及编辑部日班人员办公，夜间作编辑部之用，要举行一个会议也很困难，有些会议便在太玄先生住处召开。前几年常去香港，这个饭店尚存，自然是陈旧不堪了。近年，原址推倒重造，焕然一新。

在港之际，先生潜心学习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著作。据孟璞告，时先生常写信告诸子以学习心得，有的信谈自然辩证法，并云佛学中有辩证之理。于报社工作，先生除了参与决策、写文章之外，还和杨东莼先生辅导同人学习。时报社同人有一学习组织，我记得为此组织演讲的第一位是夏公（衍），第二位为东莼先生，太玄先生是第三位。只记得三位讲学之风度与方法绝然不同，夏公是深入浅出，切中实际；杨东老则轶闻掌故不绝，引古证今，妙趣横生；太玄先生则多作理性探讨，不失哲人风度，当然不是谈禅了。

1949 年 6 月我回上海后，太玄先生尚留香港，此后未再见一面。如果要报先生解放后的经历，听起来似乎也堂而皇之：荣誉名称上，他是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特邀代表，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行政职务，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及所属文教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 年调北京后，所历职务为中国科学院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后又兼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但是，我总感觉太玄先生似乎沉寂了，好像没有见到他发表什么文章，现在看见他的哲嗣昆仲文章所列举先生译著十一种之目，都是 20 年代至 40 年代所出版。又风闻先生时与旧友周恩来先生泛舟昆明湖，倾诉心曲，并求教正。我不明白先生所思所想，也不知道他是否还学佛谈禅。虽然我不敢说“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但毕竟听不见先生的声音了。作为晚辈，我为先生感到欣慰的是，经过多年独居生活之后，先生结婚了，新夫人喻培厚女士，乃堂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大将军喻培伦之妹，喻女士在 40 年代末任国民党政府苏浙皖监察使之时，我曾有一面之缘。老友陈凡，“文革”前每自港赴京，总往拜谒周太玄先生，他以四川话效喻女士之言曰：“我这辈

子有两件事做对了，一件是跟共产党走，一件是嫁给了周太玄。”以喻女士之乐，推而及之于太玄先生，则太玄先生晚年得佳偶，当可稍慰其寂寥了。

于太玄先生敬而佩之，爰作是文。抑更有补者，只是前几年，我方才知道，我早已成为太玄先生的亲戚。太玄先生长公子孟璞娶了我的表外甥女陈菊元为妻。只是他们夫妇向居成都，我无所知。前数年，孟璞、菊元夫妇短期作客香港，我才在港数晤孟璞。一见其人之貌，恍如见了太玄先生；听其谈吐气质，更使我想到了太玄先生。

前辈风范，典型犹在。此文未能描述其万一。

1989 年 12 月 8 日

附记：文中所记太玄先生生平，采自周孟璞、周仲璧、刘恩义《一代通才的科学家周太玄》，载《四川近代文化人物》，未参照他书。曾听孟璞言，有人写了一本《周太玄传》，未及见。

又记：前年刘恩义女士来沪过我，赠其所著厚厚一册《周太玄传》，读之更增神思长者之心。

1996 年 8 月 10 日

张东荪先生记微

一年以前，姜义华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进行论文答辩，其中一位的论文题目是张东苏先生思想研究。从历史上突然消逝了 40 年，且消逝之因局外人近于不明，消逝之后行踪更所不知，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有人来做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把历史的空白填补起来，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杨国强近在《学术季刊》发表文章论述 20 年代初期社会主义讨论的历史，评论了张东荪先生；《读书》杂志张汝伦之文，则着意介绍张东荪先生的哲学观，二文均为填空白之作。张汝伦对于张中行先生的《张东荪》文，有语焉不详之憾。我写这篇短文，语焉将更不详，盖不知也。只是识小事二件，也许从中可以窥见张东荪先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思想。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分别囚禁在北平和天津日本监牢里长达四年的燕京大学中外籍教授自然出狱，其中有两位，为时不久后分别先到了重庆，后到了成都，那就是校务长司徒雷登和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按校务长一词，英文为 Chancellor，在美国某些大学即为校长，英国某些大学或为名誉校长，或为校长。国民政府收回教育主权之时规定，所有教会大学的外国籍校长都必须换为中国人。燕京大学乃易校长为吴雷川翰林，司徒雷登改称校务长。实际换汤不换药。这颇有一点像上海公共租界的最高行政机构在英文为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词义很明白，在中文却叫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名称工部局，和中国明清两代的工部之称相含混，以此愚弄中国人。校务长也就有点像教务长这个名称，实则一字之别，天上地下。）他们两位都是监牢里出来的英雄，确乎狱中表现可称坚贞不屈，自然分别在重庆和成都受到欢迎。司徒雷登还和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见了面，自然也和蒋介石会面。据称，毛泽东对司徒雷登说：“你有很多学生在我们那里。”（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其时正值学生运动、民主运动高涨之际，司徒雷登在成都燕京大学全校师生的欢迎大会上做了讲演。中心是赞扬中国的学生运动，词中颇有精辟之处，他以为中国的学生运动在全世界有独一无二的可贵之处，那就是和商人、工人、店员等的市民运动相结合，发而为巨大的力量。他以“五四”、“五卅”等为例讲起，滔滔不绝，全场鼓掌称是。事过四十八年，我对此记忆犹新，因当时写了一篇长文记其事，载于以进步著称的《华西晚报》。现在附记此事，表明历史如此。1946 年 6 月后，司徒雷登做了美国驻华大使，执行的自然是美国对华政策，和他本人虽有联系，亦有区别。

话题回到张东荪先生。他在重庆的活动我不能详，只时见报载，投身于民主活动中，为民盟的活跃人物。张先生到成都，自然也到燕京大学来了。他对全校学生做了演讲。今已不能忆其所说，但他丝毫没有讲哲学，也没有发挥他研究有素的民主学说，他所讲是时局。只记得，以其雄辩之才，分析中国出路何在，中心不外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当时的张东荪先生，颇露踌躇满志昂扬奋发之气，我们学生听了也是深受鼓舞的。附带想到，张先生去了不久，梁漱溟先生来成都。梁先生时为民盟领导人物，此来或与民盟政务有关，住在民盟市委组织部长张志和先生家里（张志和先生为川军刘文辉部下师长，本人实是中共地下党员。后为“右派分子，”“文革”中惨死）。我校学生自治会要请梁先生来校演讲，因我与张志和先生相识，乃写一信与张志和先生，求转恳梁先生，允学生自治会所请。梁先生的演讲，调子较张东荪先生为低，表现了相当的冷静。其时正当苏联军队接收东北搬走器材之

际，并盛传苏军打死我工程师张苹夫，因而内地一些城市爆发了反苏游行。演讲毕提问，有人问及此事，本意想借梁先生的回答以证明张苹夫事件为国民党所伪造，藉以批判反苏运动。梁先生却冷冷地回答说：“ 不清楚。苏联军队，很粗吧。 ”算是浇了一勺冷水。我们这些自命左派学生，大失所望。历史终于证明，梁先生所言不虚，而且他答问时已作大量保留，我们这些人当年何其天真！反过来看张东荪先生，彼时正是热得很。

众所周知，张东荪先生和张君劢是多年至交，同出研究系，政治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多相近，又同为民社党党魁。至国大召开，民社党与青年党入阁，张东荪先生毅然退出民社党，并与张君劢割席绝交。时人壮之。此亦张东荪先生之热也。

不忆是 1946 年还是 1947 年，张先生来上海，我们同学数人宴之于一福建籍同学家中，烧的是福建菜。我们还邀了同为燕大著名教师的沈体兰先生作陪。大家所关心的是政局。希望能从张先生口中得知一些消息，并聆听他的分析。张先生依然甚热，慷慨激烈，多豪爽之语，满斗争之词。想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张先生曾经鼓吹社会主义，以致维金斯基代表第三国际于 1920 年来华时，曾和张先生晤谈数次，结果却是不欢而散。因为其时张先生已经远离社会主义而大张资本主义的旗帜了。则二十余年之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张先生热衷政治，赞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憧憬中国共产党所希冀与奋斗的未来，也就是张中行先生文中所谓的“ 不忘朝市 ”，当又回到了他早年为之鼓吹的社会主义。其然欤！

于是，当 1952 年大学教授思想改造运动方起之际，忽闻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仍兼燕京大学教授的张东荪先生“ 出事了 ”，且语焉不详，不免一惊。然当此时，如我这样的所称革命青年，是必然相信与不容不信果有其事的。和张东荪先生出事连在一起的，赫然还有燕京大学末位校长陆志韦先生在焉。记得第一个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沈体兰先生，沈先生自然也一样的不甚清楚其事。

此后多年，陆志韦先生在报章上渐多露面，且出版了他的著作，张东荪先生则真正消失了。只是偶见海外及港台文章提到他，有人把他归入新儒家。姜义华的弟子对我有所言，张东荪先生所出之“ 事 ”果如何，吾仍不得而知焉。只是谈到张先生子女诸人的遭际，则不能无感。张先生诸子女皆为甚有成就的科学家，为张先生事颇受株连。诸人中，我只知道张先生长子宗炳先生，我负芨燕京大学时，他是生物系主任，同时兼华西大学教职，不常来燕大。其人美姿容，除身材瘦长与张先生相近，和张先生之喜着长衫迥异，穿着当时颇时髦的西服，戴狭盘小礼帽，帽上且有一羽毛为饰，态度极为潇洒。我没有读他的课，据生物系同学言，张宗炳先生冰雪聪明，IQ（今世称作智商）极高。张东荪先生另一子宗燧，著名科学家、教授，是自杀死的。张东荪先生一家皆学人，乃兄张孟劬（尔田）先生，亦著名学者，张先生多受其教。

我的语焉不详的短文，到此为止。

1993 年 12 月

漫记萧公权先生

《读书》编辑南来，过舍漫谈，偶言及萧公权先生，说是问过学界数人，皆未详萧先生其人其学。言下不胜感慨。其实，这不足为异。萧公权先生早岁游学美国，1926 年返国执教，至抗日战争前之十年，多在清华。抗战事发，辗转入蜀，十年之间（1937 至 1947），定居成都，执教光华、燕京、四川三大学，间赴江津白沙，于役国立编译馆。此二十年间，虽盛名早著，学界中人，鲜有不知迹园萧公权先生者。然时至今日，此等人或早作古，或不闻问学术中事了，中青年之人，自然不知萧公权先生为何许人。1947 年萧先生由成都赴南京，似执教中央政治学校，1948 年初秋去台湾，未经年而赴美，从此一住三十三年，于 1967 年以七十之年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退休，1981 年以八十四岁高龄逝世。三十三年间，萧公权先生在西方学术界大名更彰，声誉更隆，其著作多有公认为研究中国历史、社会之经典者。尽管这些年中西学术多有沟通交流，毕竟彼此都不免或多或少地雾里看花，中西汉学家相对，有时真真幻幻，难解三昧。于是，中国学者之不知迹园萧公权先生，就更不足为异了。学术断层，后生不知先儒，似成常事，今日来谈一代通儒萧公权先生，近乎发掘出土文物，不免怆然。

我其实并不是写这篇文章的恰当人选。在大学里只旁听了萧先生的课，为时甚短。公权先生令弟公逊先生是我中学的训育主任，兼教三民主义课，我对公逊先生远比对公权先生熟悉。十年前读过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1988 年初，公权先生晚年高弟陈学霖教授寄赠公权先生诗词集《小桐阴馆诗词》。手边就只有公权先生这两部书，重读一过，偶溯往事，写此短文，谓之曰“ 漫记 ”。

1983 年 5 月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萧公权全集》凡共九册，依照编次列目如下：《全集》之一为先生的自传、书信和谈话录，先生自定名为《道高犹许后生闻》。此句取自先生 1944 年赠挚友吴宓（雨僧）先生诗，诗题《雨僧移讲成都赋赠二首》，下注“ 雨僧去岁五十初度 ”两律自是佳构，而对雨僧先生之守道安贫，潜心诗文，极怀敬意，爰全引如下：

> 鬓霜剑外乍添丝，守道身严似旧时。移座倾谈心曲语，启囊亲检别来诗。尘劳愧我仍无状，天命知君已不疑。杜陆遐踪今有继。风流儒雅亦吾师。（自注：借用杜句）
>
> 孤怀卓荦任斯文，笔振寒辉破俗氛。诗健别从新境辟，道高犹许后生闻。人居槛外清于水，女出东门乱似云。莫恨空轩归不去，梦中梅影自缤纷。（自注：槛外、空轩本事，均见《吴宓诗集》）

关于雨僧先生，我别有一文《想起了吴雨僧先生》，载拙集《往事如烟怀逝者》，于雨僧先生之孤怀守道、不合于时略有所记。公权先生称道雨僧先生“ 道高犹许后生闻 ”虽述其实，然终竟是后生不得闻，这已是时代的悲哀，不只是萧吴两先生的寂寞了。雨僧先生称许《红楼梦》，而以妙玉自况，俗人不解，公权先生评之曰“ 人居槛外清于水 ”，可谓洞彻明达，深知雨僧先生者。

《全集》之二就是我手头这本《小桐阴馆诗词》。先生有《桐阴》一律，题下自注云：“ 成都离庐庭中有稚桐数株，颇饶清致，辟小室为读书之所，颜曰小桐阴馆，走笔记之。 ”（诗略）成都十年，先生为学为诗，声闻海内，虽在乱离之中，精神亦最振奋，其情景迄老不忘，晚年整理吟咏所得，乃以

馆名诗词集。集采编年体，诗词分列，各为编集，每集另有题名。诗远多于词，约占全书 436 页之四分其三。书手多人分别抄写，影印成书。此集出版之前，曾在台北出版《迹园诗稿》，在香港出版《画梦词》。《小桐阴馆诗词》合诗词为一集，集末附录《唾余集》，实别开生面之作，先生题记云：“长夏苦热，偶读英国近代诗选，其中有与五代、两宋词境相邻者，爰意译之，凡令、慢二十余阕。郢书燕说，贻笑方家，买椟还珠，唐突作者，题曰《唾余》，以志惶恐。”译作后附英诗原文。

先生为学人，为通人，亦为诗人。诗词包罗极广，大抵早岁之作，多咏景状物；中岁以后，多怀友论学、感时咏史，同道唱和。读之以诗，则美感纷陈；视之以史，则活脱社会，间亦有戏谑之诗，多嘲公逊先生者，如戏公逊先生蓄髭、留须、秃顶、饮酒诸作，具见友于之情，而使我回头看五十余年前的公逊先生，顿然重现一片童心。戏公逊先生落发留髭有句云：“台城家法难哉饿，鹫岭宗风秃者尊”，令人发噱，亦使我忆起公逊先生未四十而顶秃之状。公逊先生堂堂训育主任，而绝无俨然之状，与学生甚融洽，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学生，不谙师道尊严，常与公逊先生开玩笑，甚至直面呼之曰萧老头。一次我酒醉，对公逊先生极不礼貌，公逊先生亦不以为忤，只是淡说一句：应该少喝一点。读公权先生诗，方知公逊先生亦好饮，且有一套理论。《戏公逊》言公逊先生病牙，公权先生以为“恐为饮过度，止酒当可瘳”，殊知“仲氏（指公逊先生）曰否否，此论乏根据。只有饥肠鸣，难闻酒肠蠹。”公逊先生以为牙病之由，乃在“久聆无味谈，喋喋还絮絮。入耳纷咿哑，重重积垢污。抑郁乃发声，一发不可住。但须枕清流，痛饮三斗醋。”看似玩笑语，实寓深意。三斗醋典出陈简斋诗“宁饮三斗醋，有耳不听无味句”，公权先生用之以讽世。

集中怀人及相与唱和者，最多为朱自清（佩弦）先生，次为吴雨僧先生。二次赴美后，则与先生之忘年交周策纵先生多有唱和。间亦附朱佩弦先生和诗或朱对先生诗所作评语。周策纵先生为《小桐阴馆诗词》写有一《序》，谓“缘迹园所作，虽恪遵旧体，时驱故言，然其胜篇警句，无不意新境深，格高调寒，言外不尽，可与古来佳作并美。”可谓知言。

兹录先生分挽朱佩弦、闻一多、陈独秀三先生诗于后，以见先生眼中之三先生。

朱自清教授挽诗

千古文章事，君能一手当。千种文人苦，君愿一身尝。

接物见肝胆，落笔摇精芒。袭以温润德，澄渊涵素光。

岂知造化儿，生才还相妨。深忧激高怀，并作形骸殃。

兵乱与贫病，纷沓相贼戕。伤哉拂云干，摧折随风霜。

昔日唱酬乐，追思回我肠。零落检遗篇，展诵泪浪浪。

挽闻一多教授

（自注：一多避兵居滇，屡纵谈时事，无所顾忌。丙戌六月十七日，遇狙殒命。平日说楚辞新解，络绎所作，死水诗为治新体文学者所称道。）

危言抗议震清流，狷极甘心与俗仇。岂冀怜才飞鹗表，不辞据乱学麟游。离骚别解惊人语，死水新篇刻骨忧。正气何妨偏处见，舍生成祸亦千秋。

陈独秀挽诗

事业文章欲两兼，勇能赴火怯趋炎。见偏直为忧心过，身系难逃党禁严。百口人间称字说，一时海内亦民瞻。盖棺宜用蒙庄论，仁义残生盗跖廉。

先生笃于情者也，晚岁居美，时怀故人之思，集中有一绝题为《乙卯冬日王正义寄赠雨僧诗文集重印本，展卷怅然，口占绝句，即题卷尾》。句云：

展卷低吟句尚新，不堪回首想前尘。江山改色人何在？花落空轩四十春。其时雨僧先生已被折磨以死，空轩不复在，荷声藤影之馆亦无从得觅了。哀哉学人！

《全集》之三为《政治多元论》，系先生在美之博士论文，译为中文出版。《全集》之五为英文著作《翁同龢与戊戌维新》，原刊于《清华学报》新一卷二期，现亦译为中文出版。《全集》之六为英文专著《19 世纪之中国乡村》，《全集》之七为英文专著《康有为研究》，此两种亦译为中文出版。《全集》之八《宪政与民主》为先生论政之作，1948 年曾出版于上海。《全集》之九《迹园文录》，收先生中文杂著及中译英文论著共二篇，末附《萧公权先生全集未收论著目录》，因散见于中外报章杂志之著作，网罗非易，此处特将未收英文短篇论文存目。以上各集我均未见，曾闻西方学者言，先生著作中最负盛名者为《19 世纪之中国乡村》，被誉为经典之作。日尝偶读西方汉学家论著，见多有引《19 世纪之中国乡村》以为佐证，亦可以概见。而先生之《政治多元论》为论述近代西方政治原理之作，1926 年于康乃尔大学毕业时完成，翌年即在伦敦出版，数年之间，佳评如潮。博士论文得此荣誉，就我所知，国人中只有萧先生和李方桂先生。先生本治政治学，后兼及于史，所开课已逸出政治学范畴，而及于政治思想史、文化史等，是以为通儒也。

现在回过头来谈《全集》之四《中国政治思想史》。此书于 1945 年曾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我所有的两卷本系文化大学 1980 年在台北出版的新一版。全书起于先秦，止于孙中山，共 80 万言。唯孙中山一编原稿佚落，只存其目。本书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述晚周以来 2500 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体例则以时代为经，派别为纬，而以各时代有代表性之人物贯穿之。其所以取起自先秦（晚周），先生有说，以为政治思想适于此时突然发展，其发展原因有二：即社会组织此时迅速变迁，伟大思想家适生其会。先生持论一反中国政治思想历久顿滞之说，而以为中国政论曾经显著变化。循其变化起伏之迹，先生便将此 2000 余年的思想史分列为四大段落，即：（一）创造时期，自孔子降生至始皇统一，为时约 300 年。（二）因袭时期，自秦汉至宋元，为时约 1600 年。（三）转变时期，自明初至清末，为时约 500 年。（四）成熟时期，自三民主义之成立以迄于今。

定先秦为创造时期，先生以为，先秦诸子之学虽悉有渊源，非尽出心裁，凭空立说，然此等旧说，原来既乏系统，含义亦较简单，诸大家发挥董理，融旧铸新，实无愧于创造。且，无论诸子学说来源如何，其本身实“自我作古”，开后学之宗派。先生总结之曰：“秦汉以至宋元之政治思想虽不乏新意义新内容，而其主要之观点与基本之内容，终不能完全越出先秦之范围。必俟明清通海以后，外学输入，然后思想为之丕变。……总之，先秦思想，对春秋以前为融旧铸新，对秦汉以后为开宗立范，创造之名，由此而立，或不至于大误。”这是先生为全书所立大纲。此纲立，循而下之，源流变化皆可立解。定秦汉以迄宋元为因袭时期，先生并不是说此时期悉出模仿，事实上是不必有变古之名，而每有变古之实。然此时期之政治思想，远不如先秦之富于创造精神，而思想家亦多无意于创造，因以因袭名之。还有一个重要

现象，先秦诸子各自相攻，至秦汉以后，则趋互相折衷调和，而寝有学术混同之势。“思想之内容虽随时代而屡变，其大体则先秦之旧。绝对创新之成分，极为罕见。”定明清两朝思想演变为转变时期，先生以为明代以至清初不过略见转变之端，除旧更新之大转变，要直至晚清然后发动。这自然是西学东渐的影响。从太平天国到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受西方影响，与二千余年传统思想相对抗。先生在此，阐明维新、革命诸家之接受传统旧学说之一部分，谓是自立标准，与传统之古圣先贤思想无关。对于这点，我以为先生之说稍嫌绝对，实则中西比附，乃对西学之不甚了了，弄得不好，以西方之新复中国之旧，也是可能的。先生对第四期的论断是：“辛亥革命为转变时期之结局，亦为成熟时期之起点。”2000 余年之政治思想，至孙中山之三民五权学说，乃臻成熟之境。

秉以上 2000 余年思想演变大势而分为四期之说,先生进而就思想之历史背景，分为三时期，即：（一）封建天下之思想，包括春秋战国时代，与上述之创造时期相当。（二）专制天下之思想，包括秦汉至明清共 2000 年，与因袭时期及转变时期之前大部分相当。（三）近代国家之思想，包括清末戊戌维新时代及辛亥革命以迄今日，与转变时期之后部及成熟时期相当。尽管先生之作是一家之言，有了上述的纲，可谓高屋建瓴，于是，读是书，可以贯通二字出之。应该感谢先生旅美后之门人汪荣祖教授，倾其心力，编成《萧公权先生全集》，使后生得闻大儒之学。

先生中等身材，与公逊先生容貌极相似，讲普通话而带浓厚的四川音，我过去以为先生乃四川人，后方知先生一家乃江西泰和之世家，先生祖父星北公任教谕于大庾县，因家焉，先生丁酉（1897 年）仲冬生于大庾。家学渊源，少年负芨上海，出三峡即多诗作，终身不辍作。回想先生任教燕京大学之时，正好陈寅恪先生、吴雨僧先生、李方桂先生亦同时在，可并称为四大师。我选读了寅恪先生前后所开四门课，选读了雨僧先生的《西洋文学史》，也选读了方桂先生的《语言学》，唯独于公权先生之《中国政治思想史》只曾旁听多次而未列入学分，回想前尘，后悔无及。当然，又有一解，那时我和同学少年辈，以革命左派自视，沉溺于斗争之思想与实际，傲岸自得，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为，端在于斗争，真是读书无用论的先辈，是以即使当时也从头到尾读公权先生课，恐亦终无所得。想其时，寅恪先生课上座席皆满，先生细语娓娓，真能听懂者并不多。雨僧、方桂二先生课，皆在小教室，听者并不多，但都很专心，方桂先生之夫人徐樱师母始终来听雨僧先生课。公权先生授课则在可容二百人之礼堂，先生声若洪钟，讲解入微，听者动容。此情此景犹如昨日，而四先生都去了，寅恪、雨僧二先生守道以终，晚景令人欲哭无泪。方桂、公权二先生均在美获令名，登寿考，方桂先生为全美语言学会会长多年，学术声望之高，与同辈赵元任先生相伯仲。一时四大师，晚年境遇之不同，有若是者！

1992 年 4 月，我在美国，专程去绮色佳，谒我昔年之大学校长梅贻宝先生于康奈尔大学。贻宝先生 92 岁了，耳聪目明，神清气朗，为述当年在极艰苦条件下请来四先生任教经过，并谈及寅恪先生有感于眼睛手术住医院时师生昼夜轮流守护之情，对贻宝先生说：“想不到师道尊严，今日尚存于教会学校之中。”贻宝先生对我说：“办了几十年教育，陈先生这句话，对我是最高奖赏。”不知今之大学校长听了此话有何感想？我欲问。

1992 年 10 月 25 日

记叶圣陶先生

写叶圣陶先生的文章多矣。以我与叶老交往之浅，忽然来写这一篇文章，缘于所见文章，似多侧重于先生的著述和道德，这自然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而于记先生在全国解放前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有所不足，是为一憾。写此短文，记所知二事，以供研究者采择。

其一，1945 年 5 月 4 日，成都各大学学生举行纪念“ 五四 ”营火晚会于著名的华西坝广场，中心内容是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到会的人极多，广场几为之满。当晚的形势极为紧张，早有传说，特务要抓人。会场周围虽不见着制服的军警，大家都知道，必有特务甚众。而广场之侧华西大学办公楼前的小草场，由青年党出面拉起了另一个场面，亦以纪念“ 五四 ”为名，有该党姜蕴刚教授演讲，到会的人数远不足以与广场之众相比，其声势竭矣，然零落的叫声时起，亦足以影响广场的晚会。显然，青年党此举是与国民党相为配合，意在破坏营火晚会的举行。

适得其反，这么一来，更加刺激了到会群众，营火晚会士气大张，开得激昂慷慨。青年党主持的晚会逐渐偃旗息鼓，参加者相率而去。为营火晚会励士气壮声威，居首功者是叶圣陶先生。他是大会邀请的三位演讲人中第一位出场者。叶先生素不擅于作公开演讲，他的苏州官话亦难于听懂，且嗓门较低，这都是对于当晚如此紧张繁嚣的大场面不适宜的。叶先生毅然肯来，虽然大家敬佩和信服他的声望，但对他讲话的效果，则未免有所担心。殊知叶先生竟别出心裁，在会场上高声朗诵了他为这个会议做的一首新诗。叶先生那时似乎很少写新诗，这首诗切合实际，真是雷霆万钧，震天动地，把全场情绪立刻推入高潮。

会场没有搭台，主持人介绍了叶先生后，叶先生步入会场中央，仍然着长衫一件，迎风而立，朗声说：“ 现在是民主时代，皇帝早已打倒。有人要做皇帝，我们不答应。我写了一首诗，现在念给大家听听。 ”此语一出，全场肃静。接着，叶先生高声朗诵了他的诗。全诗不长，只有几句话，今已不能复忆，只记得第一句是：“ 现在，没有什么皇帝不皇帝。 ”叶先生以苏州音将“ 不 ”读成“ 弗 ”，大家居然听懂。叶先生讲话和念诗，不过三五分钟，其效则远过长篇大论的演讲。且矛头所及，直指乘舆，极为尖锐。日常接触，觉叶先生温文尔雅，彬彬君子，没有想到竟亦擅长在稠人广众中以最精练的词句鼓动人心。不忆此诗在当时报纸发表否，编叶先生文集更不知收入否。此是叶先生别具一格之作，应予搜求。

附笔一记，继叶先生而演讲者是加拿大传教士、华西大学教授文幼章（James Endicott）博士，著名的民主运动支持者。叶先生头场唱文戏，文幼章先生二场唱武戏。他以最地道的成都话说：“ 今天有特务在场，为什么不敢站出来。你们有胆就站出来，来和我打架。你们敢吗？…… ”一边说，一边卷衬衫袖口，两手不停挥动。他人高马大，确乎是长靠武生架子。如此一来，全场大乐。会议进行顺利，所谓特殊人物，早已悄悄溜走。文幼章先生后来终以支持共产党之名为他所在的教会解职，归国后从事世界和平工作，为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他的儿子文忠志（Jr.James Endicott）为父亲写了一本厚厚的传记，蒙加拿大巴锐特教授赠我一册，传中多记文先生与中国学生运动及民主运动的关系，闻四川出有译本。第三位演讲人是陈中凡先生。

其二，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成都部分报刊杂志发起了拒绝接

受政府图书杂志报刊检查运动，成立了一个拒检委员会的组织，编辑出版了一个《拒检周刊》。一时声势浩大，重庆起而响应，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成都拒检消息，转载成都拒检宣言和《拒检周刊》文章，叶圣陶先生代表开明书店成都编辑所参加拒检委员会，并被推选为主席。同时担任《拒检周刊》主编。叶先生欣然从事。这场运动的主要活动人物是黎澍，骨干分子都在《华西晚报》。《拒检周刊》就在《华西晚报》编辑发行，陈子涛（后为上海《文萃》三烈士之一）独当编辑之任，唐海、黄是云和我几个人跑腿写文章。叶先生时来《华西晚报》，关心《拒检周刊》的事。这场运动虽很快成为过去，《拒检周刊》也只出了三期，然如老虎头上拔毛，过去无人所为，其影响也就甚大甚大。叶先生以一温柔敦厚君子，毅然为此“作乱犯上”的事，诚可敬也。

叶先生思想与时俱进，恐怕在成都居数年是他思想变化最大之时。总括一句，时势使然，当时知识分子俱如此。他离开武汉大学到成都定居后，未再教书，但和成都各大学学生时有联系。他住在南城陕西街，对面就是燕京大学，学生文学团体常请他来演讲和座谈。学生们从他受教，反之，他亦必受青年的影响。我去他府上拜访一次，所居甚狭，只占这个小院落的西厢房两间或三间。去时，见室中年轻人不少。

叶先生是成都文协副主席（全称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抗战胜利，取消“抗敌”二字），主席李劼人先生以经营嘉乐纸厂故，常居乐山，文协各种会议多由叶圣老主持。记得一次是遥祝茅盾先生五十大寿座谈会（茅盾先生居重庆），圣老主持，讲了一番话，至今不忘。他说，他的第一部小说是由茅盾先生为编辑予以发表的；茅盾先生的第一部小说是由圣老为编辑予以发表的。茅盾先生署名“矛盾”，圣老先生为之加帽，易“矛”为“茅”，从此便用一生。此亦文坛佳话，诚然使在座后生小子增识，我则因此想到，编辑与作者应该是朋友，是同道，互学互长，相得益彰。

时成都文协诸理事及各部门负责人如陈白尘、黄药眠、陈翔鹤、叶丁易诸位，皆敬事叶圣老，他们之间的思想亦必互为影响。成都文艺界的运动中心在《华西晚报》所在的著名的五世同堂街，叶圣老不时来此走走，犹忆一次在此吃中饭，时《华西晚报》已穷得不能维持，屋主又逼搬迁，菜饭自然极劣，连坐凳也没有，叶圣老和我们一起站着吃了这顿饭。

抗战结束到上海后，我只去拜望过叶先生一次。一天，忽闻朱自清先生逝世，但未得确讯，急往福州路开明书店访叶先生。叶先生告所传是真，我即请叶先生谈朱先生家世生平及二人友谊，叶先生在悲痛中详举以告。我复请朱先生的学生魏金枝先生作了一些补充，魏先生和我同住在麦伦中学，甚熟。我当天据此写成记朱自清先生及其逝世一文，载上海《大公报》，署名郑常。文题我本写《长留“背影”在人间》，编辑易为《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了》，以朱自清先生穷病而死，自亦未始不可。

此是和叶先生最后一面。及 1949 年，叶先生来香港，准备北上参加新政协，一日黎澍、唐海和我过海去九龙某旅社拜访，适先生外出，只见到同住的傅彬然先生，乃留条而去。越数日，萧乾告我，谓昨晤叶先生，嘱转致彼日未能迎候之歉。我听了真觉惶悚无地，学界敬重的长者前辈，对一个后生小子如是客气！回想访叶先生于上海开明书店楼上之时，告退，叶先生坚执送我下楼，我坚请不必，未蒙允。看见他走下那陡峭的楼梯，送我出门，如此长者之风，油然更增敬意。

1994 年 1 月 3 日

文章报国难

——纪念王芸生先生九五冥诞

1996 年 9 月 26 日，值王芸生先生九十五岁冥诞之期，先生家人拟举办纪念会而未果，《新闻春秋》杂志特出纪念专辑，以光先生之德，因草是文，略述所知。

先生执业报纸，始终如一，终生无他就。1927 年，以一无学历的青年，始为天津《华北新闻》写言论文章，翌年转入天津《商报》。 1929 年，进入《大公报》，直至 1966 年“ 文革 ”事起，《大公报》莫明所以地被迫停刊，在这家报纸连续工作了三十七年。先生一生事业在《大公报》，《大公报》因得先生而益彰。先生与《大公报》，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论述先生其事其人，文章报国，四字可尽。然而，这极简单的四个字，包含了一生的辛酸，无穷的曲折。所谓文章报国，无非传统的书生老话，志在立言，为文以垂后世。先生出身贫寒，父亲和大哥都是厨师，二哥为人看门守院，先生以幼子得父兄庇护，入私塾识字读书。13 岁起入社会为学徒。一面发愤自学，一面投入爱国斗争。在“ 五卅 ”运动时主编工会出版的刊物，并加入国民党。遭军阀褚玉璞通缉，于 1926 年逃往上海，经秦邦宪、彭述之介绍，加入共产党。“ 四一二 ”政变之后，对政治失望，脱离政党组织关系，决心专意新闻工作。文章报国之念，奠于此时。家既贫寒，乃深知民间疾苦，世态炎凉，其所企求报国之文章，便超越了传统的以垂后世的立言之意，而为匡时救世之策，是社会性的。及后，苦学不怠，学问日增，阅世渐深，所见愈广，而为庶民知识分子之代表。其文章报国之心，愈演而愈强烈，至死不衰。

先生为人，疾恶如仇，一身正气。先生行文，痛快淋漓，气贯江河。前者是他文章报国的基础。有此正气，乃能言人所不敢言，做人所不敢做。后者是他文章报国的秉赋。有此擅长，方能挥洒自如，一吐块垒。于是，先生之文，不胫而走，人争读之。

略举数事，以明先生之人与文。1946 年《大公报》复员上海，某经理以报馆名义做投机生意，发“ 劫收 ”财，先生愤怒之下，当众打了这位经理耳光。1937 年淞沪战起，《大公报》经济困难，先生提出不领社评稿酬，继又提议减薪一半。三年困难时期，先生三次提出自动减工资 100 元，未获准，便在银行专立户头，按月存入百元，以备上缴。“ 文革 ”之后，他以此款凑足 1 万元上缴。因为不是党员而未被接受。抗日战争时期，先生在国民党中宣部的记者招待会上，以敢言出名。一次招待会上，主持人凡问不答，先生怒斥之余，鼓动与会者退出会场。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市政府招待会上，每与市长吴国桢争论，痛斥腐败，反对镇压学生运动，更是我所亲见。《大公报》有记者被捕，先生不但力救，且著之于社评以抗议。

先生以忧国报国之心，痛哭救时无长策，发而为醒世惊俗之文，永在人心。其文甚多，仅撮其影响最大者，分述如后。自“ 九一八 ”事变后多次为文反对不抵抗，及后痛斥塘沽协定为卖国。抗战事起，写了大量的社评，主张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在《不投降论》中高呼：“ 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三字——不投降。 ”抗战初期，台儿庄大捷，他连写两篇社评，励人心而激抗战。重庆大轰炸，百业凋蔽，民生艰苦，他写了名文《我们在割稻子》，以示全民长期抗战的决心。

对于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他愤怒已极，拍案而起。并写文章屡予痛斥。藉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他写了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语锋一转，揭露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伟从香港飞渝，带来“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振常按：是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接着说：“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暗示时为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应该下台。语锋又一转，揭露某部长（按指外交部长郭泰祺）以 65 万元巨额公款购私，且私行不检，而作结语云：“总之，非分妄为之事，荡检逾闲之行，以掌政府枢要之人，竟公然为之而无忌。此等事例，已遍重庆，乃一不见于监察院的弹章，二不见于舆论的抗言，真使是非模胡，正义泯灭。”笔酣意畅，正气凛然，难怪其文传诵一时了。社评发表的当天，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将郭泰祺撤职。而社评所揭露的飞机运狗事件，则激起遵义和昆明的大学师生示威游行，喊出了打倒国民党的口号。

1942 年，河南大旱，三千万人民流离失所，如坠地狱。先生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为引，写了著名的《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照河南与重庆，作了血泪的控诉，矛头直指统治高层，揭露无情，斥责无遗。文章一出，人民传诵，蒋介石气坏，罚令《大公报》停刊三天，记者张高峰则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

他痛感于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奸商横行，民不聊生，发而为《为国家求饶》的呼吁：“诚恳地向那些官僚国难商人以及一切社会的病菌们求饶，为国家求饶，请您们饶了国家吧！”言之极其沉痛。当战火烧到独山，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时，他一篇《晁错与马谡》的借题发挥之作，明言：“当国事机微，历史关头，除权相以解除反对者的精神武装，戮败将以服军民之心，是大英断，是甚必要。”权相孔祥熙，败将何应钦，不呼而已出。

其后抗日战争胜利，内战烽烟再起，他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一而再，再而三，声嘶力竭，呐喊不衰。于学生运动，他发表自己署名文章，公开表示同情与支持。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他以日本问题专家的眼光，加以战后亲身访日所见，洞烛机先，阐幽发微，多次著文，言人之所未言。文章报国家，夹缝求生路，王芸生先生及其所领导的《大公报》之所为，可谓至矣尽矣。然而，文章报国难，夹缝求生更不易，凡王芸生先生所为文章报国种种，前既遭国民党当局多次的攻讦，最后复又总爆发，在 1948 年 7 月间，藉王先生一篇抗议查封南京《新民报》的社评，由蒋介石命令陶希圣，以《中央日报》社论名义，发起了对王芸生先生的所谓三查运动，连发三文，险辣罗织，大肆攻击，并组织其他报刊进行围攻。王先生以个人署名文章答之。虽遭攻讦，未初改衷，他还是抱文章报国之心，写其所写，斗志不减。他写过一篇题为《我的人生观》的文章，以太阳发热为喻，称赞太阳“我要发烧，就是要发烧，非发烧不可”的精神，提出“太阳式的人生观”，即：勇往直前——不顾一切——创造。从哲学上说，此文所析，或不免于无系统，但说明了他抱定初衷勇往直前的精神，于了解他不移文章报国之心可为参考。

解放战争取得了全国性决定性的胜利，终于到了历史转折的关头。王芸生先生应毛泽东主席邀，离上海，经台湾，转香港，到北平，参与筹建新中国舆论的工作。他自视这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以为献身新中国的新闻事业，文章报国，素志可达。从此时到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之前，尽管于报事于人事，他亦有不愉快的遭遇，然基本思路如此，文章报国，初衷未改。所以，

上海解放初期，他倾心办报，奋发为文，并热心于社会活动。至 1952 年，《大公报》面临诸多困难，他写了长信给毛泽东主席，汇报情况，请示方略。蒙示进京面谈，毛决定上海《大公报》迁天津，与已由原天津《大公报》改名的《进步日报》合并，用《大公报》名义出版。毛曾当面对王说：“ 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 ”王此时欢愉之情自可想见，天真之念亦由此生。比如，他和李公纯青曾以为，将来的《大公报》是全国政协的报纸，与《人民日报》的关系，如同苏联之《消息报》与《真理报》的相并立然。过去的《大公报》以国外特派记者的通讯为一特色，迁津之前，王先生颇思将来沿旧习派记者出国。一次闲谈，他要我赶快把丢了多年的英语拣起来。而其所思，事后想来，殆为天方夜谭。

与天真同时存在的，是“ 左 ”的时代风尚。观王先生所写的《大公报新生宣言》及其与曹谷冰先生合写的《1926 至 1949 的旧大公报》二文，于《大公报》的性质及为谁服务的论断，颇不合乎事实，且自责过甚流于自污，历历可见。《大公报新生宣言》调：“ 历史上所有改良主义者在实质上无不成为反动统治的帮闲甚至帮凶。 ”更全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贤如王先生，他是否写此而不自知其说？恐未必，此所谓时代的痕迹也。

即使如此，王先生得免于 1957 年右派罗网，已属大幸。据说，鸣放之时，他在文化部脱产集中学习哲学，未曾有所鸣有所放，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在‘ 反右 ”中奉令检讨；他准备接受宣判为“ 右派 ”了，亦不明白何以奉令离去会场，无事了结。但是，他奉令写的揭发他人材料，适于开会前送出，得罪了一批朋友，追悔无及。从此，他变得小心谨慎了，昔年敢言敢写之风不得再。尽管如此，一块多年的心病，还是不可避免地触机而发。1945 年 9 月，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会谈。9 月 20 日，《大公报》于报社宴请毛泽东等，席间，王曾提出“ 不要另起炉灶 ”之说。毛答：“ 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 ”事过多年，1953 年 9 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和梁漱溟舌战，毛在斥责梁时，忽然冒出了一句“ 当年有人不要我们另起炉灶 ”。王在座位上突然下意识地弹了起来，说：“ 这话是我说的。 ”说完久久未敢坐下。我听说此事，想起王先生过去在闲谈中有触电一语，他说上海的京戏剧场，演戏时场内全黑，女明星出场，身上珠光宝饰，闪闪耀眼，一刹那间，全场灯亮，照着这明星，观众有如触电，继之狂呼。王先生在最高国务会议场中，突然起立，真是有如触电，可见他自己对于“ 不要另起炉灶 ”一语，忐忑不安于心者久矣。那么，会完回家，不安者多日，亦乎可想而知。悲乎！

“ 反右派 ”斗争之后，王先生只挂了个《大公报》社长的名称，于报社事不再与闻。除了参加社会活动，他重理旧业，写了不少历史论文，观其所作，在文字上已失昔年锐利之锋，措辞显得拘谨，而其多篇论柳宗元之文，论旨近乎趋时，远非当年痛快写来，任意挥洒了，更失“ 在历史中求史识 ”之旨，因为历史已经被改造了。王先生写文章是第一流高手，他在《季鸾先生的风格与文境》中曾说，张季鸾先生在文章表现技巧上，曾授他秘诀，即“ 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此言极佳，照我理解，此实不止于言技巧。王先生亦善于此道，惜乎，多年来，未再见他此类文字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果如此，文章报国难，我重述此语。我一向尊重王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也佩服他的史论和《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煌煌巨著，他晚年于此两事费力甚多，自应尊重。然写此类文字是否合乎他文章报

国的本心，窃疑之。因为他的本业和他多次表示愿为之献身不移者，毕竟是报纸。

1996 年 6 月 5 日草成

悼李公纯青

李公纯青逝世消息传来，并不突然，甚至可以说早在意中。前此，京中旧友不断来信，为述纯公病状，告为肝癌，已有腹水。这自然意味着将不久于人世。5 月 25 日，得信，知纯公果然在 5 月 20 日逝世。在短短一封唁电中，实不足以表达我的哀思。好在老友张契尼已先此代我签名于在京《大公报》旧人写给纯公夫人谈家芳女士的唁函中。这封唁函由契尼执笔，节录如下：

> 惊悉纯公病逝，极感悲痛。哲人其萎，天丧斯文！
>
> 纯公平生，志行出处，学业文章，清流推誉。才足以济世，而淡泊于仕进；学足以立言，寄哀愤于论述。笔耕五十年，流风满天下。
>
> 我等与纯公共事有年，平生风义在师友之间。回思寒灯夜话，获益良多，忽闻闭影重泉，千秋怅望。
>
> ……

唁函对于纯公的为人处世，道德文章，评价极为精当。在充分表达同人哀思之余，又有句云：“伤大雅之不作，虽哀痛其谁陈！解人世之纠缠，得甘寝其何伤。”可谓哀而不伤，正得纯公本意。纯公早已写就遗嘱，谓死后不举行任何仪式，不登报，不通知亲友和子女（子女多在国外），遗体献作科学研究，其豁达如此！我写这篇悼文，在天之灵，当不以为然。魂其有知，尚请恕我。

纯公今世名人，一生所为，业绩永在。新华社发表的逝世消息，称他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政论家和日本问题专家。这是众所周知和公认的。又说他“是在台湾同胞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一位政治活动家”，“他积极参政议政，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积极献计献策。”这两段话自然包括了许多重要内容，纯公日常从不以自己所为告人，朋友们自然也不问及，但都感觉到他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由于他学识渊博，好学深思，对日本问题、台湾问题，数十年研究有素，自能见他人之所未见，发他人之所不能发，加以他总是坦率直言，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更有其价值，更为领导和人们所重视。这些，自然非我所能道。从我所接触感受，我尊重他的长者风度，佩服他的学识文章，敬重他的坦诚待人，心仪他的淡泊宁静，尤敬他的光明磊落。

纯公籍隶台湾台北，是祖辈由福建安溪去台湾经营茶叶业，因而落籍的。他在台湾度过童年，不愿当日本臣民而到厦门读书，入集美学校，毕业后去南京，入中央政治学校毕业。1936 年留学日本，翌年抗日战争爆发回国，入上海《大公报》工作，此后历经香港、重庆、上海、天津、北京诸地《大公报》，于 1954 年调离。

1946 年 6 月，我入上海《大公报》工作，纯公时为上海《大公报》社评委员（即主笔），兼主持编辑《时代青年》周刊。他写的社评多为国际问题，特别有关日本问题社评，凡非王芸生所写，皆出于他之手笔。时《大公报》有许多周刊，每天轮流见报，编者多为社外名流，如周太玄先生主编《新思潮》，洪深教授主编《戏剧与电影》，章靳以教授主编《文艺》，戈绍龙医师主编《医药》，只有这个《时代青年》和另外个别周刊是由纯公及其他社内人主编。他写的社评，鞭辟入里，分析精当，洞烛机先，启发了无数的读

者。反美抗日运动兴起之时，他和王芸老两相辉映，写了一系列的社评和专栏文章，传诵一时。他的文字修养极深，纯粹是中国文章写法，足当练达之评，且极注意文字的音韵，读之铿锵有声。《时代青年》则抓住时代的旋律，联系了广大的青年。当内战风云骤起之时，他在《时代青年》上，以几期的篇幅，发表了时事测验答案，其形式既开先河，其内容则表达了时代的心声，为人所注意，也遭到国民党当局之恨，组织人员投寄答案，为纯公识破，揭之于报端。同时，他尽力保护作者，遇有言词激烈的文章，他总为之易以假名，甚至告诉作者提起注意。国民党当局每有追查作者真实姓名和地址之举，他义正词严拒绝交出。这个刊物最后还是被勒令停刊了。纯公一向谦虚自处，一生所为，很少对人言。他初入报社，在香港工作之时，有一夜成名之说。后来，老友苏济生多次问他此事，他都笑而不答。问急了，他淡然一语曰：“不过一篇社论。那是过去的事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成了他被人问及自己事的经常答语。唯一的例外，是他时或稍以编《时代青年》之事见告，可见他对于这个刊物的满意。

纯公其时除了参加社评委员会和《时代青年》发稿，一般很少到报社，我们极少相见。一次偶然的机会，恰恰是在社外，得以相遇，然后才过往较多，时作长谈。刘文辉将军驻南京代表、四川民盟的负责人范朴斋先生一次邀请午餐，表述刘文辉将军希望与上海新闻文化界联系之意，我与纯公不期而遇于此。

饭后，我和纯公步行至南京路报社。且行且谈，内容今已忘记，但给我的印象，是增强了我对纯公的信赖。数日之后，我往访纯公于其东横浜路寓所，倾心作长谈。他分析形势，透彻精辟，这本在我料中。言谈间，处处表现出他博闻强识，于文学，于历史，都有精深的见解。并表示，现当中年，只以写时事评论为宜，到了晚年，他要写小说，他说是人到晚年写小说最适宜。这个议论不一定会为人所赞同，但其本意，是说人到老年涉世更深，看事可更透彻，亦是至理之言。历数十年之后，他在给我的信中，每以我放弃创作为不可取。我不知道他晚年是否真的写小说了，但以精力之不济，欲写恐已无从。在这次谈话中，他还为我详细介绍了《大公报》的人和事，使我这个新来者有所知而以自处。

和纯公真正熟悉起来，是在 1948 年到香港以后。这时纯公与杨刚大姐作为中共地下党员，与《大公报》诸领导运筹策划，自然作用极大。去港以前，他代表中共和王芸生先生多次谈话，邀请芸老经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此事已见于纯公所写回忆文章，成为史料。杨刚大姐不久离港北上，在杨东莼先生到香港《大公报》以前，作为中共党员负责人，纯公多任其劳。他在《大公报》内所任皆大事，而于报纸之具体业务，过问不多。但是，他做到了依靠一批进步群众，上下配合，如脑之使手，运用自如。一次，夏公（衍）对刘克林、谭文瑞和我作长谈，归结为一句话，即一切听纯公安排。

上海解放以后，纯公又继杨刚而由天津南下领导《大公报》，日夜辛劳，厥功之伟，应留待写《大公报》史者去记述，非此短文所能记。我所不能忘记的是，身居领导，纯公的地位变了，他的为人处世则始终如一。他总归是一个书生，一位学者，他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那是指他反对无聊的应酬。解放前，《大公报》某公做五十大寿，在一家游乐场哄闹了一天，他很愤然，把请帖扔进了字纸篓。后来，在开社评委员会之时，寿翁向会上每人作揖致谢，轮到向纯公作揖，纯公淡然曰：“对不起，我没有去。”其性格足当狷

介之评。但他对人则真诚热情，绝不说一句假话和官话，自然更没有一点架子。应该说，他对人充满了人情味。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有时不能适应于社会，甚至难免为一些“永远正确”的人所批评。他曾经对我说：“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怒形于色。”我一生总记住他这句话，但恐怕至死也不能改变。反观他自己，其实始终还是书生本色，不足处今世之变。

后来他调离了《大公报》，如果要说做官，应该是高升了。担任了台盟中央副主席，还有人大、政协常委的头衔，成了出头露面的人物。诚然他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但我总以为这和他的本性未见得相符合。调离之初，曾来一信，只对我谈了经过，告调去《大公报》代替他者为何人，字里行间，我看不出他的喜乐。

1957 年之难，他虽未遭灭顶，终不免于波及。所被指责之罪，多与《大公报》有关。此后，他被闲置于外交部做研究工作，直至 1977 年重返台盟，仍任副主席。离休之后，任台盟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

近年去京，我总尽可能去看他。每作长谈，忧时感世之情表露无遗。身体衰老了，书生本色如故，读书为文，思考天下事。朋友为他整理旧作，编成文集二册，纯公定名为《笔耕五十年》及《望台湾》。一次忽然得他一信，谓一篇旧文引用了刘知几的《史通》，他要再加查对，在京未能觅得《史通》，他估计我应有此书，嘱为查核。我将他需要的一章复制寄去。文集编订完成，竟然没有地方可以出版。一介书生，那里支付得起偌大的资助费？他对朋友说：“宁可不出版，不要去向人要一文钱。”这是纯公的本色。现在得知，出版之事已有着落，惜乎纯公不及见了。

晚年最大心事，是期望有人写作《大公报》史。1985 年他违背不写回忆录的夙志，连续发表两篇回忆《大公报》之作，盖出于对历史负责而作。就其大者而言，这两篇文章，实是写《大公报》史最富价值的材料。本此意，逝世以前，不断对探望者殷殷道其希望《大公报》史能写成之望。

纯公尽管所患是肝癌，据说死时并无痛苦。从遗言里亦可见其坦然之心。然其忧国忧民之赤诚，总回荡于我的脑际。

1990 年 6 月 4 日写
6 月 19 日改订

漫说陈虞老

耳闻陈虞孙前辈之名，远在 1947 年。时我们同住一楼，但并无往来。《文汇报》封门之后，沈体兰先生托我携聘书一份往请陈虞老就任麦伦中学教务主任之职。我把聘书和沈先生的信交给了陈夫人，未曾面见虞老。沈先生对我介绍说，陈虞老原是有名的中学国文教师。多年之后，虞老偶然和我说及此事，才说他其时早已避居外面，不回家了。

上海解放之后，虞老是新闻界领导人物，我们常有机会在会议中见面，很少作直接交谈。一次钦本立找我，说是衔虞老之命，邀我去任《浙江日报》采访主任。我们就是这样暗场交易一来一往均未成。至 1958 年，是陈虞老采取行政手段，强调我往《文汇报》。朝夕相处，自然熟悉多了。但从工作上（他居领导，我是被领导）去了解一个人，未必能得其全。同入“牛棚”，二人相共洗碗的时间最长；入“干校”，两床相联，虽不能长时间相与共话，毕竟时作牛语，于此常能知其内心。真正的了解，则在大难结束之后的十余年间。今番虞老去也，其音容笑谈仍留脑际，尽管他这些年已不能发一语。人各有其大，写这篇文章，只能识其小，故名之曰漫说。积小以窥其大，我愿如此。

学有素养　新旧兼融

陈虞老不是学者，但博闻强识，学有素养。他在南京金陵大学攻读中文系，时维护旧文化旧文学的主力军学衡派，主要阵地在南京东南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音韵训诂之学大师黄侃亦在此任教，黄侃曾谓八部书外皆狗屁，而力斥新文化新文学。东南大学教师多有在金陵大学兼课者，金陵大学中文系的学风，受到东南大学的影响。陈虞老的根底是国学，在这方面他受过严格的训练。但是，他对我说过，少时最喜新民体，对于梁任公有些文章几乎能背诵。这已经不是国学正宗了，后来毕竟受五四新文化薰陶，受时潮感染。因此，尽管出身国学正统的大学，要非抱残守缺之士，而能与时俱进，以其国学根基，融会新知，不蔽不偏，胸中自有丘壑。其实学衡派的主张就是融会中西，以“昌明国粹、融会新知”为标的，世人但见其反对新文学而视之偏也。他的一位老师陈中凡，国学既有深基，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营垒中过来，虞老之爱中国古典戏曲，与陈中凡先生的研究和教育当有渊源。

虞老几十年来为文，主要在政论和杂文。他的政论，我所读甚少，不敢妄议。杂文则可称颇具火候，能成一格。杂文这种形式，为匕首，为投枪，对敌战斗自有其威力。解放之后，虽几起几落，事实证明，自有其讽刺妙用。但是，衍流至今，其道多穷，摭拾报章，文抄既毕，继之以不痛不痒之语，似说未说之言，只是磨嘴皮而已，读之味同嚼蜡。虞老的杂文，脱发于深刻的观察，阅世既深，乃有其自得之解。成于文，是为真文，无论其为唐语宋句，抑或引车卖浆者言。论其事则或有古典，或有今典，悉能引人思考。试看他《解剖“马列太太”》一文，短短数百字，有如再现了《人到中年》此角。

虞老于说部之作，涉猎甚多。曾多有人在他面前以此自夸，他对我说：“倒比比看，谁读得多，读得熟。”当时上海有位善于两头吹的人物：在搞新文学的人面前卖弄旧学，在治旧学的人面前大说新文学。虞老和我皆深厌之。虞老评其人曰：“适足以见其浅薄而已。”说部之中，他最喜欢的是《儒林外史》。做报告，常脱口道出此中人物以为今喻。截至晚年，床头常置一册《儒林外史》，我每往访，辄顾而言：这两天又看《儒林外史》，愈看愈

有味道。所谓味道，恐怕正是观古见今所致，所以他才时说“ 真该写一部《新儒林外史》 ”。又曾对我漫析《儒林》人物，娓娓如说书，而时用今典引论一两句，真可谓“ 陈虞孙语言艺术 ”，听来是一享受。可惜在《虞孙杂文随笔选》中，只有《哀严监生》一文事涉《儒林》。

正因为陈虞老国学深厚新旧兼融，他对记者编辑要求颇严，有一次他对我说：“ 我们来指定一批古文给大家读。 ”记者不解古文，写不出好的白话文，此见与我相合。同时，他还主张大家读历史。我也赞成他的意见，我建议读史无妨从《史记》开始，他则主张先读《通鉴纲目》。这些话自然是在比较宽松的政治气候下议论的，为时不久，气候一变，他和我都缄口而不言了。

虞老自称：“ 我自己的性格是散文性格，因此，不善韵文。 ”（《一个至死不忘党的事业的人——悼魏克明同志》）但他集东坡与陆游句为挽魏克明联“ 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 ”，却甚见精神。我曾请他在叶浅予的《荷花舞》画上题句，他写句云：

濂溪爱莲喻为君子道学之口难免迂腐
世人爱荷或挹其芬芳或赏其美色荷花
上舞台总是旦角应行岂可挂髯口乎
爱作荷花姑娘赞
赞曰荷花之色世人羡之荷花之赞赞色
不赞其德也君子云乎哉
丙寅春日振常同志以浅予同志所作荷
花姑娘索题苦思三昼夜挤出这点不登
大雅之堂的话来罪过罪过
江阴陈虞孙年八十三岁

此字与画合裱成一幅，悬诸漏室八年，是为虞老给我的唯一纪念品。

望之俨然　其即也温

日常陈虞老板着面孔的时候多，一副严肃相，状若不可侵犯。于是，在报社似乎有不少人怕他。有一位编辑，每持大样去虞老前，总是侧身站台前，如临深渊；还有一位编辑，在他面前萎琐之至，结结巴巴说不出话。虞老曾对我说：“ 何必萎琐如此！ ”要知虞老奉命去《文汇报》，首要之务，不是办报，而是领导“ 反右派斗争 ”，风声鹤唳，早已草木皆兵，虞老此去，其必挟声威以自重也必然。后来听身历其事的人说，当时状况确实令人一日数惊。这也不能怪陈虞老，人的认识当时就是如此。甚至“ 文革 ”已起，我和他被“ 勒令 ”同在食堂洗碗，一次，他忽然说：“ 确实，修正主义的局面已成，文化革命非常必要。 ”一副真诚，语极严肃。我亦不禁为之肃然，极表同意。他言下之状和我同意之情，即隐藏着我们确实有罪之意。当时认识就是如此，其奈没有觉悟何！

虞老批评人，亦时发脾气，有时甚至是声色俱厉，出语不免过分尖锐。这也是有人怕他的一个原因。平心而论，他的批评并不都对，而且常过甚其辞，发脾气有时更是无道理，突如其来令人瞠目莫解。历时既久，我逐渐对他的晴雨表悟出一个规律：每当政治宽松，他是有说有笑，无疾言厉色之状，且活泼如年轻人；气候一变，他就板起了面孔，状如铁板一块，“ 望之俨然 ”，

尚不足以形容其状。以此验诸于几年间他和我的关系，亦复如是。凡是在前种形势下，不外几种表现：一是他的秘书时送他写的短文给我（此时他勤写也）；二也是他的秘书来找我，一声“陈虞老有请”，我下楼入室，与之海阔天空，神说一阵，最后归结为对文艺宣传的改进；三是晚饭以后，他自己上楼，在我写字台边沙发上坐下，照样神聊，一些同事围了过来，一起扯淡，更活跃了。凡遇疾风劲吹之际，他和我除了必要的业务往来，再无个人接触，只是一个严肃的上下级关系而已。交代任务，一板一眼，语无多发，话不投机。前几年，在他家中，我偶和他略说以上看法，问是否如此。他突然一拍大腿，轻盈地一跃而起（那时他的腿脚已有些不灵便了），说道：“你怎么至今方悟？”我并不以验证了我的看法为得，反而不胜其悲，当然不是悲我自己，也不是悲陈虞老，所悲者时，时乎，时乎人性的扭曲，虽于智者亦不免。少年时读意大利皮蓝德娄戏剧，多写人之两面，验之特定时代的我们，逃不出皮蓝德娄笔下。

陈虞老之为保护自己，滔滔今世，无可指责。但毕竟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赤子的真心仍在，即使在疾风劲雨之时，有时也还露出了真心。我这时看他，突觉有如《嫁妹》的锺馗平添了几分妩媚。举两事：一，“大跃进”之风猛吹的时候，一次我和他去剧协开会，有一个歌颂“大跃进”的话剧正在演出，剧名叫《沸腾的×××××》，人问他看不看。他冲口而出：“沸腾个屁！不看。”问者瞪目结舌，闻者不能声，这个剧本的作者亦在旁边，尴尬之状可想。二，1962 年，他曾率领上海评弹团赴港演出，归来后，各方请他作报告者频繁。一次，我们正开会，他去听了一个电话，回到会议桌上，怫然不悦，厉声说：“我就是想不通，一定要讲香港怎么怎么不好。……”真情的流露在一刹那间，我想，他上台讲时，自然还是大骂香港的。在其时，能有一刹那间真情流露，已属难能可贵了。

谓陈虞老其即也温，自然多是指他心情舒畅之时。这时候的陈虞老，和不得不或说不由不做俨然之状的陈虞老，从里到外，真判若两人。说话多了，笑脸频仍，谈到得意之时，还不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简直有些文武昆乱不当。所谈的话，无所顾忌，妙语如珠，令人捧腹。对人，似乎也有些温情了，于下属，常呼其绰号，状至平等。甚至于行履步伐，亦矫捷异常。一般在这种时候，他写文章便多起来，怎么想便怎么写，写来挥洒自如，一气贯成。

“文革”一起，他成了《文汇报》的头号“走资派”，笑容从此消失，大小批斗会，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再无一点英姿，更无一丝灵气。一直到他的问题全部解决，他请了两桌人在锦江饭店聚会，还有几位从北京来的老友参加，即使在这种场合，我也感到他并无精神，迥异昔日。元气的恢复，毕竟需要时间。

冰雪聪明　妙语解颐

陈虞老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用冰雪聪明四字形容他，似乎还不足以表现。日常读书，虽非一目十行，过目成诵，至少是进度极快，看后即解。谈读后心得，他是一流好手，不只娓娓述其内容，更难得是立地融会，滔滔讲其理解，上下连贯，前后相接，如同深思已久。听记者汇报，他从不用笔记一字，汇报完结，他即能归纳，并立刻提出问题，抓住要点提供线索。往往平淡事一经他分析，便成可探之珠。

他是天生的演说家，面前一张纸，只有寥寥数字，他可以讲述数小时。他的演说绝非雄辩一类，而是娓娓如话家常，以其生动的语言，艺术描写的

天才，紧紧抓住听众。他真可算语言艺术家，引古书古句，恰到好处，正用歪打，两得其宜，更时杂以民间大白话，市井小民之言，增强了生动性。他爱评弹入迷，评弹艺人的说、噱，他运用自如。更有一个特点。每讲到听众发笑时，他更是一副严肃面孔，脸上没有半丝笑容，听者愈笑，他愈是神情肃然，而妙语如珠成串，使人应接不暇。

日常说话，妙语更多，令人捧腹。今天还记得一二，记如下。批评记者采访的盲目性，他用《归去来辞》说：“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诸公飞倦而回，一无所得。”议论一个人呆板，他常说的一句俗话是：“三拳打不出一个闷屁。”当年《上海滩》杂志草创，在座谈会上，曾因我一句话引来一场小不愉快。我说，办杂志不容易，我想浇点冷水。虞老紧接说：“我不只浇冷水，是抱着一桶冰来的。办个《上海滩》，我们这些人算哈名堂，岂不都成了小瘪三？”我知道他说这句话并无恶意，无非灵机一动，追求语言的趣味而已。后来读了几期《上海滩》，他相当满意，表示“收回旧说”，其率真如此。

大家最感佩服的，是他传达市委领导讲话的本领。那些年，市委抓报纸极紧，他常被市委叫去谈话，回到报社，总是立刻召开小型会议传达贯彻。他从无笔记本，依然如作报告一样，不过一两张纸，记了几条，然后源源本本传达。作报告是发抒他自己的思想。思之有得，成篇亦非甚难。传达则是讲述别人的话，只那么几条杠杠，他照样长篇大论，讲来活灵活现。这不单是记忆力好的事，实已将他人所言融入自己脑中，用办报纸的行话讲，叫做吃透领导意图。当然，所说当非原来词句，但其内容则不能出以己意，且不容出以己意的。果然，传达完，然后发表他自己的贯彻意见，提供会议讨论。陈虞老的冰雪聪明，大多类此。

文人办报　灵思焕发

陈虞老是办报里手，解放前他在《文汇报》专写社论，是《文汇报》一支笔。办报纸如果没有一支笔或几支笔，报纸难于办好。远者如梁启超，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是一支笔。依次而下，黄远生是民国初年一支笔，陈布雷是《商报》一支笔，张季鸾、王芸生是《大公报》两支笔，夏衍、恽逸群亦莫不是一支笔。中国近代报纸事业之兴，和西方资产阶级报纸之纯属商业社会产物有所不同，那就是文人论政。因此，一支笔便成为报纸兴衰的关键之一。

陈虞老重返《文汇报》，担任总编辑，董理报纸全部业务。其时，报纸早已脱离了文人办报的陈规，新进者已不知文人办报为何物，老报人一提起文人办报则谈虎色变，趋避之唯恐不及。报纸被称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总编辑的职责则是领导报纸去适应阶级斗争，作驯服的工具，所谓总编辑应是一支笔（无论为大笔抑小笔），应该日不离写社论，早成开元天宝遗事，因为报纸社论几已不存，偶或有之，内容全国各报一律，亦属多余。处此情况，陈虞老这位总编辑所为，自与全国报纸总编辑无异。而他还时时在报上舞文弄墨一番，可以说是文人技痒难止，还其本色，此其一。其二，在政治气候宽松之时，他精神振奋，灵思焕发，办起报来得心应手，点子层出不穷，版面精彩纷陈。

这里只说虞老领导报纸贯彻“双百”方针、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一事。此时的虞老，凡所举措，都是他真情的表现。也就是说，他本人就心情舒畅，情发于真，事出于诚，其效乃著。这就是古训所谓“修辞立其诚”。

前面说过，他主张编辑记者要学文史，他还主张要加强专业学习。他认为，不如此不能进入角色，只能是记他人所言，而乏自己的认识，甚至所记也难免错误。于是，在他的倡导下，报社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请来各行专家主讲，记者编辑听讲。现在记得的，曾有：朱光潜讲美学，夏承焘讲词，荀慧生讲京戏，赵景深讲戏曲史，刘天韵讲评弹，等等。讲座不只增长了编辑记者的专业知识，还活跃了思想，开阔了眼界，对工作的提高颇见成效。

报社举行各种座谈会，始倡于《大公报》，为其特色。徐铸成把它带到了《文汇报》，亦见成效。陈虞老力行召开座谈会，有所发展。《大公报》和徐铸成时期的《文汇报》，座谈会是让知识分子、各行业人士发表意见，公诸报端。陈虞老倡行的座谈会，内容一般不在报纸发表，而每次都举行的是专业问题座谈，即同一专业的专家谈问题。对座谈会出席人员讲，讨论专业，活跃思想，大有俾益；对报社言，则有益于摸清问题，利于组织意见，发表意见。在座谈会上，陈虞老是组织者，也是发言者，他发言和插话甚多。所说专业，有些他本在行，言出有见。而有些问题，他虽不备专业知识，但恰恰是他的所见能补专家常有的片面性。数年间，《文汇报》开了许多座谈会，对于活跃知识分子思想，贯彻“双百”方针，大大有利。这里应该补一句，“文革”将至，《海瑞罢官》座谈会已是纯为钓鱼，应当别论。这些座谈会多在华侨饭店和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时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家都苦于觅食之难，座谈会后，供应一顿便饭，虽非大嚼，亦有小补，与会者皆甚乐。一次座谈会上，周谷成老大声曰：“虞老，你们的座谈会，好啊，好啊！”周老自然说的是座谈会这个形式好，但能得一顿家中难措的小吃，恐亦在谷老“好啊，好啊”之语义中。其时《文汇报》的这种座谈会小食，以视今日之会议大嚼且有偿，相去岂能以道里计。时乎，时乎，吾不知其为进退也！

起初，《文汇报》文艺部搞了个取名“闻亦步”的谐音随笔专栏，写短文，议论文艺及文艺界问题。我事先没有跟他说，见报之后，虞老大悦，立刻叮嘱抓住不放。他自己也投身进来，几年中他为“闻亦步”写的文章不少，多属看戏随笔之类。那几年，我常和他去看戏，听评弹，深夜回到报社，我们常立即挥笔成文，写上一篇。抓得快，写得活，在文艺界颇受欢迎。远在北京的梅兰芳，看了批评《贩马记》中两个表演动作之文，称赞批评得对，并说：“我也是那样演的，以后要改。”他写的“闻亦步”诸文中，以两篇关于海瑞戏最为著名，当然后来吃足了苦头。此后，扩而大之，他让科教部搞了个“石岱虚”，以实带虚也。他称“闻亦步”和“石岱虚”为《文汇报》的“两只眼睛”，经常说：“两只眼睛不能闭”。在写法上，他要求“议论风生，以小见大”。他以其思想之活，带动了大家。

《文汇报》的戏曲报道特多，有人批评说，《文汇报》变成了《戏曲报》。我坚持不动，以为中国戏曲众多，无比丰富，观众最盛，理应多宣传。陈虞老支持了我。时外地剧团来沪演出者众，多数都先到《文汇报》拜访。1959年，吴祖光偕中国戏曲学校演员剧团首次来沪，事先祖光给我一信，请予支持。剧团到沪之日，祖光率领年轻的生旦净末丑一大堆即后来闻名的刘秀荣、钱浩梁、刘长瑜等来访，我把他们引入陈虞老办公室，此老乐甚。事后对我说：“《文汇报》要是真成了文艺界人士常来常往之地，报纸就算办好了。”

最后，再举一事。1962年，红学界一面在讨论曹雪芹卒于何年，一面说是北京恭王府即大观园遗址。驻京记者刘群写来一长文记恭王府访大观园遗

址，文章写得极好，考证翔实，文采焕然。我们读之大喜。文无题，文艺部理论版诸编辑为议定题目，颇费周章，最后由叶冈命名为《京华何处大观园》，文章拼发一整版。此时的陈虞老，循例踱步到我处，我把文章推荐给他，他读后亦大喜过望。他毕竟头脑胜于我等，对大家说，可以写一新闻，谈曹雪芹卒年之辩和大观园遗址发现的事，刊第一版头条，以和《京华何处大观园》文呼应。新闻由黄裳根据报章写成。陈虞老犹以为未足，说是新闻标题可以写成一副对联。七嘴八舌，终把这个头条新闻标成一联：“曹雪芹卒年无妨一辩，大观园遗址有迹可寻。”第二天报纸出来，大受欢迎，某处贴报栏的《文汇报》镜框被人打破，取报纸而去。陈虞老的灵思焕发，谨此亦可见一斑。

惜哉斯人　未尽其才

“文革”期间，陈虞老受折磨最多，精神亦至痛苦。他八女一子，儿子是最小的一个。在“干校”的时候，他的儿子蒙准来干校省父。就在我们那间芦苇地的大卧室里，父子对坐，神情木然，语言无多，老半天才说出简单的一句两句。见状，我思父子之情此时亦不得一吐，人间惨剧，可谓至斯而极。后来，大家从“干校”相率散去，他被安顿在《辞海》，听说，甚少与人接触，人亦不去接触他。只有赵超构对之常表关怀，中饭后还拉着他散步一回。寂寞可以想见。

及至受命建立大百科上海分社，他的精神真正振奋起来。搞出版，又是全新的大百科全书，于他为新的领域，而我多次听他谈规划，说设想，其志大而着手实。他写过一篇杂文，叫《“还我头来！”》，借玉泉山关公显圣大喊“还我头来”，谈人的有头是为了思想，“文革”使人愚昧，如今该“还我头来”。陈虞老的头“还来了”，他本是富于自由思想的人，于新领域新事业，他就使其自由的思想得以驰骋，是以卓然有成。他又受命主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这对他应该是轻车熟路，会内会外，我听过他谈设想，虽颇不凡，其成绩似乎未达他的理想。

他曾说，有人给他看手相，以为其寿之高惊人。他确实身体极健，思维极清。但有一次因小病住院，说话之间，忽然伸出一双手，说：“你看，这手指甲多像女孩子染了凤仙花的样子。”闻言不禁一惊，头脑怎么有些乱了。及至后来长期住院，由说话而至于只笑不语更至于不能说话，由认识人而至于不认识人，真不知他脑中尚能清醒思维否，如能思，思些什么？头已还来，能思亦无益矣。他还能说话的时候，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怎么穿西装？”

惜哉斯人，未尽其才。如果前十几年不是那么总折腾，如果没有“文革”，在正常的气候下，他当能大有发挥。

1994 年 1 月 22 日

忆江村

张瑞芳前不久在《笔会》有文写江村，读后触动旧忆，颇念其人。这么一位有才华的演员和诗人，此世早忘之；在我尘封的记忆中，也几乎找不到很多的影子。有同学老友夫妇自北京来，当年同学少年把酒话旧，谈起了江村和我们学校演剧活动的关系，引动我中断了的回忆。为此文，以纪念墓木已拱逾五十年的江村。

认识江村，乃话剧演员周峰的介绍。时为 1943 年，我和一批同学，醉心话剧，在我们学校，建立了一个叫做海燕剧团的组织，请来周峰，为我们导演剧团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型剧目《刑》（作者宋之的）。江村时来学校，看我们排演。我看过江村演的戏，读过他写的诗，早已心仪其人。其人身材修长，美姿容，而瘦骨嶙峋，一脸病容，谈话不数句，咳嗽必多次。举止言谈，文质彬彬，很少高谈阔论，总是细语轻言，若断若续，表现出一种若不胜其忧者的神态。这种形象和气质，在当时和后来我所接触的演员中，很少见。说他生来是《北京人》的曾文清气质，确乎其然。

和江村更多的往来，在 1944 年。我请他来学校为我们导演一个独幕剧《解甲归来》。这是一个外国戏，译稿发表在上海出版的一个介绍西洋文学的杂志上，作者名字已忘，译者似为吴兴华。剧本写战争以后的战士生活，有讽刺现实之意，但相比海燕剧团此前和以后演出的剧目，政治意味稍轻一些。剧中人物只有三个，演员由我和两同学分任之。江村排戏非常认真，把我们不擅胜场的外国戏真是排活了。当时成都的大学剧运，和职业剧运同样发达，而大学剧运的发展，多得职业剧人的指导、帮助。大学演戏，剧目不受政府审查，是最大便利处，进步职业剧人之所以愿意到大学排戏，正和手脚不受捆绑，较为自由有关。要知道他们来排戏，没有任何报酬。

这时江村住在青年会的旅舍里，衣着无多，一套西装又破又旧，虽不是身无分文，所有亦不多，经常处于穷困之中。我去看他，偶然请他吃一顿小馆，算是不错的享受了。当时吃小馆价钱便宜，菜之可口远过今日。我们谈戏剧，谈文学，谈时事，江村是优秀的演员，有为的诗人，他强烈不满于当时的政治现实。我们谈得很投机。贫穷折磨着江村，肺病时发，终于不能支撑，住进了肺病疗养院。一个大房间，住了许多病人，此咳彼嗽，相互传染，治疗无药，（有进口特效针药曰般尼西灵，价昂而难求）此时的江村，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更谈不上维持必须的营养了。我每去疗养院看他一次，不安者辄数日。眼看他一天天衰弱下去，朋友们束手无策，终于坐视他永离人间。一个年轻的诗人、演员，死于贫病之中。吾友车辐，捐出了他家历代坟地，让江村安身于此。郭沫若为题碑曰：诗人江村之墓。那天，一个凄风苦雨之晨，我随着出殡送葬的行列，从南城包家巷肺病疗养院出发，凄然缓行，出东门，至墓地，眼看江村落葬。哭而无泪，感而郁于胸。江村未婚，只身一人在成都，没有家属执绋。此情此境，倍增凄凉。一个有大志而万里流亡为社会献身的青年，社会对他作了什么报偿？我回答不出，后在陈白尘主编的华西晚报副刊《艺坛》上写了题为《悼江村》的文章，聊抒哀思而发胸臆。

江村是时与成都的剧团无所属，没有谁出面为他开追悼会。我们海燕剧团在一个晚上，举行了一个太小太小的追悼活动。是夜停电，学校一片黑暗，在一间教室里点了蜡烛，大家围坐而作低沉的悼语。到者十三人，海燕剧团团员来的不多，反而有几位从来和戏剧无关的同学来参加了。这一晚的悼念十三人都讲了话，实际成了对现实的控诉。一位潜心研究历史的同学，说他

并不热衷戏剧，只是在学校偶然得见江村，为江村那副令人不能忘怀的形象招引而来，结果所得良多。一位年长而热情的同学，会后写了一篇文章在报纸发表，引一部名作之句作结云：“ 朋友啊，勇敢！只要有一双眼睛和你共同哭泣的时候，就值得我们为了生命而受苦。 ”（这位同学后来死于中原解放区。）一个悲凉而又小小的会，有十三双眼睛为江村共同哭泣，江村“ 为生命而受苦 ”更是值得的了。

叙文篇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

远在五十多年前，即已耳闻黎东方先生大名。时值抗日战争期间，黎先生执教重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三台东北大学，常在四川各地讲演历史，高坛设座，讲古说今，以历史励人心而鼓抗战，名动一时。我虽未曾躬逢其盛，每于报端得读讲词，并听者受鼓舞之报道，未尝不深受感染而仰慕焉。想不到 50 多年之后,忽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崔君美明出示黎先生煌煌历史巨著五大册，曰《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上、下册）、《细说民国》，谓将为是书出大陆版，而命以序，并告：黎先生已是八十九岁的高龄了。余小子学不逮，年齿不及，何敢为前辈长者之书作序，辞谢再三，终感于黎先生为讲史之学迄老不衰的壮志与深情；黎先生与崔君书，复殷望我能承乏为序，此亦长者激励后生之意，何敢再辞焉。乃踵武邓广铭先生，一述黎先生的讲史之学。

读黎先生四史，确为史，为元之史，为明之史，为清之史，为民国之史。每一史写法相同，取这一朝代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以及职官、制度、地理、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缕而述之，如治梦理丝，串置散钱，以成规模。其选择题目，自由度较大，而写作之际大小自如，不必过于拘束，然又须得其要领，书非通史之作，而合读一朝所有各节文字，实有可得此朝断代通史之貌的收获。各节分述，不同于史学论文专题的研究，无须如同写作专题论文的深入细致，详述尽证，只须讲明事实，论证得宜，读之亦如同读了关于这一朝代的许多专题文章。

黎先生采取这样的写作形式，得力于他的史学素养和多年讲史之功。黎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专攻史学，受教于梁启超先生，后又游学巴黎大学，从名师多人学习史学和哲学，得博士学位。1931 年归国后，相继执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抗战军兴，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识古今，激励抗战。侧闻黎先生擅长讲演，有雄辩之才，每讲史，辄能鼓动全场，听者动容。又曾在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有编辑教科书的经验。1949 年以后，在台湾和美国，续任大学教职。一生的学识经验，积而为讲史之学。四史之成，有赖于此。

黎先生四史，自是做的历史通俗化的工作。难得的是，以黎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史学家，甘心于教学之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乐为历史通俗化而终生不疲。黎先生的四史，严格按照历史去写，不造作，无虚饰，极为谨严，保持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态度。随手翻检，如关于多尔衮和孝庄皇后是否结婚之谜，谓官方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销毁干净，现在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只是张煌言的四句宫词：“ 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此虽不足为据，然下文摆出了几件可疑的事，用词极为谨慎，但亦同下了结论。于康熙年间忽然有所谓朱三太子产生的事，书中是各说并存，不为一己之论。反之，对于明载的事件，书中则据以分析，断然作结。如对雍正，既述其狠，复叙其功，摆列事实，作结云：“ 当皇帝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说法，诚然可以讨论，但并非凭空而说，毕竟可称为一家言。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对于集中皇权统治，架空“ 内阁 ”，起了关键作用，是有清一代皇权政治演变的大事，对于此后清代政治关系甚大。书中对此，有较详的叙述，从军需房发展到军机房，再演变到军机处，均有考订，使我们明其原委，既知雍正的

集权，又明白张廷玉把内阁票拟之权献给雍正的始末。读史明源流演变，方可据以为论，不落入空泛，甚或牛头不对马嘴。

读史，了解各代官制是极重要事，非如此不得称为入门。本书对于各代官制的变化很注意，各有详略不同的论述。最见功力的，是对于明代官制的论证，一共写了十二节，计近 40 页文字，考订翔实，论述精确，于治史及读史皆有助。读之，既见明代官制的上承和变革，又有助于了解清代官制的承袭变化。

凡此，皆见本书作者的精神。间有未尽如人意处，亦所难免。以我所见，如关于太平天国部分，编次稍涉散乱，详略未尽恰当。写洪秀全多至 20 页，实为太平天国兴亡史，未必全然为说洪论洪，而于杨秀清只与半页篇幅，于李秀成共为 3 页，皆嫌其吝。仅举此例，以为作者参考。

这样一部五卷巨著，作者出之以对历史的忠诚，对文化的爱护，严肃从事，不掺半点虚假，让读者学习历史，热爱历史，进而维护历史尊严，在今天，历史被搅得混乱不堪之际，更为需要。今日之历史热，往往表现为小说电影的描述历史，或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或出于以己意妄解历史，全不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当然更不懂脱离开了历史真实便无艺术真实可言，于是历史变成了“戏说”，一位历史片导演甚至说“历史本来是假的”，便可任意伪造。历史云乎哉，令人浩然兴叹。望九高龄的老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出此通俗谨严的历史著作，当可一醒此辈随意描述甚至伪造历史者的头脑。在书中，作者于此写道：“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戏说乾隆”源自台湾，乱及大陆，黎东方先生发此议论，当亦深有所感焉。

与真实相一致，“在历史中求史识”，是一重要原则。“在历史中求史识”，是陈寅恪先生一生治史的出发点，已成为陈先生教诲学生与后进的重要遗训。陈先生的史学著作和论文，无不在真实的基础上，具今昔之感，兴亡之叹，此即所谓读史治史非仅读史治史而已，当于历史中求其教训。治史者无通识古今的修养和胸怀，不能达此“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以此移于黎东方先生，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本传统的讲史之法去讲演历史，其所以能励人心而鼓抗战者，亦由于此。则黎东方先生，亦得乎“在历史中求史识”之旨矣。

讲史本为中国民间传统的形式，“说三分”即是其一，后经整理修订成文，留下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今日域中史学家，掌握了历史的真实，具有通识古今的胸怀，便得管与能管历史人物之“身后是非”。讲史与历史之作用，非同小可。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末诸体，不尽足以写史传史，迄于近代，引进了通史章节体。习之多年，史家亦渐感于此亦有弊，思有所以创新。至今尚未观其效成，则口头讲史亦可备一体。黎东方先生本讲史之体而成讲史之书，其体无固定的形式，作者可自如运用；其文通俗易懂，凡识字者皆能读，则此书之出版，当有益于世道人心，非只历史之普及也。

是为序。

1996 年 5 月 19 日

附记：

此文写成后，由崔美明君电传美国黎东方先生，黎先生电传一覆。爰为发表于次，以见前辈学者之敬业精神而示两岸学术交流之谊（黎先生系由台湾而往美国定居和工作）。黎函于我之文，自是谬奖，愧不敢当。

美明女士赐鉴，并转振常吾兄道鉴：

病中得奉惠札，转示赐撰拙书之序言。洋洋十页，美不胜收。衷心感激，无可言宣。所评洪传疏漏，亦十分深获我心，敢不拜嘉。全文拜诵，无一字可以更动，大手笔于此可见。敬请美明女士录载，俾光篇幅。专此，敬谢。容小恙获痊，即行专程来沪面谢。得此好友，此生不虚度矣。专上，敬颂道安。美明女士同此，拜感。

弟黎东方敬上 6 月 6 日

1996 年 6 月 9 日记

熊佛西先生及其《山水人物印象记》

辽宁教育出版社拟重印熊佛西先生《山水人物印象记》，知我与佛老有旧，命为前言，欣然从命。

此书于 1943 年 3 月在桂林由当代文艺社出版，为当代文丛之第一种，那正是佛老在桂林主编《文学创作》月刊的时候。战时大后方，重庆是政治中心，学术文化亦有地位，然学术重镇则为昆明，文化中心乃是桂林。此书之出，非是偶然。集内共收佛老当时发表于报刊的散文三十篇，小　32 开，薄薄一本，共　117 页，非宏篇巨制，亦不能认为是佛老的代表作。出版社之所以重印，我想是别有深意在焉。

佛老逝世于 1965 年，距今不过三十年，今之话剧界人士，恐怕未必人人皆知有熊佛西其人。他的巍巍铜像，立于上海戏剧学院之内，外来参观者，恐怕不乏看了铜像方知其人之士。至于话剧界中人，未读佛老众多的剧本和戏剧理论，不知佛老毕生从事戏剧教育之经纬者，想来或亦不在少数。进而谈到文学，今天还知道佛老是一位文学家，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与许地山、徐志摩、闻一多、冰心等大师有深交并共致力于文学事业者，几乎微乎其微了。当今文学史博知如姜德明先生，前有文，颇感叹于他发现了佛老旧文，才知佛老早年的文学活动，遑论他人。

出版社之选出《山水人物印象记》重印，我想是意在不忘斯人。我之欣然从命写前言，其意亦在于此。但是，想到仅历三十载而几被人遗忘，欣然之中不免怆然。为学明渊源，重师承，讲家法，此中国学术之传统；谈文学，治戏剧，也是一样，非独于治文学史、戏剧史者为然，文学、戏剧之其他从业人员亦莫能外。不明渊源，便不知其来历变化；不重师承，便不得其本，因而家法大乱，学无所出。自然，转益多师是汝师，当更得其涯际。但在今天，无论为学或从业，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一切乱了套，舍师承、家法而徒言创造，以“新”感众，以怪迷人，以口舌之乐逗人乐，立异以为高，无非叫人看不懂。如此，重印佛老旧文，扩而大之，选一些如佛老一样几被人忘之作重印，不只是盯住那么几位大师抢来盗去，以至涉讼公堂，于世道人心方可称有益。

佛老，世纪之同龄人，生于 1900 年，江西丰城县罐山村人。幼家贫，从事农业劳动，9 岁入私塾，10 岁入小学。14 岁，其父在汉口做了茶商，派人将佛老接到汉口读书，初入圣保罗中学（实则小学），后入辅德中学。在此期间，对文明戏发生兴趣，在学校里演过戏，写过幕表剧。1919 年，中学毕业，赴北京，考入三校合并时方成立的燕京大学，主修教育，副修西洋文学（这种主副修制，是燕京大学和其他个别教会大学的一种良好的办学制度，求其博专兼备，不流于狭）。燕京生活，奠定了佛老一生方向。他在燕京，从事文学创作，写剧本，演话剧。与同学谢冰心、许地山交往甚多。许地山先生班次高于佛老两年，于佛老影响尤大，许先生介绍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得识茅盾、郑振铎诸公。在《山水人物印象记》中，佛老有二文写“燕京人”，一为《忆司徒校长》，对于司徒雷登先生的道德、学问、为人与办学备极赞颂。（想到 1952 年“思想改造”运动时，佛老对此文必痛哭流涕——佛老感情激动时常大哭——检查多次才会过关，不禁喟然！）另一篇即为《忆亡友许地山》。许先生于 1941 年 8 月逝世香港，佛老此文哭之哀，谓他进燕大时方 18 岁，什么都不懂，是老学长许地山先生带着他读书，带着他玩，“不管在做学问或做人的方面，地山都给了我许多的指导”。而新文艺之引入燕大，

佛老谓许先生之功甚大。其实许先生何止于燕大如此，30 年代，香港大学请胡适之先生往任中文系主任，胡先生转介许先生往就。在此之前，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者皆倡国学的老先生、旧翰林，于新文学甚反对，是许先生力挽狂澜，于旧学之外，引入新文学，使港大中文系新旧兼容，风气一变。我在十余年前讲学澳洲国立大学，见图书馆中书，多许氏旧藏，乃许氏死后，为国立大学买去者，可见港大包括大陆对许氏藏书皆未与重视，不禁又为之喟然。

佛老自燕京大学毕业后，于 1924 年得人之助，赴美留学。这时他写的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文章已多，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戏剧集《青春底悲哀》。赴美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戏剧和教育。在美期间，一面学习，一面写剧本，一面与闻一多、谢冰心、顾毓琇（著名科学家，后居美国。与佛老关系甚深。也是剧作家，写剧本用名顾一樵。上海戏剧学院编著的《现代戏剧家熊佛西》，将顾毓琇和顾一樵误为二人，故及之）、赵太侔、余上沅、梁实秋、林徽因等共同从事戏剧活动，与闻一多交尤深，1946 年闻一多被刺身亡，佛老哭了一整天，写长文《悼闻一多先生》，载《文艺复兴》二卷一期，称之为“ 诗人、学者、民主的鼓手 ”，其文感情真挚，气势磅礴，今日读之，犹觉震人心肺。

1926 年 9 月，佛老自美归国，除短期兼任燕京大学文科讲师，从此开始了他戏剧教育家四十年的重要实践，为中国戏剧教育的奠基者，培养了大批的戏剧工作者。佛老于此，成绩显著。他先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后学校改名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佛老仍任戏剧系主任。除了办学，他仍写剧本和理论不辍，并时亲任导演。此时即有“ 北熊南田 ”之称，佛老与田汉齐名。1932 年，佛老加入晏阳初所创办和领导的平教会，赴定县从事平民教育工作，任戏剧研究委员会主任兼定县实验区专门干事，以戏剧为武器，开启民智，鼓舞群众，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平教会所从事的工作，连同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教育实践，以及其他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等，过去都被贬为改良主义而歧视之，似乎，救国之道除了革命便无他途。这种论点的偏颇，日益为事实所证明。佛老躬行实践平民教育，亦戏剧界中的先行者。

抗战事起，佛老率领抗战剧团，由北平经长沙而成都，于兹三年。抗战剧团解散后，佛老办起四川省立戏剧专科学校，至 1941 年学校为四川省参议会胁迫政府解散，佛老应张治中将军邀往重庆任中央青年剧社社长，只五月，不辞而别，去桂林，办刊物，写文章，写剧本，写小说，参加剧运，一住三年余。湘桂大撤退，滞留贵州，辗转贵阳遵义间。抗日战争胜利，1945 年 11 月到上海，从此定居，以至于 1965 年逝世。在上海，他全力以赴办戏剧教育，任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并仍写文章不辍，又投入民主运动，佛老不老。上海解放以后，佛老初为实验剧校改名为戏剧专科学校的校长，后剧专与山东大学艺术系及上海行知学校戏剧组合并而成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不久易名为上海戏剧学院，佛老均任院长，以迄于逝。

以上述佛老一生事业，自不足以尽达其人之实。感令人之多已忘记甚或不知斯人，乃为抄录如上。至其著作，无论是戏剧作品、戏剧理论、小说、散文、随笔，写出来恐怕是一大堆。上海戏剧学院编有《现代戏剧家熊佛西》一册，可惜没有开列一个详尽的佛老著作目录。

我初识佛老，在他 1938 年率领剧团到成都之时，事出偶然。我的亲戚陈

筑山先生，时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曾参与领导平教会事宜，与佛老有旧。佛老的剧团演戏，总送不少戏票给筑山先生，我家乃得分享。我其时是个蒙昧少年，全不知世事，但醉心于话剧，每次演戏都去看了，也因此得识佛老，但对佛老之人与事，则无知焉，只不过觉得这位望之俨然的美髯公其即也温而已。及后，佛老在桂林办刊物，他的刊物和文章，倒常看，然于其人其事，所知亦不多。我读书于燕京大学，可以称佛老一声学长。然他是燕大开创的第一届学生，真正的元老，我与他读书之时相差了二十年有余，何敢谬托？和佛老真正熟起来，是在 1946 年我到上海之后。其时我在上海大公报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和佛老接触渐多，由工作来往而有了较为频繁的私人往来。佛老看我对于市立剧校的宣传甚为热心，以为此人可信，在各种场合，包括他的东横浜路兴立村家里和他经常请客于此的北四川路凯福饭店，每作倾心之谈，不以我年少而轻视之。佛老为人，热情豪爽，天真可爱，说话本口吃，易激动，便更口吃，然一副真情，形之于色，发之于声，甚至表之于手舞足蹈。他的天真，有时不免过分。1949 年佛老申请入团，时已 49 岁，今当不可解，然移于其时其人，亦易解。卒批准为团友。

市立剧校被国民党视为异端，每思取缔之。一次我得知市参议会有一多人签名的提案，要求政府取缔剧校。急忙打了个电话给佛老。电话放下不久，佛老忽然亲临我家，看他颠抖吃力地登我所居之陡峭狭窄的四楼，我不安于心。佛老与我，年辈与年龄相差甚多，是我的前辈长者，而他与我这个小子之间，互可信托。我受命为《文萃》杂志写《失踪人物志》，写被特务机关逮捕之人几位，其中一被捕者之妹在剧校读书，我托佛老为我约他的这个学生和我见面谈话，佛老欣然做了周到的安排。《文萃》烈士陈子涛为我至友，与佛老相熟，常往佛老家组稿。佛老对我说：告诉子涛要当心，他挟着个大皮包到处跑，总要出事。后果然。解放后我们举行《文萃》三烈士追悼会，我请佛老与会讲话，他还讲了这件事。

有一件令我永不能忘的事。我的胞弟振肃想进市立剧校读书，我告之佛老。佛老不但令其入学，还特别一再关照他的左右二丞相（朋友如此戏称）教务主任吴天、总务主任邱玺经常照顾振肃。但为此事，解放以后却引来了出乎佛老亦出乎任何人始料所不及的麻烦。上海解放后不久，邱玺忽以特务罪被捕。我亲见佛老在一次会议上痛哭流涕，检讨错用人之罪。我对邱玺被认为特务之事并未在意，自亦不明白其真伪，但却给振肃带来终身之孽。时振肃参军，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他交代了和邱玺的关系。从此被整得神魂颠倒，终至精神分裂，四十余年不治，以迄于今年初病死于精神病院。他每念念有词，言不离邱玺，我告诉他，邱玺已经平反，不是特务，他茫然不解，语如故。当此之时，我心几碎。邱玺平反后在某区剧团作导演，我偶遇数交，他总问及我弟，问病如何而起，现状如何。我自不能以实告。事虽起因于邱，而与邱何干焉？佛老也对我问过振肃之病，我亦含糊以对。

50 年代之后，和佛老往来渐疏，然每见，佛老待我热情如旧。后来听说，他有可能遭“右派”之运，是石西民力保得免。60 年代，相遇更少，偶晤，见他似有寂寞之状，亦不便深问，他的追悼会，我亦因事未去。想不到，他死后，竟还有我与他创办的上海戏剧学院一段姻缘。“文革”后期，我被发配戏剧学院“冷藏”，虽然什么事也没有做，上班时间为时亦甚短，竟蒙上海戏剧学院认我为校友。得参与佛老的弟子之列，于我有荣焉。他的门墙桃李遍天下，早期弟子贺孟斧、杨村彬，中期弟子李天济、刘沧浪、屈楚、徐

昌霖等，皆我熟人，得与以上诸友为伍，虽是未入门墙，我亦高兴。

为此文，未尽佛老业绩之万一，亦非墙外如我所能尽。如总而论之，佛老于中国文学艺术的贡献，戏剧教育家应是首列，戏剧家及戏剧实践家居他业绩之二，文学之事居其三，但不能漏了他。也许最后还有一个书画，佛老能书善画，与白石、大千二大师皆有深交，且有文写二大师，尤以论白石为多。

1994 年耶诞前夕竟日草

《中国文化之谜》第四辑序

犹忆 1982 年底复旦大学历史系举行中国文化史学者座谈会之时，同人多目为开辟草莱之举。这自然是赞词。然从反面落墨，不免是历史的讽刺。立国数千年，以文化辉煌闻于世，在新国家建立三十三年之后，方始议论文化为何物，倡导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岂非怪事！

轻视文化，摒弃文化史，必将导致文化的毁灭。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无存，其国家与民族又将何以立足？“ 文革 ” 殷鉴在迩，人谁能忘？“ 文革 ” 之难，其原因固是多方面的，其内容也远远超过于文化的涵盖，而既托名文化，亦发端于文化。近之如以批判《海瑞罢官》为 “ 文革 ” 之序幕，远之如以批判《林家铺子》、《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几部电影为锣鼓之前奏，无一非指向文化。且此等被批判作品皆属名作，其作者又无一不是文化界有名人物，那么，“ 文革 ” 之起，似亦可看作仇视文化之一端。60 年代初声称‘ 资产阶级消灭了，唯一可以和我们较量的，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 ”，预示更大的山雨将来。“ 文革 ” 提出 “ 知识越多越反动 ”，那已经是杀机毕露，彰明昭著的要毁灭文化、消灭知识分子了。

这种做法，虽然超过了古往今来的全世界历史，然其思想渊源，则其来有自。老祖宗正是秦始皇。然而，秦始皇只不过坑了四百六十几个知识分子，所焚之书，限于《秦记》以外的列国史乘及非属博士官之学的《诗》、《书》等，其数目自然有限得很。著名史学家汤因比分析秦始皇的焚书，认为是“ 以防古代中国混乱时期春秋战国以来各家学术思想会危及他所要实现的新社会秩序 ”。其说倒有些近于 “ 文革 ” 期间 “ 烧四旧 ” 的理由。由于 “ 四人帮 ” “ 烧四旧 ” 的范围比秦始皇焚书的范围大得不知多了若干倍，说明“ 四人帮 ” 的神经比秦始皇衰弱许多。

汤因比还引了古代叙利亚的例子。他说，当攻克亚历山大港之时，哈里发阿抹对向他请示如何处理亚历山大港有名的图书馆藏书的一位将官指示说：“ 如果这些希腊文书籍符合上帝的圣经，那它们就是无用的，犯不着保存；如果不符合上帝的圣经，那就是有害的，应当予以销毁。 ” 这位统治者的逻辑真是妙极，其说法复如是冠冕堂皇。“ 据说就是这样，整个图书馆费了九百多年收集起来的藏书，遂被拨充公共浴室的燃料而化为灰烬了。 ” 叙利亚焚书的范围，看来超过了我们的 “ 文革 ” 所为，然只限于一个图书馆的藏书，数量自然有限，更何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书籍亦本不如今日，所以 “ 文革 ” 焚书的规模仍然是世无其匹。

汤因比谈了希特勒的焚书，却认为 “ 由于印刷术的发达，像这样的暴徒要想收到其所预期的 ‘ 全功 ’ 也已更加困难 ”。上举这些历史上毁灭文化的例子，至今发人以深思，然亦说明其笨拙与愚蠢。汤因比举了一个手段巧妙的独裁者的做法。土耳其的凯末尔为了 “ 使他的国人摆脱传统的波斯文化的羁绊，硬把他们纳入西方文明的塑模，但是他不采取焚书的办法，而只满足于改变字母。从 1929 年起，一切书籍报刊都要用拉丁字母印行，所有文件契约要想在法律上有效，也非以拉丁字母缮写不可。 ” 汤因比接着分析说：“ 既然有了这样一条法律付诸实施，这位土耳其的最高领袖当然没有必要再去仿效中国秦始皇或阿拉伯的哈里发了。 ” 而其结果是：“ 现在所有波斯文、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的古典文学，已经不能为新生的一代所理解了。 ”[①]

[①] 以上所引汤因比论述，均见其所著《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索麦维尔所写三卷节录本中册，

凯末尔在土耳其所做，似属于文字改革之列，不过不同于我们的简化汉字，自然其动机与效果可以分析，究不能与秦始皇、哈里发、希特勒之流的直接毁灭文化相提并论，汤因比是把它作为“文明的解体”中灵魂的分裂而出现的未来主义去研究的，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一般说，毁灭文化，是仇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表现。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一向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毛泽东还不止一次地发表过这类文章。建国之后，情况有所变化，思想改造运动和文艺整风，似乎还比较客气，不那么干戈相见。以后，年年有运动，多数是在整知识分子，美其名曰学术批判，其实所批判者何止学术观点！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那么紧，动不动就上纲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胡适远在海外，来一个大批判，无非是杀鸡儆猴，给留在大陆的所谓胡适门徒或受胡适学术观点影响的知识分子看。胡适在政治观点上确有反动与应批之处，然完全抹煞其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与学术上的贡献，远不只是不公正的问题了。一部电影《武训传》，搞得举国声讨，电影工作者与提倡平民教育的教育家人人自危。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被批得一无是处，而试看今日之红学研究，又有几位跳出了当年胡适、俞平伯所研究的手掌心？回头来还得承认俞平伯是《红楼梦》研究的权威。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孙冶方的经济学观点，也是那么不顾事实、不讲道理地胡批一通。如此等等，无非是文化有罪，知识该死，知识分子只能箝口而不言，或者众口齐唱一个调子。万木无声，太平静了，平地一声，乃有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反应如何，似乎不言自喻。乃竟果有直言之士——又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继之而起则是反右派运动。反胡风和上举多数的挂着学术批判名义的运动不同，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风暴，其结果更是触目惊心。

历述批判知识分子往事如上，非在算旧账。不难看出，多年以来，不尊重知识，不爱护文化，隐成一串之线。则大跃进时期，“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提示，似是“顺理成章”，而“文革”时期大标特标“知识越多越反动”，也就索然可解。如此，“大革文化命”乃成必然。根据汤因比的研究，对于文明与文化的挑战，其势愈猛，其反应必然是愈激烈。文化毁灭殆近于无，而一旦“四人帮”覆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喷薄而出，万木复苏，对于文化的渴求与期待，乃成万马奔腾之势，这就是近年兴起的所谓文化热潮之起因。

狂潮之来好得很。这是救国救民的狂潮，说明中华民族之生机历竭而不衰。人或谓之曰“此趋时也”。我将答以趋时作何解，所趋之时是什么？如以趋时为观风，此殆小人之行。所趋之时，为国家转衰为盛之时，民族转敝为振之时，中华子孙皆不能辞其责。不趋此时，即是“背时”。所谓“背时”，那是四川话骂人倒霉的意思。那就是不能顺应时代之潮流，必遭致茕茕独立，向隅而泣。那是活该。我们就得趋这个时，沉潜下去，关心和研究国家与民族文化攸关的大问题。研究自非人人之事，关心则人谁无干？

从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着眼，与当今世界文化作对比，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文化大大落后了。这种落后，在封建末世已见端倪。其时先进的知识分子起而呼唤，体用之争，本末之辩，于事或有所补，于情或有所顺，而终于无救于大局，传统的负担太沉重，每走一步必经千难万险。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兴起，犹如一声春雷而惊醒万物，惜乎反传统（即学习先进。具体言之，

即是请进德赛二先生）之大功，因救国（民族矛盾，亦即五四之时的爱国运动）之眼前急迫而未竟其功，致使数十年后新中国建立之际，犹殷殷然期待德赛二先生之将至。十年蒙昧，复成闭关锁国，一旦眼开，方惊世界之殊。于人乎乃有开放与改革此深得人心之盛举。所谓开放，自然包括文化这个大范畴。

总结过去，立足现在，放眼将来，且以下面几句话概括：辉煌的过去，洪荒的十年，奋起的现在，有待的将来。前三句容易晓，后一句称为有待，盖言端看我们目前的奋起程度如何，政策持续性怎样，是以姑悬问号，以待来兹。

一个大问题是迫切需要文化的现代化。如果不充分注意文化问题，不改造传统的凝固的封闭文化，对于四个现代化的完成阻碍极大。所谓文化现代化，最重要的含义，是人的现代化，即是人的观念的改变，人的价值的提高，人的学识与文化素养的增进，是广义的文化，而非限于文化实体设施的建设，那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事。据说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已经有人议论及此，说是现在提出的“四化”，多在生产力的发展，是小“四化”，除此，还应该有个大“四化”。我以为大“四化”之端，即是文化的现代化。

否定传统，那是民族虚无主义。反之，侈谈昔日的辉煌，亦无救于今日的落后。昔游云冈，石壁之上，石窟艺术诚然辉煌，令人神往；石壁之下，大同煤矿的落后与矿工生活的困苦，则使人浩叹。龙门沿途的脏乱，也和古文化的发达极不相称。豆腐、太极、功夫之类词语，今天在西方，已经不用意译，只须读音，人即可解。这自然也是一种文化，然如满足于此类事物即为社会主义中国文化的代表，宁不可悲。文化危机表现于多方面，戏曲界的朋友竞谈戏曲危机，以为不合潮流，亟应改革。但是，也有人以洋人赞京戏或唱京戏而作为救亡之草，以掩盖危机之说。实际，洋人猎奇与一时的兴趣，并不能说明戏曲文化无危机。更有一种奇怪现象，一方面夸谈古文化，一方面并不爱惜文化，随意破坏文化之事，无处无之。历史短的国家，往往视一、二百年的建筑和其他文化遗产为珍宝，而加意爱惜与保护。我们则反之，历史太长，坛坛罐罐太多，反而不稀奇了。如此等等，都是一个文化观念问题。而这一切，又离不开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如“五讲四美”，诚然是文明的表现，光靠标语口号，而不从提高人的文化素质着手，五讲四美能达到吗？即使一时达到，又能持久吗？心窃忧之。犹忆当“五讲四美”初提出之时，加拿大著名历史学教授陈志让对我说：“这就对头了。”（他是四川人）我答云：“就怕是一阵风。”现在果然宣传也逐渐冷却。并非我们就是喜欢搞一阵风，未足够重视文化之药方而乏治本之道也。

今天谈文化问题，和清末至“五四”谈这个问题仍然一样，离不开吸收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这个主题。回忆近代历史，我们在中国文化观（指广义的文化）上，有过多次的争论和各种意见的发挥。除了影响一时的体用之辩，本末之争，其著名者，诸如：吴稚晖倡科学，蔑传统，说是古书都该丢入茅厕；章太炎提倡发扬国粹，斥吴稚晖为洋奴、买办之才；蔡元培办北大主张兼容并包，被林琴南指为“覆孔孟、铲伦常”，而兴起一场论战；20年代初，杜威、罗素相继来华讲学，以中西文化优异与能否融合为题的各家论述盛极一时；以丁文江与张君劢各为代表而有科学与玄学之争；梁启超欧游归来后力斥西方文化，提倡东西文化融合之说；学衡派与胡适等展开论战；

柳治徵提出以孔子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论；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影响一时；何炳松等十教授提出了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主张；鲁迅主张拿来主义，蔡元培则主先选择而后拿来，……如此等等，众说杂陈，旨都在为中国文化找一个出路。

沉寂了多年的老问题，今天在新形势下提出。解决之道何在？一在清理传统文化，逐渐弄清楚，何者为精华，何者为糟粕，去糟粕而留精华。二在对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要介绍引进，细加辨别，决定取舍。中西文化观太不相同，我们未必真了解西方文化。加以中国传统之深厚，吸收外来文化往往失其本来面目，甚而是面目全非。以西方之新复中国之旧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这个问题，我在其他文章中详谈了，此处不赘）。所以更须源源本本，真真实实，然后再加分辨，避免桔逾淮而为枳。全盘西化是杞人之忧，反过来说，以中化西，也未必都好。

今日吸收西方文化，与昔不同，有一大利，那就是我们是有充分主权的国家，再无所谓文化侵略了，甚而文化渗透的说法也不宜滥用。世界大通，文化总是要输出与引入的。输出者何，引入什么，在主权平等的条件下，不是与枪炮俱来，全在自由选择，那就不能再称为文化侵略。“万里休言道路赊，有谁教汝渡流沙？只今中国已多事，何事无端更乱华！”韩愈排佛，牵怒印度译经僧的陈腐思想，不当重演于今日。

上面所说，足以说明今日“文化热”兴起的因缘。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之谜》的征稿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也就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施宣圆、林耀琛、许立言三位主编的《中国文化之谜》不胫而走，大受欢迎，堪为之喜。据说此书可出至十多辑。蒙编者给我看了部分来信来稿，都已经是厚厚成叠。来信都表示欢迎这个专辑，进而或提供题目，或提出问题，或引发为文，这就说明，大家都重视文化这个多年被冷落或竟至有罪之物了，宁非好事。

提倡文化，重视文化，发扬和建立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文化，除了前面说过的要有一个文化的现代化，作为研究，不外二途：其一是作高层次的文化问题与中外文化史研究；其二就是普及《中国文化之谜》这类知识性的启蒙著作。两者并重，而互为关系，各有其责。《中国文化之谜》是普及性读物，尽管所谈问题都是单独的个别的，亦能供人启发而引入宏观的和整体的研究。汤因比的皇皇巨著《历史研究》，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人类的文明史，用节录本作者索麦维尔的话说，那“就是在文明社会第一次出现后，人类的历史经验的性质和式样如何的问题”。[①]而汤因比在作这项研究时，他非常强调“发生作用的种种力量，并不是来自一个国家，而是来自更宽广的所在”。因此提出“要对整个社会的作用作全面的了解，否则便无法了解它们的局部作用。”[②]又说：“为了便于了解局部，我们一定要把注意焦点先对准整体。”[③]《中国文化之谜》提供了许多局部与个别，其作用之一，当亦为整体的研究提供了例证。欣喜之余，乐为之序。

1986 年 12 月 9 日

---

① 《历史研究·节录本编者说明》。

② 《历史研究·节录本编者说明》。

③ 同上书，第七页。

独辟蹊径创新境

——序《乡土童年——回忆消逝的中国传统》

张倩仪女士《乡土童年——回忆消逝的中国传统》，是一部奇特之作。在当今著述之林中，它独辟蹊径，另开新路，从当代时流大量的自传文字记载，去感受时代，研究历史，条分缕析，发而成篇。在张女士笔下，我们看见了一个消逝的时代，消逝的传统。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这个传统的内容是什么，乃历历如画，展现于眼前。胡适力倡传记之作，谓其用在于“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新路”。此言诚是，为一时传记写作之兴，起了鸣锣开道之功。张倩仪女士利用当代时流多达一百五十余人的自传，专门研究他们的童年，写成这么一部别开生面之作，真是独得新境了。

19 至 20 世纪之交，时代更迭，新旧交替，于中国而言，诚所谓千古之变局，而中西文化之冲突，贯穿始终，愈演愈烈，于时所有之求变，上自意识变化，下至物质探求，思想之交易，学术之所向，制度之求革，风俗之望改，“因政教而成风俗，因风俗而成心理”（章太炎语），无一不为此两种绝然不同的文化之冲突所衍绎以发生。在本书作者所阅读和研究的所有自传中，上而及于宏观之文化，下而见乎具体之施为，亦无一不反映了旧之逝，新之来。分门别类，条列以陈，乃所以补史籍之未载，得史事于感受，娓娓道来，如述身之所经。这也是一种史识。陈寅恪先生一生强调“在历史中求史识”，脱离开了历史，无史识可言；史识之得，于亲历其事者之缕述，亦在其中。本书作者于研究转述中传播了史识，读其书者亦可得史识焉。是以，此作便是从名人自传中看时代与社会之作，了解何谓文化之作，何谓传统文化之作，进而便可悟出文化承传与创新之义。此作从各家作者童年之所身受，分纂为教育、家族、环境、游戏与工作、科举、宗教、价值观、女性诸篇，而尤详于教育，其所举于教育篇者，多达二十三题，此亦自然之事，主题即在“乡土童年”，童年所经，自以受教为主。作者《自序》，不称此作为研究之得。然无研究不足以成书，其教育篇所述，更多分析，乃是以具体事例条分缕析，尤为研究有得之作，应更予留意焉。

作者近年多次返回大陆，眼见“70 年代以前的中国一去不返，中国人洒血泪所追求的，都在十多年中以经济之手无声地做到了”（本书《自序》），其言甚是。然作者在这本对 19 至 20 世纪之交的传统文化的审视和研究之中，就文化之传承言，亦有所感，请见作者《自序》的两句话：“历史总喜欢跟我们开玩笑，今日放弃的，将来我们或会缅怀甚至抢救。”“人往往走完路之后，才回味路上的片段风光，而风光已经不再。若未走完即回首，是否可以减少所交的学费。”我欣服其说。我尝言，以著名的徽州文化为例，明清之际，徽学，徽商，徽戏，徽菜，以至于徽州乡土文化建筑，是相继而起，同时大盛，其间经纬，很值得研究。我们今日何以经济大盛，文化则衰落不振？在经济大潮中予文化发展以应有之地位，应是亟须予以考虑并采取措施的事。是书之作，或亦可以于此有启发也。

1997 年 3 月 18 日

《上海工运志》序

在上海多达一百几十部的专业志书当中，《上海工运志》应为重镇之一而具其特色，引起注意。这是上海这个城市的历史所使，无可争议。近代上海，曾经以其多方面的光彩照耀人眼，而在其璀璨的历史篇章中，世人尤习知于，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的诞生地。溯自 1843 年开埠之后，外国近代企业建立，上海产生了第一批产业工人。至 19 世纪 60 年代，自强运动（世所习称为洋务运动）应时而起，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近代工业大兴，而上海为其基地，于是产业工人数量大增。及至同世纪 70 年代，民族资本亦于上海投入近代企业，促成了近代工人数量的上升。甲午之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开外资输入的先声，其另一面则是，十余年之间，引发了上海工厂大增，工人阶级大盛。上海工人阶级由无到有，由幼到壮，居全国发展之先列，而其在爱国、反帝、反压迫、反剥削、求解放历史长河的工人运动的光辉斗争中，所做为，所呐喊，所奋斗，所牺牲，所成就，皆足以惊世界而泣鬼神。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人运动的性质和任务均有本质变化，上海工人阶级居百业之首，从建国初期的恢复生产、保证建设，到今天的以改革、开放为主导，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奋斗，其任也重，其成也大。凡此种种，世所悉知，上海人尤明其详。今汇为一部洋洋巨观的《上海工运志》，把 150 年的所经所历，条分之，缕述之，明其源，载其流，述昔所以知今，论今可以明后，其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必矣。

上海工人运动的壮烈丰富，包括其斗争的曲折及其失误的可为教训，应该是历史学者研究的源泉，无论如何论述，总有未尽。作为志书，这部《上海工运志》则是开创之作。志与史，源同流异，事同法变，相辅而相成者也。如按习惯的说法，志者但记其事，史者除了记事，还得从而论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求历史的规律 ”，尽管这个所谓规律，言之多年，在史家笔下未必即能求而得之。志与史的职能有所不同，要之，历史二字则是无论志家与史家皆所一刻不能忘，脱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历史，则无志书与史书之可言。所谓历史，不管谁来写，不管事过多少年之后来写，总要纳入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中去论述。换一句话，亦即是陈寅恪先生的“ 在历史中求史识 ”。一切纳入历史之中，方有史识，亦方可以言“ 在历史中求教训 ”。盛衰之感，兴亡之叹，是从历史中来，是从写史之书得来。志书尽管是述而不作，但亦非是那么“ 消极 ”，同样，可以在“ 历史中求史识 ”，所记之事愈真愈悉，所得之识愈深愈切。而志书一向以记事详悉、收罗笔至见长，则此《上海工运志》之出，更可以补上海工运史诸作之所不备，而收上海工运史研究之大效于来日也。我其信诸。

从结构上说，本志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起于 1840 年，止于 1949 年；下编起于 1949 年，止于 1994 年。这是按历史的划分而然，断限得宜，起止恰当。因此在上编中，记述重大经济、政治斗争，从 1840 年至 1949 年，划分为三大阶段去写即相吻合。按此结构，著为体例，既符志书之例，亦合本志内容所要求，无量体裁衣之感，非削足适履之作。其成文也，乃详略皆宜，不繁不陋。谨志数语，以贺其成。

1996 年 8 月 5 日

《龙华镇志》序

在车载斗量的地方志书中，向有“乡里小志”之一目，为一乡一镇之小史能备志乘，要必有因。龙华，上海市徐汇区区区一小镇，地不过八点零八平方公里，人不足四万，竟尔编修成洋洋 70 万言的一部《龙华镇志》以状其今古，我以为，这是与龙华的盛名相符的。有其负盛名的龙华，应得符其实的《龙华镇志》。龙华盛名，由来有三。其一，古建筑龙华寺与龙华塔；其二，桃花成林；其三，杀人之地。说如后。

龙华古寺，算得上名刹，龙华一地的得名，即由此寺。龙华是先有寺，再有塔，然后才有了龙华的泛称，再后方有龙华镇的专名，可以说，龙华一地，最耀眼者首推龙华寺。龙华寺的规模和建筑，诚然不能和江南一些名刹相比拟，始建的年代亦乏可信之证，然在上海一地亦复不可多得，应是可以珍贵的了。“天下庙宇都一样”，此说深入人心，其实这只是泛泛而言。庙宇建筑有其固定格式，这和中国民居、宫殿建筑有其固定格式出于同样的美学心理。但从行家看来，亦自各有其特点，各有其匠心，庙宇并非就绝然一个样，如同民居、宫殿建筑并非就绝然一个样，其理相同。于是，除了礼佛，龙华寺亦为可供游览之地。寺、塔相倚，更增游趣。龙华晚钟，早归入沪城八景；而所谓龙华六景，亦非纯是骚客虚张之词。桃花盛开，游寺赏花，龙华乃成海上独得之地。

这样一个令人心醉之地，却又在上海人心目中留下了阴森可怖的形象。龙华，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松沪护军使署设于此。军阀混战，齐卢大战，搅得上海人心不安，松沪护军使署是个指挥中心，龙华一地，已开杀人之风，许多无辜人民被杀于此。而继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从 1927 年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招牌挂在了松沪护军使署原址门上，大恶继前凶，龙华成了屠杀革命人民的最大刑场，一时杀人如麻，据统计，十年之间，在此被杀的革命人民和中共党员数以千计。遮天乌云之下，桃花开放鲜艳如旧，却似为烈士鲜血所染；龙华晚钟幽鸣如昔，实似为烈士忠魂安息而祷。此情此景，为今日上海人民游龙华增加了一个更可纪念的内容：缅怀先烈，悼念忠魂。当然，游人过松沪护军使署及其后继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旧址，也会想到，淞沪商埠督办公署也曾在这个衙门办公。学者出身的丁文江做过淞沪商埠总办，是在他手里，于 1927 年 1 月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为国家收回了司法主权。这大约是军阀政府为上海所做的唯一好事。

合以上三者，纪之以实，《龙华镇志》得以突出其异于众的特色，而为读者所赏。由于龙华寺在龙华一地的重要，《志》中记述多至一卷，有其必要。编纂者于龙华寺及塔的始建年代，并未断然采取吴大帝赤乌五年及十年之说，亦否定了宋太平兴国二年由吴越王钱俶命人建寺及塔之说，而定前说为传闻，后说实在是重建。何以见其然？《龙华镇志》附《始建考》长文以明之，可以供读者之参考，史家之议论。于此，《龙华镇志》打破了志书“述而不作”的体例，为他志之类于此者开其先河，大获我心。理论从实践中来，为理论所缚而不得展其手足，这个理论也就应该有所破了。《龙华镇志》采条目式，而以类统目，不致散乱无归，亦为可行之法。于此，我也佩服编纂者的措置。

1996 年 11 月 12 日

中华文化最关情

——《明报》纽约版创刊志贺

《明报》创刊纽约版，万里遥祝，中华文化最关情，谨以文化二字致意焉。

一国之兴衰隆替，诚然有诸多因素，并包含了各种内容，而文化厥为首要。文化之不存，即使其国家尚在，亦复奄奄一息，若有实无。古人说：“亡其国者必先亡其史。”历史是文化的记载，历史亡，这个国家也就如同亡了。世界文明古国，文化延续数千年不断者，推我中华。即使按照汤因比的论述，中华文化亦无愧色。因为中华文化诚有衰微之时，然延续以存，侵寻复振，不绝如缕，昂首云天者，还见中华传统文化一经注入了新精神的可贵。

中华民族古称华夏，按照华夏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今人喜用炎黄为代表。我不取焉。华夏历史，实际迄今只有商文化遗址得到了科学论定而取得了学术界的公认，早于夏以前的炎黄二帝之事渺乎不可考，是以司马迁写《史记·五帝本纪》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司马迁采取了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们不必夸古，历史须要信而有徵，文化须要信而有徵，以中华文化代称炎黄文化，是信而有徵的。我们可以以中华文化自傲。

言中华文化，海内同胞，海外华人，海峡两岸人士，即将回归的香港人士，毫无疑问，都能取得共识，热爱我们的文化，关情我们的文化，发展我们的文化。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中国古老典籍中，最早解释文化的记载。以文化成，正是人们团结在文化旗帜下的表征。章太炎说：“因改教而成风俗，因风俗而成心理。”移风易俗，发自内心，文化的作用大矣。国人习知徽州文化之风靡一时，考明清之际，徽商兴起，徽学大盛，徽戏风行，徽菜盛张，徽州乡土文化建筑引人入胜，这一系列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是同时相继，正说明文化的重要。如以上海这个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发展的历史为例，上海之所以成其为上海，并非只由于经济，还由于上海的文化所决定。历史上的上海，是个有高度文化的城市，历史上的上海人，是有文化的人。明末学者顾炎武说：唐代的城郭都市，都是道路平直，城高墙厚，宋以后就不行了。这就是一种文化内涵。今天，经济大潮席卷中国大陆，如果以史为镜，应该多考虑昔日的徽州文化、近代上海文化，想一想顾炎武的话，给文化以应有的地位，不要经济独盛而文化不振。

《明报》这样一家有影响的报纸，一向致力于文化，宣传文化，建设文化，宏扬文化。今当创刊纽约，我想，必当秉其初衷，高举文化之旗，奋力以进。中华文化最关情，文化，文化，三致意焉。

1997 年 3 月 24 日

《黎澍之路》后记

黎澍逝世，瞬逾七年，墓木拱矣。遥想伊人，地下所思，诚不知是何况味。生者一面，岂止逝世之初所计议诸事，如编辑出版《纪念集》、《书信集》、《传记》，皆因种种原因，未克如愿。甚至于黎澍生前亲自选定的《自选集》亦屡受阻而不能问世。此稿初被原约选单位毁约拒之门外，后交上海某出版社，搁置数年亦终于设词退回。最后由广东的出版社见义勇为而取去，如无他故，大约最近可以出版了。

值得高兴的是，黎澍的老友张生力，以八十高龄写成了传记《黎澍之路》。去年 12 月，得张老寄赐其稿，拜读之余，深感此稿于黎澍生平提要钩玄，得其大体，所着力者在黎澍晚年学术思想的清理，对于黎澍探求真理的丰功伟绩，条列清楚，论证得当。斯作亟当予以刊布，为学术界留下黎澍踏实的脚印。商之京沪友人，均如是云然。斯时适应香港大学中文系之邀前往讲学，乃携张稿前往。到港之初，请询几位老友。他们热心支持，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以为张稿（四万余字）刊之于杂志太长，出版一书则太短，不如收集一些纪念黎澍的文章，合张稿为一集。

事情按这几位朋友的意见进行，收集来十几篇纪念文章，蒙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万雄先生全力支持，得成是书。稿件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黎澍之路》，新华社所发黎澍逝世消息及其他文字，均属传记或学术思想综述一类，第二部分则为黎澍生前友好的纪念文字。遗憾的是，当时纪念文字甚多，限于篇幅，只发了这些篇，遗珠之责，应归于我。

编辑出版这本书，以奠黎澍亡灵，读者如能从中认识到黎澍毕生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尊之崇之，起而效之，则学术幸甚。

1996 年 1 月